

ISSN 1016-0566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出版

◎ 第31期 ◎



北京「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開幕典禮



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的「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  
左起：桑兵教授、李國祁教授、白永瑞教授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三十一期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出版

---

<b>學術會議</b>	從北京到南京——參加兩次近代史盛會紀略..... 陳三井	1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任育德	12
	「二十世紀中國戰爭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 吳餘德	18
	「讓證據說話：案類在中國」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楊芳燕	24
<hr/>		
<b>學術演講</b>	China Will Complete Its Transformation in Forty Years ..... Te-kong Tong	31
	Homogenizing the World's Cultures? Global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Sherman Cochran	37
<hr/>		
<b>學人簡介</b>	口述歷史的開拓者與民國軍事史、山西區域史研究的尖兵 ——陳存恭先生的研究志業..... 沈懷玉·林德政	53
	李又寧..... 吳喆	66
<hr/>		
<b>研究概況</b>	近四十年來香港醫學發展史的研究概況..... 吳國樑	73
<hr/>		
<b>史料介紹</b>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友聯資料介紹..... 區志堅·侯勵英	92
	清代小商販稀珍資料五種..... 王爾敏	102
<hr/>		
<b>檔案與研究</b>	英國檔案所見蘇俄與孫中山及國民黨的聯繫 ..... 李丹陽·劉建一	115
	日本檔案數位化概況介紹..... 莊樹華	134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成立一年來的概況..... 蕭富隆	141
<hr/>		
<b>研究行腳</b>	「大陸尋奇」、「中國經驗」：大陸訪查資料經驗 座談會紀錄.....	145
	上海查檔生活二月行..... 孫慧敏	168

---

<b>新書評介</b>	容閔以後的故事——李又寧教授的華族留美史研究	
	叢書評介.....	吳喆 176
	蘇小東，《中華民國海軍史事日志》.....	王家儉 181
<b>大事紀要</b>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2000.9-2001.3).....	張珍琳輯 185

---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編輯委員 呂芳上 張玉法 陳永發 許雪姬

謝國興 張淑雅 劉素芬 李達嘉

楊久誼 巫仁恕 洪秋芬

執行編輯 楊久誼

助理編輯 張珍琳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31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電話：27824166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文芳印刷事務有限公司

定價 新臺幣100元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出版

GPN 509538890011

ISSN 1016-0566



學術會議

## 從北京到南京 ——參加兩次近代史盛會紀略

陳三井\*

### 一、楔子

九月裡，秋風送爽，桂花飄香，陽光和煦，氣候不冷不熱，是前往大陸觀光旅遊、開會訪友的最理想季節；九月間，又是新學年度伊始，各機關驗收過去一年成果，籌謀未來新計劃的一個開端，所以同樣是廣邀天下英雄好漢，舉辦研討會相互切磋的最良好時機。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於 1950 年 5 月 1 日，五十年來在范文瀾、劉大年、余繩武、王慶成、張海鵬等幾位所長的領導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據統計已出版各類著作 332 種、資料書 166 種、譯著 67 種、工具書 20 種，發表學術論文及其他文章大約 1,765 篇，<sup>1</sup>成績斐然，堪稱大陸研究近代史的重鎮而無愧！爲了紀念五十歲生日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也爲了推動學術交流，並且爲了迎接新的世紀、新的千禧年的到來，該所特於 2000 年 9 月 6 日至 10 日召開「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成立有年，在張憲文教授主持下，推動民國史的研究不遺餘力，已經召開過三次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會議，並出版《民國研究》不定期刊物四期。爲了進一步繁榮中華民國史的學術研究、交流研究成果、增進中外學者間的合作，該中心特於 2000 年 9 月 22 日至 24 日召開「第四次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從北京到南京的兩次討論會，可以說是大陸史學界數年難得一見的盛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sup>1</sup> 張海鵬，「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開幕詞。

會。回顧以往，筆者未及參加十年前在北京近代史所舉行的「第一屆近代中國與世界討論會」，卻有幸出席了六年前由南京大學主辦的「第三屆中華民國史討論會」。這次都收到兩會的邀請，當然不能錯過與中外學者交流的機會，所以不惜風塵僕僕，二進二出大陸，躬逢其盛的參加了這跨世紀的兩場學術饗宴。

北京與南京的兩次盛會，時間相隔僅二星期，無論規模盛況均不在話下。在此僅就其開會地點、經費來源、國外出席學者、提交論文和開會等情形，稍做比較敘述，讓無緣與會的學者專家透過這篇報導，略知其梗概，這是本文的最大目的。

## 二、怡生園 VS. 中心大酒店

北京的討論會，在主辦單位特具創意的安排下，假北京市順義區的怡生園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寓開會於渡假，名園盛會，相得益彰，這是中國史學界過去難得一見，相當高規格且具大魄力的盛舉。

怡生園距首都機場 25 公里，是一處遠離塵囂、空氣新鮮、風景秀麗的渡假休閒聖地暨召開各種會議的理想場所，它佔地 26 萬平方公尺。在 2 萬 3 千平方公尺的人工湖畔，氣勢宏偉的主體建築綜合樓與風格迥異的歐美式客房區及別墅群，隔著長堤遙遙相對。客房區由哥德式、西班牙式、美式、日式四組建築構成，別墅群則由嬉雨公館、藍水車院、凱旋宮、騎士山莊、白金漢宮、尋夢園等八棟獨立式建築構成。漫步其間，垂柳成蔭，湖光倒影，清新脫俗，有如置身世外桃源，令人心曠神怡。國外學者得天獨厚，每人各擁寬敞客房一間，但見窗外綠草如茵，水波不興。惟客房與客房之間，幢幢獨立，住處分散，且距離會場約有十餘分鐘的步程之遙，除開會與用餐外，平常見面聯誼交流頗為不便，這是美中不足之處。

反觀南京之會，卻選擇市中心位在熱鬧繁華的新街口的中心大酒店舉行。酒店樓高十數層，屬歷史悠久具國際聲望的四星級觀光大旅館，距機場 8 公里，由祿口國際機場有定時班車（約一小時一班）可到附近。一踏出酒店大門，車水馬龍，南來北往四通八達，十分方便。酒店內各式餐飲與娛樂設備應有盡有，服務亦親切令人滿意，惟兩人共宿一房，生活作息起居稍覺不便。

### 三、財團資助 VS. 門票收入

大陸同臺灣一樣，舉辦一次大規模、高規格的學術討論會，頗為不易。除了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外，經費動輒一、二百萬，籌措的順利與否，無疑直接攸關會議的成敗。這次南北兩會在這方面都有殊途同歸的滿意表現。

北京之會，除了東道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聯合中國史學會主辦外，列名贊助的金主有財團法人平和中島財團、財團法人大和銀行亞洲大洋洲財團、財團法人國際通訊基金、財團法人笹川平和財團、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等五個單位，這些主要來自日本財團的經援，象徵主辦單位與日本學術界關係的密切，特別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衛藤瀋吉為本次會議的召開，在經費方面做出了特別的貢獻。

相對的，南京之會，除了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本身的經費外，主要得自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慷慨捐輸。政協轄下有個金雞母——「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也就是南京長江路 292 號遺址，此係前清的兩江總督署，其中十年為太平天國天王府，辛亥光復後，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府，後又為國民政府、總統府所在地。從「十年壯麗天王府」到「風雨滄桑總統府」，多少英雄人物在此風雲流散，多少歷史往事在此灰飛煙滅，所以參觀的人特別多，每天川流不息，絡繹不絕，而門票的收入便相當可觀。省政協把這隻金雞母取之於社會的所得，用之於學術，總是值得頌揚之事。

### 四、國外學者 VS. 國外學者

南北兩會，國外學者參加者踴躍，規模亦復不小。北京的「近代中國與世界討論會」，據會議手冊上列名的共 143 位，其中來自大陸境外國家和地區者共 51 名，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強。茲將分配情形開列如下：

日本 21 名最多：衛藤瀋吉、山田辰雄、安藤彥太郎、久保田文次、狹間直樹、森時彥、森紀子、西村成雄、小島淑男、古田和子、并木賴壽、嵯峨隆、冢近亮子、橫山宏章、深町英夫、川島真、佐佐木揚、鹿錫俊、李廷江、孫江、王柯。

美國 10 名次之：魏斐德(F. Wakeman)、賈士杰(D. C. Price)、麥金農(S. Mackinnon)、史瀚波(B. Sheehan)、柯瑞佳(R. E. Karl)、任

達(D. R. Reynolds)、賀欽賢(J. K. Olenik)、梁思文(S. Levine)、  
陳錦江、鄒達。

澳洲 4 名：馮兆基、黎志剛、黃宇和、沙培德(P. Zarrow)。

法國 2 名：巴斯蒂(M. Bastid)、蕭小紅。

俄羅斯 2 名：齊赫文斯基(S. Tikhwinsky)、葉文基(P. Ivanov)。

義大利一名：薩馬拉尼(G. Samarani)。

波蘭 1 名：施樂文(M. Slawinski)。

韓國 1 名：李銀子。

新加坡 1 名：黃堅立。

香港 1 名：趙令揚。

臺灣 7 名：張玉法、李恩涵、陳三井、林滿紅、林能士、王正華、  
侯坤宏。

由於會議的主題圍繞著近代中國與世界這個長盛不衰的話題，所以外國學者所佔的比例偏高，而且幾乎每個國家都有代表參加，這是可以理解的。倒是英國和德國這兩個與近代中國頗為密切的國家，正巧並沒有人到會。

除來自境外的學者外，做為東道主的近代史所幾乎老中青三代傾「巢」而出，共達 40 名之多，強而有力地撐起了大會的半片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多位後起之秀的中生代，如楊奎松、汪朝光、王奇生、王建朗、黃道炫、閻黎明等幾位先生，無論在所提論文题目的創新、資料的搜集和分析，或新規律的創發等方面，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現，獲得與會同行的普遍肯定，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史學界接棒有人，確是值得欣慰之事。

南京的「民國史討論會」，共有出列席人員 151 名（號稱 180 餘人），其中來自中國境外的學者約 47 名，比北京之會名額略少。僅有少數學者是兩會都參加的。但總體而言，名單還是有相當大的不同。茲開列如下：

韓國 10 名：裴京漢、白永瑞、尹惠英、姜明喜、羅弦洙、車雄煥、  
金世昊、朴宣泠、李升輝、朴檀。

日本 6 名：山田辰雄、西村成雄、橫山宏章、久保亨、土田哲夫、  
川島真。

美國 7 名：唐德剛、薛君度、吳天威、朱永德、熊璋、Laura McDaniel、  
Lee McIssac。



俄羅斯 2 名：高念甫(Andrei N. Karneev)、Vitaly A. Kozyrev。

英國 1 名：方德萬(Hans Van de Ven)。

德國 1 名：墨軻(Peter Merker)。

義大利 1 名：薩馬拉尼(G. Samarani)。

加拿大 1 名：戴安娜(Diana Lary)。

澳洲 1 名：費約翰(John Fitzgerald)。

香港 3 名：齊錫生、葉漢明、鄭會欣。

臺灣 12 名：張玉法、李恩涵、李國祁、陳三井、呂芳上、賴澤涵、張哲郎、魏萼、周惠民、張力、邵銘煌、郭俊鈺、劉維開（未到）。

比較參加兩會的海外學者，可以看出：(1)美、日兩國學者參加北京之會明顯多於南京之會，其中是否有學校已開學的關係，不得而知，但北京做為國際學術交流的選擇顯然優先於南京；(2)英、德兩國無人參加北京之會的遺憾，到南京之會獲得彌補；(3)韓國與臺灣參加南京之會的學者大幅增加，顯示南京大學在這方面所做的學術交流工作，收到顯著的效果。

與北京之會由近代史所老中青三代所撐起的半片天相比，南大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也在南京之會推出 22 位陣容堅強的博士後及博士研究生，他（她）們有的提論文，有的參加分組討論，都有不錯的表現。從研討會中發掘年輕後起之秀，協助年輕人成熟，使研究隊伍不斷增強，這是「紀念史學」的另一正面意義。

## 五、特色論文舉隅

北京之會，共舉行 28 場研討會，發表 101 篇論文。<sup>2</sup>以篇幅所限，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介紹。由於「大溪檔案」（蔣中正先生檔案）已經正式開放，風氣已開，故無論大陸、日本或臺灣，研究蔣介石的成果不斷湧現，在此即以蔣介石為焦點，略為介紹兩會所提有關蔣介石的文章。

北京之會，共有 6 篇論文涉及蔣介石，而且幾乎集中在對外關係的處理上。它們是：

(一) 楊天石（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蔣介石與韓國獨立運動〉

<sup>2</sup> 參閱《漢學研究通訊》，卷 19 期 4（2000 年 11 月），頁 640-643。

蔣介石在韓國獨立運動過程中，積極促成韓國流亡人士中兩大派別的團結，支持韓國義勇隊和光復軍在中國土地上活動，促進韓國臨時政府改組，在經濟上有求必應，特別是在開羅會議上的仗義陳詞，終於達成在開羅宣言中確立「保證韓國戰後獨立」的基本原則。

- (二) 楊奎松（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蔣介石抗日態度之研究——以抗戰前中日秘密交涉為例〉

蔣介石對抗日的態度，歷來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根據新披露的檔案顯示，所有議和之舉顯為日方所主動，蔣並不排斥。蔣之接受議和，向與內外壓力有關，其中含有消息傳遞不確或對日方妥協意圖估計過高的判斷錯誤在內。蔣在抗日問題上最值得討論者是，抗戰前期實際上缺乏持久戰的觀點，較多地寄望於外力的幫助與干預。

- (三) 黃道炫（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緬甸戰役蔣介石、史迪威的失敗責任問題〉

史迪威在緬甸戰役指導中，過分強調進攻，沒有注意到戰場的實際情況，造成中國軍隊分割使用，疲於奔命，處處為英軍堵漏洞的惡果，應負戰略指導及具體指揮錯誤的主要責任；蔣介石雖對緬甸作戰有一些正確設想，對史迪威的錯誤指導也做過一些抵制，但在戰役中、後段，因怕開罪美國，放棄指導責任，遷就史迪威的錯誤指揮，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 (四) 家近亮子（日本敬愛大學國際學部）：〈蔣介石外交戰略中的對日政策——作為其歸結點的「以德報怨」講話〉

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發表〈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此一講話在日本被稱為「以德報怨」講演，受到高度評價，但蔣氏所決定的放棄戰爭索賠的這一政策，阻礙了日中戰爭真正意義上的結束。換言之，它把日本的戰爭責任集中在不具備實質內容的口頭上的「反省和賠罪」。其結果，戰後處理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中國經常要求日本在口頭上「反省和賠罪」，以加深「歷史認識」。

- (五) 陳三井（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蔣介石眼中的俄國顧問——以鮑羅廷為中心之討論〉

本文主要根據《蔣總統事略稿》資料，探討蔣介石與鮑羅廷之間欲迎還拒、若即若離的微妙關係。在蔣眼中的鮑羅廷，專橫、飛揚跋扈、目中無人，曾公開面斥蔣，詆毀黨部，壓迫別人，這是蔣氏所不

能忍受者。鮑羅廷以顧問之尊，反客為尊，與蔣介石爭權，並主導分裂國民黨的活動。畢生以追求革命應獨立自主、操之在我的蔣介石，視鮑羅廷的干預掣肘為革命之障礙，自然無法容忍，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於是雙方的革命合作關係便劃下了休止符。

(六) 王正華（國史館）：〈國民政府北遷後蔣中正驅逐鮑羅廷之議〉

本文主要根據國史館皮藏《蔣總統事略稿》、《困勉記》、《省克記》等資料，探討國民政府北遷後到寧漢分裂前，蔣氏與鮑羅廷衝突的原委，並分析蔣中正進行驅逐鮑羅廷的心路歷程以及所反映的艱難處境。

南京之會，共舉行 36 場分組研討，發表 110 篇論文，有關蔣介石的論文恰好也是 6 篇，但多半集中在內政問題上。它們是：

(一) 楊天石：（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蔣介石和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孫中山為籌措革命活動經費，曾聯合虞洽卿等人倡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張靜江、戴季陶、蔣介石、陳果夫等國民黨人都曾投入其經營活動，並透過交易所業務給予革命活動以經費支持，但 1921 年冬至 1922 年初，交易所因畸形發展而突然嚴重衰退，蔣等人投入的資本都嚴重虧損。透過交易所的經營活動，蔣介石有機會深入了解上海資產階級，飽受其排擠、壓榨之苦；同時，也親身感受到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凡此種種，增強了其社會改造思想。

(二) 張憲文（南京大學）：〈試析蔣介石早年對共產黨的態度〉

蔣介石最終與共產黨分道揚鑣，堅決反共，有著極為複雜的因素。蔣氏早年並無反共言行，訪蘇歸來思想發生變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但孫氏並未採納他的建議。1926 年上半年開始，蔣介石逐步走向反共道路，加緊策劃防制共產黨的謀略。

(三) 申曉雲（南京大學）：〈「四一二」前後的蔣介石與列強〉

根據過去教科書的既定結論，蔣介石是在列強的支持下發動「四一二事件」（清黨），建立南京政權的。作者利用英美外交檔案，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探討列強對華政策是否與這場事變直接相關？英、美、日主要列強對新成立的南京政權態度是否一致？

(四) 董國強（南京大學）：〈略論 1932-1935 年間蔣介石個人權力的擴張〉

蔣介石利用「剿總」、「委員長行營」等軍事指揮機構，對各級

政權的滲透和擴張，強化了蔣氏個人的權威，使得民國政治重返軍政狀態。他通過對許多地方各級政權黨政軍事務的牢固控制，架空了汪精衛領導下的中央黨政機構，最終在 1935 年實現了擺脫汪精衛牽制，建立個人軍事獨裁統治的政治目標。

(五) 陳三井（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蔣介石眼中的民國人物——以《蔣總統事略稿》為中心之討論〉

本文主要根據《事略稿》，把蔣氏論評民國人物的資料，依時間先後，分(1)亦師亦友，肝膽相照篇；(2)革命同志，漸行漸遠篇；(3)地方派系，翻雲覆雨篇；(4)豪門國戚，矛盾叢生篇；(5)共黨人物，壁壘分明篇，論述蔣氏對孫中山、陳英士、張靜江、戴季陶、吳稚暉、陳炯明、胡漢民、汪精衛、張學良、閻錫山、馮玉祥、孔祥熙、宋子文、孫科、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的好惡及評價。

(六) 溫銳、戴利朝（江西師大）：〈蔣介石時代的終結——論 1946 年前後蔣介石與中國歷史的走向〉

在 1946 年前後的一年左右時間，中國的社會與政治出現了一個全新的面貌：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鬥爭中的成熟與實力的壯大，為因抗日戰爭所出現的「一國兩制」和抗戰時期所發展成長的民主力量，在戰後的生長與發展奠定了基礎。而戰後國民黨統治力量的削弱，以及它所面對的戰後社會與經濟恢復的困難和國內外全新的政治形勢，規定了它必須放棄昔日傳統的一統模式，選擇「一國兩制」與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方向。然而蔣介石高估了自身的力量，低估了中共與中間民主黨派的力量，選擇了內戰與獨裁的統一觀，其結果，終結了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時代，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除了蔣介石這一方興未艾的新課題引發熱烈討論外，在北京之會魏斐德(F. Wakeman)所提的〈戴笠的通訊系統〉、章開沅所發表的〈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兩文，都饒有興味，引起與會者的重視。

## 六、去政治化：從開幕典禮到綜合討論

一次具有指標作用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重頭戲當然首推論文的報告和討論過程，但大家同樣對最後的綜合討論懷抱無限的期待，因為透過集思廣益的腦力激盪，可以檢討過去的研究成果，並展望未來新領域的開拓。

最不討喜的大概就是開幕典禮，往往過多官式的政治性講話，令人索然無味。不過，這次南北兩會，是筆者歷來參加大陸學術討論會中最不具政治意味的會，可見大陸學術界也在逐漸去政治化，向學術專業化之路邁進。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之會由東道主張海鵬所長提出一篇擲地有聲的開幕詞，對近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做了精闢的剖析，為百年來的中外關係做了一次總結。張氏首先指出，「近代中國與世界，是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中國與周邊國家，與西方國家發生關係，經歷了長久的年代。鴉片戰爭以前，以中國為中心形成了東方式的國際關係體系。中國並不關心西方世界的發展。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殖民主義的擴張，通過鴉片戰爭把中國與世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西方式的國際關係體系以大砲為前鋒，把貿易和殖民體系迅速推向東方，以道德和尊嚴相維繫的東方式國際關係體系取下陣來。中國在屈辱、賠款、割讓土地和主權被侵蝕的不良國際關係環境中，苦苦掙扎。中國在與世界的關係中不能不扮演一個被動的角色。到了二十世紀初，無論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說，還是從國內歷史進程的角度說，中國國勢的「沉淪」都到了谷底。在失敗和屈辱當中，中國的先進分子在思考並且開始覺醒起來。在東西方各國留學，學習了西方社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新的生產方式的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出現了。中國人在 1919 年的巴黎和會上第一次對西方國際社會秩序說了「不」。一批熟悉西方文化傳統的人，從孫中山起，開始在中國探索並試圖建立不完全與西方相同的社會政治秩序。這種探索，在 20 世紀，特別是在 20 世紀的下半葉，非常明顯地進行者，並且開始取得成績，包括建立新型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回顧 20 世紀的歷史，考察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張所長特別突出以下三個年代：

1900 年：當 20 世紀剛剛拉開帷幕不久，在中國大地上便發生了一場規模巨大的義和團反帝運動，隨之而來的便是八國聯軍的入侵，其結果是中國遭受自鴉片戰爭以來最為慘重的損失，已經殘缺的國家主權進一步淪喪。〈辛丑條約〉明確規定了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中國在屈辱中跨進了 20 世紀。

1945 年：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中國歷史由衰轉盛的轉折點，是 20 世紀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在這一年，中國參與籌建聯合國，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後的世界五大強國之一，中國

的大國地位由此而奠定。1949年以後，中國進一步可以對舊的世界秩序說「不」，開始坦然地面對世界，面對未來，並且信心百倍地努力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2000年：在中共建立政權後，經過艱難的摸索和走過曲折的道路，終於找到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並勇敢地向世界開放。中國即將在2000年內或稍後不久加入W.T.O.，這不僅表明中國的發展需要世界，而且表明世界的發展更需要中國。2000年對中國而言，實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意味中國將不再是世界的一個被動因素，而是世界的一個積極因素。進一步而言，中國將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將為世界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並提供新鮮的經驗。

在綜合討論方面，北京之會由張海鵬所長主持，充分發揚敬老尊賢的傳統美德和尊重地域分配的原則，先後安排吳承明、齊赫文斯基、安藤彥太郎、章開沅、魏斐德、李文海、茅家琦、張玉法、龔書鐸、山田辰雄、施樂文、丁守和等12人做指定發言，他們稱得上都是年高德劭的史學界大老，其中吳承明、齊赫文斯基、安藤彥太郎三人的年齡都已超過八十歲，章開沅、丁守和、茅家琦、龔書鐸等幾位則逾越七十歲，其餘諸位也都在六十開外。老而彌堅的經濟學前輩吳承明認為此次盛會論文近百，紮實而富新意，多能從史料和史實出發，不憑空立論，保持實證主義的特色，故為成功之會。齊赫文斯基建議多探討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和貢獻，例如移民、華僑與華工問題。章開沅則呼籲，在大環境重科技冷落史學之下，史學家不但不應自暴自棄，更要積極參與史學，賦予歷史新生命，使史學充滿活力與魅力。張玉法提出分階段探討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建議。施樂文認為有的報告太冗長，讓人有「不怕槍，不怕砲，只怕聽大報告」的痛苦，他建議多關注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雙邊關係。佳言宏論不少，不及一一備載。等到自由發言時，筆者一馬當先，等不及到八十歲才發言，對會議的技術性問題，提出洋洋灑灑的善意批評和具體建議，頗引起共鳴。

南京之會的綜合座談，以「中華民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為主題，由張磊先生主持，引言人有山田辰雄、賴澤涵、魏萼、呂芳上、薛君度、戴安娜、楊天石、薩馬拉尼、齊錫生、費約翰、高念甫、裴京漢等，接著自由發言的有黨德信、尚明軒、劉曼容、吳景平、朱宗震、張同新、張力、

李國祁、呂明灼、吳天威等。建言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無法一一贅述。僅舉呂芳上教授的意見做爲代表，以見一斑。呂所長認爲南京之會的論文議題仍以政治史居多，故建議大家開拓新領域，諸如家族史、疾病史、婦女史、華人史、邊疆或少數民族史等。他更盼望，以後的學術會議，能夠以比較簡單的餐飲，享用更爲豐盛的論文大餐，這應該也是中外學者共同的心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年出版之論文集

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

論 文

422 頁

400 元

程志成：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辨及其現代意涵

黃克武：從追求正道到認同國族——明末至清末中國公私觀念的重整

楊瑞松：修身與平天下——顏元/朱邦良對儒家身體之學的重構及其歷史意涵

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園公用與公共活動空間的拓展

高彥頤著·許慧琦譯：「痛史」與疼痛的歷史——試論女性身體、個體與主體性

馮 客著·周 遜譯：個人身體與群體命運——近代中國之人種繁衍和社會紀律

林郁沁著·郭汎微譯：公德或私仇——1930 年代中國「情」的國族政治

李玉珍：佛教蓮社與女性之社會參與——1930 年代上海蓮社與 1960 年代臺灣蓮社  
之比較

Hsiung Ping-chen(熊秉真): The Other Side of Filial Piety: Reflections on Compassion  
versus Loyalty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amily Relations

John Fitzgerald: "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

#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 會議報導

任育德\*

近年來臺灣推動教育改革，一方面是改編國、高中教科書，高中且全面開放為審訂本；另一方面是實施九年一貫教育，使歷史課程面臨全新的調整。歷史教科書的編著、使用與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及時代思潮有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2000年11月17-18日在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召開的「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即反映了學界對此一問題的注意。在該會中，教科書的編者、教師及學者藉著對歷史教科書編寫經驗的討論，和對不同地區、不同時代歷史教科書的比較研究，進一步地思考了歷史教育在變動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該會議係由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協辦，純智文教基金會與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贊助，共有7場次（含1場綜合座談）、16篇論文（詳目附錄於文後），與會歷史學者、教師近150人。

培養歷史教學主力的歷史系，其課程內容的設計與學風走向即為歷史教育中具根本性且不可忽視的一環。與會的廣州中山大學桑兵教授以探究近代大學史學課程規劃及設計理念為課題，他指出本世紀中國史學科學化過程中，史觀派與史料派均有一席之地，本世紀前期史觀派之興起與學界須採藉外來學說形成新的解釋框架有關；而自新學制確立後，各大學史學系本科教學的迫切需求，造成各校系主辦者和教師縱使在觀念、學風不同，課程設計卻一貫呈現社會科學化的取向。1920至30年代之交，整理國故運動帶來濃厚的考據史料氣氛，史學課程出現以斷代為特徵的細分化趨向。由於教學和研究的不同需求，造成史觀派、史料派間長期分立，史學研究擺盪於博通與專精之間的現象延續至今，影響甚為深遠。

清末以來，政府規定教科書從制定課程標準、編寫、審查、到頒佈，均需合乎官訂標準，因此官方欲灌輸給學生的意識形態便呈現在歷史教科

---

\*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書中。臺灣師範大學王仲孚院長以為，國內中學歷史教科書受到教育部《課程標準》約束監督，編者發揮空間有限。教科書雖應帶有國家立場，編者卻不宜以強烈政治意識支配教材內容，因而影響學生學習歷史知識和教育效果。不過，為因應教學需要，編者仍應按政權主體意識、歷史影響性、教育意義、學生年齡與程度來篩選教科書教材。彰化師範大學黃綉媛副教授探討美澳歷史教科書中有關種族、文化、認同相關課題，認為兩國均強調不同族裔對社會發展與本國文化的貢獻，尊重並接納不同族群的文化認同，祛除種族偏見，從而批判同化意識、強調多元文化主義，以及著重特定價值，進而凝聚國家認同。

各國歷史教科書所給予學生的歷史認識，對於學生的國際觀會有何種程度的影響？與會學者以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中日關係為例作檢討。日本杏林大學段瑞聰講師指出，由於日本初、高中歷史教科書從出版到選用過程中，文部省與各級教育委員會均有影響力，形成所謂「民編國管」體制，因此歷史教科書對於中日關係的記述即反映日本政府的歷史認識。譬如日本在述及甲午戰爭時，偏重該戰對日本國力的提升、將滿洲事變爆發歸因於國民政府在東北勢力的增強、忽略七七事變的責任、並且僅以附註的方式處理南京大屠殺死傷的平民數，對該事件的本質毫無明確的解釋。相較於日本政府的認識，中國則呈現另一種歷史認識。譬如在談到馬關條約時，只提及賠償金額、強調九一八事變的背景為世界經濟危機、七七事變係為日本蓄意引發、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濫殺中國軍民三十萬人等情事。由於社會制度及歷史上兩國的立場不同，不易形成共同的歷史認識，中日雙方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記述與評價差異甚為顯著。相對於日本近年對歷史課程時數的縮減，中國大陸對近代史課程的強調，使得兩國學生對歷史認識的差距更形擴大。長期看來將不利中日關係的發展，因此雙方學界應多交流，以求得彼此更進一步的瞭解。石牌國中蕭勝文教師分析臺灣方面教科書的記述，認為由於教科書的編輯專業層面漸趨寬廣，並且不斷融入新的重要議題，以致同一課程標準下的內容差異甚著，直到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後課程內容才適當淺顯化。此外，課程內容雖屢屢強調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操與日本侵華的歷史記憶，但是教科書一方面在字面上並未充分譴責日本侵略中國的心態、行為、性格，致使日本殖民者的形象不甚顯著，另一方面則缺乏導引學生如何愛國與報國途徑的討論。在現今社會日趨多元化的時代，如何將愛國情操內化便成難題。

針對教科書中所反映的歷史認識及其所形成的民族國家歷史觀，進而與既有歷史觀對話、並重新予以定位，亦是本次會議論文主題的一項特色。如韓國延世大學白永瑞教授以韓國《萬國史》、《世界史》教科書中如何敘述當代亞洲的國民國家之形成為分析對象，認為韓國教科書中「國民國家」史觀貫徹如一。在對其重行檢討後，他提出「作為知性實驗的東亞觀」應予以回應，並強調應拋開既有的國別史框架，而從更宏觀的東亞地域史脈絡來敘述包括國民國家在內的多種主體的活動空間，進而拋棄來自國史、東洋史、西洋史三科分立的侷限，重新認識作為全球史和個別國史之間的中介東亞地域史，以便深刻理解全球史的多層結構。中研院近史所熊秉真研究員以她對本世紀中文世界史教科書內容的研究，指出其受到著重淵博的「普遍主義」與著重實用的「國族主義」兩種取向的支配，導致對西方的敘述與中國的定位有所不同。清末至 1930 年前敘述呈現西方自我中心的取向。1930-1940 年代間仍屬西方中心敘述，但已試圖將中國放回世界史「全球化」的大敘述中，並夾雜對中國師夷以制夷的期盼。1950-70 年間西洋史的敘事結構與中國史互相平行，並且藉鋪陳雙方歷史的關連性來彰顯東方獨特的成就，用語與架構在官方色彩下雖屬保守，卻為未來教育體系中的世界史寫作爭取到實驗的空間。1980 年代後世界史教科書的作者們在吸收史學新知的背景上加重社會史、生活史（國中）、文化史、思想史（高中）內容，並在用詞上力圖避免西方中心論。1990 年代隨著政治情勢的轉變，追尋國家認同情緒強烈，歷史教學中呈現了濃厚的國族色彩，造成歷史敘事相對保守化。

在歷史教育中，傳遞歷史知識的媒介並不限於歷史教科書，本會與會學者除探討教科書外，亦從檔案、參考書入手來檢討兩者在歷史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並對現行歷史教育進行省思。國史館朱重聖副館長、張鴻銘科長提出檔案是最有價值、可信度最高的史料之一，也是珍貴文化資產，在歷史教育上有多元功能，歷史研究可藉檔案辯證史實，在學校教育上可使學生獲得更確切的歷史知識，在社會教育上則可激發民眾的愛鄉、愛國心，從而恢復其對民族的自信心。現今國人知道如何利用或善用檔案者仍屬有限，如何提升檔案在歷史教育的分量，歷史教育工作者與檔案管理者均責無旁貸。臺灣師範大學林麗月教授分析十一本歷史課本參考書，認為參考書固然為教師備課、學生課後複習提供幫助，但是參考書的商業性和工具性取向使之在實際上已成為另一種教科書，學生透過參考書

習得的歷史知識，在不斷割裂與簡化下，不僅對史實的基本認知受到誤導，學習目標也更形空洞；而國中歷史教學若是長期以考試領導教學，則教師的歷史思考也將逐漸「項目化」，此種現象值得教育界深思。

中學歷史教育是歷史意識形成的重要階段，教師要如何在課程標準的規範下，善用媒介傳遞訊息，引發學生學習興趣，讓學生於獲取歷史知識的同時，也學習到分析能力，提升學習效果，也是從事教學實務者所重視的問題。臺灣師範大學劉德美教授評估圖片在外國史教科書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編者若能留意圖片與課文的配合度、圖片清晰度、數量與大小、完整度、更新情況等，將可增進學習效果。而教師善用比較法，透過對圖片的提問與闡釋，並注意時代精神與歷史意義，將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思考。景興國中袁筱梅教師指出，歷史人物在國中歷史教學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故應對歷史人物的出現標準予以規範。教科書介紹歷史人物時，應注意其重要事蹟的真實性及對歷史的影響，形象上無須神聖化或醜化，評價時要考量時代侷限性與道德裁判，教學上可用較活潑的小故事，或以補充方式協助學生了解歷史人物。另外，針對九年一貫教育，東吳大學林慈淑副教授從九年一貫課程揭櫫的基本精神之一「能力本位」著眼，確立歷史教學與歷史學間的聯繫性，再探討其是否與國中小學「人與時間」領域規劃目標間的差異，認為「人與時間」的歷史科規劃基本上仍屬學習範圍取向，而非能力發展取向，與原來的規劃未盡相符，建議未來進行綱要修正時，應訂定更能落實的能力指標，使教學方向更加清晰。

由從事教學、執行入學考試工作的實務人士對現行歷史教學與考試進行檢討，也是本次會議的重點之一。大學考試入學中心的管美蓉探討近十年大學聯考歷史試題作答情形，提出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寬鬆、教師授課負擔過重、學生過度依賴課本、缺乏基本概念、分析能力薄弱、語文能力不佳等為現行歷史教學、考試所面臨的困境。作者同時也指出，擬定明確的〈考試說明〉、清晰的測驗目標及示例、提供具體的測驗內容，並且準確控制試題難易度，當可說明教科書開放後的命題構想。本次會議中，建國中學嚴佳芳教師及成淵高中陳春梅教師均依其親身教學經驗指出國、高中歷史課程連貫性的重要。嚴佳芳從本國史的中古史部份探究國、高中教科書的銜接性，認為現行教材編選要領雖曾提到要互相銜接，但是事實上編著者鮮少留意，以致兩者間嚴重脫軌；尤有進者，極少高中教師瞭解此問題的嚴重性，而在教學時予以補救，致使教授和學習效果大受影響。陳春

梅則比較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日治臺灣史的部份，認為六版教科書大部份合乎教育部頒訂的課程標準，但亦有部份版本的差異較大，從引導學生學習歷史的觀點而言，實應加以避免。竹北高中林桂玲教師針對新採用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提出意見，認為新教科書的優點是作業較過去更顯活潑、多樣；但在編寫與輔助教材兩方面，則均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此外，歷史教師為了增強本身的教學實力，需要更多的在職進修機會，並且減少現有過多的授課時數以改善教學品質。

最後，綜合座談邀請了目前從事歷史教學實務的校長和教師，包括三民國中林淑貞校長、北安國中劉芮教師、內湖高中韓靖宇教師、永春高中游振明教師分別就國、高中歷史教學面臨的實際問題與困難，提出不同層面的探討與看法。大家的共識是歷史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一環，在時代變遷之際，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和施教，需要學術界、教育界人士從不同層面來共同思考和推動。

### 附錄：會議論文主講人、論文名稱、主持兼主評人

- 第一場 王仲孚：試論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特性  
 桑 兵：近代大學史學課程設置與學風轉變  
 白永瑞：超越本國史的框架：從歷史教科書來看韓國人的  
 亞洲認識  
 主持兼主評人：李國祁
- 第二場 朱重聖、張鴻銘：檔案與歷史教育——以國史館現藏檔案  
 的運用為例  
 黃綉媛：多元文化教育與美澳歷史教科書的比較：種族、  
 文化、認同相關課題的探討  
 主持兼主評人：劉翠溶
- 第三場 蕭勝文：國（初）中歷史教科書中「近現代中日關係」  
 教材之研究(1923-1999)  
 段瑞聰：日本的歷史教育與中日關係——以初中、高中歷  
 史教科書為探索  
 主持兼主評人：林能士
- 第四場 劉德美：談歷史教學外國史圖片之編選與運用

袁筱梅：歷史人物在國中歷史教學中的重要性

林慈淑：「學歷史」與「歷史學」之間——九年一貫「人與時間」領域規劃之商榷

主持兼主評人：賴澤涵

第五場 熊秉真：自轉與公轉——近代中文世界史教科書之演變

林麗月：另一種「教科書」——國中參考書中的歷史知識

管美蓉：高中歷史教學與考試——兼論教材開放後的命題

主持兼主評人：張玉法

第六場 嚴佳芳：探討現行國、高中教科書的銜接性——以本國史為例

陳春梅：新編高中本國史（初版）有關臺灣日治時期教材之分析比較及其與國中《認識臺灣（歷史篇）》連貫性之探討

林桂玲：高中歷史教學的實務分析

主持兼主評人：吳文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73)

### 張希哲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張存武 紀錄：李郁青

254 頁 平裝 200 元

張希哲先生廣東陽江人，民國三十一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前身）。曾任職於中央設計局，為廣東中山日報總主筆，廣州日報社長，廣東、廣州國民黨幹部及議會議員，中央宣傳部處長，來臺後任教育部總務司長。民國三十九年遞補為立法委員，長期任教育、僑政、外交等委員會委員，故於有關事務知之甚稔，且盡忠職守，問政立法建樹殊多。任逢甲學院院長十年，充實教學研究師資設備，奠定了改制為大學之基礎。曾主持中印尼、中琉文經協會等民間社團，於國民外交、中外文化交流頗有助力。關注國家社會時局之演變，故訪問紀錄中多有可觀可採者。

# 「二十世紀中國戰爭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紀要

吳餘德\*

去年(2000)是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也是庚子義和團事件的一百週年。回顧過去這個世紀，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所產生變動之劇烈，實為亙古未有。有鑒於此，中華軍史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近史所）、美國企業研究所，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等四個單位，在二十世紀結束前夕的12月15、16兩日，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聯合舉辦了「二十世紀中國戰爭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研討會由中華軍史學會理事長葉昌桐致辭開幕。葉理事長在致辭中明白揭示會議召開的宗旨，指出近百年來中國動盪的根源，無不與軍事、政治的變動息息相關，故明瞭百年來中國戰爭與政治錯綜複雜的關係，釐清歷史發展的前因後果，可為借鏡。會中共有國內外學者發表23篇論文。以下將會中所發表的論文，歸為五個議題，分別概述其主要論點。

## 一、外籍人士與中國政治軍事

周惠民（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的〈從法肯豪森（Falkenhausen）檔案看德國軍事顧問團（1934—1938）〉，以抗戰前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團最後一任總顧問法肯豪森的報告與檔案，探討德國顧問團在練兵、組訓、採購德製裝備，及聯絡中德兩國政府等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法氏在工作上將國民政府的對日關係做為重要考慮，在中央與地方的問題上，態度又偏向南京中央政府。他在戰後，因戰犯身分受審，出獄後生活困頓，獲得蔣中正物質上的接濟，可見國民政府對其戰前工作成效的肯定。

李恩涵（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張家綸（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任助理

究所碩士)的〈1947年魏德邁中國調查團事件經緯〉,探究1947年7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魏德邁將軍為特使,前往中國與朝鮮考察的動機以及其考察所得及建議等。作者認為魏氏調查團來華的目的,主要係藉對中國和朝鮮政治、經濟、軍事及復員實效等進行調查,從全球性的觀點評估中國與朝鮮的情勢,並進一步提出美國在遠東應採取的行動方針,為對國府採取道德上的鼓勵與物資的援助兩項途徑。此次任務的結局是魏氏與蔣中正近乎決裂,其報告書的發表遭到壓制。不過魏氏的預測(即如果國府不採納他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建議進行改革,將遭到悲劇性的結果),則不幸言中。

## 二、地方軍系與軍事發展

楊維真(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的〈國共內戰時期東北戰場中的滇軍(1946-1948)——以第六十軍為中心的探討〉,探討國共內戰期間,滇軍在東北戰場上的表現,並論析其對於戰局的影響。作者認為滇軍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雖有一八四師率先投共,但在各戰役的表現,並不在中央軍之下,無負其原有之盛名。東北戰場之敗,軍政高層應負更大的責任,不能全由下屬承擔。

陳立文(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的〈抗戰前後國府對東北地方武力的運用〉,探討在民風強悍的東北擁有相當多的地方武力,但在抗日戰爭與戰後的接收過程中,卻始終未能成為國府的重要助力。作者認為國府對於統一的意願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因在東北的勢力不穩固,對東北地方武力沒有充分掌握的信心,故處處顯現多所顧忌或無從著力的態勢,既恐東北淪為國際特殊化,又擔心重蹈軍閥割據的覆轍,因而平白地喪失如此優良的資源。

陳進金(國史館協修)的〈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以四川為例〉,以民初五位四川軍人劉文輝、劉湘、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等,在中原大戰期間的動向為討論對象,探究地方實力派與中央互動的關係。作者認為四川軍人其實仍著眼於個人防區的擴充,只重視個人利益,故初期均採取雙面策略,企圖從中獲得最大利益。而各派系的駐外代表扮演著聯絡者、協調者和政局觀察者和謀士等多重身分,故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

Stephen R. Mackinnon 麥金農(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的〈爲保定系而戰：中日戰爭初期之軍事人才專業化與軍事政治〉，討論蔣百里及其他保定系的關鍵人物，如白崇禧、薛岳等人的軍事背景。作者認爲 1938 年是保定系勢力發展的顛峰，同年 1 月至 10 月的武漢保衛戰，是在保定軍校畢業生的領導下進行的，這些軍事精英的專業影響力，中和了國共領導者較爲政治化的權力；但在皖南事變後，這些人對選擇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政治考量，卻超過他們的軍事專業判斷。

陳繼善（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發表的〈化解「兩廣事變」之研究〉一文，從中國軍事航空組織的發展，比較兩廣空軍的建設，以及 1936 年 6 月陳濟棠發動「六一事變」時，廣東空軍所扮演的角色。

### 三、對外作戰

周美華（國史館助修）的〈蔣中正與綏遠抗戰（1936 年）〉，以蔣中正正在 1936 年綏遠戰役時的意向與決策，解讀他對此役的態度。作者認爲蔣氏旨在保全晉綏，鞏固西北防線，並未試圖以此爲抗日出發點；當日本關東軍做出干涉威脅之後，即迅速停止行動。因此該役只是一次「目的有限」的作戰行動。蔣氏赴西安及西安事變的發生，與綏遠停戰毫無因果關係。

吳守成（海軍官校外文系教授）的〈關東軍的成軍與初期活動（1905-1930）〉，描述關東軍由其前身滿洲軍成軍的過程。他認爲，關東軍在對抗蘇聯及擴張護路的策略下逐漸壯大，但是它獨斷地泡製「九一八事變」、「滿洲國」等一連串的事件，反而加速日本帝國的滅亡。

Diana Lary 戴安娜（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的〈戰爭的負荷：區域差異對戰爭的影響——抗戰時期的廣西戰場〉一文，分析抗日戰爭對廣西省的衝擊，探討廣西省的軍事貢獻、國內的戰爭動員、難民潮、人員傷亡等議題。作者除試圖從國家的觀點檢視戰爭的衝擊外，亦從各議題的比較中歸納出，戰爭對各個層面與各個地區的衝擊並不一致，所造成的結果與回憶也各不相同。因此若要了解抗戰中各地區不同的複雜經驗，必須先對中國各地區分別闡述。

葛敦華（總統府國策顧問）在其文章〈二次世界大戰中之緬甸戰役——各參戰國之政治與軍事互動〉，概述東南亞戰區的緬甸戰役相關的史地、作戰前後之國際大勢及各參戰國軍隊作戰概況。作者認爲，盟軍之所以在



緬甸戰勝，其主因在於大戰略決定之正確、同盟國間的協調與合作，以及先進的後勤和科技等因素。

陳孝悌（海軍總部史政員）的〈戰後日本賠償艦艇之接收編組及其意義〉一文，分析對我國海軍在戰後接收日本賠償艦艇的經過、接收後的處置情形、編組成軍及其意義與作用。作者認為，日償艦未能全數進入海軍服役一事，反映了海軍戰後復原重建工作所面臨的部份問題。

張競（國防大學軍事學院戰略學部海軍戰略組上校教官）的〈赤瓜礁海戰——中共對西、南沙的經營〉，從戰略學的角度，透過 1988 年中共與越南在南沙群島赤瓜礁海域所爆發的武裝衝突及其先前在西沙的經營，來探討中共對南海政策的實際態度，以及國際間所瀰漫的「中國威脅論」的指控是否屬實。作者認為，以戰後中共採低調外交姿態來分析，其戰略仍側重在維持和平穩定的局勢，以保障其國家利益。

#### 四、國共內戰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發表的論文為〈戰後國共勢力在山東地區的軍事對抗：對日受降與接收時期（1945.8-1946.1）〉。本文討論中日戰爭結束時，國民黨與共產黨爲了爭奪在山東的地盤，互不讓步所造成的軍事對抗。作者認為此一時期的軍事對抗，基本上是抗戰及國共軍事對抗的延續。由於停火初期的和平氣氛、蘇聯對中共的抑制、美國的調停，加上共軍在「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下，故衝突規模不大。但國軍基本上維持守勢，僅能控制主要城市，而縣以下區域則幾乎爲共軍所控制。

呂實強（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宣讀〈試論抗戰時期膠東地區的游擊隊——國共實力的消長及其原因〉一文。文章指出，抗戰爆發後，日軍陸續進入膠東各縣市，抗日游擊隊隨之而起，初期屬政府系統的游擊隊規模和實力均不小，中共游擊隊不能與之相比；但至抗戰勝利時，雙方卻主客易位，成爲日後共軍在此區勝利的基礎。作者認為雙方勢力消長原因有二：（一）國府系各游擊隊彼此不合作團結，甚至互相攻擊；共方則能統一指揮，目標一致；（二）國府系偏重軍事，忽略政治，以致不能將軍政融合，所用的只是軍隊本身的力量；而共方則屬總體戰，組織嚴密，動員迅速，造成日後膠東基層爲共軍所掌握。

何耀光（海軍軍官學校軍史館館長）在其論文〈抗戰以前海軍參與剿

共戰爭之研究》中指出，30年代國共戰爭的議題多半集中在陸軍與空軍的作戰，對於海軍著墨甚少。作者自檔案與相關史料中歸納出，雖然因作戰區域以長江流域為主，而使海軍對戰爭結果影響有限，但習史者若深入地分析海軍所參與各戰役，將發現海軍在主宰戰場的積極成果與整體作戰的效果，對於抑制中共勢力擴張仍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高天倫（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在他的〈中華民國戡亂作戰與政治〉文章裡，將1945-1949年間的國共衝突與戰爭，分美國調處時期、調處結束、三大會戰、共軍渡江、國府遷臺等時期，並概述這段期間的政情與戰役。作者在結論中認為國府戡亂失敗的主因仍是政治因素大於軍事因素。

卓遵宏（國史館纂修）的〈從八二三砲戰的爆發論兩岸的戰爭與政治策略〉，從1950年代的國際外交局勢著眼，檢視八二三砲戰期間美國與國、共間的互動，分析各方背後所持的政治策略。作者認為，從結果來看，此役國、共雙方均有所獲：國府藉以整合內部，提振士氣，獲得美國更進一步的軍援，實現戡亂以來夢寐以求的願望；中共則摸清美國對國府協防的底限，得以恢復對美大使級會談，並試探出蘇聯的真正態度。

Arthur Waldron 林蔚（美國賓州大學歷史系教授），〈現代中國戰爭與政治中的勝負理論〉一文，闡述近代中國主要軍事人物在戰爭與政治鬥爭中面臨的抉擇，以及其個別的看法、態度，並試著從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背景中，找出決策模式的淵源。

## 五、戰火中的社會

陳三井（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的論文〈抗戰前後國民政府的知識分子政策〉，探討蔣中正暨國民政府的人才觀、正面策略與反面工作，並且對中共和汪偽政府對知識分子的統戰策略進行分析比較，從而檢討其利弊得失。作者認為，抗戰初期國府為凝聚共識、團結力量，所採取的一連串措施，獲得知識分子的諒解和擁戴；後期則因軍事失利，政治上貪污腐敗，使知識分子尋求社會改革，兩者間的關係呈現緊繃，以致尖銳對立。國民政府未能掌握新的社會脈動，遠離知識分子，終致自食喪失政權的惡果。

邵銘煌（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的〈捐客乎，閒棋乎：張季鸞在抗戰時期的謀和角色〉論文，以抗戰期間張季鸞奉命與日人秘密交涉為經緯，探索抗戰時期謀和的實貌。作者認為，面對日本誘和，中國政府在抗

戰到底的決策下，張季鸞不排斥以謀略為出發點，進行秘密交涉，以伺機掌握敵情，破解日本的和平攻勢，期有裨益於抗戰大局。

胡國台（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的〈抗戰時期教育部淪陷區招致工作〉，重點在闡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為了因應人才大量流失的現象，積極展開招致青年學生與教師的作為。作者認為教育部在戰時萬般困難中，除了先後劃分教育專區、成立「戰區教育指導委員會」等組織、負責淪陷區的教育與招致工作之外，也與中統、軍統互相合作，完成艱難的敵後任務，拯救為數眾多的大專院校學生。歷年的統計數字即可證明其成績卓著。

林美莉（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在她的論文〈戰火下的稅制改革——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直接稅理念論述〉中，描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開徵直接稅的過程，討論國府在變局中，尋求新稅源、革新稅制的理念。作者認為，抗戰時期直接稅的開徵，延續了中國自清末以來試圖建立西方式直接稅的趨勢。雖然在大後方經濟條件不足的限制下，直接稅仍無法取代間接稅的地位，但是直接稅在戰時仍然發揮了開拓稅源的作用，開創公平合理的改良稅制，並且為日後的稅制改革奠定了基礎。

## 結語

中華軍史學會理事長葉昌桐在研討會閉幕致詞中指出：雖然有人認為戰爭是歷史的動力之一，但對中國而言，抗日戰爭固然引發國人前所未有的團結和勇毅精神，增強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但戰後國家殘破，民生凋蔽，最後導致分裂分治的情況，因此戰爭對近百年來的中國仍是弊大於利。葉氏亦言，此次研討會所提出的報告題目，各個都可以成為近代中國史研究的主要議題。他期望與會學者將來能持續擴大軍史研究的領域，並向國際推展，俾使此次研討會獲致更多的成果。本研討會便在熱烈的掌聲中閉幕。

# 「讓證據說話：案類在中國」學術研討會 會議報導

楊芳燕\*

由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主辦的「讓證據說話：案類在中國」學術研討會，經一年多的籌備，於 2000 年 12 月 28 日假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舉行。會中邀請李玉珍、熊秉真、邱澎生、朱鴻林、張哲嘉、王瓊玲、何大安等七位學者，分別就宋代以降中國歷史上的禪宗公案、幼科醫案、刑案、學案、星案與公案劇等「案類」文獻，以及「案」的歷史語源及文體發展的考證，發表相關論文共 7 篇，並由張珣、李尙仁、Thomas Buoye（步德茂）、呂妙芬、李建民、Judith Zeitlin（蔡九迪）、姚榮松等學者擔任評論人。最後的「綜合討論」則有引言人 Charlotte Furth（費俠莉）提報“Thinking in Cases”一文，回顧近三十年來北美學界研究科學的新取向，並綜論案類文獻研究的學術意義，以及中國案類文獻所展現的「說理風格」（styles of reasoning）的性質與特色。

此次研討會的召開，緣於 1998 年 1 月熊秉真、Furth 與 Zeitlin 三位學者同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參加 *The Case History in Chinese Medicine: History, Science, and Narrative* 學術研討會。會後三位學者由醫案研究的探索，進一步思考如何理解中西以「案例」（case）為本的文獻的歷史發展過程，從而拈出「案類」之一詞及集結學者舉辦相關研討會的構想。1999 年秋，因 Furth 到中研院近史所訪問研究之便，工作坊正式成立，隨即展開一系列的討論會。

1999 年 10 月起，至隔年 12 月此研討會舉行之前，工作坊共舉辦了八次討論會，其中五次由成員分別就個人研究主題，提出初步報告。第一次討論主題為「問題緣起與公案介紹」，由熊秉真主講〈國醫案脈絡之一路：近世幼科所見及其他〉、Furth 主講“Cases and Case-based Reasoning in China”、李玉珍主講〈『公案』的歷史發展與定義〉。第二次主題為「刑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案與學案的發展」，由邱澎生主講〈18、19世紀清代『刑案』文類的傳統、發展與特色〉、朱鴻林主講“Xue'an and Case-Based Reasoning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第三次主題為「文學中的公案與案的詞義溯源」，由王瓊玲主講〈公案文學之文類特質與其發展〉、何大安主講〈『案』與『按』的語源及相關問題〉。第四次主題為「星案」，由張哲嘉主講〈星案初探〉。第五次討論會由 Thomas Buoye 主講，講題為“Homicide Cases and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Ch'ing China: Legal Document and Moral Tale”。

除了會前舉辦工作坊討論會之外，此研討會的另一特色，是將相關資料（包括議程、論文及摘要）刊載於主辦單位專屬的網站上（網址是：<http://www.sinica.edu.tw/~mingching>），並提供以電子郵件報名參加的服務。在研討會結束後，主辦單位亦擬定了出版計畫。7篇論文將結集由臺北麥田出版社出版，並由熊秉真撰寫導論。主辦單位同時亦選譯6種西方相關論著，<sup>1</sup>佐以六位與會者撰寫的引言短文，並彙譯 Furth 的論文以為導論，纂成會議論文集的文侶，預定於2001年夏一併由麥田出版。2001年10月，熊秉真、Furth 與 Zeiltn 將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召開另一場案類研討會，題名為 *Thinking in Cases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朱鴻林、王瓊玲與 Buoye 屆時亦將到場交流。

整體而言，此研討會的主旨，依其題名尋思，在探討中國歷史上各種案類文獻對於案例的運用情況，以及這種運用背後可能蘊含的關於「事

<sup>1</sup> 這六種論文分別是：(1)論宗教性文獻——Lorraine Daston, “Marvelous Facts and Miraculous Evidence in Modern Europe,” in James Chandler, Arnold I. Davidson, and Harry Harootunian, eds., *Questions of Evidence: Proof, Practice, and Persuasion across the Disciplin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243-74; (2)論醫學性記載——Julia Epstein, “Case History and Case Fiction,” idem, *Altered Conditions: Disease, Medicine, and Storytell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57-75; (3)論哲學性紀錄——Albert R. Johnson and Stephen Toulmin, “Prologue” and Chapter 1 “Theory and Practice,” idem, *The Abuse of Casuistry: A History of Moral Reason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1-46; (4)論法律性紀錄——Cass R. Sunstein, “Analogical Reasoning,” idem, *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2-100; (5)論文學性運用——Nancy Harowitz, “The Body of the Detective Model: Charles S. Piec and Edgar Allan Poe,” in Umberto Eco and Thomas A. Sebeok, eds., *The Sign of Three: Dupin, Holmes, Peir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79-97; (6)論定義性問題——Ian Hacking, “Opinion,” “Evidence,” and “Signs,” idem,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Early Ideas about Probability, Induction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8-48.

實」、「證據」、「實證」或「說理」的某些特殊認知與態度。透過各篇論文的鋪陳演繹，我們大體可以看到，16世紀以降逐漸出現於中國的各种案類文獻，皆展現出一種「據案例以說理」的論述意圖與敘述策略；至於具體的說理方式以及所說的「理」的性質與內容，則隨各種文獻專門類別的不同而有差異。7篇論文當中，有6篇即嘗試就不同的案類文獻材料，探究該類文獻所涉「據案例以說理」的情況，以及其歷史發展的背景。另一篇何大安的論文則涵蓋了歷史語言學，以及文體結構與發展等兩方面的探討，從而為中國案類文獻的發展史勾勒出一個鳥瞰圖像。以下對各篇論文內容的簡述，將以何文為始，以方便讀者進入此研討會所欲揭示的一個歷史發展的視野。

何文題名為〈論「案」、「按」的語源及案類文體篇章的構成〉，其論旨大致有三：第一，就語源而言，「案」與「按」的本義無涉，但至遲在漢代便出現了前者作為後者之名詞形式的假借用法，其意為「查驗後的紀錄」。另外，就其作為文體名稱而言，「案」在漢代僅限於指謂一種官府記事的格式；直到唐代禪家首先借「公案」一詞作為禪門教材之名，「案」的涵義才包括非官方文獻。第二，雖然以「案」為名的非官方文獻最早是出現於晚明，但以「敘事」加「評議」為基本篇章結構的案類著作，在宋代已可得見；而這項發展，則與唐代開科取士造成「知識世俗化」或「知識的解放」有密切關係。第三，案類文體的篇章結構屬於開放性的「巢聚式構造」(nesting construction)，亦即它是以一個主題或原始文本為中心，容許新評解或新訊息陳陳相因地累聚。這種文體構造亦見於中國經典註疏、官修史傳、個人文集與話本小說等文獻；它和漢語中慣見的「主題」加「評論」的語句結構互相呼應，呈現出「開放性特徵」與「言談取向」。何大安認為，這種特徵與取向或許反映了（或導致了）中國人特殊的「認知架構與知識形成的過程」，值得繼續探討。

如果說何大安一文在論述「案」意指非官方文獻的用法始於唐禪，那麼李玉珍在〈禪宗文學之公案：佛教證悟經驗之宋代新詮〉一文中，則透過對近年來美國禪宗研究的評述，討論「公案」作為一種「陳述風格」(genre of narrative)，在中國禪宗史上所發揮的兩個一而二、二而一的影響，即宋代時禪宗宗派的建立以及禪宗教義法脈的傳承。就第一種功能而言，公案不僅為禪宗開創了獨特的新論述典範，也進而與叢林制度結合，成為禪宗宗派確立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其次，就禪宗教義法脈的傳承而言，公案兼

具傳記、證據與案例三種功能——它既是禪師生平行誼的傳記，也是其證悟經驗的證據與案例。公案既以「『實際的』案例來強調『直指本心』的證悟經驗和可能性」，則公案的編纂就「締造了禪宗的歷史傳承」。就作為一種證據與案例而言，公案在締造知識傳統的過程中所凸顯的是個人宗教經驗（相對於經典詮釋）的紀錄，以及這種紀錄（因其所錄本質上為神秘經驗之故）在解讀上的開放性。不過，公案雖有這種開放性，由於其記載的主人公是已死去的祖師，並且禪宗論述傳統會「因例證的證據性而限制新例證的產生」，因此，宋代禪宗只能不斷重複既有的證悟典範，而無法超越唐代的祖師禪。

相對於李玉珍所處理的宗教神秘經驗的案例，熊秉真在〈案據確鑿？近世幼科醫案之傳承與傳奇〉一文中，則直接面對醫案文獻所涵蓋的「科學實證」問題。她以 16 世紀中國幼科醫案文獻的發展為討論焦點，並透過對近代西方「實證文化」的反思，嘗試論證前近代中國所發展出來的是一種不蘊含「科學\人文」、「實證\杜撰」及「非小說\小說」等二元對立觀的另類「實證傳統」。她指出，在中國的幼科醫療史上，醫案、醫論與醫方三者恆處於交叉並立的互動狀態，但直至 16 世紀，醫案作為一種醫療知識文類才大量見於刊刻流傳，形成一種在專業及一般讀者群中皆佔有一席之地的新興「文化產業」。同時，這些幼科醫案文獻有一個基本特質，即「知性傳承」與「感性傳奇」兩股敘述力量的雜揉。熊秉真並且指出，這種雜揉的情況除了「不斷以各種組合，現身於中國醫案」之外，「同時亦展露於禪宗公案、宋明學案、近世刑案，乃至卜算星案，甚至間而托出了公案戲曲與案類筆記小說的誕生。」透過前近代中國的這個「實證傳統」或「推理文化」的燭照，上述種種源於近代西方的二元論，便顯得不足以為「何謂科學實證」的定論，而其所推崇的質素，也不足以標示進步與落後的區隔。作為知識分類的指標，這些二元論不過是特定歷史時空的產物及文化建構的跡影。

同樣視 16 世紀為轉捩點，邱澎生的〈明清「刑案匯編」的作者與讀者：《折獄明珠》、《刑案匯覽》、《審看擬式》中的法律推理〉一文，討論 16 至 19 世紀期間，案例的運用在法律部門的發展情況。其論旨大致有兩方面：第一，在中國，透過刑案進行「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的舉措雖非始於 16 世紀，但自 16 世紀以降「刑案匯編」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公認的法律文類，彰顯了刑案在中國法律部門（包括民間與中央）新興的

地位與重要性，形成了所謂「律」、「例」、「案」三足鼎立，同為司法審判的法源的新現象。第二，所論三種明清刑案匯編，各自有其不同的制度性背景，所採的體例亦不相同，並因其預設的讀者不同而各有其慣用的法律推理形式。不過，透過不同的制度背景、體例與推理形式，三書逐漸促使刑案成為一種明確的法律文類；而這種法律文類所承載的知識系統，「並與 16 世紀以後諸如『醫案』等知識系統相互影響，豐富了明清時代展現『證據』建構『事實』以架構『客觀知識』的內涵。」

朱鴻林的〈早期學案類著作的性質探討〉一文，以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為討論重心，論證黃氏之作的部類歸屬當是「子」而非「史」，同時也釐清了「學案」的一般性意義。他指出，16 世紀以降出現的各種學案著作中，所謂的「學」都是指儒學，而「案」則兼具四種不同意義：(1) 管理意義上的檔案；(2) 思考意義上的公案；(3) 法律意義上的案件；(4) 學習意義上的方案。這些不同意義的「案」又有一個共同的意義：個案，亦即「與同類可以同也可以異的獨立個體」。透過獨立個案的並陳，學案著作旨意在於「立言」，亦即明示先儒成學的「方案」，以為後學從學之楷模。由於它是透過個案並陳的方式立言，因此，就儒學的授受主張而言，學案其實具有相當獨立和開放的意義（「學者可就其性向，自作適合有用的選擇」），而這恰與「晚明以降流行的要求純正而不免封閉的宗傳主張」，形成強烈對比。

張哲嘉的〈中國星命學中案例的運用——以《古今圖書集成》所收書為中心〉一文，嘗試以案例與理論的關係為切入點，探討案例在中國星命學的知識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論點有三：第一，根據《集成》星命部匯考所收十三部星命典籍中，只有四部收有案例的情況來推斷，案例在中國星命學文本中，大體乃居邊緣但獨立的地位。第二，在案例挑戰之下，理論失靈時，星命家通常不是尋求正規理論體系內的解釋，而是以「增益解釋因子和非理論的方式」來予以回應，如：四柱增為五柱，或是引用「方野」理論或出生環境的差異等因素。換言之，理論幾乎完全不會因案例的挑戰而有所異動，而案例的基本功能則在於「印證」，而非「證明」理論。案例因而並不創造新知識，理論也因而呈現出某種僵固性。第三，在形式或展現風格上，案例雖只容許附屬於理論，但在星命學的發展中，案例並非毫無作用，理論也並非完全僵固不可動搖。事實上，「在理論尚處競爭階段時，成功的案例可能使某派的星命學在物競人擇（按：物競人擇是作



者張哲嘉的用詞)中扮演重要地位」，從而發揮證明而非印證的功能。

據案例以說理的敘述風格，不只見於上述各種以記實為主的文獻，也見於中國文學的敘述傳統。「公案劇」即是其中一個顯例。王瓊玲的〈清初公案劇之藝術特質與文化意涵〉一文，即嘗試在元、明、清的歷史脈絡裡，以「正義問題」為分析主軸，探究公案劇作者如何透過戲曲的表現形式，開展出一據案例(司法案例)以說理(正義之理)的文學敘述傳統。她的論點大致有三：第一，作為一種戲劇主題類型，公案劇必然以某項具體司法案件所涉的「冤情」作為故事情節的輻射軸心；不過，司法案件本身固然構成可敘述的對象事實，但公案劇引人入勝之處，並不在於「查凶緝惡的懸念」，而在於賞善罰惡的「社會正義」訴求的推衍。第二，公案劇透過司法冤情的案例所呈現的「社會正義」訴求，不但反映了劇作家對於「人類社會中『正義如何才成為可能』」的關懷與探討，也反映了他們基於戲劇藝術內在理由而導出的一種「文學正義」(poetic justice)的訴求。這兩種正義訴求的交織互動，反映到戲劇設計上，便是讓司法冤情所涉的不公，都能得到平反或另一種補償(所謂「雪恨」、「補恨」)；並且，這種平反或補償的方式是道德性的，但就法律或事實上而言，則往往是不可能的(如典型的「冥判」與「果報」)。第三，從歷史發展來看，公案劇於發生之初雖然是得力於元代社會政治動亂的刺激，但到了明清以後已成為一種確立的主題類型，其作者對於司法不公的關懷焦點，則不再是單純的無奈控訴或對拯救的祈求，而是「對於司法所以不易經常維持其正義之成因的探討」；其結果，一方面是劇中人物刻畫的深刻化，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寫實程度的加深與層面的擴大。

上述 7 篇論文之外，Furth 在會議最後的「綜合討論」，提出“Thinking in Cases”一文。該文從 1970 年代以降北美學界對科學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的脈絡立論，為此研討會提供了一個學術背景的鋪陳與問題意識的釐清。同時，該文對中國案類文獻的性質及說理風格，也提出若干綜合性觀察。關於後者，Furth 的看法大致可簡述如下。

首先，Furth 認為，中國的案類文獻通常見於不同的「專業領域」(specialist domains)，如法律、醫學、哲學、宗教等；而不管其所屬領域為何，每一個案例恆為根據證據說理，並且針對某一個別情境所做的「真值聲稱」(truth claim)。其次，整體而言，中國的案類文獻蘊含了一種共同的說理風格；這種說理風格既有別於實驗科學的歸納法，也不同于邏輯學的

假設演繹法。對它而言，作為範例的個案之間雖有某些共通的連貫模式，但其關注所在，恆為個別案例的個體性與歷史偶然性，而非從諸多案例中歸納出一般性的普遍法則。Furth 進一步將這種說理風格做了兩個分析層面的區分：文字修辭以及比較正規的論證方式。就前者而言，案例的敘述可以透過修辭技法而包含故事性的敘述。不過，由於案例總是涉及對證據與真假值的聲稱，因此，如何將「事實」轉化為「證據」，則須仰賴比較正規的論證方式。Furth 並從兩方面來考察這類論證方式的運作情況。就個別的案例而言，其成立有賴於對相關事物的種種「痕跡」(traces)與細節的收集、閱讀與拼湊，而這種方法基本上是歷史的，所得的結果則是臆測性知識(conjectural knowledge)。其次，就案例與案例之間的組合連貫而言，中國案類文獻展現了三種基本的連貫方式：類別的劃分(classification into kinds)、類比模式(analogical modeling)、以及系譜上的歷史關係(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of precedent/descent)。這三種方式都體現了中國案類文獻說理風格的取向，不在以歸納規範性的普遍法則為宗旨，而在強調案例所從出的個別情境。

總之，Furth 認為，中國案類文獻所展現的說理風格，與近代西方實證主義式的科學所推崇的方法（如排除歷史偶然性因素的考慮、貶抑事物的個殊性面相、以及強調規範性普遍法則的歸納等等），形成強烈對比。這種非實證主義式的說理方法亦見於西方，並且是晚近北美研究科學的新取徑所欲重新挖掘、探討的對象。準此而言，此研討會以中國案類文獻為主題，正提供了一個與西方學界對話的契機與管道。

---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



學術演講

## China Will Complete Its Transformation in Forty Years\*

Te-kong Tong\*\*

Two years ago, I published a five-volume work in Taiwan entitled *The Last Seventy Years of the Manchu Empire*. It is an introductory work, leading toward a more extensive project on Republican China. Recently, this work was abridged into a one-volume edition and republished on the mainland. The first printing sold out in a few months. When the publisher was to bring out a second and better-printed edition, the Party apparatus suddenly prohibited sale of the book. The mainland readers were no less surprised than the author and his readers overseas. When I attended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s on related subjects during last September in China, held successively at the universities of Fudan and Nanjing, often I was questioned and interviewed about it. The most significant question asked was: "What was the the nature of the last 70 years of the Manchu dynasty?" Since the question and the answer are closely related to what I want to speak about today, I will address them

---

\* This article was compressed from a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for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Fredericton, New Brunswick, Canada, on October 20-21, 2000. The HSTCC is an affiliate of the AAS & AHA. Its current president is Professor David Barrett of McMaster University, Hamilton, Ontario, Canada; the Keynote, Professor of Asian History Emeritus, CCNY, CUNY.

本稿表達之諸觀點係唐教授個人之意見。

\*\* The views expressed herein are entirely the author's.

唐德剛先生，紐約市立大學退休教授。本文是唐先生於 2000 年 10 月「美加 20 世紀中華史學會」發表的主題演講。

both, and ask for your critical comments. Here is my simpl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Ever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Opium War (1839-1842), a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taking place in the old nation of China. The total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onarchical institutions towards a republican system may take 200 years to complete. The last 70 years of the Manchu dynasty was only the first stage. The second 70-year stage occurred in the last century. Now, China is halfway through the third and last 70-year stage in this process. Thus, the nation has 40 years to go before completing this transformation. Thereafter, and only thereafter, China will return to normalcy and become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not today.

Of course, this arbitrary prospect requires some further illumination, which is as follows. China had been a monarchical, unified state ever since its first unification by Qin Shihuangdi in 221 BC. It remained so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without substantial changes in its political or social institutions. However, following the life-and-death challenge by the Western powers during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nation was forced to remodel herself in all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Such an institutional overhaul occurred so rapidly that it caused the old nation to change in decades more than she had done in two thousand years prior to the Opium War. This overhaul has made China a different country in every ten years. [Note: As an octogenarian member of this society, this speaker has personally witnessed 8 different Chinas in the past 80 years.] Today,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s still procee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ough with much less intensity.

Given China's monarchical experiences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and given what China's revolutionary and cultural movements have demonstrated in the past 160 years, historians come to believe that this sort of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will take 200 years to complete, i.e., that this rapid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been the major source of all disasters in modern China, would not complete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is is the theme of my book on modern China, which I have attempted to

prove with solid evidence. As to why my book antagonized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I have no clear idea.

The fact that China made no substantial changes in its socio-political institutions during its long monarchical past has puzzled many a historical giant, such as the late historian, Arnold J. Toynbee in England, and the late Chairman Mao Zedong in China, although they visualized the same historical phenomen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ynbee characterized China's changeless past as a "petrified or arrested civilization,"<sup>1</sup> while Mao praised it as "institutional stability".<sup>2</sup> Indeed, the motionless monarchical period and rapid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times have formed a sharp contrast in Chinese history that still puzzles most of us China scholars today.

To solve this riddle, I prefer to trace the roots of China's changeless history as far back as the legendary Xia Dynast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BC. Originally, the area that we now call China proper was populated with 10,000-odd tribal states when, as the legend goes, King Yu of the Xia period called them all together for a conference somewhere in the southeastern region of the nation. Gradually, the number of these tribal states was reduced through internecine wars. Reliable ancient records show that there were still 1,800 states coexisting in the same area during the West Zhou period (c.1046-771BC). But during the lifetime of Confucius (551-479BC), only slightly more than 200 states remained. When Qin Shihuangdi unified in 221 BC, he conquered only 6 "Warring states". Put succinctly,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is a ferocious history of military conquests that ended with the first unification by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 Qin Shihuangdi, who was the greatest conqueror in ancient East Asia.

Therefore, ceaseless wars of conquest made all the socio-political as well as religious institutio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subject to military rule, which,

---

<sup>1</sup> See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360-361.

<sup>2</sup> In August, 1973, Mao Zedong composed a poem praising Qin Shihuangdi, saying that the Qin System has continu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unchanged up to the present time. See Liu Chi Kun, ed. *Mao Zedong shici xiangzhu* [Mao Zedong's Poetry with Annotations] (Hong Kong, 1996), p. 196.

in turn, made the state machinery strong enough to suit military purposes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result was that China's state,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enjoyed "total power" that enabled it to dominate every aspect of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This tradition has caused modern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tists to characterize China's political heritage as "a 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 by comparison with the Western tradition in which state power was shared by the Church and other socio-political institutions.

As Qin Shihuangdi endeavored to maintain unification, moreover, he further centralized political power by abolishing all the feudal institutions, by dividing the nation into 36 provinces, and by confiscating all lands belonging to the former feudal lords and giving them to free farmers to till. To manage them, he established an efficient, centralized, three-level civil service system. In the meantime, the Qin state made the unified empire overwhelmingly rural by adopting a radical policy of anti-commercialism, which killed all chances for the growth of an urban economy in traditional China.

Thi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which Mao Zedong called "the Qin System", was all but the last form of a long reform movement, initiated by a more ancient Legalist statesman, Shang Yang (?-338 BC) of the 4<sup>th</sup> century BC. In fact, it was the first institutional overhaul in Chinese history that lasted over two hundred years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succeeding Han Dynasty. This Qin System was continued through all the imperial dynasties with little substantial changes. Even though the succeeding Han Dynasty changed its state philosophy from Legalism to Confucianism, the state machinery remained the same. Precisely for this reason, Toynbee viewed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as an "arrested civilization", which had been badly "fossilized". But conversely, Mao Zedong praised its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because even his communist government was built on the same pattern. In f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Mao upgraded Chinese state power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Although it was leveled off a little by Deng Xiaoping after Mao's death in 1976, it seems to have been partially reinstated by the present rulers, under the excuse of national stability and security, which, to some degree, could be a political necessity. Obviously, my little book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test victims of the revived monarchical tradition of inquisition.

However, as a student of comparative institutions, I should say that the Qin System, which President Jiang Zemin continued to uphold, is still a functional, if not a “better system” for China, even at the present stage. Historically, it has kept the East Asian continent unified in prosperity and peace for most of the ancient and middle ages, which no other nation was able to match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But, despite its glorious past, this traditional system is unable to withstand the challenge from the West in modern times. It is bound to be further modified sooner or later. And such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starting with the Opium War, which occurred only twice in China’s long history, now is reaching the end. A real democratic modern China – a China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 is on the horizon before us. Traditional state power personified by a dictator, whether he be called emperor, president, generalissimo, or chairman, has been reduced visibly and progressivel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f not from year to year, as has its related lesser institutions including inquisition. In the last 20 years, a modern, urban middle class has risen rapidly. This trend will not be reversed by any individual, social class, or public event. It is an objective reality in human history. Once China has completed its seco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let me repeat once more, she will be able to function as a normal republic ruled by law, and will execute her moral obligations, symbolized by the so-called four freedoms, as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In order to play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as its imperial ancestors did in the ancient and middle ages, however, the nation will have to wait for another 40 years. Thus, at present, I myself frankly think that my little book, *The Last Seventy Years of the Manchu Empire*, may deserve its fate of being banned at the time being under a modern inquisition which is all but a remnant of the “Qin System” and which is yet to be completely overhauled. But the job will be done within forty year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 may call it a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society and

state.

Half of the 200-year process of this second transformation, which also may be called a modernization movement, has occurred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As 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pecialized in 20<sup>th</sup> century China, with 109 due-paying professional members scattered around in many emin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merica, Europe and Japan, our Society has constituted a 3<sup>rd</sup> brand of its kind with comparatively less political favoritism to adhere to than the other two, existing respectively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It is our task, therefore,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carry on the major part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required for such an institutional overhaul in modern China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 We should pursue our academic research thoroughly, diligently, and impartially so as to meet the glorious era to come.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74)

### 都市計畫前輩人物訪問紀錄

訪問：呂芳上等 12 人 紀錄：謝采秀等 4 人 311 頁 平裝 350 元

本書收錄高玉樹、王章清、劉永楙、張維一、張祖璿、李如南、辛晚教、黃南淵、林將財、張隆盛、林子瑜、莊南田、沈祖海、章民強等十四位都市計畫前輩、政府部門、學術界、民間企業人士的訪問稿。除各人的生涯敘述有助於了解時代背景外，都市計畫部份，從民國四、五十年代談起，乃至目前現況。涵蓋內容包括歐美日都市計畫理念的引進、聯合國顧問團的協助、新市鎮的本土實踐，都市計畫法的修訂，區域計畫、都市設計、都市更新、建築發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實務的推動，政策的建言與檢討，可為臺灣都市計畫史提供珍貴史料。



# Homogenizing the World's Cultures? Global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Sherman Cochran\*\*

In my title for today's talk, what do I mean by "homoge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et me begin with a definition: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cultural images are distributed across nation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transmitted through mass media, and circulated beyond political control. Note that in this definition I have not specified the agents that initiate or carry out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agent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re at the heart of a vigorous debate over homogenization. On one side of this debate, we find those who say that the agent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re Western-based corporations. Proponents of this view have argued that Western-based corporations have introduced transnational advertising images to break down national and cultural barriers, to gain direct access to consumers, and to overcome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We might call this the "top-down" or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cultural globalization. Supporters of this view have produced studies of particular Wester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like McDonald's fast food restaurants, Walt Disney entertainment enterprises, and most recently Nike as described by my friend and close colleague at Cornell Walter LaFeber in his book *Michael Jordan and the New Global Capital* (1999).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bate, we find those who say that the ultimate agent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re not Wester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but rather individual consumers in local cultures. We might call

---

\* 本文為 2001 年 1 月 4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的演講稿。

\*\* 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

this the “bottom up” or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ultural globalization. Proponents of this view have argued that individual consumers in local cultures have localized global culture in several ways: by maintaining their own cultural barriers to transnational images, by combining transnational images from mass media with preexisting local cultural images, and by creating their own new and diverse local cultur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ir governments and other local institutions. Supporters of this view have done field work and have interviewed members of communities to learn how they have received and interpreted marketing campaigns and advertising images in several parts of the world: India, Africa, and recently East Asia in *Golden Arches East* (1999), edited by James A. Watson.

Advocates of these two interpretations are currently engaged in a fierce debate. One side says that Wester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making the world’s culture more standardized by imposing a single consumer cultur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other side says that individual consumers are making the world’s culture more diverse by creating diverse new consumer cultures.

Where do I stand on this debate? And what can I as a historian of China contribute to it? I promise to give you my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but before I do,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research that I’m basing my answers on.

In hopes of learning about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on the marketing of medicine in Chinese history. Why medicine? Because in China 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marketers of medicine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mass market their goods. Throughout the 20<sup>th</sup> century and even today the marketers of medicine (like Bayer aspirin) continue to allocat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their budget for advertising than marketers of any other product do. So I have looked into the marketing of medicine to see how agent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made a start in Chinese history.

I researched this topic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either I would find evidence of Wester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omogenizing Chinese culture and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into one global consumer culture or I would find evidence of individual Asian consumers localizing and creating a

multiplicity of local consumer cultures.

In the course of my research, I had a surprise and a disappointment. The surprise was that Western-based trans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s did not play major roles as agents spreading global consumer culture in Asia during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By 1920, the biggest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n the world had offices in Shanghai. German-owned Bayer (as in Bayer aspirin), American-owned Eli Lilly, British-owned Burroughs Wellcome, and Canadian-owned Williams Medicine Company all were there. But in the 1920s, '30s, and '40s, these Western giants did not reach much beyond Shanghai and a few other coastal ports.

The disappointment was that I could not find out much about individual Asian consumers as agents creating local consumer cultures. I did not come up empty handed, and I'll report to you today on some of my findings. But in general I have to admit that anthropologists have learned more from their field work about individual consumers' localization than I have.

I have little to offer you on Western corporations' homogenization, and I have little to offer you on individual consumers' localization. So what do I have to offer you on homogen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Should you all go home? Well, I like to think that I have something fresh to offer you, and I hope that my project will provide a basis for rethinking and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My project focuses on neither Wester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nor individual consumers in local cultures but rather on Asia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owned and operated by Chinese entrepreneurs whose birthplaces, upbringings, educations, and work experiences were all in Asia. I've drafted an introductory chapter and five chapters that constitute the body of the book, leaving only the concluding chapter unwritten. In these chapters I have described several Chinese-owned pharmaceutical businesses, and I have argued that they all were agent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because they transmitted cultural images and motifs acros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used mass media to do so, and eluded national governments' political control.

Today I want to discuss with you a chapter from the book on a case in which a marketer of medicine dealt successfully with governments. The principal subject of this chapter is 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that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a medicine known as Ten Thousand Golden Oils (wanjinyou) or Tiger Balm. As you may know, Tiger Balm is now available worldwide.

The business that makes Tiger Balm was founded by an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 named Aw Boon-haw. Aw was born in Rangoon, Burma, and he kept his headquarters in British colonies: Rangoo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Today Tiger Balm's headquarters are in Singapore.

Aw lived from 1882 to 1954, and during the 1930s, '40s, and '50s he gaine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by dealing directly with top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 in wartime as well as peacetime. Let me give you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Aw's success at dealing with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eluding political controls by quoting a top secret memorandum written by the British governor of Singapore, Gim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Britain's colonies in London. This document is dated September 22, 1949.

Gimson, the governor of Singapore, was writing to justify his decision to ban Aw Boon-haw from Singapore in 1949 even though Aw had lived there in the 1920s and '30s and had based his business there prior to World War II. Publicly Gimson used Cold War rhetoric to justify the ban in statements at press conferences. Gimson told newspaper reporters that Aw had expressed leftist views that were sympathetic to the Communist cause so he should not be allowed in the British colony of Singapore. But Gimson confided to his superiors in London that he believed Aw was guilty of much broader, long-term political sins. Here is what Gimson said in his secret memorandum:

Aw Boon Haw was a collaborator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hose activities were freely advertised and who bought his way back into favor with the [Chiang Kai-shek's] Kuomintang government in China after the war. At the end of 1948, the Hong Kong Police obtained reliable information that he was attempt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at the same time his chain of newspapers

showed a strong leftist tendency. ...He is a man of no principles who will side with any party he thinks most likely to serve his own interests.

The British governor was appalled by Aw Boon-haw's lack of "principles". But I am curious to know whether Aw was really so successful in his relations with governments. How did Aw succeed at collaborating with the Japanese, buying his way back into favor with Chiang Kai-shek (the mortal enemy of the Japanese), and attempt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Mao's Communists (the mortal enemy of Chiang Kai-shek)? Did these political leaders capitulate to Aw as a globalizing capitalist?

Aw dealt adeptly with political leaders face to face, and later I'll describe his meetings with the top political leaders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But I believe that Aw's success at eluding political controls was based firmly on his success by my other two criteria for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mages and use of mass media. Aw used the soft power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against the hard power of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So let's look first at Aw's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mages acros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second at his use of mass media to reach consumers; and finally at his relations with governments.

In 1908, at age 26, Aw inherited his father's one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 shop in Rangoon. At the time, he presided over a very small family-owned, family-operated business that distributed strictly within a local market. At that point, there was little that was transnational about his business. Aw's father had migrated to Rangoon from China. But Aw inherited no practice of using cultural images to market goods across nation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no mass media, and no experience at eluding national political control. Moreover, Aw did not seem well prepared to expand his business because he was not well educated. Aw was born in Rangoon, Burma (a British colony), but he did not attend British schools or learn English, leaving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to his younger brother. Aw was sent back to his family's native place in Southeast China (Fujian province's Yongding county), but Aw didn't learn much Chinese either. As a family member later recalled, Aw was

“a naughty boy and did not like to study in school.”

And yet, by the 1930s (25 years later), Aw had reached far beyond this small family-operated shop in one local Rangoon market. He employed 10,000 people. He owned medicine plants making Tiger Balm in Burma (at Rangoon),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China (at Shantou). He owned twelve newspapers in seven Asian cities. And he owned branch stores in almost all part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w built branch store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of Burma, Singapore, Malaya, and Hong Kong; the Dutch colonies of the East Indies (Indonesia); the Japanese colony of Taiwan; and almost all parts of China. Aw did not build branch stores or penetrate the markets of French Indochina (Vietnam, Cambodia, and Laos) but not because of official French prohibitions. He abstained from selling in French Indochina because he formed a market-sharing agreement with a rival overseas Chinese who was based at Saigon and made medicine similar to Tiger Balm. Aw also did not sell in Japan or the Japanese colony of Korea wher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ut up protectionist barriers. So if we discount Japan, Korea, and French Indochina, Aw sold almost everywhe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f Aw did not market good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before 1908 and he did widely market good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by the 1930s, how did he make this leap from a small-scale mom-and-pop's herbal shop to a gigantic Asia-wide commercial empire?

In 1909, the year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Aw did two things: first, he took a trip to observe the marketing of medicine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 between Burma and Japan; and second, on returning home, he gave his goods a trademark. Throughout the rest of his life, Aw always maintained that he named his tiger trademark after himself. Aw Boon-haw (which is a romanization of the sound of Aw's name in Hokkien Chinese) is pronounced Hu Wenhu in Mandarin. The “haw” in Aw Boon-haw means “tiger,” and Aw's name as a whole means “The Cultured Tiger of the Aw Family.”

Initially, Aw designed and drew his own images of the tiger. (Clearly Aw was visually oriented, not language oriented, and he was visually acute.) Then

as his business grew, Aw commissioned commercial artists to paint tigers that would appeal to consumers across nation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Perhaps the most transnational artist that Aw recruited was a commercial painter named Guan Huinong (Kwan Wai Nung, 1880-1956). Even Guan's ancestors were transnational artists. The most famous of them was Guan's great grandfather, Guan Zuolin, who studied with the British artist George Chinnery at Macao and had his paintings exhibited in London, New York, and Boston during the 19<sup>th</sup> century, using the name "Lamqua". Guan'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re also well-known artists, and they trained Guan as a Western-style painter.

In the 1910s (then in his 30s), Guan Huinong was further trained by Japan-oriented Chinese artists. Guan moved to Shanghai to join the Lingnan School of painting. The founders of this school were Cantonese (like Guan), and they had studied painting in Japan. At this time they became famous for their paintings of tigers. Guan was a member of the Lingnan School of Painting until the collapse of its principal publication in 1913. Guan then left his fellow members of the Lingnan School in Shanghai, and he returned to his home in Hong Kong where he opened his own business as a commercial artist. Guan's business flourished in the 1910s, '20s, and '30s, and he opened branche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Guangzhou, and Shanghai. In other words, Guan had his ow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he supplied Aw with images for advertising that Aw used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his outdoor advertising, Aw used a wide array of pictorial mass media: posters, billboards, wall paintings, painted cars, theme parks. I might add that Aw associated his own persona with tigers. For example, Aw nicknamed all of his sons Tiger: Tiger Number One, Tiger Number Two, Tiger Number Three, Tiger Number Four.

In evaluating Aw's advertising, can we say why his images of tigers appealed to consumers? Did Aw succeed from the top down or the bottom up? From the top down, Aw played a direct role in formulating these images. He chose the tiger for his trademark. He personally designed the springing tiger on the original trademark. He commissioned Guan, a commercial artist who

had studied with China's most famous tiger painters. He controlled production of mass media such as posters and billboards. He invented theme parks and chose and supervised the architects who designed them.

From the bottom up, according to a specialist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Lynn Pan, consumers responded favorably because these new images resonated with their long-held beliefs. In Pan's words, Tiger Balm consisted of "little more than a mixture of menthol, camphor, clove oil, peppermint oil, cassia oil, and cajuput oil, bound together by wax and petroleum" and was at best "an effective rub," but "it was popularly believed that the ointment, seen by many to be a cure-all embodying some of the tiger's legendary qualities, contained one or more parts of the animal's anatomy, ground up and mixed in with the rest of the ingredients."

So which better explains the popularity Aw's medicines: his imposition of tiger images through outdoor advertising or consumers' beliefs in the tiger as a symbol of good health? Pan's observation in support of the bottom-up interpretation is difficult to confirm until more is known about Pan-Chinese and even Pan-Asian visual culture. Did all Chinese or all Asians perceive the tiger as a symbol of medical potency? Have Chinese and others all over Asia always regarded the tiger as a symbol of good health? I hope that you will help me with these questions.

Aw advertised through newspapers as well as outdoor media. Between the late 1920s and his death in 1954, Aw founded, owned, and operated a chain of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known as the Star (xing) newspapers. Throughout these years, Aw used his newspapers above all as an advertising medium for promoting the sale of Tiger Balm and his other medicines with Chinese readers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and in China. Aw was so deeply committed to his newspapers as an advertising medium that he ran them at a loss. What's more, when his newspapers were losing money, he added expensive new features to make his losses still greater.

In every case Aw invested in newspapers to make them popular and to make them effective at advertising and not to make them profitable in themselves. In 1929 Aw founded his first newspaper, Xingzhou Daily, in



Singapore. Aw made a spectacular entrance into Singapore's newspapers market. He underpriced his competition, charging eight cents per issue compared to his rivals ten cents per issue. By the end of the 1929 (his first year), Xingzhou Daily had a circulation of 7,000 representing 1/3 of the market for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And in the same year (1929), Aw lost \$30,000 Singapore dollars on this newspaper.

In the 1930s, Aw widened his market by investing heavily in this newspaper. In 1930 (his second year in the market), Aw enlarged it from sixteen to twenty pages and cut subscription prices by 50% for schools and civic groups and by 80% for subscribers who had taken it for six months or more. In 1932 Aw added a Sunday supplement and a morning edition. These features had never before appeared in Singapore newspapers. Aw included them at no charge to regular subscribers. By using these techniques, Aw pushed up Xingzhou Daily's circulation to 10,000 in 1933 and 60,000-80,000 in 1937, making it the most widely read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 in Southeast Asia at the time.

Meanwhile, Aw followed a similar pattern in establishing and popularizing newspapers outside Singapore. According to his strategy, at each of his newspapers he underpriced his competition, introduced free Sunday supplements, provided both morning and evening editions for the price of one, and made other appeals to subscribers. As a result, by the late 1930s Aw's newspapers were all popular and his losses on his newspapers rose to \$250,000 Singapore dollars per year.

So Aw Boon-haw put popularity above profits in publishing his newspapers. According to Chinese newspaper historians, Aw's newspapers devoted more than half of their total space to advertising for Tiger Balm and Aw's other Tiger-brand medicines.

By the 1930s Aw owned twelve newspapers: four in Singapore, one in Penang, three in Hong Kong, and four in China at (Shantou, Xiamen, Guangzhou, and Chongqing). Aw managed these newspapers and his Tiger Balm offices all through a Chinese social network. Aw's managers were bound to him by ties to his family, ties to his native place (Yongding county

in Fujian Province in Southeast China), and ties to his sub-ethnic group, the Hakka minority. In fact, Aw's employees at all levels of his business (from top managers to low-level workers) generally were Hakkas from his family or his native place.

In Aw's newspaper, as in his outdoor advertising, we see Aw Boon-haw's imposition of a marketing system from the top down. Aw founded and owned the Star chain of newspapers. He set a priority on popularity over profits and willingly took losses on his newspapers as long as they served his marketing purposes. He closely controlled his distributing system through a Chinese social network based on family, native-place, and Hakka sub-ethnicity.

Aw also stimulated localization from the bottom up. For example, Aw's business practices were "localized" by his Chinese rival. Aw had his main offices in British colonies (Rangoon, Singapore, Hong Kong). He had a rival, Wei Shaobo, in French Indo-china based at Saigon. Wei made a medicine called Two Heavenly Oils (ertianyou) which was similar to Aw's Ten Thousand Golden Oils (wanjinyou). Aw and Wei formed a market-sharing agreement, leaving the markets of Southeast Asia's British colonies to Aw and the markets of the Southeast Asia's French colonies to Wei. In the course of their cooperation, Wei localized Aw's business practices. In particular, Wei imitated Aw's advertising, and their two companies waged spectacular advertising wars against each other in their battle for China's market (where they had no market-sharing agreement).

So far I have been describing Aw's success at building up a commercial empire through the soft power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mass media and newspapers for advertising and social networks for exercising control over distribution. Now let's consider how he used his soft power to deal wi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who had hard power.

In his relations with Chinese leaders, Aw adopted a two-phase strategy: first, he donated funds to their causes, and second, he followed up by publicizing his donations for his own advertising purposes. Take for example, Aw's relations with General Cai Tingkai,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19<sup>th</sup> Route Army against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Shanghai Incident of 1932. In

1932, General Cai and his army became national heroes in China for resisting Japanese forces at Shanghai. Afterwards, General Cai thanked Aw in an interview saying,

We had the strongest support from Mr. Aw when we were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Shanghai. He shares with us a bitter hatred of the Japanese, and he inspires us with his patriotism.

I've quoted General Cai's entire statement. In his newspapers, Aw published it under this headline,

National Hero, General Cai Tingkai, Revered by Peop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Gives His Support to Tiger-brand Medicines

Thus did Aw poach on a Chinese elite war hero's political nationalism and transmute it into a commercial endorsement for Aw's Tiger-brand medicines.

Aw's relations with Chiang Kai-shek were more complicated but followed a similar pattern. Aw repeatedly donated funds and benefitted from publicizing his donations. In 1930, three years after Chiang established hi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 its capital at Nanjing, Aw paid Chiang a visit in his official residence. Chiang asked Aw for a contribution to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Central Hospital in Nanjing, and Aw promised to cover the entire cost, 375,000 Chinese dollars (yuan). In 1935 Aw pledged to give an additional 3.5 million Chinese dollars over a ten-year period to fi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1,000 elementary schools throughout China, and between 1935 and 1937 he began to fulfill his promise by building 300 of these schools at a cost of 1.5 million Chinese dollars. In 1937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Aw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finish the rest of the schools after the war, and in the meantime, he contributed the remaining two million Chinese dollars from his school fund to Chiang's war effort against Japan by buying war bonds from Chiang'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meantime, Aw did not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credit for these contributions. For example, Aw had his name put o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which were each named "Aw Boon-haw Elementary School". Moreover, Aw held press conferences to announce all of his gifts.

During the war Aw accepted an official position in Chiang's government. In 1941, 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Political Assembly at Chongqing where Chiang had retreated following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in 1937. Throughout the war Aw prohibited his newspapers from making criticisms of Chiang Kai-shek by name. In general Aw did not set editorial policies for his newspapers, but on this one point he was emphatic.

Using these techniques, Aw eluded political control by Chiang'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1930s and '40s. Aw never surrendered control over his medicine business or his newspapers to Chiang's government, and Aw steadily expanded his marketing in China during Chiang's prewar era (1927-37) and even during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45). Aw's success at eluding Chiang's political control was attributable to Aw's effective face-to-face negotiations with Chiang but also more broadly to Aw'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through mass media which Chiang wanted on his side.

Aw Boon-haw dealt with the leader of wartime Japan, Prime Minister Tōjō Hedeki, somewhat differently than he dealt with China's leaders. Throughout the war, Aw was based in Hong Kong, which was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from 1941 to 1945, and in Hong Kong Aw continued to manufacture and sell Tiger Balm and to publish a newspaper. During the war Aw distributed his medicine in the parts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also in the parts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not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w's sales of Tiger Balm were higher than ever before, earning profits of two billion Chinese dollars (yuan) per year during the war.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as his employees have said) that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The Golden Age" for Aw's medicine business. Aw also entered the rice trade and managed distribution on a large scale i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1943 at the height of the war Aw made his most controversial contact with the Japanese. Aw traveled from Hong Kong to Tokyo to pay a visit to the head of Japan's wartime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 Tōjō Hideki. In 1943

before his trip to visit Tōjō, Aw published in his newspaper a favorable assessment of Japan and Japanese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At their meeting in 1943, Aw Boon-haw and Tōjō Hideki discussed how to use Aw's Chinese networks. Tōjō wanted Aw to use his network to extract and transport China's raw materials for use in Japan's war effort, and Aw wanted Tōjō's protection for Aw's management of Hong Kong's rice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transcript of their conversation, Aw rejected Tōjō's proposal and won Tōjō's approval for his own proposal.

After returning from Tokyo to Hong Kong, Aw did not use his network to extract war material from China, and he was not able to engage in the rice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either because American bombing cut off shipping betwee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But Aw won approval for his plans from Tōjō even if Tōjō was not able to make good on his end of the deal.

Under Tōjō, as under Chiang, Aw retained control over his business. Only under Chinese Communist rule did he lose it. Before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1946-49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Nationalists, Aw cultivated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 in his usual way. Aw made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sts. He met with Communist leaders such as Zhou Enlai and Ye Jianying (who was a fellow Hakka). He converted favorable Communists' news releases on his donations into publicity for Tiger Balm. During the Civil War between Mao and Chiang (1946-1949), Aw did not require his newspapers to adopt editorial policies favoring one side or the other. As a result, some supported Chiang, and others supported Mao.

After Mao won and found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n October 1, 1949, Aw gave the Communists his undivided attention and made every effort to win over the new government. He tried to exploit his old contacts with Communist Chinese leaders. He instructed his branch managers in China to obey new official regulations, to pay new taxes, and to hand over 300 million Chinese dollars for new government bonds. But this time Aw failed to win over China's leaders. In 1950 he was branded a "reactionary capitalist" (*fandong zibenjia*) for having collaborated with Chiang Kai-shek and Japan's wartime government. In 1951 Tiger Balm and Aw's other tiger-brand goods were

banned from China, and Aw's newspapers in China were all confiscated.

By comparison Aw was much more successful with the Western colonial governments of Southeast Asia. In June of 1949 the governor of Singapore lifted his three-month ban on Aw's visits to Singapore. Aw then shifted his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from China to Southeast Asia and Taiwan. In the early 1950s, Aw greatly expanded his business 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dding branch offices and newspapers. He also made peace with his old ally Chiang Kai-shek (who had retreated to Taiwan), and he campaigned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lmost until his dying day. In September 1954 Aw died at the age of 72.

These examples of Aw's dealings with Chinese, Japa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leaders show that he contended with strong governments. And yet, Aw was not merely a passive victim of government oppression.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gave to political leaders but also gained from them and often turned business- government relations to his commercial advantage. As shown here, he was particularly adept at using his official contacts to generate publicity and advertisements promoting the sale of his goods.

So, that's Aw Boon-haw's story. Now let's return to our original questions. Should I use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to interpret this case? As you see, my research has led me to raise some questions that are sub-global, regional, or even local. If dividing the world into continents, then we might consider these questions to be relevant only to Asia. But I think that Aw became an agent of globalization by all three of our criteria for cultural globalization. He transmitted cultural images across nation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he used mass media to disseminate these images, and he persuaded political leaders to allow him to elude political control (except in China after 1950).

By these three criteria, I think Aw's business measures up agains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ven in today's world. The record of Aw's business before 1950 compares favorably with many contemporar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its success at establishing brand recognition and image (the tiger), extending distributing networks, and exercising political influence.

Doesn't a business that captured international markets containing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qualify as an agent of globalization?

Aw also resembled today'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his utilization of time. To be sure, Aw's company did not use electronic advertising media and could not deliver television commercials worldwide in a single instant before 1950 (as it can today). But Aw anticipated the electronic age in his use of newspapers (which were published daily) for up-to-date promotion of sale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So we certainly have here a case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but do we have a case of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or do we have a case of cultural localization?

Here's my answer: I think we have here a case of greater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and greater cultural localization by an Asia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than by its Western rivals. As I mentioned, Wester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did not market their good widely in Asi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Compared to these Western companies, Aw crossed far more national and cultural barriers and had a homogenizing effect on far more consumers in Asi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bate, did Aw'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stimulate cultural localization? My reply to this question is more difficult to document. But again I think the answer is yes. My best examples are Lynn Pan's observation on Chinese consumers' popular beliefs in the tiger as a symbol of medicinal potency and Wei Shaobo's incorporation of Aw's business practices into Wei's own Saigon-based Chinese network. So, yes, on the basis of these examples, I think Aw'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was an agent that stimulated cultural localization.

On the debate over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and cultural localization, let me make one last point. If we stay within the current framework of the debate, I think we'll miss a lot. It is true that Wester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like Bayer and Eli Lilly) played a role here. They set up offic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 and Aw (among others) saw and appropriated their Western cultural images and their use of mass media. But if we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se Western-based corporations as the sole agents of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we'll greatly underestimate the reach of Asian-based business institutions that homogenized culture from the top down.

By the same token, it is true that Chinese consumers localized advertising that reached them from Wester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it is true that Chinese networks localized business practices that they learned from Wester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But once again if we confine ourselves to localization of the practices of only Western-based corporations, then we'll greatly underestimate the amount of localizatio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that occurred from the bottom up.

In evaluating agents of homogen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why should we confine ourselves exclusively to marketing by Wester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hy not look at non-Wester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oo?

I began this talk with a definition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d like to end with a metaphor for cultural globalization. When I see arguments for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I imagine a big Western-made truck (a sixteen-wheeler) barreling down an information highway into non-Western cultures. When I see arguments for cultural localization, I imagine local consumers marching up this highway and turning it into a two-way street. If my research has any bearing on the future, it suggests that Western-made trucks will not be the only vehicles on the highway, and that individual consumers will be running into heavy traffic from big and powerful non-Western-made trucks too. We'll see.

中研院近史所、臺史所合出臺灣史料叢刊(1)

灌園先生日記(一) 一九二七年

編者：許雪姬等 8 人

243 頁 精裝 300 元 平裝 250 元

林獻堂先生的《灌園先生日記》是臺灣最珍貴的私人資料，它起自 1927 年，止於 1955 年，中缺 1928、1936 年，前後長達 27 年，跨越日治、戰後兩個時代。

日記中除了家族歷史外，有豐富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活動的資料；尤其是以他為中心所展開的活動，如臺灣文化協會、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一新會，故本日記不僅是林獻堂一生最重要的見證，亦可補充官方資料的不足，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學人簡介

## 口述歷史的開拓者與民國軍事史、山西區域 史研究的尖兵——陳存恭先生的研究志業

沈懷玉\* · 林德政\*\*

陳存恭先生，1933年11月生於福建省南安縣。1948年初中畢業後隨其堂兄陳青山先生經由廈門搭船到臺灣，進臺灣省立臺東師範學校就讀，畢業後，先後於臺南縣善化國小、臺東師範附小教書。1957年保送臺灣省立（嗣改為國立）師範大學史地系，1961年畢業，在臺北市立萬華初中實習一年，入伍服預備軍官役一年，隨後於1963年11月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聘，充任臨時助理。當時近史所在其業師郭廷以先生籌辦下，正是筆路藍縷的時期。陳先生以其才識，蒙郭先生不次提拔。1964年10月升助理員，1968年8月升助理研究員，1970年獲得美國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獎助，到英國進修一年九個月。返國後陸續發表有關民初軍火禁運問題等研究論文，1975年7月升副研究員，1983年7月升研究員，1995年8月至1998年7月兼近史所一般近代史組組主任，1999年2月1日退休，改聘為兼任研究員迄今。總計在近史所擔任專職工作達三十五年。

先生研究學問，注重理念，主張要有創見，對學生與後進，則愛護、提攜有加。現雖退休，改聘為兼任研究員，每天仍到研究室工作，退而不休，老而彌堅，為學界楷模。

### 一、口述歷史的開拓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本文「口述歷史的開拓」一節由其撰述。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1. 初期的訪問工作

先生自 1963 年進入近史所即參加口述歷史訪錄工作，迄 1970 年 9 月先生至英國倫敦大學進修，訪問工作才暫告一段落。在這段期間，除進行研究工作外，訪問向構父、李鴻文、沈亦雲、張廷諤、雷殷、楊森、周雍能、戢翼翹、劉景山、王奉瑞、張喬齡、白崇禧、徐啓明、邵百昌、郭廷以等政治、軍事、交通、學術界重要人物。先生最得意的是 1969 年 8 月完成業師郭廷以先生的訪問紀錄。

1972 年 5 月，先生自英國進修回國，近史所的口述歷史訪問計劃，因福特基金會兩期的合作補助於 1972 年 7 月結束，而宣告暫停。1975 年先生升任副研究員，雖沒有經費支援，卻因為有約在先，仍於 1976 年自行訪問勞聲寰先生，完成口述歷史一冊。

## 2. 遵循郭所長遺訓，繼續推動口述歷史

1980 年，近史所所長呂實強約請先生與王聿均、張朋園（因出國，改由陸寶千接任）三人共同檢討口述歷史紀錄是否公開刊行，經多次商討後，決定由所方籌措出版經費，在受訪者或家屬同意下，逐年出版口述歷史叢書。先生負責實際業務，自 1982 年刊行《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後，迄其得卸仔肩，總共出版五十一種口述歷史叢書（其中，《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訪問紀錄》是外稿），對現代史研究提供寶貴的參考史料，引起各界對口述歷史的重視。

1984 年元月，近史所成立口述歷史組，由先生領導，再度展開口述歷史的訪問工作。先生商請近史所研究員擔任訪問，助理研究員擔任紀錄及整理（後來改由約聘人員負責）。1988 年 4 月至 1993 年 9 月，先生實至名歸，擔任召集人（1990 年 10 月至 1991 年 6 月出國，由陸寶千代理），更積極推動訪問工作，並配合同仁研究專題，訪問影響臺灣四十年來發展之關鍵性人物，遍及軍政、企業、科技、醫學、婦女、藝術等各界。在先生任內，近史所共完成六十六位個人一生事功訪問，其中先生親自訪問者有：石覺、周至柔、張式綸、羅英德、劉安祺、趙正楷、張彝鼎等軍政、企業界人士。此外，先生亦推動以重要歷史事件為主的專題訪問，如由許雪姬負責就二二八事件訪問三百多位人士，朱泮源就孫立人案件訪問八十餘人。先生本人亦參與訪問孫案有關人士，計孫立人、王筠、潘德輝、周以德、陳良壠、張茂群、王霖、王學斌等八人。

### 3. 倡辦《口述歷史》

1989年9月，先生與近史所張玉法所長及參與訪問的幾位資深同仁，鑒於以往成稿的短篇訪問紀錄，有結集出版之必要，乃向口述歷史小組委員會提議，以紀念近史所推動口述訪問屆滿三十週年為名，出版《口述歷史》不定期刊物。此一刊物，除篇幅較短的訪問紀錄之外，亦刊登口述訪問經驗談、書評、訪問活動報導、各國口述訪問機構介紹等。10月，《口述歷史》創刊號問世，這是國內第一本口述歷史刊物。在先生擔任口述歷史召集人任內，共出版四期《口述歷史》，其中第三、四期是許雪姬所訪問的二二八事件專號。

### 4. 促成全國口述歷史會議的召開

由於口述訪問的工作與成果頗受各界重視，而國內從事口述歷史的單位不少，為交換訪問心得，協調訪問對象，了解彼此工作狀況，先生與朱宏源乃於1990年4月，向口述歷史小組委員會建議，由近史所發起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空軍總司令部、空軍軍官學校、臺灣省文獻會、臺北市文獻會、高雄市文獻會等單位參與。1991年2月8日正式召開，先生由香港返所參加。此一會議每隔一年或二年召開一次，迄今已召開七屆。

先生長期參與訪問工作，推動口述歷史不遺餘力，在此一領域有一定的貢獻，頗受推崇，史政編譯局與臺灣省文獻會均借重先生，協助推動口述史工作。先生自1963年參與訪問以來，訪問軍政要人四十餘人，已出版的口述訪問紀錄，包括與同仁合訪者計有：徐啓明、白崇禧、周雍能、賈翼翹、王奉瑞、石覺、張式綸、劉景山、郭廷以、勞聲寰、劉安祺、萬耀煌、趙正楷、陶希聖、柳元麟、周靈鈞、劉象山等十七種，發表於《口述歷史》期刊者計有：向構父、雷殷、李毓萬、李鴻文、張廷諤、張喬齡、邵百昌等七篇，此外，參與臺灣省文獻會有關八二三戰役相關人物的口述歷史計劃，對朱秉一等十位參戰軍人及戰地平民所做的訪問紀錄，亦已出版。先生多年來對軍政人物的訪問，有助於他對民國軍事史研究的深化。先生1999年退休後，仍參與訪問，2000年已完成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如先生訪問稿二十餘萬字，不愧是口述歷史的開拓者。

## 二、民國軍事史研究

### 1. 民初外洋軍火輸入及禁運問題

先生初從事口述歷史訪問時期，原有意涉獵清代臺灣械鬥史，後因口述訪問對象多屬民國軍事將官，赴英進修時又從英國公檔局(Public Record Office)發現不少有關中國的軍火檔案，加之業師郭廷以自美國寫信，囑咐他研究英國與孫傳芳的關係，遂轉而研究民國軍事史，並以民初軍火輸入為研究重點。

先生從英國外交檔中發現，國共兩黨的正統歷史論述中，帝國主義國家與軍閥利益結為一體的說法，全屬揣測；英美兩國並未支持直系，也未支持陳炯明或廣東商團，英國政府尤其未支持孫傳芳。反之，1919年英美兩國攜手促成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協議(The China Arms Embargo Agreement)。先生返國後，以這個發現為基礎，參考中國外交檔案、美、日外交文書以及海關紀錄，並進一步鑽研國際法、海洋法等相關書籍，下結論說美國於中國南北議和時，發起軍火禁運，其目的在於促進中國和平，以免戰亂滋長，屬於對中國內戰嚴守中立的性質，惟施行十年，多少含有強國控制弱國的性質，且由於蘇、德兩國政府拒不參加協議，禁運效果大打折扣。北伐後，列強先後承認國民政府，遂在英國提議下廢棄禁運協議。先生根據以上研究心得，首先完成有關民初陸、海、空三軍軍火問題的論文數篇，再於1973年4月出版《列強與中國的軍火禁運：民國八年～民國十八年》一書。該書論敘軍火禁運協議之肇始、執行及廢棄的經過，除評估禁運的效果外，也分析了軍火禁運對民初軍政及外交發展的影響，對民初外洋軍火輸入問題作了有系統的整理與解釋，並糾正了不少傳統的說法。

### 2. 北伐後的動亂

先生結束民初軍火研究後，應蔣永敬教授邀約撰寫《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三篇，第九章「內亂之平定」的前三節。1929年桂系先動干戈，西北軍、晉綏軍繼起稱兵，1933年十九路軍發動閩變，1936年陳濟棠和李宗仁掀起兩廣事變，國民革命軍的分裂與戰爭成為國民黨政權的致命傷。重建此段歷史是高難度的工作，蓋當時尚有政治忌諱，有關檔案亦尚未開

放。幸獲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提供部份檔案資料，如閻錫山資政檔案、人民日報（福州）、大公報、閩變時期海軍檔案等，先生得以順利完成撰述計劃，三節合計十餘萬言，對北伐後國民黨軍政的分裂與再統一，做了初步的論述。

### 3. 國共鬥爭史

先生完成北伐後「內亂之平定」一文以後，計劃增加「國共鬥爭」及「匪亂」兩節，以便完成「北伐後的動亂」專題研究計劃。國共問題錯綜複雜，原本難以深入研究，而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入侵，更增加撰述的難度，先生從國共兩黨的政策入手，先發表有關蔣中正「安內攘外」政策和毛澤東「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論文，再發表有關兩黨屬性以及部份鬥爭的論文。如今國史館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先生希望據以增補完成「北伐後的動亂」一書。

## 三、山西區域史研究

### 1. 山西現代化

1986年春，先生應張朋園教授邀約，參與「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計畫，1860—1937」，選擇具有特色的山西省為研究對象。其時正值中國大陸開放，先生於是藉赴香港珠海書院講學之便，親自前往山西蒐集資料，先後發表〈張之洞在山西〉、〈閻錫山與晉軍的興衰〉、〈山西省的災荒，1860—1937〉等論文。先生雖於四年之內完成有關山西現代化研究的初稿六十餘萬言，但因資料汗牛充棟，迄今仍未定稿。

### 2. 徐永昌研究

1991年先生因訪問趙正楷先生，得悉徐永昌夫人藏有抗戰時期軍令部長、日本投降受降代表徐永昌將軍（山西人）的日記，乃徵得當時所長張玉法先生的同意，向家屬取得發表權，並自任編務，悉數予以付梓問世。

1993年先生發表〈現代專業軍人的典範——徐永昌〉論文。1996年再將趙正楷先生遺留的徐永昌先生資料編輯成《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一書，列為近史所史料叢刊之34，便利學者研究。

### 3. 徐繼畬學術研究會

1990年12月，先生趁講學香港之便，參加廣州中山大學舉辦的《紀念中國近代史開端一百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徐繼畬事略及其瀛環志略》。徐繼畬，山西五台人，曾任福建巡撫，所著《瀛環志略》為清季世界史地的啓蒙讀物。英法聯軍之役後，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北京同文館第一任總辦，對中國現代化貢獻殊多。先生自認所提論文不夠周延，而以未及參考 Prof. Fred W. Drake（龍夫威）所撰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su Chi-yü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為憾，不過細讀《五台新誌》（徐繼畬主編，孫步墀、徐耘田增補），發現徐繼畬於福建巡撫兼攝閩浙總督任內，曾為外國傳教士進入福州城問題，與林則徐等官紳有所爭執，先生將徐林的爭比喻為鴿鷹之爭，對林有所批評，自認為就史論史，無所偏袒。

不料，中共臧否歷史人物，全以符合其政策為準則，基於「對抗外夷」之需要，向來尊林而貶徐，尊林則徐為民族英雄，但貶徐繼畬為官僚派、妥協派，甚至詆為「漢奸」（在山西徐的墓被鏟平）。先生認為如此對待徐繼畬，實為厚誣古人。會議當時提倡「愛國主義」，甚至有人公然聲稱「不怕與外國人再打一百五十年」，充滿「好戰」氣氛。先生認為此一現象固然是中國飽受列強欺凌的自然反應；但中國大陸已逐漸由弱轉強，實不應如此執著。先生隨即利用大會提供的論文報告時間，說明徐繼畬並非頑固的官僚派、投降派，其在鴉片戰爭之後力主撫綏，乃鑒於國力不足和形勢不利，不願中國發動戰爭自取其辱。隨後列舉中外聖賢有關和平的言論，痛斥為子孫後代設定戰爭路線之非是。先生報告後，感覺多數學者皆能接納，不料次日傳來反彈訊息。事後獲悉中國大陸史學領導階層於前日夜晚集會推舉近代民族英雄人選，據云在討論先生有關徐繼畬一文時，有人指責先生為臺灣派來的搗蛋者，可笑至極。

1991年，先生兩度北上山西省蒐集史料。山西甫成立的「徐繼畬學術研究會」感於先生治史秉筆直書，於是敦聘先生為副會長，先生欣然接受，盡力支持該會辦理各項活動。當年與該會秘書長任復興先生合作召開「徐繼畬與東西文化交流國際討論會」，邀請美國學者龍夫威教授等前來參加，而中國大陸許多著名教授亦來共襄盛舉。中國大陸學者強調徐氏的愛國與清廉，先生則強調徐氏的愛好和平與民主，而共同之處則是肯定徐氏對東西文化交流之貢獻，推崇徐氏走在時代前端，並非頑固的官僚或投降

派。中國大陸對徐繼畬的評價有些轉變，先生頗引以為慰。

## 四、最近的研究

### 1. 反革命與反內戰

先生研究軍事史，發現民初內戰繼以國共鬥爭，以致生靈塗炭，於是反革命與反內戰的情緒油然而生；又從軍火禁運研究，發現內戰責任應由國人自負，不能推給帝國主義國家，是以探討中國軍政領袖的政治主張、政治文化與軍事行爲。近年來的作品如〈戰爭與和平——民國史的經驗〉、〈抗日勝利前夕國共兩黨的政治決策〉、〈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海外黨務〉等，皆係參加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所舉辦的兩岸三地學術會議之作。至於〈隔海之聲——中共對中國近代戰爭及臺海戰役的說辭〉、〈中國國民黨六全大會中委會及中常會初探〉、〈西安事變前夕陝北紅軍東侵晉西之役〉、〈毛澤東抗日統戰策略初探〉、〈毛澤東抗日策略：由「不打硬戰」到「抗而不戰」〉等則爲在臺參加學術會議或專輯所發表的論文。

### 2. 「和平」擺第一、「鬥爭」擱一邊

2000年6月，先生退休後第二年，於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發表〈中共在山西的戰爭目標與戰爭動員（1936—1945）〉一文，探討中共在抗戰時期戰爭目標的本質、戰爭動員的演變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同月，珠海書院亞研中心《亞洲研究》第35期，發表先生對兩岸交流的見解，標題是〈「和平」擺第一，「鬥爭」擱一邊：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建議〉。7月，先生復於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的「國共問題與兩岸關係——歷史的觀察學術座談會」擔任引言人，提出引言：〈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省思〉，探討中共在抗戰時期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爲綱、以統戰爲術的政治文化。先生以三十餘年學術研究爲基礎，提倡和平，主張臺灣不獨、大陸不戰，透過經濟合作、文化交流以及政治談判來解決統一問題，敦勸兩岸當局以蒼生爲念，處理兩岸事務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不可鹵莽滅裂，陷兩岸人民於萬劫不復之深淵。

## 五、其他活動與作品

### 1. 參與中國現代史書評工作

先生於 1986 年應國史館纂修遲景德之邀約，撰寫〈評《李宗仁回憶錄——兼論新桂系與中央的關係》〉，此後每隔三四年即撰寫書評一篇，發表於國史館《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其書評基本上以運用史料針對某一議題發表評論意見為寫作方式。

### 2. 推動檔案公開與提倡訂定檔案法

先生於 1970 年代即提倡開放檔案，80 年代主張訂立國家檔案法，曾於 1986 年 3 月 5 日向國安會、國家建設委員會作「為國家檔案法催生」的專題講演。隨後，國安會即向行政院建議採納其主張。1998 年先生兼近史所一般近代史組組主任時，召開「檔案與近代歷史學術討論會」，發表〈檔案的開放與史學研究〉一文。

### 3. 演講與教學

先生於研究之餘暇，亦應邀在國內外各大學或史學機關演講與教學，曾於國史館、史編局、東海大學通識中心、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演講「口述歷史」專題，2000 年 6 月到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演講「抗戰期間中共與閻錫山在山西的鬥爭」。另從 1989 年起先後在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以及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開課，講授「區域現代化專題」、「軍事史專題」與「民國史專題研究」等課程。1990 年 10 月至 1991 年 6 月前赴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講授「史學方法」、「民國史」與「近代中國軍事史」等課程。先生誨人不倦，指導學生撰寫學位論文時，不僅指示研究方向，還細心校閱修訂，不辭勞累，深得學生愛戴。

先生於近史所退休後，將致力完成山西區域研究、北伐後的動亂專題研究計劃，假以時日，相信可以如願以償。



## 附錄：陳存恭先生著作目錄

### 專 書

〈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民國八年～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7)，民國 72 年 4 月，278 頁。民國 89 年 6 月再版。

### 論 文

〈列強對中國禁運軍火的發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上）（民國 62 年 5 月），35 頁。

〈列強對中國軍火禁運〉，《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輯 4（民國 63 年），106 頁。

〈談軍事史的研究及簡介若干英文資料〉，《復興崗學報》，臺北：政工幹校，期 12（民國 63 年），14 頁。

〈從「貝里咸合同」到「禁助中國海軍協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民國 65 年 6 月），39 頁。

〈民初陸軍軍火之輸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民國 66 年 6 月），74 頁。

〈中國航空的發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民國 67 年 6 月），50 頁。

〈黃埔建校前後在華南的蘇俄軍事顧問〉，《黃埔建校六十週年論文集》（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民國 73 年 6 月，70 頁。

〈從「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探討「安內攘外」政策〉，《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 12 月，42 頁。

〈「十九路軍」與「閩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史政學術講演專輯》（二），民國 73 年，30 頁。

〈青年軍的徵集與編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青年軍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5 年，37 頁。

〈蔣公中正與俄德籍軍事顧問〉，《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民國 75 年 10 月，88 頁。

〈楊森（傳）〉，《中華民國名人傳》（五），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 民國 75 年，23 頁。
- 〈從美國軍事情報探討「安內攘外」政策〉，《現代中國軍事史評論》，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期 5（民國 77 年 4 月），42 頁。
- 〈張之洞在山西，1882-188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下）（民國 77 年 12 月），33 頁。
- 〈北伐後內亂之平定——（一）李馮閻等亂事之平定（二）閩變的收平（三）兩廣事變的解決〉，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三編，民國 78 年 1 月，123 頁。
- 〈透視最近中共扭曲抗戰史的陽謀〉，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輯 13（民國 78 年 11 月），36 頁。
- 〈山西省的災荒，1860-1937〉，《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8 年 12 月，45 頁。
- 〈徐繼畬事略及其《瀛環志略》〉，《山西文獻》（臺北：山西文獻社），期 37（民國 79 年 12 月），17 頁；又刊於任復興主編，《徐繼畬與東西方文化交流》（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 9 月，21 頁。
- 〈現代專業軍人的典範——徐永昌〉，《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2 年 6 月，39 頁。
- 〈閻錫山與晉軍的興衰〉，《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二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3 年 1 月，32 頁。
- 〈戰爭與和平——民國史的經驗〉，《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4 年，15 頁。
- 〈隔海之聲——中共對中國近代戰爭及臺海戰役的說辭〉，臺灣省文獻會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民國 83 年 8 月，50 頁。
- 〈中國國民黨六全大會中委會及中常會初探〉，編委會，《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4 年 3 月，40 頁。
- 〈抗日勝利前夕國共兩黨的政治決策〉（與李國成副教授合撰），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及廣州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近代中國與亞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民國 84 年 6 月，36 頁。
- 〈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海外黨務〉（與鄧德濂副教授合撰），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及近代史學會，《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民國 85 年 3 月，24 頁。

- 〈毛澤東抗日統戰策略初探〉，《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5 年 3 月，30 頁。
- 〈西安事變前夕陝北紅軍東侵晉西之役〉，《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輯 19（民國 86 年 8 月），44 頁。
- 〈毛澤東抗日策略：由「不打硬戰」到「抗而不戰」〉，《中華軍史學會會刊》，期 3（民國 86 年 12 月），臺北：中華軍史學會，41 頁。
- 〈國共戰爭中的山西戰場(1936-1945)〉，《中華軍史學會會刊》，期 5（民國 88 年 12 月），臺北：中華軍史學會，47 頁。
- 〈中共在山西的戰爭目標與戰爭動員(1936-1945)〉，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國 89 年 7 月，51 頁。

## 訪問紀錄

- 《徐啓明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3)，民國 72 年 5 月，200 頁。
- 《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與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等先生先後訪錄，全書 950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4)，民國 73 年 5 月，352 頁。
- 《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與陳三井先生先後訪錄，全書 170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5)，民國 73 年 6 月，49 頁。
- 《賈翼翹先生訪問紀錄》（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6)，民國 74 年 4 月，140 頁。
- 《王奉瑞先生訪問紀錄》（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8)，民國 74 年 6 月，188 頁。
- 《石覺先生訪問紀錄》（訪問），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10)，民國 75 年 2 月，632 頁。
- 《張式綸先生訪問紀錄》（訪問），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11)，民國 75 年 2 月，344 頁。
- 《劉景山先生訪問紀錄》（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13)，民國 76 年 2 月，145 頁。
- 《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與陳三井先生先後訪錄，全書 240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15)，民國 76 年 6 月，172 頁。
- 《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

書(16)，民國 77 年 6 月，233 頁。

〈民主憲政見聞——民社黨主席向構父先生訪問紀錄〉(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期 1 (民國 78 年 12 月)，30 頁。

〈雷殷與民初內政——雷殷先生訪問紀錄〉(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期 1 (民國 78 年 12 月)，40 頁。

〈晉閩的司庫——李鴻文先生訪問紀錄〉(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期 2 (民國 80 年 2 月)，26 頁。

〈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與張玉法先生合訪)，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30)，民國 80 年 6 月，534 頁。

〈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與賈廷詩等先後紀錄，全書 482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46)，民國 82 年 5 月，28 頁。

〈趙正楷先生訪問紀錄〉(訪問)，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48)，民國 82 年 10 月，212 頁。

〈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訪問、總整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3 年 6 月，272 頁。

〈八二三戰役口述歷史採訪〉(訪問朱秉一將軍等 10 位參戰軍人及戰地平民)，臺灣文獻會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民國 83 年 8 月，45 頁。

〈耕耘與收穫——周靈鈞先生八十回憶〉(訪問)，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3 年 12 月，242 頁。

〈柳元麟將軍訪談紀錄〉(訪問、總整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5 年 6 月，250 頁。

〈邵百昌先生訪問紀錄〉(與林泉先生合訪)，《口述歷史》，期 9 (民國 87 年 6 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3 頁。

〈劉象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70)，民國 87 年 6 月，139 頁。

## 書 評

〈評《李宗仁回憶錄——兼論新桂系與中央的關係》〉，《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一)，臺北：國史館，民國 75 年 6 月，30 頁；又刊於《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 期(民國 76 年 1 月)，46 頁。

- 〈評張同新編著《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略》〉，《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四），臺北：國史館，民國 78 年 4 月，43 頁。
- 〈評何理著：《抗日戰爭史——兼論中共的抗日策略》〉，《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八），臺北：國史館，民國 80 年 4 月，73 頁；又刊於《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0 期（民國 80 年 6 月），42 頁。
- 〈評張德良、周毅主編《東北軍史》〉，《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十三），臺北：國史館，民國 83 年 12 月，71 頁。
- 〈評范克明著：《少帥張學良》〉，《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二十一），臺北：國史館，民國 87 年 12 月，55 頁。
- 〈評孫其明著：《和談、內戰交響曲——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初期》〉，《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二十二），臺北：國史館，民國 88 年 6 月，58 頁。

## 其 他

- 〈中國國民黨的體質與民主轉型〉，《近代中國》雙月刊，期 108（民國 84 年 8 月），「對日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專輯」，11 頁。
- 〈侵略政策——日本現代化的歧途〉，《歷史月刊》，期 114（民國 86 年 7 月），6 頁。
- 〈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省思〉，《近代中國》雙月刊，期 138（民國 89 年 8 月），「國共問題與兩岸關係——歷史的觀察學術座談會——中國近代史學會」引言，12 頁。

## 編 纂

- 《徐永昌日記》，十二冊（民國 5 年 1 月—48 年 7 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0 年 12 月。
- 《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與趙正楷先生合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34)，民國 85 年 11 月，313 頁。

# 李又寧

吳喆\*

李又寧教授(Bernadette Yu-ning Li)在抗戰的烽火和內戰的硝煙中，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她 1949 年來臺，從北一女到臺大歷史系，於焉奠定了個人的人生價值觀和堅實的學養基礎。1957 年李先生赴美深造，於 1960 年取得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碩士學位，1967 年取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哲學博士學位。1968 年創辦、主編英文《華族歷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該刊此後一直是英語中國史學界發表論著和譯文的重要園地。1968 年至 1973 年，李先生先後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所、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 of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執教，開始了亞美研究(Asian-American Studies)和教學的生涯。1973 年起迄今，李先生執教於紐約聖若望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其間並於 1990 年創辦「國際胡適研究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 Shih Studies)，1996 年創辦「華族留美史研究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ith an American Education)及會刊《華美族研究集刊》(*Journal of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三十多年來，李先生以無比執著、投入的態度，以時代化、全球化的視野在近代史研究上開闢了幾個新的領域，啟發了不少有志的研究者，並為他們提供了高品質的討論、發表園地；她同時不遺餘力地提攜後進，展現了中國傳統學者和長者的風範。

李先生的近代史研究生涯始於 1960 年代，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共早期領袖瞿秋白。<sup>1</sup>李先生關注瞿秋白個人身上傳統中國文人的特徵及由此衍生的理想主義性格，這與當時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界廣泛流行的費正清學派自由主義史觀並非全然無關，但仍凸顯出其觀點特殊，頗具創意。然而李先生並沒有停留在這一思路上，而是在考察以瞿秋白為代表的一群選擇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sup>1</sup> *A Biography of Ch'u Ch'iu-pai: From Youth to Party Leadership, 1899-1928*. New York, N. P. 1967.

俄式共產主義為救中國道路的知識分子之後，更進一步意識到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所提倡的「西化」道路，乃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漠視乃至敵視歐美近代化的成功經驗必然會導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步上歧途甚至倒退。這就為李先生在 1980 年代末期之後的胡適相關研究埋下了伏筆。

1970 年代初期至 1990 年代初期，李先生的研究有兩個主要課題，一是女性史，一是歷史背景下的人物研究。關於第一個課題，焦點首先集中在中國婦女史和近代婦女問題上。她質疑五四以來西方和中國本身在女性問題和婦女史研究中對中國女性地位和命運的變化所作的簡化、截然的歷史分期，也質疑西方和現代中國人對中國女性建構的的刻板印象。她指出近代女性狀態的變化，事實上與傳統是密切相關的。古代中國女性在社會中絕不止於擔任配角的角色，她們在家庭、社會、經濟乃至政治上的影響，常常是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同時以儒道二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體系和社會，也並不是全然以男性為絕對中心的，例如「陰」、「陽」的概念即相依相生，缺一不可，因而隱含了性別平等的觀念；而「禮」的秩序在缺乏女性參與的情形下又無法維持。所以儒家思想並不排斥女性接受教育的可能，中國傳統上代表「正統」思想體系的正史和地方志中通常都有〈列女傳〉，可資為證。<sup>2</sup>正因為中國婦女的近代化是從傳統的根源出發的，故其過程要比多數東方國家順利、深入。李先生在這個先驅型的理論架構下，率先蒐集、整理了大量近代女權運動史料，編輯成兩巨冊，<sup>3</sup>奠定了最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中國女性史研究豐富的史料基礎。在中國婦女史研究領域，李先生不僅是理論上和史料發掘上的先驅，同時，也站在華人和女性的角度，發揮全面、辯證、直覺、感性思考的長處，從文學、藝術、教育、家庭、社會甚至戰爭等各方面重新考察女性的歷史地位、生活狀況暨其特有貢獻，寫成了十數篇重要研究論文，對西方和男性的婦女研究者產生了多方面的啟發。

同時，從瞿秋白研究的經驗和基礎出發，李先生建立了歷史人物，包括史學家，都是環境的產物，既為時代的縮影，也為人際關係的集合的觀

<sup>2</sup> "Historical Roots of Changes in Women's Status in Modern China," *St. John's Papers in Asian Studi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2).

<sup>3</sup> 與張玉法合編，《近代中國女權史料 1842-1911》（臺北：傳記文學社，1975 年）。

念。從 1970 年代初期起，一方面持續對瞿秋白<sup>4</sup>和中國社會主義運動<sup>5</sup>的研究，另一方面針對當時中國大陸史學界關注的三個重要人物：吳晗、<sup>6</sup>秦始皇、<sup>7</sup>商鞅，<sup>8</sup>開始了從歷史人物看歷史、看史學的新角度研究。伴隨著這一系列研究的深入，李先生對傳統中國史學、西方史學和中共史學的盲點有了更深切的體認，因而當她將視點投向胡適時，又開始醞釀更新的歷史研究方式和方法。

自 1980 年代末期起，李先生愈加確信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當中，胡適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多元化趨勢中的主流，即自由、民主、現代化，胡適的歷史是這個時代最重要、最全面的縮影(microcosm)，是由人物入手全面觀照中國近代史的不二選擇。然而此前的胡適研究沿用了傳統傳記、年譜式的方法，即將焦點集中於傳主和譜主自身。這種方式隱含了兩個可能的陷阱，一是不能看到人物是一切社會關係的集合，忽略人物與環境間的複雜多變的互動情形；二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發生移情作用，研究誰便推崇誰，喪失客觀性。李先生注意到胡適作為近代中國思想界的代表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由種種時空、文化和社會關係的背景影響以及個人與親友、師生、同學、同鄉、同事、團體、階層甚至論敵、政敵之間的多樣聯繫，多種生活圈和生活型態所共同推動的。以胡適為點，擴及與之聯繫的線，再合為面，復與其他相關研究共同組合為體，纔可能掌握中國近代史的全貌。1990 年，李先生創辦了「國際胡適研究會」，開始編輯出版從胡適週邊的人物看胡適的系列研究叢書，迄今為止，已有《胡適與他的朋友》、<sup>9</sup>《回憶胡適之先生文集》、<sup>10</sup>《胡適與國民黨》、

<sup>4</sup> "Ch'u Ch'iu-pai's Journey to Russia, 1920-1922," with Michael Gasster, *Monumenta Serica*, XXXIX(1970-1971).

<sup>5</sup>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sup>6</sup> "Wu Han's View of History," *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First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1). 另見《吳晗傳》(香港：明報出版，1973 年)。

<sup>7</sup>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The 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1975).

<sup>8</sup> *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1977).

<sup>9</sup> 第一至六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0-2000 年)。

<sup>10</sup> 第一、二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7 年)。



<sup>11</sup>《胡適與民主人士》、<sup>12</sup>《胡適與他的家族和家鄉》<sup>13</sup>等五種系列相繼問世，成績斐然。今後還要推出胡適與其學生、論敵、學術團體、政治團體、教育團體、文學團體等系列的論文集，將傳統的見木不見林式的觀察，擴大為既見木又見林的全像化研究。

在全像化胡適研究逐步深入的過程中，李先生由胡適和他的周遭人物身上深刻體察到留美人物的在中國近代史當中的關鍵地位，繼而從 1990 年代中期展開了更大規模的「華族留美史研究」。李先生發現，推動中國近代社會成功轉型，甚至進而引領華人走向世界的關鍵環節在於以留美學生為主的留學生。留學生是世界與中國之間的橋樑，中國經由留學生從各個角度各個層面接觸了世界，使中國相對成功地融入了現代世界體系，同時以現代化的方式保存了部份傳統。中國人更是經過留學生這一橋樑逐步走出了地理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國界，成為對人類文明卓有貢獻的華族世界公民。「華族留美史研究會」的成立，旨在發掘、探究這一部份影響深遠卻遭到忽略的歷史。1997 年，李先生在紐約倡議、徵集、主辦了「華族留美史：150 年學習與成就」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將其中重要論文編輯成書，<sup>14</sup>其中彙集了十餘位重要學者的論文，分別考察自晚清、北洋、國民政府和臺灣時期留美學生在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對母國所產生的深刻影響，以及留學生本身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心態、角色、作用及其所造就的中國近代化運動的特色。「華族留美史研究叢書」系列自此發端。該叢書的第二個系列《留美八十年》，<sup>15</sup>則彙整了從 1920 年代到 1990 年代共二十幾位留美學生的留美經驗回憶錄，是更為感性、具體、生動翔實的活的史料（“living history”）。

近年來，李先生留美史研究的進展中，將她的史學理念推向了更新的層次、更高的境界。主要的思考方向有二：其一，留學生的影響不僅限於母國，他們也同樣將個人的聰明才智以及在人類文明中具有獨特價值的中國文化貢獻給世界，同時帶動了「華僑」地位的提昇，甚至導致「落葉歸

<sup>11</sup> 紐約：天外出版社，1998 年。

<sup>12</sup> 紐約：天外出版社，1998 年。

<sup>13</sup> 第一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 年）。

<sup>14</sup> 《華族留美史：150 年的學習與成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 年）。

<sup>15</sup> 第一、二卷（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 年）。

根」的「華僑」觀念轉化為落地生根的「華族」觀念。要研究這些留美學生，就必然要打破中國史和美國史的界限，超越傳統國別史的樊籬。其二，傳統的史學訓練面臨挑戰。生活和資訊的多元化要求史家一方面必須重拾司馬遷的精神，從當代人類活動中直接蒐集鮮活的史料；同時也要增加個人多方面，包括社會科學和現代科學技術的修養，成為隨侍於時代洪流之側的見證人、新史官，紀錄以上所述「活的歷史」。李先生力行實踐，立即展開了「華族留美史研究叢書」第三個系列《當代留美中學生：喜樂與心酸》<sup>16</sup>的徵稿、編輯，直接紀錄華人社群在美國由「移民」到「涵化」、「共生」的發展模式。2000年10月，李先生在紐約舉辦了「華族對美國的貢獻」國際學術研討會，其規模、所涉及的範圍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同時重組、改寫了中國史和美國史，正式奠定了打破國界之世界史的第一個里程碑。

李先生治史，總是先站在宏觀的大視野，把握時代的方向和歷史的本質，繼而以細膩的思考、一絲不苟的精神全力以赴。更重要的是，她一刻也不會停下來休息，總是不斷挑戰既有的結論，也挑戰自我。我們可以預期《華族對美國的貢獻》論文集的問世給學界所帶來的震撼。

## 附錄：李又寧教授主要著作目錄

### 中文專書

《吳晗傳》，香港：明報出版，1973。

### 中文論文

〈曾昭燏(1909-1964)——我國最傑出的女性考古學家及博物館學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1993年6月），頁35-48。

### 編書

《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與張玉法合編，共2集，臺北：傳記文學社，1975。

<sup>16</sup> 第一、二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年）。

- 《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 《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與張玉法合編，共2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
- 《胡適與他的朋友》，第一至六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0-2000。
- 《回憶胡適之先生文集》，第一、二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7。
- 《胡適與民主人士》，紐約：天外出版社，1998。
- 《胡適與國民黨》，紐約：天外出版社，1998。
- 《胡適與他的家族和家鄉》，第一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
- 《留美八十年》，第一、二卷，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
- 《華族留美史：150年的學習與成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
- 《當代留美中學生：喜樂與辛酸》，第一、二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

## 英文專著

- A Biography of Ch'u Ch'u-pai: From Youth to Party Leadership, 1899-1928.* New York, N. P. 1967.
-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1977.
-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The 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1975.
- Two Self-Portraits: Liang Ch'i-ch'ao and Hu Shih.* New York: Outer Sky Press, 1988.
- Chinese Women Through Chinese Eyes.* New York: M. E. Sharpe, 1988.
- Images of Women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 Press, 1994.

## 英文論文

- "Wu Han's View of History," in *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First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1.
- "A Note on the Russian Language Institute," *Con Currence*, I:4, 1971.

- “Ch’u Ch’iu-pai’s Journey to Russia, 1920-1922,” with Michael Gasster, *Monumenta Serica*, XXXIX(1970-1971), 1971.
- “The Vicissitudes of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iography: Ch’u Ch’iu-pai from Martyr to Traitor,” in *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China*, edited by Joshua A. Fogel & William T. Row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9.
- “Historical Roots of Changes in Women’s Status in Modern China,” *St. John’s Papers in Asian Studi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2.
- “Hsu Tsung-han, 1877-1944: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7.
- “Tseng Chao-yueh, 1909-1964: The Most Outstanding Chinese Woman Archaeologist and Museum Specialist,” in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Inaugural issue,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93.
- “Yun Zhu,”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edited by Lily Xiao Hong Lee, A. D. Stefanowska and Clara Wing-chung Ho,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76)

### 一個經濟小兵的故事：顧應昌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劉素芬·莊樹華 紀錄：向明珠·陳怡如 215頁 平裝 250元

顧應昌先生 1918 年出生，祖籍江蘇省嘉定縣。上海聖約翰大學會計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會計學碩士、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職華盛頓聯合國遠東委員會中國代表團，並曾任教密西根州立大學、密西根大學等。1968 年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先生於 1960-1970 年代擔任臺灣經濟顧問，1980 年代參與大陸經濟改革，對於海峽兩岸經濟發展卓有貢獻。



研究概況

## 近四十年來香港醫學發展史的研究概況

吳國樑\*

人類文明與醫學發展有著不可割裂的關係，從生、老、病、死到世代延傳、文明進化，無一不與醫學緊緊連結著，故醫學的歷史發展在近年社會史、文化史大盛的情況下受到相當的重視（杜正勝，1992）。此一情況在海峽兩岸的史學界亦然。<sup>1</sup>但就香港而言，香港史的範疇裏很少將醫學史列為一個獨立課題看待。我們不禁反問：香港史已是本地學術研究的一個核心課題，然而翻閱相關的研究概況，對香港醫學發展的研究卻著墨甚少（蕭國健，1994；Sinn，1997），究其原因這個課題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呢，還是香港醫學史的研究真是一個還未成氣候甚至乏人問津的領域呢？有見及此，本文即嘗試綜合有關的研究，側重討論近四十年來出版的著述及論文，並附以有關的學術活動、研究機構動向及相關史料。至於

---

\* 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行政主任

<sup>1</sup> 在大陸方面，主力研究中醫本身的歷史，旁及近代西方醫術引入後的情況，自五十年代政府採取中西結合並重的措施，中醫的發展邁向另一層面。早期重要著作有陳邦賢《中國醫學史》（1937）、伍連德（Wu Lien-teh，1879-1960）*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1932）、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955）等，近年則有俞慎初《中國醫學簡史》（1983）、李經緯《中醫人物辭典》（1988）、《中國古代醫史圖錄》（1992）、《中外醫學交流史》（1998）、《中國醫學通史》（林昭庚合編，2000）等。期刊有五十年代創刊的《中華醫史雜誌》。大陸研究醫學史的學者多是醫科出身，重點放在醫學理論方面或對疾病認識的歷史發展的「內史」上（鄭金生、李建民，2000）。而臺灣方面則較注重跨學科研究，將醫療史結合社會史、文化史作整體的探索（杜正勝，1995：113-51），在1992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了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舉辦過多次研討會，相關作品亦曾在《新史學》、《漢學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期刊刊載。特別是《新史學》更多次出版專號，如《疾病、醫療與文化專號》（1995）、《身體的歷史專號》（1999），成果豐碩，可參閱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網址：<http://saturn.ihp.sinica.edu.tw/~medicine/>。英文著作方面，有關古代中醫的歷史可參考Dominique Hoizey和Marie-Joseph Hoizey的作品（1993），近代中國醫療衛生的歷史可參考Yip Ka Che（葉嘉熾，1995）、MacPherson, Kerrie L.（1987）的討論。

五十年代以前或通俗流行的作品，則擇其要者介紹，希望藉此勾畫出香港醫學史在過去數十年之研究概況。文中或有紕漏，還望讀者不吝賜正。

在開港以後，香港華人仍以中醫為主，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華人才開始重視西醫，促成西醫醫療體系的長足發展。這個發展不單只是西方醫學技術的引進，而且也包括本地醫學精英的培訓、頑病惡疾的克服、醫療系統的建立、民眾健康的保障及環境衛生的落實等各方面。本文將就與醫學發展相關的題目，作一簡單介紹。

## 一、概論

較早注意香港整體醫學歷史發展的是前香港衛生署署長，現仍為開業醫師的蔡永業教授之“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Hong Kong”一文(Choa, 1970)。本文雖完成於七十年代初期，但至今仍具參考價值。它總結了香港早期醫療發展，例如政府醫院和非官辦醫院的發展、早期殖民地的衛生情況等。另外，在九十年代蔡教授致力籌備香港醫學博物館之時，亦撰寫了〈本館香港醫學史簡介〉(Choa, 1996)一文，論述早年香港的衛生情況及幾所香港醫院(如國家醫院、海員醫院及律敦治醫院)、第一所為華人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西醫醫院雅麗氏紀念醫院及與其甚有關係的香港西醫書院、傳統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華人自己成立的東華醫院、1894年的鼠疫及二十世紀香港幾位重要的病理學家王寵益(1888-1930)、勞勃森(R. J. Robertson, 1889-1942)和侯寶璋(1894-1967)等等。本文雖係通俗性的著作，但資料充足，為認識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香港醫學發展的入門文章。

Tom Solomon的“Hong Kong’s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al History”(Solomon, 1997b)亦是介紹十九世紀香港醫學發展的重要文章。Tom Solomon曾以訪問學人身分在香港醫學博物館進行研究工作，其所介紹的資料無出於蔡教授上文之外者。不過，Tom Solomon的論述較側重展現十九世紀香港醫療中、西並行的體系和西醫在1894年後壓倒性地位的取得。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之Robin Hutcheon的*Bedside Manner: Hospital and Health Care in Hong Kong* (Hutcheon, 1999)，重點在近五十年政府官方對醫療政策的推行及改變上，淺明易讀，頗具參考價值。

## 二、醫院的歷史

醫院是醫療體系的前線。今天香港醫療水平很高，醫療網絡遍佈，可惜對於個別醫療機構的研究卻相對地少。香港有悠久歷史的醫院不多，今天的醫療網絡多是五十年代後才漸漸建立，並且醫院全都集中在港島中西區，較大型的只有國家醫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在一九四〇年拆除，並改建為今天西營盤診所）。自十九世紀後期至抗日戰爭前，醫院的數目漸次遞增，其中以東華三院（即東華醫院、廣華醫院及東華東院）最受重視。東華在 1870 年成立，1872 年投入服務。由於人口急增，華人又普遍不接受西醫治療，中醫醫療需求因而增加，加上「義祠」的惡劣環境，在政府的要求下，一群華人領袖便籌款集資建立東華醫院。東華三院十分重視保存本身的史料，在 1970 年已著手建立本身的文物館，保存檔案、典籍及文物，<sup>2</sup>還出版東華的歷史，例如最近的《東華三院一百三十年》（東華三院，2000）。<sup>3</sup>雖然編者強調這是一本通俗性的作品，目的在增進市民大眾對東華以至香港歷史的認識，然而本書資料豐富，並結合重要著作的論點，配合歷史圖片，實具參考價值。本書編者參考最多的是冼玉儀的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 (Sinn, 1989)。這書乃作者根據其博士論文修改而成，以探討東華醫院成立的原因、經過及「功能」為關懷，是較有系統討論東華歷史的一部著作。作者的框架是早年東華醫院中介於香港政府與華人之間，除了是一所以傳統中醫醫治病人的醫院外，亦負起當時華人社區慈善福利機構的職責。因此，籌備和管理東華的一班精英就成了華人社區的領袖，擔任殖民地政府管治香港華人的中介人。東華的影響要到十九世紀末才受到挑戰，特別是 1894 年發生瘟疫，中醫療效不彰，東華才被迫引入西醫。至二十世紀，隨著政府政策的改變和香港本身的發展，東華三院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漸淡化。

除了東華三院外，較受注意的還有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1887

<sup>2</sup> 文物館設於九龍廣華醫院之內一座歷史建築物，其前身為廣華醫院的大堂。參閱東華三院網址 <http://www.tungwah.org.hk> 文物館條。

<sup>3</sup> 還有如《東華三院百年史略》編纂委員會編，《東華三院百年史略》（香港：香港東華三院庚戌年董事局，1970年）；李東海編，《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

年，在華裔西醫何啓（1859-1915）等倡議下，成立了雅麗氏紀念醫院，為普羅大眾提供免費的西醫治療。早年醫院由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管理，其後傳道會先後成立了那打素醫院（1893）、何妙齡醫院（1906）等，至五十年代，三院合稱為現名。該醫院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其保留最完整的是該醫院每年提交倫敦傳道會的週年報告（只有少數遺佚）。有關該醫院的歷史在六、七十年代已有簡略的介紹（Ashton, 1957；MacKeith, 1967），在這個基礎上，巴治安醫生（E. H. Paterson）在1987年醫院一百週年時完成了《矜憫為懷：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1887-1987》（*A Hospital for Hong Kong: The Century History of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一書（Paterson, 1987）。作者以傳教士身分在1951年來港擔任醫院的高級外科醫生，並參與行政工作，對醫院認識甚深。全書共分十九章，每章專題記述醫院的某一發展，例如與香港首批華裔西醫培訓的關係、和香港第一批護理人員和助產士之引入與訓練等，資料翔實。近年又有何興民醫生為配合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一百一十週年紀念而撰寫的《矜憫為懷—香港科學醫療轉捩點（一八八七至一九四一年間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對香港市民的貢獻）》一書。該書屬通俗性讀物，簡介醫院早年歷史，對認識香港早期醫療發展有一定的幫助（何興民，1997）。上述巴治安醫生新近還出版了一本姊妹作，介紹另一所與倫敦傳道會有關的聯合醫院（Paterson, 1999），全書共十二章，除簡介醫院在六十年代成立的背景及其發展脈絡外，最重要的主題是如何建立一所夢想的聯合醫院：在「健全的肉體」的同時，怎樣處理病人的「恐懼、誤解、懷疑、愛、希望及恨」，而達到「健全的心靈」的目標（Paterson, 1999：83-87）。

另一所受到注意的醫院是瑪麗醫院。在該院紀念其六十週年時，出版了冼玉儀指導、馮志明編的 *A History of Queen Mary Hospital, 1937-1997* (Fung, 1997)。瑪麗醫院在1937年落成，並取代國家醫院，成為全香港規模最大的醫院及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附屬醫院。馮志明博士這書簡單地鋪陳了瑪麗醫院六十年的發展。此外，成立於二十年代的贊育醫院（香港著名的產科醫院）及養和醫院（香港首間非教會辦理的私家醫院），也都有專著介紹其發展情況（King, 1972；Tsan Yuk Hospital, 1992；Hong Kong Sanatorium and Hospital, 1997）。而在1840年代，香港由於娼妓盛行，曾設有一所專門的性病醫院。雖然沒有專著論述此一機構，但在個別



討論到香港妓女歷史的著作中，亦有資料可尋。（謝永光，1994：353-356；單光肅，1995：200-225）。近年，部份醫院出版的年刊或特刊也有簡史部份，對了解香港醫療體系發展亦有幫助。<sup>4</sup>至於其他醫護組織如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紅十字會等最近也開始受到注意(*The Hong Kong Tuberculosis, Chest & Heart Diseases Association*, 1994；呂大樂，2000)。

### 三、西醫的培訓

當雅麗氏紀念醫院成立（1887年）後，何啓便認為香港需要培訓本土的西醫生，於是半年後便成立了「香港西醫書院」，為香港現代醫療教育及高等教育之始。「香港西醫書院」享負盛名，由於是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加上孫中山(1866-1925)是該校第一屆畢業生，因此相對其他課題而言，「香港西醫書院」較早受到注意。關於孫中山學醫的情況，早年有鄭子瑜(1916-)的〈孫中山習醫記〉（鄭子瑜，1960），相信很多人已閱讀過。但最早有系統地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是羅香林教授(1906-1978)，其《國父之大學時代》(1954)、《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1961)、《國父在香港之歷史事蹟》(1971)等，皆論及西醫書院，並注意到香港西醫書院在引進西方教育制度的貢獻。羅教授指出香港在開埠以後雖受中西文化薰陶，但西醫書院是第一所西學體制的高等教育機構（羅，1961：135）。西醫書院引入西方培訓醫生的模式、對香港首批本土西醫的培育、孫中山在香港讀醫的情況及其他有關西醫書院的詳情，在羅教授的三本著作均有很詳細的討論。此外，李敖（李，1968）及施其樂牧師（Smith，1978）亦有作品介紹孫中山在西醫書院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習醫的情況。

A. J. S. McFadzen 的 “Medicin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McFadzen, 1970) 一文，重點放在西醫書院於 1912 年併入香港大學成為大學醫學院的情形。Dafydd Evans 所著之 *Constancy of Purpose: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and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887-1987* (Evans, 1987)

<sup>4</sup> 筆者所見有九龍醫院（1925年落成）七十週年特刊（區結成，1995）、明愛醫院的年報等。比較特別的是威爾斯親王醫院（1985年落成，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實習醫院）出版的十週年紀念圖集《四季人生》，以圖片表達醫院的四季工作（威爾斯親王醫院，1995年）。

一書，則全面地回顧了從「香港西醫書院」到「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發展歷程。這所醫院有輝煌的日子、也有辛酸的過去。日治時期港大關閉，醫學院學生散落到中國西南各大學繼續學業，經濟困難，幸得王國棟教授(Gordon King, 1900-1992)捐助獎學金接濟，方可繼續學業。蔡永業教授之“Missionary Medical Education for Wartim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Choa, 1990: 167-88)一文，就記錄了這段史事。

除了香港大學外，香港中文大學也提供醫學院課程。從1974年香港政府批准成立第二所醫學院，到1981年中大的醫學院正式收生，醫學院創立距今只二十載，但其醫學研究卻與港大齊名。關於其歷史，該校在其醫學院成立十五週年的時候，曾出版了 *To Lead, Innovate and Serve—First Fifteen Years* (Fok et al, 1995)，記錄了中大醫學院由創院到各部門成立的情況。當然最詳盡的紀錄首推史大齡(A. E. Starling)的 *The Chance of a Lifetime: The Birth of a New Medical School in Hong Kong* (Starling, 1988)。史大齡曾是香港醫務衛生署的 Chief Hospital Administrator，並參與籌辦中大醫學院。作者以其親身經歷介紹醫學院從構思、籌備到建立、其背後的哲學理念，以至實際課程的安排。

#### 四、醫學界的重要人物

香港醫療歷史上著名的人物很多，除上文提及的孫中山外，最受重視的是香港土生華人何啓。何啓是近代中國一位很特別的人物。他自少接受西式教育，習英文，在1872年離開香港中央書院，遠赴英國修讀醫科及法律，回港後成為執業律師，並大力促成雅麗氏紀念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的成立(Choa, 2000: 19-34; 54-78)。一般學者對何啓的重視向來在於其作為一個天朝邊緣地區的新型知識份子如何致力於傳統中國的改革(Chiu, 1968; Tsai, 1975)，或是何啓作為一個新教徒對改革中國的關懷(李金強, 1999)。但能夠全面探討何氏與香港醫療發展關係的著作，則非蔡永業教授的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A Prominent Fig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hoa, 1981)莫屬。本書原在二十年前出版，但蔡教授參考這二十年來大量湧現的香港史專著，修改其內容，將之再版印行(Choa, 2000: x-xi)。第一版共分十三章，再版則擴充為十六章，除個人歷史外，各章節大體與何啓同時或有關的醫療重要事件結合，例如

1884 年的衛生條例的修訂、潔淨局的誕生、雅麗氏紀念醫院、香港西醫書院和 1894 年鼠疫等。簡言之，新版不論是在編排、討論或資料上都較初版為流暢和充實。

另一位香港醫學史上為人熟悉的是孫中山的老師康德黎醫生(Sir James Cantile, 1851-1926)。孫中山曾在英國倫敦被清政府囚禁於大使館，當時就是由康德黎斡旋才能脫險。關於此段史事，除可參考孫中山先生的《倫敦被難記》(又名《倫敦蒙難記》；孫文，1974：3-40)外，還可參考康德黎的傳記(Steward Cantile, 1983)。康德黎是一位西醫，曾來港任教香港西醫書院，其生平與香港醫學教育甚有關連。

關肇碩、容應英的《香港開埠與關家》(1997)則注意到香港早年的醫學世家——關氏。關家是近代「中國西醫世家」(頁3)，關肇碩(1922-1998)是關家在港發展的第三代及香港著名放射科醫生，另一作者容應英的祖母關月英是關肇碩的姑母，故容氏與關肇碩同輩。他們的祖輩關元昌(1832-1912)有「中國牙醫之父」之稱(頁45)，元昌妻黎氏(1840-1902)是香港首位護理人員；關家最著名的是元昌七子景良(1869-1945)，與孫中山同期，西醫書院畢業，曾任職雅麗氏紀念醫院，亦為養和醫院的創辦人(頁13)。本書分四部份，有回憶文字、譜牒考據及歷史敘述。關家與孫中山的關係和早年香港西醫教育的情況等，都有顧及；對於本文先前提及的若干課題如香港西醫書院、雅麗氏紀念醫院、孫中山的習醫情況等，皆有補充。本書既為關家後人編寫，所徵用的亦多一手獨家材料(如關家本身的族譜)，對理解香港西醫的源流發展甚有參考價值。

關於香港醫學歷史的重要人物傳記，還有對處理香港鼠疫甚有貢獻的 Sir James A. Lowson (Choa, 1993; Solomon, 1997)、被喻為熱帶病學之父之香港西醫書院的另一位創辦人 Sir Patrick Manson (Manson-Bahr, 1927)、香港首位婦產科醫生西比醫生 (Dr. Alice Sibree) (George, 1993)、曾在贊育醫院任職的女西醫 Dr. Alice D. Hickings (Hoe, 1991: 158-68)、曾任 Health Officer 及 Acting Colonial Surgeon 等政府職位且活躍於世紀之交的 Dr. William Stanley Adams 和 Dr. Gregory Paul Jordan (Mattock, 1984) 及上文提及的侯寶璋教授(王德修, 1992)等。和這些傳記大同小異，同樣對探索香港醫療發展的群體記憶有一定幫助的是主事者本人的紀錄，如曾擔任香港衛生署署長的司徒永覺 (Selwyn-Clarke, 1975)、香港第一所非宗教性質私家醫院養和醫院的創辦人李樹芬醫生(Li, 1963)、二次世界大

戰前英軍在港的 Surgical Specialist 而戰時成爲日軍戰俘的 Donald Bowie (Bowie, 1975) 等人的回憶錄。

## 五、專科的發展

醫學發展一日千里，各門專科相繼出現，<sup>5</sup>但今天對於各專科的發展很少注意，如有關於腦外科的 *Hong Kong Neurosurgery—Four Decades & Beyond* (Fong et.al., 1999) 和放射學的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X-ray: The First 100 Years of Radiology* (Ward, 1995)。不過，這並不能代表從事各專科的人不重視其歷史，他們只不過以其他形式表達而已。事實上，我們可以從其他渠道得知各專科的發展，例如香港醫學博物館就有關於病理學和放射學在香港的發展資料；<sup>6</sup>而心臟科、生物化學、內科、精神科等的歷史資料也可從互聯網上找到。<sup>7</sup>醫學專科組織相當多，在各自的網頁上，一般均能找出他們的成立背景、使命及其發展。雖然這些都是資料性的文字，缺乏結構性的討論，但仍有助於我們瞭解香港醫學的發展及貢獻。更進一步地，它們可展示出醫生這種專業人士在社會上如何形成一種紐帶，甚至影響政府決策及香港社會的結構和發展。

## 六、鼠疫

在世界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鼠疫，最後一次就是 1894 年夏

<sup>5</sup> 港大醫學院共分十七學系，包括麻醉學 (Anaesthesiology)、解剖學 (Anatomy)、生物化學 (Biochemistry)、社區醫療 (Community Medicine)、放射診斷 (Diagnostic Radiology)、內科 (Internal Medicine)、微生物學 (Microbiology)、護理 (Nursing Studies)、婦產科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骨科 (Orthopaedic Surgery)、兒科 (Paediatrics)、病理學 (Pathology)、藥理學 (Pharmacology)、生理學 (Physiology)、精神科 (Psychiatry)、放射腫瘤科 (Radiation Oncology)、外科 (Surgery) 等，可參閱其網址 <http://www.hku.hk/home/newpage/facmed2.html> 而中大亦大同小異，除了加入了眼科 (Ophthalmology and Visual Sciences)，其他部門只是名稱及重點略有不同，可參閱其網址：<http://www.cuhk.edu.hk>。

<sup>6</sup> 可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kstar.com/~hkms>。

<sup>7</sup> 可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hkma.org.hk>，<http://www.hkam.org>，<http://www.fmshk.com.hk>，<http://www.ha.org.hk> 等。有關各專科學會的資料，還可參考 *30th Anniversary Jubilee Publication 1965-1995* (Chang, Jane Kan, 1995)。

天香港爆發的淋巴腺鼠疫。這次事件是香港、華南地區以至世界醫學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單這一年，死亡人數即超過二千五百人，因此它是香港醫學史上眾多課題中最受矚目的一項。縱論十九世紀鼠疫由中國雲南地區蔓延至香港，再傳播至東南亞的，有費克光 (Carney T. Fisher, 1993) 及 Carol Ann Benedict (1996) 的作品。二者都強調這次鼠疫的「原創性」，認為沒有證據顯示這次瘟疫與以往在歐洲發生的鼠疫有直接關係。E. G. Pryor 則通論這次瘟疫的經過和影響 (Pryor, 1975)。

冼玉儀的著作強調鼠疫對香港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影響。在其討論東華醫院歷史的時候，她指出由於以東華為首的中醫藥業未能好好地處理疫症的蔓延，東華醫院終於被逼引進西醫，並且由於鼠疫對於整個華人社區影響甚大，所以華人終於改變了對西醫的不信任態度，西醫由是成為香港醫學發展的主流 (Sinn, 1989: 159-83)。蔡永業教授 (1993) 及 Tom Solomon (1997a) 則從 Dr. Lowson 的日記看鼠疫的發展。Dr. Lowson 是當疫症甫在廣州爆發時受聘於殖民地政府前往調查的人員，並且率先發表報告，故其日記及報告可以說是這次事件的第一手資料。

另一個焦點則放在鼠疫菌的發現上。由於對香港的鼠疫菌毫無認知，一些有名的細菌學家前來調查，其中包括日本的北里柴三郎 (1852-1930) 及瑞士的亞歷山大耶爾森 (Alexandre Yersin, 1863-1943)。二人在調查的過程中對鼠疫菌有不同的發現，彼此之間更發生了是誰找出真正鼠疫菌的爭執，持續數十載，至一九四〇年代，醫學界才以耶爾森氏之名命名這種首次被發現的鼠疫菌。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很多，可參考 Elmer Bendiner (1989)、Howard-Jones (1973; 1975)、Tom Solomon (1995, 1996)、李培德 (1998)、北里一郎 (1996) 及北里研究所 (1964) 等的研究。目前我們雖以耶爾森氏為鼠疫菌發現者，但北里對香港的醫學貢獻亦大，因此我們應該也肯定北里在香港醫學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上所學的都是較近代及較具代表性的著作而已。關於鼠疫的資料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亦多，我們可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例如當我們一致認為中醫藥對鼠疫的治療不足時，中醫藥業本身對這場瘟疫如何回應，整個華人社區對此疫又有何看法（如部份迷信的華人認為鼠疫與風水有關）？又如鼠疫影響香港超過三十年 (Choa, 2000: 111-121)，全香港以至華南地區對此又有何種反響？殖民地政府對這一場瘟疫採取的行動、反應以至所汲取的教訓又是甚麼？鼠疫對香港政府日後的衛生、醫療政策有何指導性的影響（例如直至四十年代仍有所謂

的洗太平地的措施)？這些都是仍有待進一步研討的課題。

## 七、中醫藥

很久以來中醫藥業都形容其在香港的發展是「自生自滅」(謝永光, 1998: 20), 因為開埠初期, 殖民地政府並沒有刻意規範中醫藥, 同時也沒有提供資源助其發展。雖然如此, 華人普遍接受中醫, 直至一八九四年鼠疫發生之後, 這種情形才逐漸改變。儘管有學者持論香港政府自此打壓中醫藥的發展(謝永光, 1998: 6), 但直至今日, 普羅大眾對中醫藥仍然十分接受。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遠較西醫早, 但這方面的研究一直不多, 亦不深入。早年有蔡永業教授的“Chinese Medicine and Contemporary Hong Kong”(Choa, 1966)一文, 簡略談到中醫藥的理論, 也報導了一些關於香港人對中醫接受程度親身調查的結果。蔡教授本身是西醫出身, 但對中醫藥的研究推動卻不遺餘力。他在1999年促成了香港歷來規模最大的中醫藥展覽「中醫藥展覽暨研討會——邁向新紀元」的舉行; 同時還舉行一個研討會, 邀請香港著名教授演講。該會講題多元化, 有理論和實踐、中西醫學比較、以及香港中醫藥教育的情形等。<sup>8</sup>展覽的內容更出版成書, 深入淺出, 適合初接觸中醫學的人參考(曹美芳等, 1999)。本書雖然有提及中醫藥在香港發展的歷史, 唯由於一手材料不多, 展覽當局礙於人手所限, 無法多所著墨, 只能為讀者提供一個概略的介紹。不過在書中附載這次研討會的論文提要, 從其中江潤祥教授及許少珍教授的論文亦可略窺香港中醫藥教育的發展過程(曹美芳等, 1999: 15, 17)。

謝永光的《香港中醫藥史話》(謝永光, 1998)是迄今較全面探討一個多世紀以來香港中醫藥發展的作品。全書分章專題, 論述近百多年中醫由盛轉衰的經過, 如在家醫痘條例、中醫生的培訓和登記、中藥業的出現、針灸的發展、東華三院及夏季義診等。礙於課題太大, 作者在個別問題的

<sup>8</sup>

在這次研討會演講的嘉賓有香港中醫管理委員會中醫組主席張大釗教授, 講題:〈中西醫之異同〉、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江潤祥教授, 講題:〈中醫教育概觀〉、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課程主任梁榮能博士, 講題:〈中醫藥對慢性病的應用〉、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許少珍教授, 講題:〈中醫藥在香港大學的發展歷程〉、中西醫學交流發展中心主任余秋良醫生, 講題:〈為中醫學術昇華努力〉、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研究所所長楊顯榮教授, 講題:〈中藥研究的學術意義〉等六位(排名按出場順序)。

考定上容或有失，例如討論鼠疫時，不但弄錯發現鼠疫菌的年份，更只言是「日本醫生」發現病菌，不僅沒提北里柴三郎的名字，連該疫菌的發現者也弄錯（謝：132）。尤有進者，在民族史觀的影響下，作者認定中醫藥的發展受到壓迫。謝氏的看法固然並非完全無理，但我們不能因此無視中醫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例如，中醫不及西醫之專精和科學，在無菌、止血等方面的技術也不及西醫，加上華人對衛生的認識不足等等，都囿限了其發展。故此，我們斷不能將中醫式微的責任全推到殖民地政府身上。

九十年代，中醫藥在香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一方面香港政府銳意規範，另一方面，大學亦先後開辦中醫藥全日制或兼讀制的學位課程。在學術領域上，幾所大學也開辦中醫史的課程，例如香港浸會大學在1999年就由歷史系配合中醫藥學院開辦中醫史的課程，還推動相關醫史的研究計劃；<sup>9</sup>而且浸大、香港大學、中文大學亦各自設有自己的展覽館。凡此種種皆予人一種中醫藥業飛躍發展的感覺，可惜有關香港中醫發展的歷史則仍有待進一步的發掘。

關於香港中醫藥的研究，還有李甯漢等編《香港中草藥》一至八輯（李甯漢等，1978-2000），網羅了香港可以找到的中草藥；又有中文大學出版的一系列的中醫學教材。<sup>10</sup>這些著作雖不涉及中醫在香港的歷史發展，但作為香港中醫發展史的一部份，仍值得讀者們注意。此外，商界亦很重視與中醫藥的合作，而形成中醫成藥業。香港著名的成藥很多，對此香港商業史的著作亦開始注意，例如馮邦彥介紹以生產白鳳丸、保嬰丹出名的余仁生家族、以生產驅風油聞名的胡文虎家族、以生產白花油聞名的顏氏家族等（馮邦彥，1997：125-32）；王健儀介紹王老吉涼茶的發展（王健儀，1986）。雖然這些不是很嚴謹的著作，但就發掘資料及拓展視野而言，仍有一定的貢獻。

<sup>9</sup> 研究計劃名為 *Visions, Perspec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 Bibliographical Study*，可參閱浸會大學的網址：<http://www.hkbu.edu.hk>。

<sup>10</sup> 例如《中醫文選》、《本草研究入門》、《中藥學發凡》（江潤祥等，1998，1999）；《成方新編》、《中醫臟腑概說》（梁頌名等，1999）。當然近年香港出版有關中醫理論、歷史及工具書很多，但已偏離本文題旨，故從略。

## 結語：展望香港醫學史研究的方向

在一百六十多年的發展中，香港醫學主要分為三個階段：(一)十九世紀萌芽、中醫為本；(二)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醫「沒落」，政府醫療體系漸次成立；(三)抗日戰爭以後，西醫的發展一日千里。其中值得深入討論的課題很多，但由於香港醫學史的研究既沒有系統，亦未見成熟，只是由個別學者對個別課題作出討論，「見樹不見林，見西不見中」，因此本文也只能重點地介紹當中若干較受注意的課題。不過從這許許多多的作品來看，至少可以說已踏出第一步，如何將各點連成一網絡體系，及深化至各個層面，尚待日後的努力。而日後的研究走向如何呢？我們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入手。首先，接受西式醫學教育的醫生及護理人員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出現，漸漸形成一獨特的階層。到了今天，西醫在香港仍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他們成立各類型的專科學會，推廣自己的專業、爭取自己的權益，對政府的決策極有影響，特別是與社會民生有密切關係的醫療系統及衛生環境等方面。這個精英階層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這段期間內他們對香港社會有怎樣的影響？他們又憑藉甚麼去發揮影響力呢？

此外，香港的（西）醫學在近數十年已走在世界前端，以宏觀的世界視野來看香港的醫學史及貢獻，將是另一個可發展的方向。例如，香港歷史上惡疾橫行，從以前的肺結核、霍亂、鼠疫、天花、傷寒到今天的愛滋病(AIDS)、禽流感(H5N1)、腸病毒(EV71)等，香港的經驗對世界醫療發展的意義何在呢？環境衛生、社會民生和政府醫療政策的密切關係又如何串連在這個大都會的發展脈絡中呢？還有香港醫療科學中有部份是手執環球醫學界的牛耳（如婦產科、骨科、內科、眼科等），外國又如何借鑑香港的經驗呢？總而言之，香港的醫學經驗與世界大環境的潮流息息相關，二者如何互動，相互關係如何，實深值探討。

至於中醫方面，相關的討論和研究更少。雖然有不少人注意中國古代醫學史，但就香港這個東西文化交匯的城市而言，中醫如何在十九世紀以後「失勢」，其對於西醫在華人社區的「抬頭」又如何「回應」？際此中醫在香港大盛，對這方面的深化理解實在刻不容緩，難道我們可以接受整個香港中醫歷史的發展只是在殖民地政府壓迫下苟延殘喘的說法嗎？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有很多與醫療發展有關的史料尚待開發，例如十九世紀香港政府 Colonial Surgeon 的週年報告、1882 年的 Chadwich 報告、



其後的 Medical Officer 報告等都尚未受到重視，造成我們對於香港醫療衛生的整體認識不足（不過最近已有學者開始撰作潔淨局的歷史，相信會用到這方面的資料，同時亦補充香港醫療發展史研究的缺失）。其他有用的材料還包括從早年教會（包括新教和舊教）的醫療傳道工作找回香港醫療發展的點滴。研究醫療傳道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已蔚然成風，但研究其對香港的貢獻還是少見。<sup>11</sup>此外，還有來自各所醫院、機構、專科學會的年報、檔案及口述歷史的工作，所以可開拓的空間實在很多。

誠然，香港的醫療發展歷史已超過一個半世紀，但對於它的研究仍處於萌芽階段，我們還需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比較完整地勾畫出這個大課題的整體圖像。

## 參考書目

王誌信，《道濟會堂史——中國第一家自立教會》，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6。

王健儀，《創業垂統》，香港：王老吉涼茶莊，1986。

王德修，〈中國著名病理學家——侯寶璋教授〉，《中華病理學雜誌》，卷21期3：129-131，1992。

北里一郎，《北里柴三郎の人類學說》，福岡：福岡印刷株式會社，1996。

北里研究所，《北里柴三郎傳》，東京：北里研究所，1964。

江潤祥、關培生，《本草學研究入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江潤祥、關培生、梁頌名，《中藥學發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江潤祥、關培生、鄧仕樑，《中醫文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何興民，《矜憫為懷——香港科學醫療轉捩點（一八八七至一九四一年間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對香港市民的貢獻）：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一百一十週年紀念展覽（1887-1997）》，香港：香港醫學博物館。本書英文版由何屈志淑教授擔任翻譯，1997。

呂大樂，《山上之城：香港紅十字會的故事 1950-2000》，香港：香港大學

<sup>11</sup> 劉粵聲的《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王誌信的《道濟會堂史》(1986)和李志剛的《香港教會掌故》(1992)，雖然以香港基督教會發展為討論，但也有交代倫敦傳道會及雅麗氏醫院的發展情況。

- 出版社，2000。
- 李金強，〈香港華人與中國：何啓(1859-1914)與胡禮垣(1847-1916)之個案探討〉，《中國神學研究所期刊》，期 23：53-71，1999；亦可參閱 <http://www.cgst.org.hk/Journal/23/3.html>。
- 李志剛，《香港教會掌故》，香港：三聯書店，1992。
- 李東海，《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 李敖，《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香港：文藝書屋，1968。
- 李甯漢等，《香港中草藥》，香港：商務印書館，1978-1990。
- 李培德，〈香港鼠疫之日本發見〉，《歷史海流》，卷 3 期 3：37-41，1998。
- 李經緯，《中醫人物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
- ，《中國古代醫史圖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2。
- ，《中外醫學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李經緯、林昭庚主編，《中國醫學通史》，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
- 杜正勝，〈甚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卷 3 期 4：95-116，1992。
- ，〈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新史學》，卷 6 期 1：113-53，1995。
- 東華三院，《東華三院一百三十年》，香港：東華三院，2000。
- 《東華三院百年史略》編纂委員會，《東華三院百年史略》，香港：香港東華三院庚戌年董事局，1970。
- 威爾斯親王醫院，《四季人生：威爾斯親王醫院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1995。
- 馮邦彥，《香港華資財團，1841-1997》，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7。
-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3。
- 孫文，《倫敦被難記》，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第二冊，頁 3-40，1973。
- 俞慎初，《中國醫學簡史》，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
- 區結成，《九龍醫院七十週年》，香港：九龍醫院，1995。
- 梁頌名、梁思潛，《成方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 梁頌名、榮向路、江潤祥，《中醫臟腑概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曹美芳、鄧秉鈞、歐陽詠敏，《香港中醫藥展覽暨研討會——邁向新紀元》，香港：香港醫學博物館，1999。
- 單光鼐，《中國娼妓——過去與現在》，北京：法律出版社，頁 200-225，1995。
- 費克光(Carney T. Fisher)，〈中國歷史上的鼠疫〉，載劉翠溶、伊懋可(Mark Elvin)編，林玉梅、劉翠溶譯，《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史研究所，頁 673-676，1993。
- 鄭子瑜，〈孫中山先生習醫記〉，載氏著，《鄭子瑜選集》，星洲：星洲世界書局，頁 207-210，1950。
- 鄭金生、李建民，〈現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源流〉，2000。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medicine/discuss/1019.html>。
- 謝永光，〈香港娼妓史〉，載謝氏改編，羅澧銘原著，《塘西花月痕》，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
- ，《香港中醫藥史話》，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8。
- 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4。
- ，《香港中西文化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
- ，《國父在香港之歷史事蹟》，香港：珠海書院，1971。
-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香港基督教聯會，1941。
- 蕭國健，〈九十年來之香港史研究〉，載周佳榮、劉詠聰合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
- 關肇碩、容應莢，《香港開埠與關家》，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97。
- Ashton, F. R.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1887-1957*. Hong Kong: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1957.
- Bendiner, Elmer. "Alexandre Yersin: Pursuer of Plague," *Hospital Practice*, March 30: 121-148, 1989.
- Benedict, Carol Ann.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owie, Donald. "Captive Surgeon in Hong Kong: The Story of the British Military Hospital, Hong Kong 1942-1945,"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5: 150-290, 1975.
- Cantile, Steward Jean. *The Quality of Mercy: The Lives of Sir James and Lady Cantil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3.

- Chang, Jane Kan et al. *30<sup>th</sup> Anniversary Jubilee Publication (1965-1995)*. Hong Kong: The Federation, 1995.
- Chiu, Ling Yeong. *The Life and Thoughts of Sir Kai Ho Kai*.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ydney, 1968.
- Choa, Gerald Hugh.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Contemporary Hong Kong,"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and Conceptions in Hong Kong Social Life Today. (Weekend Symposium: Brochure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Hong Kong," in The Federation of Medical Societies of Hong Kong ed., *The Medical Direc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Federation of Medical Societies of Hong Kong, 11-26, 1970.
-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otto: *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he Lowson Diary: A Record of the Early Phase of the Hong Kong Bubonic Plague, 1894"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3:129-145, 1993.
- "Aspects of Hong Kong Medical History Seen in the Museum," *Hong Kong Museum of Medical Sciences: Grand Opening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Medical Sciences, 7-19, 1996.
-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sup>nd</sup> edition, 2000.
- Evans, Dafydd Emrys. *Constancy of Purpose: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and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887-198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7.
- Fok, T.F. et al. *To Lead, Innovate and Serve—First Fifteen Years*. Hong Kong: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5.
- Fong, Dawson and W. S. Poon. *Hong Kong Neurosurgery—Four Decades &*

- Beyond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Neurosurgical Society*, 1999.
- Fung, Chi Ming. *The History of Queen Mary Hospital Hong Kong 1937-1997*. Hong Kong: Queen Mary Hospital, 1997.
- George, Janet. "The Lady Doctor's 'Warm Welcome': Dr. Alice Sibree and the Early Years of Hong Kong's Maternity Service 1903-1909,"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33: 81-109, 1993.
- Hoe, Susanna.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Western Women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1-194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Hoizey, Dominique and Marie-Joseph Hoizey. *A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Vancouver: UBC Press. translated by Paul Bailey, 1993.
- Hong Kong Sanatorium and Hospital. *Hong Kong Sanatorium and Hospital 75<sup>th</sup> Anniversary 1922-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Sanatorium and Hospital, 1997.
- Hong Kong Tuberculosis, Chest & Heart Diseases Associ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Tuberculosis, Chest & Heart Diseases Association, 1994.
- Howard-Jones, Norman. "Was Shibasaburo Kitasato the Co-discoverer of the Plague Bacillus?"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Winter: 297-307, 1973.
- . "Kitasato, Yersin, and the Plague Bacillus," *Clio Medica*. 10.1: 23-27, 1975.
- Hutcheon, Robin. *Bedside Manner: Hospital and Health Car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King, Gordon. "The History of Tsan Yuk Hospital, 1922-1955," *The Bulleti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8.1:30-39, 1972.
- Li, Shu Fan. *Hong Kong Surgeon*. London: V. Gollancz, 1964. 中文版, 《香港外科醫生》, 香港: 李樹芬基金會, 1965。
- MacKeith, John and E. H. Paterson.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1887-1967*. Hong Kong: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1967.
- MacPherson, Kerrie L.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Manson-Bahr, P. and A. Alcock. *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Patrick Manson*. London: Cassell, 1927. (本書筆者未見)。

- Mattock, Katherine. *Hong Kong Practice: Drs. Anderson & Partners—the First Hundred Years*. Hong Kong: Linkprint Ltd, 1984.
- McFadzean, A. J. S. “Medicin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e Federation of Medical Societies of Hong Kong ed., *The Medical Direc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Federation of Medical Societies of Hong Kong, 28-37, 1970.
- Paterson, E. H. *A Hospital for Hong Kong: The Century History of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Hong Kong: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1987. (本書中文版由其醫院前總護士長陳永嫻女士負責翻譯。)
- Pryor, E. G. “The Great Plague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5: 61-70, 1975.
- Selwyn-Clarke, Selwyn. *Footprints: The Memoirs of Sir Selwyn-Clarke*. Hong Kong: Sino-American Pub, 1975.
-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in Hong Kong: A Review,”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7: 147-169, 1997.
- Smith, Carl. “Sun Yat-sen’s School Days in Hong K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Ching Feng*, XXI(2): 78-94, 1978.
- Solomon, Tom. “Alexandre Yersin and the Plague Bacillus,”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98: 209-212, 1995.
- “Discovery of the Plague Bacillus—Hong Kong, June 1894,” *Experpta Medica*, 2-4, 1996.
- “Hong Kong, 1894: The Role of James A. Lowson in the Controversial Discovery of the Plague Bacillus,” *The Lancet*, 350: 59-62, 1997a.
- “Hong Kong’s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31.4: 458-463, 1997b.
- Starling, Arthur E. *The Chance of a Lifetime: The Birth of a New Medical School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Tsai, Jung-fang. *Comprador Ideologists in Modern China: Ho Kai (Ho Ch’i)(1859-1914) and Hu Li Yüan (1847-1916)*.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5.

- Tsan Yuk Hospital. *Tsan Yuk Hospital 70<sup>th</sup> Anniversary*. Hong Kong: Public Affairs Division, The Hospital Authority, 1992.
- Ward, Philip.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X-ray: The First 100 Years of Radiolog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Radiologists, 1995.
-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ientsin: The Tientsin Press, 1932.
- Yip, Ka Che.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Ann Arbor, Michiga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網址：**

- 香港大學 <http://www.hku.hk>
- 香港中文大學 <http://www.cuhk.edu.hk>
- 香港東華三院 <http://www.tungwah.org.hk>
- 香港醫院管理局 <http://www.ha.org.hk>
-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http://www.hkam.org.hk>
- 香港醫學組織聯會 <http://fmshk.com.hk>
- 香港醫學會 <http://www.hkma.org.hk>
- 香港醫學博物館 <http://www.hkstar.com/~hkmmms>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medicine>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四期

論文

319頁 平裝 250元

曹天忠：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基層社會建設

余敏玲：蔣介石與聯俄政策之再思

張寧：在華英人間的文化衝突：上海「運動家」對抗「鳥類屠害者」，1890-1920

巫仁恕：節慶、信仰與抗爭——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為

洪秋芬：日治初期葫蘆墩區保甲實施的情形及保正角色的探討(1895-1909)

許文堂：十九世紀清越關係之演變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史料介紹

##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友聯資料介紹

區志堅\* · 侯勵英\*\*

### 一、前言

香港自鴉片戰爭結束簽訂南京條約，至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前，為英國殖民地，期間既建立一套迥異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成為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橋樑及國內外學者往還中國必經的地方。尤值國內戰亂，香港因其獨特的政治環境及對外交通便利，往往成為中國南下學者的避居地，及西方人士瞭解中國的地方。

1949年國府遷臺前後，國內不少文人、學者，既不認同國民政府的政策，又不願留在紅色中國，而鑒於當時的香港做為英國殖民地，局面相對穩定，較能確保安全，處身其間，除了能夠瞭解中、臺關係，又可享受有言論自由權，批評二地政府，因此選擇香港做為居住地。另一方面，二次大戰後，出現東西冷戰，以英、美為主的「文化自由聯盟」(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與蘇聯為首的「共產國際」相對壘，在英、美政府直接或間接的支持下，以西方為首的國家，在各地（包括香港）成立研究中心、出版社及廣播電臺，不獨傳播反共的言論，更收集有關共產國家的訊息。

中國大陸因1949年後建立共產政權，被西方封鎖，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又與中國大陸相連，便成為盟國收集中文資料的地方。美國政府更資助在香港成立研究所，收集中國報刊、書籍，研究中國事務。在這種特殊的時空環境下，友聯出版社(Union Press Ltd.)、友聯書報發行公司（或稱為友聯書報有限公司）及其下屬的友聯研究所(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

\*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高級研究助理、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導師



於是成立。暫且不談這個機構成立的政治目的，單就它所收集及出版的資料而言，實為日後研究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大陸及亞洲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的重要材料。這些材料，一部份為微捲(microfilm)，一部份為書籍，分別存放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及大學服務中心、香港浸會大學（以下簡稱浸大）圖書館及圖書館特藏組「當代中國研究資料」。友聯於七十年代末，結束在香港工作之前，把館中所收藏的剪報、報刊及書籍，賣給浸大，其負責人之一胡欣平（司馬長風），及一批自由思想的學者，如徐訏等，晚年均執教浸大歷史系及中文系，他們也把藏書捐贈給圖書館或友聯，這批書籍多是當時中港臺出版的書籍，均被蓋上「友聯研究所」字樣，成為友聯藏書及資料的一部份。因友聯整理的資料，較多收藏在浸大圖書館，故本文主要介紹浸大圖書館館藏友聯資料的內容及特色。<sup>1</sup>

## 二、友聯事業

1951年4月，香港友聯出版社由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資助成立，地址先後在九龍新圍街9號、多實街14號；友聯書報發行所、友聯研究所及後成立的《祖國周刊》（以下簡稱《祖國》）編輯委員會也在同一地址。可知友聯這一個機構具有學術研究、編輯刊物及出版發行的特色。1959年前後，友聯研究所遷至九龍書院道9號，書報發行公司及印刷廠遷往花園街、碼頭圍道及四美街。南來學人胡欣平、丁文淵為當時友聯出版社的核心領導人，他們更擔任友聯研究所顧問，並資助出版以下的刊物：1952年7月出版《中國學生周報》；1953年出版《祖國》及《兒童樂園》；1955年刊行《大學生活》半月刊。《祖國》也刊載臺灣出版《自由中國》的雷震、殷海光等人的言論，殷氏著《旅美雜記》、《怎樣研究蘇俄》兩書，也早在此雜誌上發表。

今天尚未清楚得知友聯出版社成立的目的，但在《祖國》上曾刊載〈介紹我們的社徽〉一文，介紹代表友聯三環相連徽號的意思，由此可略知友

<sup>1</sup> 有關五十年代前後，香港成為南來文化人的居地，及左派、右派文化人在香港的活動，見鄭樹森、黃繼持、盧瑋瑩編：《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香港：天地圖書，2000），頁3-33；袁小倫：《戰後中共與香港進步文化》（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Frances Stono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pp.268-273.又本文以公元為紀年方法。

聯成立的原因。據該文所述，三環三角雙葉的圖徽，就是「象徵我們對民主社會的三項基本理念：民主、公平、自由」，上環代表民主政治理念，右環代表公平經濟的理念，左環代表自由文化理念，三者結合，就是代表「政治的民主必須建基在經濟的公平」，民主政治、公平經濟及自由文化這三大理念為創辦友聯事業的目的。至於友聯社徽上的三角形，象徵「民主中國運動」，三個三角形貫穿三環，代表了文化運動重心階段、政治運動重心階段及社會運動重心階段，而三角形由下端開始，順時鐘方向進行，代表了由文化運動重心階段轉入政治運動重心階段，是整個面的展開，如是三個三角形，以三個頂點為軸，周而復始，不斷展開文化、政治、經濟的改革。更進一步，因為友聯社員企望世界和平，故採用兩枝象徵世界和平的橄欖葉。總之，「友聯的三角三環雙葉徽誌象徵著：通過民主中國運動，以實現民主社會理念，並進一步促進世界和平」。

再看友聯在《祖國》刊載〈苦難中的偉大祖國——代發刊詞——〉一文中指出：

《祖國周刊》的創辦，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向海外同胞報告祖國大陸的狀況。我們要從橫的方面報導祖國大陸近期的重要事件，從縱的方面討論中共統治下的各項問題。國際局勢的演變，也是我們報導與討論的對象，因為祖國的前途不能脫離世界局勢的發展。此外，我們要共同探討反共戰鬥的策略問題，反共勝利的善後問題，以及民主社會的理想問題及實戰問題。

在〈寫在第一卷之後〉中又指出：

我們的宗旨是：報導祖國實況、研究祖國問題、分析國際局勢、評介現代思潮。我們的作風是：學術性、研究性、藝術化、趣味。我們的立場是反共的。

換言之，1949年後，有感於紅色中國已建立，遂創辦此刊物，藉研究及報導中國大陸的情況，使海外華人了解五十年代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的面貌；同時，因香港與國際知識界交往頻繁，所以刊物上也報導國際時事，藉此團結世界各地「反共」勢力，重估文化；同時也為文士提供一個發表意見的園地。因此，《祖國》的內容，就是：

- 一、專題研究報告和綜合報導；
- 二、當前事件的背景資料；
- 三、國民經濟統計數字；

- 四、人事異動及人物簡歷；
- 五、國內外有關中共書刊評介；
- 六、每月中共大事記。

《祖國》主要分為社論、大陸消息、大陸報導、蘇聯動態、論著、譯述、中共問題研究、人物評價、雜文、自由人語、大事記要、讀者投書、書刊評介、文藝等類目。及至七十年代，《祖國》改為月刊，其類目，包括政治社會、軍事、外交、財政經濟、文化教育、觀察與評論、北國見聞錄、資料選錄、人事動態表、對外關係資料等。刊載的文章不獨探討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問題，更有批評中共的言論、引介及批評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東南亞問題、翻譯歐美時論及政治言論、文藝作品，及以大事年表的形式記載 1951 至 1974 年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而友聯也把《祖國》專號內的論文，編成論文集。

《大學生活》主要列有社論、生活與思想、專題論述、讀書指導、人物介紹、讀書生活回憶、學府介紹、報導、遊記、通訊、大陸文教透視、文藝及消息的類目。其創刊的宗旨為：「讓大家在這兒栽花植樹，攜手遊游；它是陣陣和風，把虹彩周圍的陰霾吹散；它是一個樂器技師，使交響樂的聲音得到諧和；它是一幅軍事演習的地圖，使三軍在戰鬥中配合更加密切」，此刊物為大學生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鼓勵同學把心裏的話寫出來，並協助大學生致力學問、修養及對生活應有的認識。

《中國學生周報》創刊的目的是：「在這種自由園地裏，才可充份表現我們的意志，才可以充份闡揚我們的理想，才可以充份發揮我們的智慧，並且使我們與各國學生之間得到充分的瞭解與情誼，進而溝通中西文化，替未來的中國摸索出一條正確的出路來。」此刊物是學生主辦，友聯資助，但友聯未嘗影響辦報的方針，故能發表批評美國及國共兩黨的言論，並討論文化、思想生活、學識、研究及寫作各方面的問題。

友聯也進一步協助推動本地學術活動，如借用多實街洋房給包錯石及胡菊人等於 1968 年創辦「創建學院」。在學院開辦的課程有戴天的詩作坊，胡氏及李天命主持文學班，文樓開美術班，推動本地文化藝術工作。1955 年邱然也借用友聯社址，成立香港中國筆會。友聯又資助筆會成員徐東濱出版詩文集，及舉辦文藝金像獎，得獎人曾有彭歌、鍾虹、李采薇等臺灣作家，經由此一管道，臺灣文學流播香江。

而友聯研究員主要工作是收集中國大陸上的時事新聞，訂閱大陸上中

央到地方的報紙，作剪貼和分析；又曾把所中收藏的期刊及報章，先後編成 *Catalogue of Mainland Chinese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1968)及《友聯研究所分類資料目錄》(1962)，方便讀者參閱。<sup>2</sup>

友聯又曾編輯「友聯文庫」1及2輯，「現代思潮文叢」、「世界學術叢書」、「中國學生叢書」。出版的專作有：

(一)政論專著：

鍾華敏《江青正傳》(1967)、燕歸來《紅旗下的大學生活》(1952)、黃雨川《中共節育運動》(1967)、徐東濱《甚麼東西專政?》(1952)、《細菌戰?》(1952)、友聯《自由民主論叢》(1967)、翻譯約翰哈維《一個留學北平的外國學生》、徐東濱《中共的高等教育?》(1953)。

(二)文學著作及遊記：

劉紹銘編《現代中國文學評論選集》(1970)、胡菊人《旅遊閑筆》(1970)、祖國周刊社編《自私短篇小說集》(1953)、辛膺《談讀書方法》(1953)、糜文開《詩文學隅》(1953)。

(三)學術研究：

張君勳《辯證唯物主義駁論》(1959)、楊仲揆《中國、琉球、釣魚臺》(1959)、友聯《釣魚臺問題資料選輯》(1972)、徐道鄰《行為科學概論》(1958)、勞思光《康德知識論要義》(1957,1976)、友聯《人文思潮論叢》(1956)、祖國周刊出版社《中共十年》(1960)。此外，英文著作方面有：Sybil Wong 編的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t Agricultural Terminology* (1968)、友聯編 *Catalogue of Mainland Chinese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1968)。

可見，友聯成立的目的是要傳播自由、民主及反共思想。為了解中共的情況，更資助研究中共各方面的問題，及推動其他民間團體舉辦的學術活動。但它未嘗干預這些組織辦事方針，於是很多南來的知識份子，既可獲經濟援助。解決生活問題，又可發表批評國共兩黨的言論。友聯亦為年輕作家或大學生提供發表文章的機會，因此帶動香港六、七十年代文化界繁榮的景象。但隨七十年代末，中美關係日趨緩和，中國實施開放政策，報刊資料也能直接運往西方；加以領導學者大半離港、或年老或過世，友聯遂於此時遷離香港，而把整理及研究有關中共的中文資料，賣給浸大，

<sup>2</sup> ( ) 號內為出版年份。

經由圖書館館員進一步整理，成為香港研究當代中國史的重要資料庫。以下便介紹館藏的友聯收藏和出版的書籍、剪報及微捲報章的內容。

### 三、友聯藏中共政治資料

1979年後，友聯所藏的資料移入浸大，圖書館館員將資料重新編目，一部份編為開架書籍，讀者可隨意取閱；另一部份則存放在「當代中國研究資料」特藏組(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ollection)內，列為閉架資料，需要閱讀時，必須向館員查詢。現就這兩部份作一個簡介。

首先開架書籍方面，浸大圖書館收藏的友聯藏書，數目及種類繁多，諸如中國史地、外國史地、國際形勢、各地經濟，以至華僑史、民族史等，而以中共政治史這個主題的藏書最為豐富。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列出有關中共政治史的書籍。

#### (一)中文書籍：

館內收藏友聯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政權第四年》(1954)、《中共政權第五年》(1955)、《共產主義下的中國》(1956)、《自由民主論叢》(1956)、《經濟制度論叢》(1957)、《中共怎樣對待民主黨派》(1952)等；還有展望周刊社編輯部編《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問答解答》(1958)、共青團中央宣傳部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講話》(1959)、中國共產黨中共委員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53)、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編《中國共產黨史學習資料》(1952)、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六組編《匪黨的組織與策略路線》(1952)、中共中央華北局黨校教務處編《中國共產黨黨章教材》(1952)、湖南「宣傳員講本」編委會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1952)、中國青年出版社編《樹立共產主義風格》(1958)、中國共產黨中央中南局宣傳部編《共產黨員課本》(1950)、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編《共產黨員政治教材》(1957)、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編《共產黨基礎知識讀本》(1951)、西安犀眾日報宣傳部編《學習中共黨史重要文獻》(1951)、《中國共產黨在中南地區領導革命鬥爭的歷史資料》(1951)、《星火燎原》(1960)等。

#### (二)英文書籍和期刊：

友聯研究所編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1969)；Lau Yee-fui, Ho Wan-ye, Yeung Sai-cheung, *Glossary of Chinese Political Phrases*

(1977) ; *Communist China (1949-1971) ; Document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Sept.1956-Apr.1969 ; 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67* 。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如 *Dictionary of Basic Military Terms*, Richard F. Starr, ed.,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3) ; *Standar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Terms ;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ume 1-4) ;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Jan.1966-Jan.1969, Mar.1969-Sep.1977) ;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volume 1-2,4-6)等。

至於收在特藏組的友聯藏書資料主要是剪報、報章、期刊及書籍，資料珍貴，其中剪報和報章的內容而言，主要是 1949 至 1979 年大陸報刊資料。大體上可分為以下數種：

(一)原稿：

1953 年至 1970 年 3 月《新華社電訊》(S0590243)、<sup>3</sup>1970 至 1979 年 3 月《新華社新聞稿》(S0590243)、1955 至 1976 年 9 月《中國新聞》(S0595060)、1964 年期 1 至 1978 年期 12《人民畫報》、1955 至 1974 年 3 月 *Union Research Service* (CC951.005UN3)、1953 至 1972 年 *Hsinhua News Agency Daily News Release* (CC079.51h859D)、1976 年 11 月 3 日至 12 月 1 日 *Hsinhua News Bulletin* (CC079.51h859D)，及自 1968 至 1974 年未拍攝各省的剪報資料(R0008-346)。

(二)剪報報刊資料的縮微膠捲：

館員把這些剪報資料，列入「當代中國研究資料組現存剪報資料檔案清單」，而從友聯得來的資料，在膠捲的第一頁印有「友聯研究所」字樣。據友聯研究員統計自 1953 至 1979 年，所藏大陸剪報資料，主要以財政類為大宗，共 581 卷；次者為政治類，共 266.5 卷。而館員把這些資料再歸類，編成〈當代中國研究資料檔案現存剪報清單〉，分為：總部門、政治社會(P0001-2397；P0208-0281；P0430-530；P0843-0992；P1123-1179；P1323-1370；P1449-1476；P1556-1594；P1667-1704；P1769-1789；P1970-1971；P2055-2056；P2123-2124；P2181-2182；P2258-2260；P2271)、軍事(M0001-M03888)、財政經濟(F0001-F3548)、文化教育(L1101-1954；

<sup>3</sup>

此是浸大圖書館館藏編號。

L1101；L1656-1657；L1713)四個部門，其下細分為：總部門下有政綱(0-02)、地方誌(03)、紀念節日(04)；在政治社會門下有國內政治(11)、政治協商會議(1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1241)、司法工作(11254)、公安管理(11257)、民族事務(11259)、西藏地區專卷(117)、對臺灣問題(118)、對港澳問題(119)、國際關係(12)、政黨(13)、中國共產黨(131)、各民主黨派(132)、海外反共動態(134)、勞工運動(141)、民主改革運動(142)、婦女兒童運動(143)、青年運動(145)，全國財經概況(305)、經濟特區(3051)、經濟開放區(3052)、財政(311)、金融(312)、國內貿易(321)、糧食(322)、對外貿易(323)、農業(324)、林業(325)、水利(326)、災害(327)、工業(328)、交通(329)等。此外，也把友聯所藏國內以中文書寫有關國際事務的剪報資料分別歸類及編號，其細目如下：聯合國、亞洲、遠東、東南亞、印度支那、蒙古、南北韓、越南、寮國、高棉、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星馬、印尼、婆羅洲及各島、菲律賓、巴基斯坦、印度、中東、歐洲、蘇聯、波蘭、德國、梵帝岡、希臘、意大利、英國、法國、羅馬尼亞、歐洲各小國、美洲各國、美國、大洋洲、大洋洲各國、非洲各地方的資料。

### (三)報刊書籍縮微膠捲：

浸大編 *Hong Kong Baptist Library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Section* (《小報微捲目錄》) 上承友聯採用韋氏拼音(Wade-Giles System)方法，列出館藏友聯收集的報刊及書籍的名稱，把自 1949 至 1966 年國內外出版報章、期刊、雜誌的英譯名稱為排列次序，上起自 A 卷《安徽日報》(*An-huei Jih-Pao*) (1956-1958)，終至《雲南工人報》(*Yun-nan Kung-jen Pao*)。尤以「其他微捲」部份 (Miscellaneous Materials on Microfilm)，甚值得注意，此部份包括：

1. 官方文件，如 1951 至 1954 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彙編》。
2. 海外出版報刊及書籍，如在北韓出版 1956 至 1958 年的《戰友》、在香港自 1947 至 1950 年出版《公平報》、在蘇聯出版 1958 至 1960 年《蘇中友好》及 1957 至 1958 年出版《蘇聯》、在香港出版的《中國共產黨與土地改革》。
3. 把收錄自 1950 至 1974 年大陸各地區的廣播資料，撰成中文文稿，如「安徽省人民廣播電臺 (1967-1974 年)」(R0001-30)、「浙江省人民廣播電臺 (1967-1969 年)」(R0031-42)、「湖南省人民廣播電臺」(H7-21)。

4. 採訪政經、財經及文教人物卷、宗教鳴放與反右專卷、中蘇邊境衝突，共 48 卷。

(四)特藏書籍：

這些藏書可分為中文及英文兩方面。中文方面主要包括友聯研究所編《中共中央文件彙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8）、新華日報資料室編《論知識份子》（1949）、《民族政策文件彙編》（1958）、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編《中央財經政策法令彙編》（1950）、自由中國勞工同盟編《中共奴工內幕》（1952）、工人出版社編《中國工會第七之全國代表大會主要文件》（1953）、《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公安工作法規匯編（1949.10-1957.6）》、中國共產黨中央西北局宣傳部編《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通俗講話》（1952）、《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公報》（1962）、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編《整風學習參考資料》（1950）、《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週年紀念專輯》、中國人民大學民法教研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參考資料》（1956）、《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文件》（1956）、光明日報編輯所編《思想改造文選》（1952，共五集）、人民出版社編《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1958）、週末報社編《新中國人物誌》（1950）等。

而英文方面，則有友聯研究所出版的 *Index to Titles of English News Releases of Hsinhua News Agency* (1967); Richard Baum, *Bibliographic Guide to Kwangtung Communes 1959-1967* (1968); Chang Man, *The People's Daily and the Red Flag Magazin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9); Chalmers A. Johnson, *Communist Policies Toward the Intellectual Class* (1970); Shih Cheng-chih, *Urban Commune Experiments in Communist China* (1962); Cheng Chu-yan, *Income and Standard of Living in Mainland China* (1967) 等。其他出版社有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Report and Proceedings* (1960); Edward J. M. Rhoads, *The Chinese Red Army 1927-1963* (1964);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eople's Communes"* (1959); C. F. Remer, ed., *Three Essays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f Communist China* (1959); S. B. Thomas,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53); Chi Wen-shun, *Readings in Chinese Communist Documents* (1966); *Communist China Yearbook 1962*; *Communist China 1955-1959: 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 (1962); *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7* (1968) 等。

#### 四、結語

友聯雖離開香江，但其收集的資料，對研究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共各方面發展，甚有幫助，並成為研究當代中國的「寶貝」。時至今日，不獨本地各大學研究人員，也有國內外學者登臨浸大圖書館查閱中國當代史的資料。希望往後有更多海內外學者，能進一步運用館藏友聯資料，從而開拓中國當代史的研究領域，這不僅是友聯創辦的目的所在，也是本文撰稿介紹友聯資料的動機。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1)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2)本通訊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3)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以 Word 文書處理軟體打字後，併同 3.5 吋磁碟片送交本所通訊編輯委員會。
- (4)來稿請署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5)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 (6)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7)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 清代小商販稀珍資料五種

王爾敏\*

香港處士翁仕朝先生是一位道地的鄉僻漁村訓蒙老儒。生於前清同治末年，死於對日抗戰期末。畢生獻身於九龍、新界海隅漁村村童施教，並開設六桂堂藥鋪，行醫治病。六桂堂乃是翁氏、汪氏、沈氏、洪氏、江氏等六姓共同堂號。當知翁仕朝先生之重視宗姓本源。翁仕朝雖是佔畢小儒，英國學者稱他是 village teacher，但卻小看他是一個貞定好學有淑世思想的儒者。他的最大特色是儒生的抱道守器。故凡是他經手的文獻，確做到片紙不遺。他身後子孫致富，將其所積文獻捐給香港新界中央圖書館。有小部份影印資料存在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本人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就複印了一些破舊資料。現在將五種小商販資料刊布，以供世人參考。

## 一、招墟七言雜字

招墟七言雜字，是清代小商販趕赴各鄉鎮集墟市，販售百貨的一種歌訣。招墟的意思，反映各地不同墟市在營業場合搭建商攤，陳列各色貨品的實況，以至不同營生與經辦方式，一概編入歌訣。包括各樣行業，及其相應貨色。這可以說是墟市攤鋪商販唱貨歌訣。

全首詩一千三百五十八字，一韻到底。自是十足庸俗鄙俚，只表現口訣功用，不能入於詩家水平。雖然出於清代庸俗歌訣，但也有難懂之處，如詩句：「歇鋪酒館兼茶坊」。歇鋪即是住宿之處，今之所謂旅館。又如詩句：「仙姬大景十三行」。即是指十三洋行所出售的西洋美女圖。從沈復所著《浮生六記》可知國人在乾隆時代已慣稱西洋圖為「洋畫」。從黃鈞宰所著《金壺七墨》，可知嘉慶、道光初年民間已慣稱西洋圖畫為「西洋景」。這個詩句，特別標出十三行與大肆叫賣美女圖洋畫，即可推知這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類招墟歌訣應早成於前清嘉道之間。其外詩中所舉的西氈、毛氈（毯）、多羅呢，已早見於《紅樓夢》中的多羅呢斗蓬（西洋毛織品），自然也都是歐洲洋貨。此是舉例。又如「洋物加官金水甲，串排江炮黃煙響。」上句指官場上慶祝加官所被帶金線卷繡串的官衣外披。這是西洋金線卷手藝，在廣州訂做運往歐洲。當地土名叫「鬼子欄杆」。下句是慶祝加官時的連珠炮仗。而「黃煙響」則是大剛雷炮。道光時廣東巡撫黃恩彤被粵民戲稱爲「黃煙筒」，就是放響炮之謂。這也是舉例。但凡學者從事研究，認真重視平民小商販的一套唱貨詩歌，自亦有辦法辨識這類淺俚文獻。

#### 招墟七言雜字

招墟做店大開張，歇舖酒館兼茶坊。  
 鮮魚豬肉堆滿市，糴谷糴米列幾行。  
 布疋雜貨件般有，油燭燈芯滿架藏。  
 大字溪錢二進寶，上香紙角大曹罌。  
 年紅雙福硃砂紙，仙姬大景十三行。  
 洋物加官金水甲，串排江炮黃煙響。  
 龍東梅紅寫書帖，貢川白紙抄文章。  
 筆墨手巾頭帕闊，荷包白扇袋毬長。  
 鞋履襪靴紅絳帽，苧麻綿葛布衣裳。  
 褂袍襖衲裙衫褲，赤白青紅綠黑黃。  
 蚊帳單被連匣蓆，西氈毛氈並枕箱。  
 潮藍江青真白蘭，小絨嗶嘰上鵝黃。  
 褐片山東及漢府，織絨哆囉共程鄉。  
 絲綢羅緞真實貨，長短精粗丈尺量。  
 肚兜腰帶學新樣，胭脂水粉打面光。  
 手鉤戒指鑲瑪瑙，紅鞋白襪繡鴛鴦。  
 金釵銅鈕銀簪練，絲線耳環袋鈴響。  
 胸針頭鈿新打扮，髻欄鬢貼好梳妝。  
 剪刀眼鏡都齊備，水晶玻璃件樣光。  
 茶壺錫鑄盃盤盞，瓦瓶牙鉢罐埕罇。  
 碗箸挑羹堪使用，甕塔壘公可貯藏。  
 棋頭板蓋筭箕子，瓢杓沙盆水桶樑。

飯甑飯撈煙窗架，鍋頭鍋鏟灶廚房。  
 狹間窄巷長廊廁，高樓大屋闊廳堂。  
 灰壁泥牆磚瓦石，松柱杉桷棟桁樑。  
 矮凳高檯竹校椅，企棚明櫃樹拖箱。  
 棕籠績籠多大小，扁篋圓籃有短長。  
 鹵笔籬裝飾篋壳，碓舂櫃攪磨礮糠。  
 蓑衣箬笠油紙傘，犁耙碌礮腳鋤幫。  
 鎚嘴釘鋤和鐵錘，斧頭鑿仔與刨藏。  
 車鑽割刀鋏鏟利，鐵鉗鏈銼鋸鉋剛。  
 弩箭藤牌銅銃炮，鈎镰腰劍竹高鎗。  
 扁鼓馬鐮犀牛角，鏡鈸鐘鼓響叮嚕。  
 夜行捕捉搜巡邏，提籠校燭上牙香。  
 菜酌頂圓瓜片棗，欖仁柿餅茆檳榔。  
 麵粉香糕紅柚米，油麻黃豆白冰糖。  
 酸醋甜糟鹹豆醬，豉油麻肉汁魚湯。  
 木耳金針蝦米好，八角胡椒豆豉香。  
 閩笋腐皮多異味，薯蕷海蜇亦堪嘗。  
 鮑魚蟾子炆燉食，蛤蚧河鮑熬熟嘗。  
 繒網索縵船艇事，桅浬橦槳捕魚郎。

赤鱣青鯨白鮑子，青鱗橫鯨烏藍鮓。  
 馬鮫魴鮓鮓鮓鮓，螞蟻青蟹蟹螺蚌。  
 鰱鱸鱖鱖鱖鱖，鰻鱔龜蟹鱔鱔鱔。  
 葱蒜韭蒿蕪芻芻，糯粘粟麥芋薯羌。  
 芥菜菠菱蘿蔔米，芸萹刀板苦瓜瓢。  
 圓瓠茄子葉青秀，甘蔗沙梨味自涼。  
 檸檬香丸桃李白，荔枝龍眼桔橙黃。  
 菠蘿椰子也堪食，菱角蓮藕種在塘。  
 雞鴨公母及狗貓，牛馬牯犍併豬羊。  
 野獺狐狸逐兔子，黃麋麋鹿走豺狼。  
 獅象麒麟蹄角利，猿猴虎豹爪牙長。  
 鴉鳩鴉鵲同鴻鴈，赤鶴黃鸝引鳳凰。

白鶴畫眉籠上宿，鷓鴣沙鷗水中藏。  
鸚鵡嘴尖啣燕雀，鷓鴣毛好賽鴛鴦。

人生面目多肥瘦，手腳身腰有短長。  
耳聽口吮舌舐味，喉吞眼看鼻聞香。  
額門腦沁通經絡，頭頂喙唇連腑臟。  
肩背臂豚兼腿膝，肘胛頸項及胸堂。  
皮毛骨髓鬚眉髮，腎肺心脾肝膽腸。  
指甲齒牙血脈聚，肚臍腹脛屎尿藏。  
伶利聰明加俊秀，跣跣喑啞又聾盲。  
伯叔公婆疏姊妹，姑姨嫂孀親爺娘。  
兄兄弟恭多酌議，夫和婦順好商量。  
挑泥挖石通溝瀝，築坡開圳蔭田莊。  
畝嶺埔垵有畦墾，瑕壠坵塊近池塘。  
長短秧苗都搨落，高低糯粘盡呈黃。  
收割晒燥颯潔淨，納完租稅得安康。  
舂綿碎米爲糲板，做擔好米出街坊。  
石斗升筒須較準，厘毫絲忽莫強橫。  
舂兩重輕憑秤戥，錢銀多少問客商。  
件般賬目尋部數，賒借現交細思量。  
除收尚欠算明白，兌完折妥義情長。  
貨物買齊無錯亂，威風凜凜轉家鄉。  
買租納糧憑單票，戶司戶典及倉房。  
州省縣城連府鎮，官僚上任亂忙忙。  
總督部堂巡撫院，布政按察併黃唐（皇堂）。  
將軍提督副總府，參軍守備及都堂。  
三司六道連關部，宗師學縣赴文場。  
文武官員車輪斗，書錄原來筆墨長。  
巡檢鄉官及約保，巡丁掌練看地坊。  
偷盜小人真詭譎，裝模作樣好裝誑。  
夜晚穿牆併挖壁，貧民被害甚淒涼。  
衙役書吏俱無德，酷刑嚇詐去誣良。

光棍訟師心毒甚，狡謀唆囑以爲狼。  
 不論親疏及骨肉，總要攬銀入己囊。  
 要一青磚折人屋，無辜遭害敗田莊。  
 罪惡盈滿天誅滅，後代無人實可傷。  
 撫弄私刑真可畏，吊打繯拷如虎狼。  
 耕田讀書爲本分，貿易生意亦可良。  
 赴科買賣江湖走，棍徒白撞細提防。  
 買齊貨物須回首，切勿探花戀酒場。  
 恐染疾病喪銀兩，務禁學這小人樣。  
 宜歸家室省高堂，稚子候門喜洋洋。  
 利就名成真得意，買業置產起書房。  
 急教弟子學文章，節儉持家勿猖狂。  
 惟存禮義學賢良，傳家以道萬古方。

## 二、魚名七言歌

廣東省面臨南中國海，而陸地山多田少，民眾率多以航海行船爲生，攬載客運貨運，穿梭海洋。其貧苦者則多從事漁殖，往往以船爲家。又因珠江口爲一大漁場，沿海港澳島嶼星羅棋布，漁產向稱繁盛。

漁販挑售魚產，魚類繁多，久而盡識其名，並知其身價，亦爲人編成歌訣，也是一韻到底，計九百六十六字。供魚販邊識邊用。於今而言，須動物學專門名家，方能全部了悟。本人暴布於世，備供識者採擇而闡釋之。

### 魚名七言歌

魚名十寫七言歌，算去推來第一多。  
 東海黃魚西海鯢，寒鯪熱鱸味清和。  
 正月立春魚仔到，立冬赤鱸鮪魚多。  
 夏至青鱗無計數，秋分橫鯧浮滿河。  
 四季魚蝦多湧進，漁人共樂渭川歌。  
 古言近水知魚性，緣木求魚怎奈何。  
 浮沉結散須知識，扛抬括掙網釣拖。  
 馬頭紅魴沉海底，錢草青鱗浮浪波。

時來鮫鮓榕樹葉，沉水釘公唱歌婆。  
雞谷呼名牛屎鮓，海鱸儼若暗潛麼。  
黃花結窖成千萬，赤魚作湧起青河。  
稍鈎花鮓其不遠，馬鯨錫帶判無訛。  
公魚肉鮓黃池仔，白春脈口曬乾多。

笋仔淡乾真爽市，鯪尾報肚不爛籬。  
尖頭長腰到鮓舌，軟鱗霜靚透江河。  
打鼓花鮮鮓耳走，鮓魚艇仔跳船披。  
黃鮓到鮓老爺屨，石鈎火鱸石滑娘。  
青鯨布刀大眼鮓，石鮓烏鱸爛肉鮓。  
鱸白監乾西海鮓，三鬚中鮓海鯪歌。  
攸魚螺告吹銅仔，鮓鮓蛤蚧白鮓鮓。  
墨斗何堪登烹鼎，鮓魚帶子共燉波。  
海鱸海蚌沙魚鱸，魚鱸魚鱸蟻鼓螺。  
洋銅海哲大雞鮓，富人常用味如何。  
鈎鯪馬鮓搗魚餅，炒片沙魚爽口多。  
青鯪鮓魚潰粉醋，撓酸羌鬼八爪婆。  
食生崇鱗古釘鮓，肉鯪黃魚第一科。  
蘿蔔切生粉絲漂，白糖麻肉熟油和。  
料酒燉燒尋好醋，去醒香杭莫遺訛。  
坭鮓盲雞蒸豆豉，陳皮少許味調和。  
虎徑煲湯買正菜，籠魚釣口及香螺。  
青班獅頭烏背仔，鱸魚鶴鯪山豬歌。  
金鼓花身多苦味，肉淡竹鱸並海河。  
燕斗鮓魚煮鹹菜，鶴鱸鯪鮓亦同科。  
鮓魚赤眼烏牙齒，麥谷麻鱸紅澹儒。  
龍鮓蝦鮓花鮓仔，鳳尾三角綾羅鮓。  
花雞鮓鱸曬脯料，箭頭鞋底括縵拖。  
跳腳鮓歌企石角，鮓鮓鯪雄奔浪波。  
烏羽鈴飛黃板跳，走鮓花仔並擲歌。  
白蝦淹糟勝狗耳，鮓鮓地脯曬乾多。

屎雞蝦跡鹿花蟹，沙蚕沙蛤嫩心螺。  
蝦米陳村真爽市，蝦糠狗蟹上博羅。

青鸞上灘五六月，紅螺猶云赤灣多。  
沙雞莫作黃雞食，高蝠似乎矮蝠螺。  
白鱗鯉魚如水獺，海豬海狗海牛多。  
軟乃鷓鴣海雞鴨，恰似湖裡鴈高鵝。  
鼉鱘一聲雷霹靂，江鯨吠浪起風波。  
鰓鰓強湧鯨魚強，鯨吞百物及江河。  
海鰓雖大無驚懼，紅鱸求鯉孝心多。  
鰲魚湧水千層浪，鯤化鵬飛萬丈高。  
潛龍得雨非凡物，老蚌含珠月吐娥。  
文極收鯉今既逝，韓文祭鱘息風波。  
仲由曾與鮫魚戰，靈公起禍解鼉鼉。  
蘇軾攜爐遊赤壁，王祥求鯉孝心多。  
莊周活鮒西江濟，子陵灘釣老煙波，  
東海釣鰲任公子，伏羲結網世猶歌。

虞舜取魚登帝位，姜公釣罷佐山河。  
孔聖不網仁發見，釣臺空築淮安坡。  
海瑞製縶尋母骨，屈原魂在汨江灑。  
火帝女游東海溺，昭王巡楚夢南柯。  
失靈崖門因國患，乘桴浮海是如何。  
濟川舟楫恩誰報，得魚忘筌世人多，  
陋網裝魚魚躍出，困中生意意如何。  
遠遊勿吞漁父餌，潛藏豈躍聖船坡。  
遊在釜中生不久，安能吸月樂煙波。  
燒尾禹門今不再，漁人換酒渭川歌。  
不脫蓑衣醉月臥，醒來開艇又漲灑。  
三冬寒雪非知冷，樂在其中海外歌。  
水面蛋家爲祖業，民間供祭海鱗多。  
珍饈海錯歸皇國，食前方丈味如何，  
扁舟漂泊雲消客，不著洋裘自在多。



## 三、白菓（菜）馬齋歌

此首係小菜販所集各樣菜名的歌訣，全詩最長，達一千七百二十二字。包括乾、鮮、葷、素、禽鳥、魚蝦、蔬菜、水果，各樣俱全。其附有注音者，當亦收載，惟其注音皆本之於粵省土音。正足代表小菜販子特有文獻，可謂既專門，又確定，並亦十分稀珍。

## 白菜馬齋歌

白菜馬齋煲瘦肉，荳芽荳角炒豬腸。  
 芥蘭苦蕒音陌蓮藕爽，紫菜沙梨白蔗涼。  
 檸檬香丸桃李白，荔枝龍眼桔呈黃。  
 枇杷橄欖菠蘿大，烏檢椰皮梓音勃系香。  
 菱角香荪皮壳薄，葡萄音滿桃白柚音六味甘長。  
 芡瓜枸杞葡提子，酸薺黃柑菜豆秧。  
 丹桂海棠堪玩賞，茶藤音塗眉茉莉遠聞香。  
 牡丹芍藥花標綴音至，槐音懷杏金錢蕊音曼大方。  
 夜合水仙胭脂粉，繡練白竹紫薇郎。  
 金嬰音英楊柳天葵秀，含笑雞冠指甲紅。  
 蘭菊花枝遲早發，前春羅蕊蔓芬芳。  
 鳳仙梔音支子芭蕉耍，萱草莖莆艾葉長。  
 最愛杜鵑音根梅子熟，唔嫌百合石硫黃。  
 木棉桐音扇樹生極音亞杈音驗，牛乳榕莖音根有汁漿。  
 赤蘆祖音子稜音凌春不落，烏春泉校大楓香。  
 梧桐苦棟稍尾細，枕柳棠棟節椽光。  
 蘇木赤皮青毛槭音七，楸楓樟樹好包桑。  
 松堅柏硬葉尖小，棕矮楠槁根大長。  
 霜構音勾起鹽酸味好，蓖麻結子榨音榨油黃。  
 甜蘿紫竹多高矮，筍葉麻斑有短長。  
 竹樓音樓煙筒燻音單節滑，蓬音馮龍音隆菜藪音門槽音達藤狂。  
 篩茅竹筆極杈音亞藤音藤，赤蕨音結蒼音蒼莖割草場。  
 花木菜蔬俱辦妥，蟲音出魚鳥獸又推詳。  
 拋來錫帶鮑馬子，括音括起青鯨赤蠟嘗。

馬鮫劍魴魴鋪鯢，螞蟥青蠶蟹螺蚌。  
 青鱗鱖鯉黃尾血，鎗鯨鱧鯪鯪鯪鯪。  
 竹漸黃鮎鰻魴仔，鱸花沙鑽鮑魚湯。  
 魴鱗鱖鯪魴鯉鯉，魴音彭鮎音皮鮎魚鱖鱖鯪。  
 鮑魚帶子燉燉食，蛤埔河純煮熟嘗。  
 鱧白刷音羣生尋酸醋，蝦蟇麻字剝音博骨燻音燻糟羌。  
 鹿音來標免走猿音袁猴音侯趕音祥，豺叫狼飛捕狗狂。  
 班豹音根貌貅獠音皮休宜獠抵，熊音容貍音嘉效狗獵綿羊。  
 驪騾驢音墟子馱音背重走，猛虎麒麟是獸王。  
 水獺狐狸牙爪音早利，兕音西牛獅象角蹄長。  
 黃麋音驚彪音標麋音射雙飛走，貂音刁鼠貉麋音履踏地行。  
 驢音幾馬韃音籠頭連踏蹬，駝音托駝音陀鞍音安鞞音鞞帶勒音空。  
 貓公捉鼠搯音搯牆過，肥狗剛難睡路傍。  
 牯音古犛音扶馬牛嶺上放，公梅音母鵝鴨棲欄養。  
 鴉鴉鴉鴉同花鴉音科，孔雀山雞似鳳凰。  
 鴈音岸鴉音要嘴尖驅音巨布谷，鷓鴣毛好賽音睡鴛鴦。  
 黃鸝音宜鷹音麻雀身腰小，翡翠音非翠音醉鴛鴦歌頭腳長。  
 鴉鴉音龍百鴉音勞尋蜆音蠟食，鴉音料鴉音屯白鴿音甲挪蟲嘗。  
 鴉音鴉鴉音零燕子非鴻鴈，鳧音扶鴨大鵬豈鴉音路鴿音倉。  
 白鶴音琴畫眉籠上宿，鷓音墟鷓音悲鴉音實鴨水中藏。  
 鴉音干鴉音罪老鴉音亞合卦鴉音必，山雞鸚音笑鴉音武住嶺崗。  
 黃蜂音非蜜子探花採，土蜆音即蚯音丘蚓音引鑽地行。  
 蚊蝶蜻蜒江上舞，鳴蟬蟋音引蟀音戌樹吹涼。  
 打蠟音腫蛇蟻音義蟾音蟬蝻音而走，捲音拳藪音門蠶蛾蚊子場。  
 草蜉音孫蟲咬笋音損節，蚶音干蟬音卑狗虱音失吃癢音癢音癢。  
 蜘蛛結網蝙蝠音扁蝠音婆出，壁蟻沿音元籬谷蚌音注上。  
 螺贏音果裸俗言燕鳳子，蜈蚣惡過蠹音故毛蟲。  
 烏蠅音仁蛆音支數蜘蛛背，蠅音鹿蝻音狂字蚊蜚蟻音階蟻音那傍。  
 水並難支何有血，蛔音回虫牛蚊音播本無腸。  
 笋音損蝨音考蠹音妙虫沒樹森音林，鳥鶻音枝魚餌音利放結防。  
 索結繒網船中物，惺蓆桅杆艇仔藏。

檣槳舵橈綽緯好，弓蓬艙蓋纜篙竿。  
 白槽三板高尾艇，大座洋船番鬼行。  
 艖音跳板檣音齊俱要好，槳園音木檣環要關防。  
 艖船兵卒巡邏音羅轉，漁艇音聽家泊音柏岸上。  
 海面生意難過日，墟街鋪音踏賃音任間房。  
 刷音通豬海內鬃音宗膠音果膠音奈，割音滿狗肥腓腎肺腸。  
 乾音干濕付皮都賣盡，咸鮮灰蛋音旦盡消行。  
 照標音果取貨肩擔走，販音飯客音那簿音那找數尾。  
 石斗升筒須較準，厘毫絲忽莫來強。  
 舫兩秤尺憑瑪戩，多少價錢問客商。  
 銛音舌本聽音提銀時運定，現交賒音差借細思量。  
 除收尚欠分明算，兌完拆妥義情長。  
 一年四季皆旺相，金銀萬貫帶回鄉。  
 讀書士子甚排長，筆架書櫥連界方。  
 墨硯筆筒兼水積，燈擎音迎書夾併籠箱。  
 水池水筆金剛鑽，卷扎燈挑書布長。  
 龍東梅紅寫書帖，貢川白紙抄文章。  
 讀書聲說惟清亮，學字騰紅要大方。  
 斜歪直橫皆字醜，點勾伶俐是端裝。  
 最嫌潦草懶尸音詩樣，只怕糊塗筆畫長。  
 磨濃墨水燥蕪濕，糊窗紗紙照來光。  
 註簿音那騰冊音揮科場事，貼對黏音嚴聯書館堂。  
 膳米菜儀供師長，探花榜眼狀元郎。  
 至若女人勤學績，耕麻打葛種苧長。  
 破勾音云麻音頰擘音那丟音刁去，績得熟紗好幾團。  
 染好烏藍三塔靛，織絨綿熟賣街坊。  
 褂袍襖衲裙衫褲，赤白青紅黑綠黃。  
 蚊帳單被連匝蓆，毳音起條音担子併籠箱。  
 潮藍江青真白蘭，小絨嗶嘰上鶴黃。  
 褐片山東漢府緞，織絨哆囉共程鄉。  
 洋貨絲綢真實價，長短精粗丈尺量。  
 兜肚瓜巾腰帶好，風領背塔代裘長。

耍音合衣綉紗學新樣，套褲時興練外江。  
 看著農夫辛苦日，傢音家生田器應宜時。  
 水車音后蠶杓水戽音付斗，禾籠禾押禾鎌鉤。  
 鬥穩犁耙來鈔音地，勿斷轆音員壁費心腸。  
 蓑衣箬音箬笠油紙傘，犁耙碌礮脚鋤榔。  
 籬音畫篾擋鈹牛軛曲，禾杈挑稈擔杆長。  
 鐵錘釘鋤鑿嘴斧，圓籃遍篋糞箕藏。  
 鋤坭挖石通溝澀，築坡開圳蔭田莊。  
 鉛音元鐵銅礦音沉爐炭鑄音注，鋸鉋刨鑿屋廳堂。  
 瑪瑙珍珠和玉石，珊瑚琥珀出人間。  
 銀髻頭鈹連手鈹，女人穿帶套雲肩。  
 簪頭銀鍊垂雲髻，上下欄齊及耳環。  
 更有蚊蝶燒青色，花簪龍鳳盡鋪金。  
 戒指響鈴銀針鎖，嫁妝首飾音失件般真。  
 打整棹凳棕籠櫃，椅音兩棹音卓琴絃枕梳篦。  
 水晶眼鏡玻璃盞，磁器盃盅酒瓶埕。  
 碗箸鍋頭兼飯甑，水缸盆桶鉢齊全。  
 飯撈鐵鑊筲箕杓，半壁捷音隨挽音完吊鮮魚。  
 糯粘早谷洗泥望，稻梁鴨粟麥滿田。  
 碓舂礮磨篩還籬音背，石斗升筒粒粒圓。  
 挑糞掏音刀飯香流頰音尖，勝過醇音純膠音交醉入腸。  
 頭場二命三風水，做屋當尋好住場。  
 揀日豎音受符牆脚起，上梁立向定廳堂。  
 買磚打石灰砂便，錐音連鑿音昨杉桁棚板榜。  
 擔石搬音般坭坭底起，外邊四面築音竹圍牆。  
 迴音回廊廚灶間房止，開井應宜避靜方。  
 書樓食飯君賓客，琴棋簫笛鼓樂嚙。  
 案棹仙爐薰几席，生熟名煙茶餅嘗。  
 姊妹大姑爺丈姐，共通親戚賀華堂。  
 花園數座共遊玩，金菊芝蘭噴鼻香。  
 丹桂籬音色薇衣換彩，芙蓉夜合牡丹芳。

有時紅並桃花盛，指甲長春粉蝶忙。  
彼此金豬身該論，除收尚欠重勛兩。  
出入使開工費正，多取煩蒙由客商。  
又另兌完清結淨，緊急千祈要妥當。  
雜字萬般寫不盡，且將家物略抄詳。

#### 四、魚蝦湧進大多之心

這是一份魚類名稱單，較簡明單純，只便於魚販識記。題目為原件所有，非後人所加。雖然只是單紙數頁，同樣是稀見難得。可確信其為魚販專用，故當提供學者採擇參考。俾以看到漁民應用知識。

黃魚。鯢仔。白鮰。赤鮰。魚仔。鮒魚。青鱗。橫鱈。蝦公。馬頭。紅魴。鮫鮓。榕樹葉。釘公。唱歌婆。雞谷。海鱸。黃花。赤魚。稍鮑鮑。池仔。馬鯨。公魚。肉鮓。白春。脈口。笋仔。鯪尾仔。報肚仔。尖頭仔。長腰仔。到鮓。軟鱗。霜鮓。打鼓。花鮮。鮓魚。黃鮓。到鮓。老爺屨。石鮑。火鱈。石滑娘。青鯨。布刀。火眼鮓。石鮓。烏鯪鮓。爛肉鮓。鱈白。海鮓。三鬚公。海鯪。攸魚。螺鮓。吹銅仔。墨斗。鮑魚。帶子。海鱈。海蚌。沙魚鱸。魚鱈。魚春。螺鼓。洋銅。雞鮑。鮑鯪。馬鮓。沙魚。青鯪。鮑魚。羌鬼。崇鱗。古釘。肉鯪。坭鮓。盲雞。虎徑。香螺。石班。烏背。山豬歌。金鼓。黃鱈。海河。鮓魚。鶴鮓。鱈絡。鮓魚。赤眼。烏牙齒。麥谷。麻鱈。漁儒。龍鮓。蝦邊頭。花鮓。跳腳鮓。鮓鮓。鯪雄。烏羽鮓。黃板跳。走鮓。花仔。擲歌。狗耳。鮓鮓。地鮓。花蟹。蝦米。青鯪。沙雞。黃雞。白鱗。鯪魚。水獺。海豬。海狗。海牛。海鴨。鮓鮓。鯪魚。海鯪。鯪魚。鯪魚。

#### 五、小商販記帳蘇州碼教材

在此五種資料中，只有此數字表的題目係本人所加。前載之四篇，原稿皆自有題目。於此特須說明，以便使用者放心。

這裡一篇蘇州碼字譜，此是二十世紀以前中國商販普遍使用的記數數





檔案與研究

## 英國檔案所見蘇俄與孫中山及國民黨的聯繫

李丹陽·劉建一\*

關於蘇俄、共產國際與孫中山及國民黨（中華革命黨）的聯繫，目前已有許多中外學者撰文予以詳述，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但是，就筆者管見所及，發現不少專著、論文雖利用了中、俄、美、日、法等國檔案，但迄今為止，卻幾乎無人充分利用英國有關檔案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其實，英國檔案可資利用者甚多，這是由於英國作為在中國經營最久的老牌殖民國家，其在華租界地的管理部門、情報機關及駐各地領事館都比較健全；自俄國十月革命後，為了防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阻遏布爾什維主義蔓延，這些機構對中國革命領導人孫中山先生的動向，特別是他與有布爾什維克嫌疑的俄國人和其他歐亞人士的接觸予以嚴密監視，甚至試圖通過郵政系統檢查孫中山等人的通信。

星移斗轉，時過境遷，當年許多關於孫中山及國民黨人與蘇俄人士接觸往來的報告現在靜靜地躺在位於倫敦泰晤士河畔的英國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那裏收藏的檔案中記錄的不少相關事情是以往出版的有關文獻資料、專著和論文從未提及的，有的記載則可以給已知史實提供進一步的證據或補充詳情。以下僅就筆者查閱到的有關檔案做一介紹，同時結合其他資料和現有研究成果提出一些見解。由於本文是就英國檔案記述的事情為線索來討論問題，不打算面面俱到，還望讀者諒解。<sup>1</sup>

\* 李丹陽與劉建一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歷史研究。自 1989 年以來，李丹陽先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史系、劍橋大學東方學院和約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當訪問學者；劉建一曾為劍橋大學東方學院訪問學者，後在英國約克大學政治系取得博士學位。

<sup>1</sup> 如大家所熟悉的維廷斯基（G. N. Voitinsky）、馬林（Maring）、達林（S. A. Dalin）等人與孫中山的會面，在此不贅述。

## 蘇俄與孫中山及其政黨的最初聯絡

列寧很早便對孫中山及其政黨非常關注，曾稱孫中山為「充滿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認為國民黨在中國是代表進步一方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政黨。<sup>2</sup>蘇維埃政府成立不久，便希望「盡一切可能把亞洲的民主派吸引到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中來」；1918年初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在一個指令中把孫中山領導的南方政府說成是「進步的」。<sup>3</sup>

早在1918年，當列寧收到孫中山寄來的信後，便試圖從參加過十月革命的旅俄華工中「找一勇敢的人與孫中山建立關係。」據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東方司司長沃茲涅先斯基(A. N. Voznesensky)透露，1918年底確有一名「可靠的人」被派赴廣州遞交契切林(G. V. Chicherin)代表蘇俄政府給孫中山的覆函。<sup>4</sup>雖然後來孫中山否認曾收到過契切林1918年的信，但他在1920年初卻告訴波塔波夫(A. S. Potapov)，他於1919年5月底就收到了那封信。<sup>5</sup>鑒於1919年1月有大批曾當過紅軍的旅俄華工返國，有的還攜帶鉅款，<sup>6</sup>擔負送信與聯絡任務者可能混在其中前來。

幾乎與孫中山收到蘇俄方面來信的同時，從上海傳出消息：「列寧政府派遣密使一人與孫洪伊會見。孫洪伊亦有派遣密使於列寧政府之形迹。」<sup>7</sup>孫洪伊當時是廣州護法軍政府的駐滬全權代表，同他接觸便是與孫中山

<sup>2</sup> 見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中國各黨派的鬥爭〉等文章。

<sup>3</sup> 引自 B. A. Elleman, "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Modern China*, 1995, No. 4; Leong Sow-theng,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 p.33.

<sup>4</sup> Lydia Holubnychy, *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5*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9), pp.137-138.

<sup>5</sup> 見〈波塔波夫給契切林的報告〉，《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文件集，卷1，第7號文件。波塔波夫1920年4月底便離滬，故孫中山同他談話不可能提到1920年5月的事。

<sup>6</sup> (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二)《俄政變與一般交涉》，民國8年1月24日，〈收俄使館節略〉，頁22。

<sup>7</sup> 見1919年6月20日上海《民國日報》所轉載的日本報紙《上海日日新聞》的消息。孫洪伊派的信使可能是朱齋生。朱為山東人，少時在俄國屬地長大，通俄語，又參加過國民黨人領導的濰縣地方革命，曾為孫中山與蘇俄之間的聯絡往返中俄多次。岡野增次朗：《吳佩孚》，1939年出版，頁370。



的南方政府聯繫。儘管孫洪伊登報否認此事，當年 8 月的英國情報卻明確記載，孫洪伊正試圖找一個使者去見列寧，後來又報告謝英伯與孫洪伊同為與蘇俄方面談判的代表。<sup>8</sup>這就是說，孫、謝很可能代表南方政府同來滬的蘇俄密使進行過初步會談。

目前很難確定誰是會見孫洪伊的蘇俄密使，因為那一時期蘇俄派來上海的人不少。新疆省長楊增新 1919 年曾報告：「莫斯科列寧政府派重要人物赴上海，敦請中國重要人物。」<sup>9</sup>上海工部局及駐上海英國情報局也記載了一些蘇俄人士到滬的情況，其中僅在 1919 年 4 月同抵上海的就有霍多洛夫 (A. E. Khodorof)、<sup>10</sup>托爾斯托夫 (Tolstoff)<sup>11</sup>等四人。時在上海的美籍俄人索科爾斯基 (G. Sokolsky) 晚年回憶說，在五四學生運動高潮時的 5—6 月份，一個名叫波波夫 (G. M. Popoff) 的人從蘇俄來上海。<sup>12</sup>根據英國檔案，波波夫早在 1918 年春即首途來華，1919 年已是第二次到中國了。他早年曾在彼得格勒學習過中文，能講中國話。<sup>13</sup>筆者認為，波波夫於 1919 年 6 月與孫洪伊等國民黨人會談的可能性較大。

1919 年 11 月末，中國報紙登出路透社電文：「蘇俄過激派曾致函中山先生促其發起勞工運動。對此，孫中山馬上予以否認。」<sup>14</sup>當月初的英國情報部門也報告了類似消息：「最近一名蘇俄使者帶信給孫中山，敦促他在中國進行一場蘇維埃式的革命」；同時指出，負有布爾什維克使命的一名日本人、一名韓國人和五名中國人最近由俄來華造訪了孫中山，並且偵知孫已經通過自己的秘書與布爾什維克黨在西伯利亞的總部建立了聯

<sup>8</sup> FO 228/3211, August 1919; FO 228/3140。

<sup>9</sup> 《中俄關係史料》(九)《新疆邊防》(民國 6—8 年)，頁 300。

<sup>10</sup> 後來他建立了羅斯塔北京分社，並擔任經理。詳情見筆者寫的〈霍多洛夫與蘇俄早期在華通訊社〉一文(未刊稿)。

<sup>11</sup> 此人為上校軍官，曾與共產國際駐華聯絡員維里傑 (S. L. Vilde) 同住一舍，1923 年初從蘇俄使華 特命全權代表越飛 (A. A. Joffe) 那裏領取過大筆活動經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警務日報》，1923 年 1 月 25 日報告，藏上海檔案館。

<sup>12</sup> “The Reminiscences of G. Sokolsky,” dated 1956 and 1963,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sup>13</sup> 筆者曾寫有〈早期來華的蘇俄重要密使——波波夫〉專門談波波夫的幾次來華及其活動。該稿刊於《中共黨史研究》，1998 年，期 5，出版前已被大幅度刪改。

<sup>14</sup> 上海《民國日報》，民國 8 年 11 月 26、27 日。

繫。<sup>15</sup>那一時期，在俄國參加了俄共與紅軍的華人和韓人來華者甚多，如參加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工作的韓人社會黨總書記朴鎮純就是 11 月抵滬的。這些人中如有個別銜命同孫中山聯絡，當不足為奇。不管孫中山此時同蘇俄、共產國際建立聯繫與否，有關英國情報顯示，其後孫中山對蘇俄發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諸如衆多華工參加紅軍，蘇俄訓練印度人從事反英鬥爭等情況非常熟悉。

### 孫中山接見布爾什維克代表波波夫、波塔波夫

到 1920 年春，當蘇維埃政權已稍鞏固，紅軍揮師東進時，關於蘇俄與孫中山聯繫的報告漸多起來。英國在上海情報部門 3 月底的一份報告說，兩名來自海參崴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最近訪問了孫中山。<sup>16</sup>現在知道，報告中說的那兩名布爾什維克代表很可能是波波夫<sup>17</sup>和波塔波夫。據當時常至孫中山寓所的索科爾斯基給美國駐滬總領事的報告，會見孫中山的波波夫上校持有阿穆爾地區布爾什維克部隊司令的介紹信；波塔波夫將軍雖然沒有委任狀，也擺出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樣子。波波夫的情況有如上述。對於波塔波夫，英國情報部門獲知他是一位前沙俄將軍，俄國革命時率先舉義，轉為蘇維埃政權服務。1919 年底，他因在日本表現出「革命傾向」，被要求離境，遂從東京來上海。<sup>18</sup>據波塔波夫自己後來給契切林的報告，他在上海期間同孫中山「過從甚密」，而且關於他與孫中山會談的內容亦有不同的記述。由此可以判定，波塔波夫不只一次地拜訪過孫中山。

無人否認波塔波夫將軍為蘇俄政府工作這一事實，但有的學者對他是否有蘇俄政府代表的身分問題尚有質疑。1920 年 5 月，據英國有關機構從曾在高爾察克手下任職的卡特佐夫 (Kartsoff) 中將處所獲的情報，波塔波夫是一名布爾什維克，正在為蘇俄政府工作，已經在橫濱、上海和馬尼拉建立了工作機構。<sup>19</sup>波塔波夫的活動似乎偏重於情報聯絡。在滬期間，

<sup>15</sup> FO 228/3211, 2 November 1919.

<sup>16</sup> FO 228/3214, 25 March 1920.

<sup>17</sup> 上海檔案館藏的有關檔案只記載了波波夫 1920 年 7 月來華後的活動。參見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頁 55。

<sup>18</sup> FO 405/228, No. 157; 228/ 3211, May 1920.

<sup>19</sup> FO 405/228, No. 157; 228/ 3211, May 1920.

他住在法租界的一家旅館，很少出門。但每天都有許多來訪者，其中有俄國人、朝鮮人和被認為是孫中山手下的廣東人。<sup>20</sup>最能顯示波塔波夫將軍與蘇俄政府非同一般關係的，是一些布爾什維克代表抵華後，逕直去找波塔波夫。並且在上海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人員竭力通過他與蘇俄政府聯繫。經由波塔波夫推薦的臨時政府代表韓亨權到莫斯科後，列寧等蘇俄領導人不僅接見了他，還允諾撥款二百萬金盧布支援韓人反日獨立運動及共產主義運動。<sup>21</sup>試想，如果波塔波夫不代表蘇俄政府的話，那麼，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代表不可能通過他的一紙介紹而得到蘇俄政府的破格接待，並取得鉅額資助。

波塔波夫和波波夫在同孫中山見面時，向他介紹了蘇俄的情況，勸他學習布爾什維克黨的辦法進行中國革命，要他公開聲明表示歡迎加拉罕宣言，還贈送了蘇維埃憲法等英譯小冊子。可是，孫中山在談話中屢次表示不相信在俄國能成功地推行共產主義，拒絕公開表示擁護加拉罕宣言，並且不願托波塔波夫帶給蘇俄政府任何書面東西。而當孫中山向這兩個俄國人陳述了他試圖以武力佔領華南，並進而攻打北京的軍事計劃，表示希望得到蘇俄的支援時，也被蘇俄代表所婉拒。<sup>22</sup>雙方顯然沒有談攏。但是孫中山還是應波塔波夫要求幫助他去漳州見陳炯明，並讓廖仲愷和朱執信代表他和國民黨與蘇俄方面作進一步的商談。

## 波塔波夫的漳州之行

1920年4月22日，波塔波夫與一名俄國婦女芮恩費爾德太太 (Ms. Reinfeld) 乘 Hang Sang 號輪離滬，聲言前往香港。但波塔波夫沒有直接到港，卻神秘地到漳州訪問。1918年8月，當由陳炯明統帥的援閩粵軍取得軍事勝利時，在莫斯科的一些人視之為在中國南方進行的蘇維埃革命的

<sup>20</sup> FO 228/3214, 18 March & 8 April 1920.

<sup>21</sup> R. A. Scalapino & C. S. Lee, *Communism in Kore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17; 宣德五、張明惠譯，《金九自敘傳——白凡逸志》（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1994年），頁204—205。

<sup>22</sup> 參見美國國務院檔案 USDS 761.93/142; USDS 893.00/3376; 「波塔波夫給契切林的報告」，《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文件集，卷1，第7號文件；C. M.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頁115-116。

開端。<sup>23</sup>從此蘇俄對這塊以漳州為首府的、被孫中山倚為「根據重地」的閩南護法區密切注視，據說，有人從汕頭不斷向莫斯科報告閩南護法運動的動態。<sup>24</sup>

在談及波塔波夫的漳州之行時，有人認為他是到廈門下船，然後再前往漳州。其實，波塔波夫此行的路線遠比人們想像得複雜，不是走從廈門到漳州的近路，而是繞遠道，於 25 日先抵達汕頭。<sup>25</sup>他與一名瑞典女子密徹瑪克太太 (Mrs. Michemach) 住在當地的 Astor 飯店，並與數名中國人和韓人會合。<sup>26</sup>陳炯明的一名代表早已在汕頭恭候，同他們會見後，一同前往「閩南的俄羅斯」——漳州。他們的行動十分隱密，以致英國駐汕頭代理領事直到 5 月 7 日還以為波塔波夫仍在汕頭，駐廈門領事 14 日才報告他們一行在漳州活動。

波塔波夫來到漳州後，見到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及在漳參贊戎機的廖仲愷、朱執信等國民黨領導人，面遞列寧親筆信，並向他們介紹了俄國經驗。雙方密談多日後商定：蘇俄將幫助粵軍建立一所軍校和一座軍工廠，如急需，還可將儲存在海參崴的軍械供粵軍使用；閩南方面則要向蘇俄提供食

<sup>23</sup> Leong Sow-theng,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 p.132。

<sup>24</sup> 肖林在〈列寧致函陳炯明的動因和影響〉一文中說，從事報告的是 1917 年下半年俄國設在汕頭的領事館（《福建黨史月刊》，1990 年，期 12）。實際上 1920 年 9 月以前，俄國在華的使領館都屬原沙俄和俄國臨時政府。雖然如此，筆者不排除舊俄領館有人為蘇俄工作的可能性。另，英國情報曾報告，一個在汕頭海關工作有俄國血統的湯普森 (F. W. Thompson) 於 1918 年宣佈放棄美國國籍，改為俄國國籍，同時更名為米庫林 (G. I. Mikulin)；該人懂俄、中、英文，曾因在汕頭向中國人宣傳布爾什維主義和一次攜帶二千金盧布而引起懷疑。後來發現他是根據來自《上海生活》報社的指示工作的。(FO 228/3211, November 1920; April 1921)。如此看來，米庫林也可能向蘇俄報告陳炯明部隊動態。

<sup>25</sup> FO 228/2987，英國駐汕頭代理領事 1920 年 5 月 7 日的報告。

<sup>26</sup> 梁冰弦回憶說：「V 將軍」與隨員五人同來漳州，黃凌霜亦從北方趕來作翻譯。（海隅孤客，〈解放別錄〉，香港《自由人》雜誌 1951 年 11 月—1952 年 1 月連載）據陳炯明的參謀陳其尤的回憶，路博將軍一行包括朝鮮籍趙姓翻譯及一瑞士籍婦女。（〈1919 年蘇聯派第一個代表到漳州〉，《文史資料選輯》輯 24）。英國檔案記載在閩南陪同波塔波夫的是一位瑞典 (Swedish) 婦女，並說她可能是瑞典駐彼得格勒公使的女兒。檔案還顯示，隨行者有四名韓國人，內有呂運亨。(FO 228/3211, May 1920; FO 228/3214, June 1920; FO 228/2987, 26 May 1920) 雖然英國人可能把有的中國人也當成韓國人了，但關於呂運亨的記載與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通報》中的記載是一致的（即李玉貞音譯為「劉雲恒」者）。陳其尤說的趙姓翻譯可能是參加過《救國日報》編輯部的趙東祐。

物救助。商談結果曾寫成一「談判紀錄」，由雙方簽了字。5月10日，當波塔波夫即將離開漳州時，陳炯明交給他有自己簽字的「致列寧的信」，信中不僅說所有中國人民都對加拉罕宣言「充滿了極大謝意」，還表示深信「布爾什維主義將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自己要「盡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這一制度」。波塔波夫如願以償，他在孫中山那裏沒有得到的東西，在陳炯明這裏都得到了。信帶回莫斯科後，蘇俄方面對陳評價自然非常高，甚至稱他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sup>27</sup>

甫離漳州，波塔波夫經廈門抵香港。在那裏他又會見了南方政府大本營總參謀長李烈鈞，拿到了李的「告蘇俄人民書」。港英當局警官報告了波塔波夫5月13日抵港的情況，並說他在港勾留數日後，因無船赴歐準備返滬。<sup>28</sup>又據俄國檔案披露，波塔波夫5月22日加入了大同黨，因大同黨總部在上海，這就引出了波塔波夫究竟是否再度到滬的問題。<sup>29</sup>不少人認為波塔波夫是經海參崴返俄的。但其護照上的簽證顯示，他的行程是準備從香港換乘船走海路經蘇伊士運河由南俄入境的。據英國一些殖民地的有關部門報告，波塔波夫6月11日乘「教授號」海輪抵新加坡，之後又繼續乘該船經科倫坡和塞得港入歐，<sup>30</sup>可見他經海參崴返俄之說是無根據的推測。波塔波夫於1920年秋抵俄後，曾向有關部門詳細彙報他在中國的活動，發表有關文章，並繼續為紅色政權工作。<sup>31</sup>

<sup>27</sup> 參見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通報》，1922年，期1-2合刊。

<sup>28</sup> FO 228/2987, 17 May 1920。

<sup>29</sup> 李玉貞在俄國檔案中看到波塔波夫的大同黨黨證上的日期為1920年5月22日，參見她所著《孫中山與共產國際》，頁57。由於英國檔案沒有波塔波夫再返上海的記載，並且5月17日的報告說他仍在香港，而6月11日他就到了新加坡，在此期間赴上海時間似嫌緊迫。所以，波塔波夫有可能在香港收到大同黨寄來或送來的黨證。

<sup>30</sup> FO 228/2987, 17 May 1920; FO 228/3211, May 1920。

<sup>31</sup> 新近出版的 *ВКЛ (b), Коми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4, 卷1末的人名索引有 A. C. 波塔波夫的簡歷(頁745)。也許是巧合，有一名為 N. M. Potapov 的前沙俄將軍，二月革命後任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在十月革命時也公開轉向擁護蘇維埃，後來亦充任蘇維埃政府的海外間諜。他曾於1922-1927年按照捷爾任夫斯基(F. E. Dzerzhinsky)的策劃，陪同一國家政治保衛局(GBU)間諜出國，打入、破壞海外由原沙俄軍官組成的流亡組織。參見 R. P. Browder & A. F. Kerensky 編,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848; D. V. Lehovich, *White against Red* (New York: Norton, 1974), p.429 此兩個波塔波夫之間(以及他們與在沙俄時擔任過秘密警察機關頭子的波塔波夫將軍)有什麼關係待考。從 N. M. 波塔波夫將

## 與孫中山接觸的俄僑

當孫中山在 1919 年至 1920 年間居上海時，曾與一些俄僑有過接觸。當時在滬的俄僑雖然大多數是因仇視布爾什維克而逃到中國的白俄，但也不乏同情社會主義的革命者，甚至有在高爾察克白衛軍和外國干涉軍佔領西伯利亞期間從那裏撤退或逃亡來滬的俄共黨人和紅軍軍官。一批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俄僑先後成立了「俄國勞動社」、「俄國民主俱樂部」和「俄僑事務局」等團體。這些團體的負責人有的在為蘇俄利益工作，有的本身就是俄共黨員，如 1920 年擔任俄僑事務局書記的考夫曼 (L. G. Kaufman) 後來從事共產國際和黨務工作。1920 年 2 月，一批同情俄國新政權的俄僑在上海開會，與會者建議與孫中山等知名的中國人聯絡，以讓他們參與抗議日本在西伯利亞的侵略行徑。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會議上，重要的提議人是 1918 年加入俄共，參加過內戰並畢業於工農紅軍軍事學院東方系的鮑良克 (V. E. Poliyak) ——當時人們只知道他是一個裁縫。<sup>32</sup>

曾任上海俄僑事務局負責人的瑪特維也夫—鮑德雷 (N. Matveev-Bodryi) 於 1919 年底和 1920 年初兩度拜訪孫中山的事已為人所熟知。除此之外，1920 年 3 月的英國情報還報告了數名在上海的俄僑於不久前訪問過孫中山，其中一人是俄籍猶太人蘭頓 (D. A. Lunden)。蘭頓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畢業生，俄國革命後曾到彼得格勒活動，結識不少政要，後在海參崴任《泰晤士報》通訊員。1919 年他剛來滬時還持既反對布爾什維克又反對高爾察克政權的中立立場，到 1920 年初就追隨鮑良克等人站到蘇俄立場上了。據說，蘭頓面見孫中山時，曾與之進行了關於布爾什維主義宣傳的長談。<sup>33</sup>雖說非布爾什維克的蘭頓似乎不可能十分瞭解布爾什維主義宣傳，但孫中山請精通英文的蘭頓談談這方面情況還是有可能的，因為

---

軍的經歷可以推測，A. S. 波塔波夫在中國的工作亦可能受契卡領導，因為十月革命後不久，蘇俄曾利用了不少沙俄軍、警官從事這方面工作。

<sup>32</sup> FO 405/228, No. 157 附錄, FO 228/3214, 18 March 1920。此人後來經歷顯赫：1923 年隨越飛使團來華，又是鮑羅廷的軍事顧問小組成員，曾為黃埔軍校第一任首席顧問。

<sup>33</sup> FO 228/3214, 25 March 1920; FO 228/3214, 18 March 1920; FO 228/3216, 19 June 1920。據報，蘭頓曾向其他中國人宣傳布爾什維主義，並向擔任上海外交交涉員顧問的美國人莫斯 (Barnes Moss) 談論俄國事務和蘇維埃政府。

據說當時孫「對布爾什維主義的興趣日益增長」，<sup>34</sup>自然希望有所了解。

另一名與孫中山發生聯繫的俄僑是李澤洛維奇 (Jack Lizerovitch)。此人以前僑居英國，1917 年來華受雇於上海的英商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他與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一直保持密切關係，後來又同俄國布爾什維克建立了聯繫。大約從 1919 年起，他開始為蘇俄工作，與羅斯塔 (Rosta) 北京分社與《上海生活》及維廷斯基等人密切合作。<sup>35</sup>1920 年 6 月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共產黨人潘克赫斯特 (Sylvia Pankhurst)<sup>36</sup>致信李澤洛維奇，要他同孫中山聯繫，敦促孫為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而全力奮鬥。不久，孫中山便通過李澤洛維奇答覆潘克赫斯特，其回信大體內容如下：雖然本人對蘇俄甚表同情，但現在不便公開表明此種感情。因為根據目前的局勢，暫時需要依靠資本家階級共謀中國面臨的政治問題之迅速解決；但是，一俟可以不再需要資本家的幫助，就將在中國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工作。<sup>37</sup>此信表明的對資本家的態度，與孫中山同波塔波夫所談的資本家經常給予國民黨物質援助表達的意思相似，反映了孫中山當時準備依靠資產階級的援助先統一中國、發展實業，而後再圖實行社會主義的想法和計劃，以及他不願公開宣佈擁護蘇俄而惹惱西方國家的顧慮。

潘克赫斯特托李澤洛維奇向孫中山轉達的訊息不僅僅代表英國共產黨的意向，她的這一行動似乎還與當時蘇俄、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全盤打算有關，即推動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朝著他們所希望的社會主義革命方向發

<sup>34</sup> FO 228/3214, 25 March 1920。

<sup>35</sup> 關於此人詳情，筆者已寫有專門文章〈紅色俄僑李澤洛維奇〉（待發表）。

<sup>36</sup> S.潘克赫斯特是英國著名女權主義政治家 E.潘克赫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之次女，於 1898 年 16 歲時即參加英國獨立工黨，投身工人運動，1914 年創刊《工人無畏》並一直擔任其主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上堅決反對戰爭，並率先擁護俄國十月革命。1918 年她參與組建了「人民之俄羅斯情報局」。共產國際成立不久，她便與在英國的共產國際代理人建立了聯繫，並且代表共產國際到其他歐洲國家進行聯絡。1919 年 6 月，潘克赫斯特決定把自己建立的組織——工人社會主義者聯盟——更名為英國共產黨（第三國際英國支部）。潘克赫斯特曾直接與列寧通信，雖然她的絕然反對共產主義者參加議會和工黨的立場被列寧所尖銳批評，但她仍是共產國際所信賴的少數幾名英國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之一。1920 年 2 月她參加了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共產國際會議，不久又代表她自己領導的英國共產黨（與隨後成立的統一的英國共產黨並立）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因為從事革命活動，她曾多次坐牢。

<sup>37</sup> FO 228/3214, June 1920; FO 228/3211, July 1920; FO 228/3216, September 1920。

展。<sup>38</sup>爲此，共產國際要求所屬有關國家的共產黨協同行動。共產國際二大「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要求一些西方國家的共產黨有義務首先幫助該國所屬殖民地國家人民的鬥爭，做爲中國最主要殖民國家——英國——的共產黨，協助中國革命自當義不容辭。雖然這個決議 1920 年夏才正式通過，但共產國際早就定下這種方略。1920 年 2 月在潘克赫斯特出席的共產國際阿姆斯特丹會議上，對共產國際在歐洲的分局通過美國建立歐洲與中國的聯繫做出了特別安排。<sup>39</sup>此外，1920 年夏秋之交，與她的上述信內容類似的函件也從哥本哈根給李澤洛維奇寄來。而哥本哈根當時不僅設有一個共產國際的歐洲情報與宣傳品交換中心，還駐有負責與中國政府交涉的蘇俄外交代表李維諾夫 (M. Litvinov)。下面的敘述也將進一步反映出這種爭取與推動孫中山及其政黨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協同努力。

### 旅俄華人共產黨與孫中山的直接聯絡

1920 年 7 月 25 日，劉紹周奉蘇俄政府的旨意，以旅俄華工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名義，向孫中山發出電報，邀請他前來俄國。據說列寧同時也寫過類似電報。孫中山對這一邀請婉轉地回絕了。蘇俄政府與共產國際儘管對孫中山未能前來俄國感到遺憾，但仍對他抱有極大期望。是年 8 月載於《共產國際》的一篇文章指出，「孫逸仙對我們非常有價值」，因爲他是「正日益左傾的中國青年的領導」，必須「教他簡單、明瞭的無產階級在理論和政治鬥爭中的策略；使他能夠不僅同所有本國的舊的關係，並且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關係決裂，以便讓他堅定不移地採納共產國際的觀點。」<sup>40</sup>與此同時，加緊了對孫中山的爭取。

同年秋，隸屬俄共（布）的俄國共產華員局的一名負責人劉謙（俄文名費得羅夫）來中國，在上海與孫中山晤面，並與之達成軍事合作的協定。他在給俄共阿穆爾省委的報告中稱孫中山爲「中國著名社會主義者」，認

<sup>38</sup> 參見 M. Persits 爲新近編輯出版的《蘇俄的遠東政策（1920-22），檔案集》（俄文）所寫的介紹文章：“A New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1920-1922,”載 *Far East Affairs*, 1997, No. 5。

<sup>39</sup> 參見英國社會黨機關刊物 *The Call*, 1920 年 3 月 4 日第 7 版的有關報導。

<sup>40</sup> R. “The Situation in Eastern Asi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Moscow), No. 13. 據悉此文作者是一名朝鮮共產主義者。



為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大本營」，在國民黨勢力範圍內的華南「很容易傳播共產主義思想」。<sup>41</sup>在孫的介紹下，劉謙還見了其他若干國民黨領導人。英國情報機關對劉謙在華的活動瞭若指掌，有關報告說他由一名俄國人陪同於9月初抵上海，訪問了孫中山兩、三次，又去過天津。他還帶來旅俄華人給中國青年的信，大意為：在俄國的中國人正與蘇維埃武裝力量一同戰鬥拯救他們的國家，列寧允諾如果中國人做到認清世界大勢、加入社會主義者的行列、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掃清道路，放棄對其他外國的依賴的話，就將幫助中國。<sup>42</sup>陪同劉謙的俄國人大概是卡里諾夫(Karinoff 或 Karnoff)。據報導，此人懂中文，9月份來華時曾攜帶大筆宣傳經費，並與數名旅俄華人代表從天津一起來上海，訪問過若干中國領袖人物，並曾在法租界召集中國社會主義者開會。<sup>43</sup>雖然沒有明確講卡里諾夫是否見到孫中山，但他至少與旅俄華人一同拜訪過其他國民黨領袖人物。

孫中山對劉謙的訪問比較熱情，因為二者在用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軍事計劃上一拍即合。但他們的最終目標並不一致，孫中山和國民黨人對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事業遠非劉謙所認為的那樣熱心。

## 推動國民黨人組織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的嘗試

蘇俄、共產國際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與孫中山進行聯絡，不僅是要推動國民黨人與之建立反帝統一戰線，而且還希望孫氏率先在中國開展社會主義運動，並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

大約從1919年夏秋之交，當巴伐利亞和匈牙利蘇維埃相繼垮臺後，部份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認為歐洲革命暫時無希望，要把世界革命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亞洲。是年11月，在列寧親自出席的全俄第二次東方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中，明確提出要在東方國家繼續支持民族解放運

<sup>41</sup> 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文件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卷1，第6號文件。

<sup>42</sup> FO 228/3214, September 1920。此信與潘克赫斯特同月請李澤洛維奇轉給中國人民的信內容類似。

<sup>43</sup> FO 228/3214, September 1920；FO 228/3211&3216, November 1920；FO405/233, September 1921。

動，同時努力促使共產黨在該等國家逐步組成。<sup>44</sup>有理由相信，孫中山後來對韓麟符所說的列寧曾想要他當共產黨的創始人一事，<sup>45</sup>並非虛言。

由於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的堅持和對蘇俄共產主義一貫的懷疑態度，後一打算落了空。但我們看到蘇俄與共產國際在華人員一直在竭力促使孫的某些追隨者在中國發起從屬於共產國際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黨和組織，而一些傾向社會主義的國民黨人對這種提議的反應比較積極。

早在 1920 年 2 月，英國情報機構得知，在有李澤洛維奇參加的一次中韓人士在永安飯店餐廳舉行的會議上，主持人朱卓文 (Jue Gwoen) 說，一些對中國真正懷有良好願望的人建議他們組織一個正式的布爾什維克式的團體，並創辦一份刊物以宣傳布爾什維主義和報導來自蘇維埃俄國的消息。經過討論，與會者接納了這兩項提議，並議決每個團體成員每月繳納十元以支付刊物出版費用。當時商定，這個定名為《勞動者》(The Worker) 的中文雜誌將於是年 5 月 1 日勞動紀念日發刊，每期將發行三千份。顯然提議組織團體和創辦工人刊物者是外國人，很可能是蘇俄、共產國際的代表，或是李澤洛維奇。與會的中國人多是孫中山的追隨者：朱卓文長期擔任孫中山的重要助手；李漢俊 (Lee Jen Jehy 李人傑) 當時也與國民黨和孫中山關係密切；<sup>46</sup> 尚未弄清姓名的 I. C. Lien Tsun 據說曾留學美國多年，當時住上海南京路 340 號 A，為孫的有力支持者；另一姓 Moy (梅) 的人是孫的私人隨從；M. Chow (周) 是原美國俄亥俄大學的學生。韓國人有《大韓獨立新聞》與《新韓青年》的主筆李光洙。

與會者均被認為與在俄國或美國的布爾什維克有聯繫。至於他們要組織的究竟是什麼團體尚待研究。從以後各地社會主義者同盟和初期共產主義組織紛紛創辦帶有「勞動」字樣的姐妹周刊和出席此會的李漢俊成為稍

44 參見 X. I. Eudin and R.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A Documentary Surve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64.

45 「中共廣東區委聯席會議紀錄」，1924 年 10 月 4 日。

46 李漢俊兄李書城是同盟會發起人之一，武昌首義時任戰時司令部參謀長，民國成立後，在孫中山的總統府任首席軍事秘書，這決定了李漢俊與同盟會及其後來的組織非同一般的關係。他於 1912 年參加國民黨人主辦的吳祿禎追悼會，1918 年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歸國後，在上海參與編輯國民黨人創辦的《星期評論》。1919 年 9 月 7 日他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發表〈世界思潮之方向〉的譯文之後寫道：「人家叫我做民黨叫革命黨，……」顯示他一度認同於中華革命黨。有關英國情報說他是孫中山的常客。

後在滬出版的《勞動界》主編來看，這次會議與共產黨的醞釀似乎多少有些關係。同時，又可能與中、韓、俄、印人組成的大同黨——東方共產黨有關。<sup>47</sup>因為據加入了大同黨的波塔波夫報告，孫中山身邊的一些人與大同黨聯繫密切，甚至有的人加入了該黨。<sup>48</sup>被肯定為大同黨主要領導人的黃介民早年參加同盟會，是老國民黨人。作為大同黨頭面人物的姚作賓也參加過中華革命黨，民國5年還參加過中華革命軍的飛行訓練。<sup>49</sup>主持永安會議的朱卓文很可能也加入了大同黨。因為作為國民黨勞工運動負責人和五四時期上海國民大會領導者之一，他與同在五四運動中非常積極並且時任中華工業協會負責人的黃介民關係密切；而且他不僅與俄國和韓國革命者時相過從，還與一些印度的民族主義革命者有接觸，曾支援他們的反英鬥爭。<sup>50</sup>

1920年4月一份英國情報報告，朱卓文攜帶孫中山一封重要的關於布爾什維主義的秘密手函，代表孫赴穗。大約9月以前，朱返滬後報告說廣東有三個秘密團體，其中一個是親蘇俄的，但傾向無政府主義。<sup>51</sup>很有可

<sup>47</sup> 關於大同黨的創立、組成和演變，可參見李丹陽發表於《近代史研究》，1992年，期4的〈朝鮮人巴克京春來華組黨述論〉；關於大同黨的綱領見謝彬著《民國政黨史》，學術研究會叢書，1926年，頁133—134。

<sup>48</sup>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文件集，卷1，第7號文件。波塔波夫加入大同黨一事見李玉貞著，《孫中山與共產國際》，頁57。

<sup>49</sup> 此據臺北國父紀念館一則照片的說明文字。

<sup>50</sup> 朱卓文是印度獨立運動海外著名領導人博斯（R. B. Bose）和達斯（T. Das）的朋友。博斯為卡德爾黨的主要首領，1912年他向英印總督哈定投擲炸彈；1915年策動反英起義，失敗後冒充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親戚，化名塔庫爾潛入日本。他在那裏建立了印度人在東方反英運動的中心組織。博斯積極與中日人士聯絡，也同布爾什維克黨人秘密接觸。1937年他組織印度獨立聯盟，二戰時希望借助日本軍事力量解放印度，並建議組建由日德支援的印度國民軍。達斯早年因投入革命運動而中輟大學學業，1905年流亡海外，先後在美國創刊《自由印度斯坦》（*Free Hindustan*），建立印度獨立聯盟。1914年他獲美國國籍，並被授予博士學位。一戰爆發前赴德，以在柏林大學從事研究作掩護，竭力爭取德國資助，以用於在印度發動武裝起義。參見：*Who Was Who, 1900-1980* (New Delhi, 1985); Dharmavira, *I Threw the Bomb, the Revolutionary Life of Rash Behari Bose* (New Delhi, 1979); J. M. Pluvier, *South-East Asia from Colonialism to Independence* 和 M. N. Roy, *M. N. Roy's Memories* (Bombay, 1964) p. 31。朱卓文在東京時即與博斯相識，達斯來中國時他曾提供資助。1920年，朱出版了《英國人在印度的暴政》的中文小冊子。同年，孫中山知道他手下一些同情印度獨立運動的廣東人正按照蘇俄人士的指示，對印度人給予幫助。這些廣東人當包括朱卓文。FO405/228, No.157 附錄；228/3214, September 1920。

<sup>51</sup> FO 228/3214, 8 April 1920；FO 228/3211, September 1920。

能是，蘇俄希望孫中山在中國發起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黨，孫推說上海國民黨內沒什麼人信仰共產主義，故派朱卓文南下尋找可能接受蘇俄共產主義的團體來發起組黨，來敷衍、應付布爾什維克在華代理人。

至遲從 1920 年 4 月起，李澤洛維奇忙於與國民黨人辦的《星期評論》社聯繫。值得注意的是，5 月 1 日的《星期評論》出了 20 頁之多的「勞動紀念號」，如果考慮到 5 月 1 日為曾計劃出版的《勞動者》的首刊日，讓人會推想到《星期評論》可能暫時代替了永安會議決定成立的那個團體的刊物。不久圍繞著《星期評論》社成立了社會共產黨，其成員除了陳獨秀外，或多或少都與該報社有關。<sup>52</sup>1920 年 7 月，劉紹周在共產國際二大上的發言中指出，「中央位於上海的社會主義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它辦有一名稱樸素的雜誌《周報》。劉所述的《周報》正是《星期評論》，因為他列舉的 5 月 1 日《周報》的內容恰恰是《星期評論》所載。<sup>53</sup>作為《星期評論》主要編輯的國民黨人戴季陶、沈玄廬等都曾參加過蘇俄和共產國際代表主持的發起共產主義組織的座談會，甚至參加了組織。

除上述人之外，蘇俄與共產國際人員還積極地與其他國民黨要人進行接觸，如廖仲愷、朱執信、張繼、蔡元培、陳炯明、李烈鈞、柏文蔚、徐謙、邵力子、曹亞伯<sup>54</sup>、陳嘉謨、吳山、謝英伯、李章達等人。有資料證明他們曾勸說過其中一些國民黨人發起或參加共產黨。國民黨刊《民國日報》編輯邵力子曾參加了中共發起事宜並成為黨員自不必說，維廷斯基和楊明齋在上海期間還同擔任過廣州護法軍政府大元帥府秘書及司法部司長（署次長）的吳山商談，請他出來擔任籌組共產黨的工作。<sup>55</sup>波塔波夫 1920 年 4 月底赴漳州最重要的任務，據說是要利用陳炯明的關係，「在中國建立一個共產黨」。<sup>56</sup>是年底維廷斯基和陳獨秀到廣州後，陳獨秀曾

<sup>52</sup> 如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戴季陶、沈玄廬等均參加過醞釀時期的一些會議。

<sup>53</sup> 《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年），輯 1，頁 33—34。向青認為，「劉紹周的這個發言說明他根本不瞭解中國的建黨活動。」（《近代史研究》，1980 年，期 4），實際上劉所述恰恰準確反映了那一階段在上海進行的建黨活動。

<sup>54</sup> 曹亞伯（Abel Tsao）庇護過來滬避難的印度獨立運動人士 G. 辛格，他與李澤洛維奇關係甚密。FO 228/3211, June 1920。

<sup>55</sup> 《革命人物志》，集 6，頁 1—7。

<sup>56</sup> 周毅，〈孫中山早期與俄國革命黨人的來往〉，《傳記文學》，卷 58，期 3。遺憾的是周先生沒有提供此事資料的出處。

面勸陳炯明加入中共。<sup>57</sup>不少國民黨人基於對三民主義的信仰和對領袖孫中山的服從，拒絕發起和加入中共，而有一些人則成了中共或其他共產國際資助的組織的創始者或早期成員。

## 尚有爭議的第一個蘇俄與廣州政府的協議

孫中山倚重的陳炯明領導的粵軍 1920 年秋打回廣東前後，蘇俄再次加緊了與孫中山及國民黨人的聯絡。據上海《新聞報》透露，孫中山在動身去廣東前曾與列寧政府代表訂立了如下協定：蘇俄政府將提供一萬元經費幫助國民黨人奪回廣東；一旦國民黨在廣州建立政府，蘇俄再提供一千萬元，以助其推翻北方軍閥官僚統治；國民黨允以最大努力於兩年內在東京或南京組織勞動政府，並讓俄國人在該政府中任職或任行政諮詢委員會成員。<sup>58</sup>英國檔案也有相關記載，孫中山在離滬前曾與列寧的代表私下商定，他本人一旦被選為南方政府的總統，就將承認蘇俄政府，並已派兩名私人特別密使去與蘇俄政府談判。<sup>59</sup>蘇俄代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 (K. N. Sokolov-Stelakhov) 在 1921 年 4 月寫的「關於廣東政府的報告」中提到，國民黨派赴蘇俄的代表李章達早就表示廣州政府「很願意同蘇俄建立秘密而真誠的關係」，但認為「最好是秘而不宣地派遣代表溝通情況和簽署必要的協定。」這些都說明國民黨與蘇俄雙方就未來國民黨新政府與蘇俄政府之間的關係，事先已達成了一定的共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因此在上述報告中說：「可以利用廣州政府作為在東方推進民族革命的工具。」並建議蘇俄應「立即同廣州政府建立聯繫」。<sup>60</sup>但是，在國民黨的武裝力量佔領廣州，孫中山也隨之南下後，蘇俄政府究竟派過什麼人[除了我們知道的諸如維廷斯基、霍多洛夫、斯托揚諾維奇 (K. A. Stoyanovich)、柏烈偉 (S. A. Polevoy) 等人] 到廣州直接與孫中山的廣東軍政府進行談判，以及是否簽署了協定，目前仍然不十分清楚。

曾去過蘇俄親訪列寧，並對中國政情十分熟悉的日本《每日新聞》記

<sup>57</sup> 海隅孤客（梁冰玄），《解放別錄》。

<sup>58</sup>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1920 年 12 月 17 日，《警務情報》。

<sup>59</sup> FO228/3211, January 1921。

<sup>60</sup>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文件集，卷 1，第 9 號文件。

者佈施勝治在 1927 年著的《蘇俄在東方的政策》中寫到：「孫中山從上海到廣州時，會見了一名蘇維埃代表，並與他商定將與蘇俄一致採取某些行動。」據佈施說這些行動包括在重建的軍政府內設立勞動局、土地局等，起草工會法等法律，鼓勵勞工運動、確定土地官價等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措施。佈施接著寫到：「很快，軍政府派遣代表去莫斯科，莫斯科也特別選派了一位名叫阿列克謝夫 (Alexieff) 的共產黨員[來華]。」<sup>61</sup>

一些學者，如韋慕廷和崔書琴，在他們的著作中引用佈施的書，都寫了俄人阿列克謝夫到過廣州一事，卻隻字未提在阿列克謝夫之前見過孫中山的那位蘇俄代表。<sup>62</sup>而英國情報機關從 1921 年 1 月起連續報告了一位已在粵的蘇俄代表的情況。該人名為雷曼考夫 (Remankauff)，後更名斯塔克 (Stark)，會講北京話和客家話。他是化裝成一名羅馬天主教傳教士，由李烈鈞安排經由雲南、湖南兩省抵達廣東的，居住在距廣州市不遠的一所修道院。從那裏，他經常到孫中山的官邸與之進行商談。雷曼考夫的名字雖然可能是假的，但這個俄國人不會是大約同時也到過廣州的維廷斯基和霍多洛夫，因為另一份英國情報指名道姓地提到了後二人的抵穗。佈施所說的廣州政府和蘇俄政府之間互派代表，非常可能是孫中山與雷曼考夫協商的結果之一。英國情報機關 3 月的一份報告說，孫中山已頒發委任狀，任命 Hsien Chen Feng 擔任聯省政府赴蘇俄的代表。<sup>63</sup>此人不知是誰，從譯音來看，有可能是夏奇峰。<sup>64</sup>

晚些時候的英國情報才出現一個名為阿列克謝夫 (Alexieff) 的俄國人，說此人與第三國際首領關係密切，不久前從恰克圖由一名陳姓中國人

<sup>61</sup> K. Fuse, *Soviet Policy in the Orient* (East Peking: Enjinsha, 1927), 頁 224—225。

<sup>62</sup> 參見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頁 117; 崔書琴, 《孫中山與共產國際》(臺北: 文星書店, 1965 年), 頁 55。他們在書中都說是阿列克謝夫開辦了羅斯塔廣州分社, 實際上早在 1920 年初秋, 斯托揚諾維奇就建立了廣州羅斯塔分社。

<sup>63</sup> FO 228/3211, 1921 年 1—3 月報告; FO 405/233, September 1921。

<sup>64</sup> 夏奇峰 1919 年曾以記者身分前往法國報導巴黎和會, 歸國途經俄國時, 被邀以代表身分參加全俄第二次東方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那一時期廣州軍政府派去與蘇俄方面談判者不只一人。據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記載, 1921 年初, 鄂春森曾受委派與勞農政府專使訂約。引自王聿均, 《中蘇外交的序幕》(臺北, 1963 年), 頁 232—233。俞頌華在《俄國旅程瑣記》裏提到, 1921 年 5 月他遇到一孫中山派的叫張公制的人到莫斯科。見葛思恩、俞湘文編, 《俞頌華文集》(商務印書館), 頁 94。

(C. T. Chen) 陪同來華。<sup>65</sup>此人是否為佈施書中提及的蘇俄政府代表阿列克謝夫<sup>66</sup>尚不得而知。佈施根據當時所獲消息，說阿列克謝夫在 1921 年 3 月與孫中山達成了一個協議，並在自己書中照錄了該協定的備忘錄。崔書琴斷然否認此時有過任何協議，韋慕廷與郝蓮英在他們合編的《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9-1927: Paper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 一書中也認為沒有確鑿證據證實有此協議。但在 1921 年 4 月的一份英國情報報告的附錄裏，以「莫斯科——廣東協議」為題轉錄了廣州當地報紙披露的協議大綱，其內容與佈施書中所錄條款大體相似，包括：

1. 在莫斯科的蘇維埃政府與在廣州的聯省政府同意相互承認；
2. 兩政府即刻恢復商業往來；
3. 聯省政府將協助布爾什維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sup>67</sup>
4. 蘇維埃政府將按聯省政府要求對其提供經濟上的援助；
5. 兩國將給予對方公民以最惠國公民的待遇。<sup>68</sup>

此外，北洋政府檔案也記載了 1921 年初廣東政府與蘇俄訂約，議定條款有雙方互相承認，勞農政府允借鉅款與西南政府，後者允前者在西南宣傳共產主義等。雙方還商定過設立華俄大學、接濟軍火、互派代表等具體事項。<sup>69</sup>據當時報載，這一協議雖已經由雙方代表草簽，但尚不準備馬上公佈。很可能由於該協議後來沒有正式簽訂，故無正式文件存世。無論怎樣，上述記載不會是事出無因。如果屬實，該協議當為蘇俄與孫中山的政府之間準備密切合作的第一個初步協議。從契切林 1920 年 10 月 30 日致孫中山的信中有「應當立即恢復我們兩國的貿易關係」一語，以及 1923 年初越飛在與孫中山談判時提出希望後者「答應不禁止在中國進行布爾什

<sup>65</sup> FO 228/3211, October 1921。

<sup>66</sup>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俄國最著名的漢學家 V. M. 阿列克謝夫在 1920—22 年的研究課題就是「中華民國」，參見尼基弗洛夫《研究中國問題的蘇維埃歷史學家》(莫斯科，1970 年)。又因為談判要求較高的語言能力，故筆者推測 V. M. 阿列克謝夫有可能在 1921 年春充任蘇俄代表與廣州政府談判。

<sup>67</sup> 此條在佈施書中為：「在廣州軍政府所管轄的地域允許共產主義的傳播」，似較為合理。

<sup>68</sup> FO 228/3211, April 1921 附錄 2。

<sup>69</sup> 林家有、周興樑，《孫中山與國共第一次合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42。

維克宣傳」的條件，<sup>70</sup>可以看出上述協議中所寫事項確是蘇俄所一貫希望達致的。徵之當時蘇俄羅斯塔廣州分社人員和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廣州積極從事宣傳活動，<sup>71</sup>以及遠東共和國向廣州政府提供「物質援助」<sup>72</sup>等事，均可反映出雙方初步議定的一些事項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實施。

## 結語

從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英國檔案的有關記載印證了蘇俄、共產國際很早便開始同孫中山及其國民黨和南方政府進行接觸，並且利用各種途徑、渠道和各種人去建立和保持聯繫，包括俄僑、旅俄華人、前沙俄軍官和外國共產黨人。他們盡一切努力促進雙方關係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推動中國的民族解放鬥爭，建立共同的反帝統一戰線；利用同南方政府的關係為籌碼來迫使北京政府與之建立正式的國家關係，或借助國民黨的力量來推翻與蘇俄不友好的北京政府；還試圖影響孫中山本人和他的追隨者們為社會主義事業效力，甚至想通過他們在中國組織隸屬於共產國際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組織和政黨。這些檔案同時也反映了孫中山對蘇俄的態度：他雖然同情俄國革命，願意學習布爾什維克黨的一些方法，也亟欲得到來自俄國的援助，但他堅持自己的主義，根本不同意將俄式共產主義搬到中國，並拒絕以完全屈從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指揮棒作為接受援助的代價，始終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sup>73</sup>因此，儘管孫中山在 1923 年終於決定公開與蘇俄、共產國際實行正式合作，<sup>74</sup>次年國民黨按照布爾什維克黨的一

<sup>70</sup> 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1917—1924 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

<sup>71</sup> 擔任廣東省長的陳炯明曾資助共產黨人任主筆的廣東《群報》，該報刊登了許多羅斯塔社發的消息。FO 228/3211，1921 年 3 月的報告說，陳獨秀以孫中山的名義發佈一道命令，要所有大、中學校每日必須講授有關於布爾什維主義的課。FO 228/3211，1921 年 7 月報告印度人 Bose 到廣州發現那裏有蘇俄的宣傳家在活動。他訪問過孫中山和伍廷芳，得到的印象是，孫中山不反對蘇俄宣傳，只要這種宣傳不損害南方政府。FO 405/223，1921 年 9 月的報告，卻顯示地方政府因擔任廣東政府教育總長的陳獨秀的一系列計劃過於極端而不願意支持。

<sup>72</sup> 賈丕才，《孫逸仙，1866—1966》（莫斯科，1966 年）。

<sup>73</sup> 據 1923 年的一份英國情報，某蘇俄代理人向孫中山帶來信息：若想要莫斯科提供援助，就應服從莫斯科的命令。孫因不同意此一條件而與之發生了爭吵。FO 228/3211, October 1923。

<sup>74</sup> B. A. Elleman 在上引論文中指出，布爾什維克提出與孫中山及其政黨結成統一戰線的政策遠在中國共產黨出現之前的 1918 年，因此這種統一戰線並非通常所認為的是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



些辦法進行改組，並繼而在俄國顧問的指導和蘇聯的物質援助下與中國共產黨攜手進行國民革命，但雙方基本理念、觀點、立場的歧異不僅造成前此聯繫、談判過程的種種波折，導致以後合作當中的貌合神離，而且也預示了這一合作必然失敗。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5)

#### 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

黃自進著

350 頁 精裝 350 元 平裝 300 元

北一輝是戰前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導師，同時，早年他又曾投身中國革命運動，是中國革命秘密組織「同盟會」的正式成員。探討他這一段曾奔走中日兩國革命運動的離奇生涯，是本書的宗旨。全書共分三章，第一章以他生涯中的三大著作——《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支那革命外史》、《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為討論重點，觀察其思想演變。二、三兩章分別論述他投身中國革命的歷程、及其對中國革命認知上的發展。最後論及他轉而倡導日本革命的心路歷程、影響日本法西斯主義走向的來龍去脈。

而一開始便是指蘇俄共產黨及其政府與國民黨間的合作。筆者同意這種看法，並且根據上述事實認定，蘇俄、共產國際與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實際上至遲在 1921 年初就在某種程度上實施了，並不自 1923 年始。

# 日本檔案數位化概況介紹

莊樹華\*

中央研究院日治時期總督府檔案整理小組成員，於民國 89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前往東京，考察日本檔案數位化典藏情形，共拜訪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數位化博物館、史料編纂所及文部省國立情報學研究所等單位。茲將各單位檔案、資料數位典藏情形介紹如下。

## 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http://www.ioc.u-tokyo.ac.jp>

東洋文化研究所之電腦資訊室，主要由 3 人工作小組統籌，其餘人員多為工讀生。另有研究人員 10 多人組成的 network 委員會，他們根據自己的研究計畫訂定規格，委託廠商設計資料庫。影像的掃描製作亦委外，先用 35 厘米的一般照相機拍攝資料，再將底片掃描，再以光碟片儲存。完成的資料庫由資訊室提供協助，上網開放。東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計畫均屬小型資料庫，因為規格由研究計畫主持人自訂，造成資訊流通上的困難，為了突破這重限制，未來將整合成大型資料庫。可見日本學界與臺灣相同，在檔案數位化的進行方向上，由史學研究者主導，電腦資訊人員配合技術支援，資料庫的統合運用是共同面臨的難題。

## 二、東京大學數位化博物館 <http://www.um.u-tokyo.ac.jp>

該館建於 1955 年，當初建館係鑒於資料日益龐大以及資訊國際化成為潮流，乃將所藏資料數位化，以便讓無法親臨博物館的人士得以透過數位化資訊的服務，讀取資料。

此一數位化博物館的解說有日、中、英語語音系統，展示的內容解說透過東京大學情報學環系的坂村(Sakamura)教授所開發的 TRON 軟體，可以與多國語言相容，包括漢字的繁體字、簡體字、日本漢字，在日本已被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產業界及學界所使用。

影像製作部的存檔，是先用 35 厘米的一般照相機拍攝資料，再將底片掃瞄，存成 JPEG 格式，再以光碟片儲存，解析度視底片大小而異，從 600 至 800dpi 不等。經過數位化後可對受損的影像作修復，效果比原件更清晰，因此，該館透過數位化保存早期拍攝的電影膠捲，不但可長久保存影像，亦有修復的功能。

另外，博物館也進行 MMMUD（3D 虛擬實境），同時呈現影像、文字與語音解說，提供參觀者更好的服務。Streaming technology 則是一種傳輸現場實況的技術，大部份用在考古文物遺址的挖掘，透過此功能可立刻觀察現場挖掘工作進行的實況；此外，也可以用於博物館之間建立資訊交換系統，彼此同時在網路上開會與進行討論。以上是數位博物館的發展方向，其中有些系統仍在實驗研發階段，尙未成熟。

### 三、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http://www.hi.u-tokyo.ac.jp>

史料編纂所除安排參觀該所蒐藏的珍貴史料，包括十七世紀的倭寇圖卷、1853 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 Perry 登陸江戶灣（即今之東京灣）繪畫、大日本史料、臺灣總督石塚英藏關係史料、臺灣霧社事件照片集與相關史料等外，並安排座談、介紹歷史人物肖像的數位化資料庫。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是研究、編纂日本前近代史的研究機構，前身是 1793 年成立的和學講談所，於 1869 年改爲史料編輯國史校正局，開始從事修史事業。1872 年，內閣制度成立後，改爲臨時修史局。1888 年，政府規定修史事業由東京（帝國）大學負責，稱爲臨時編年史編纂所。1893 年開始編纂出版所蒐集的史料。1929 年 7 月正式稱爲史料編纂所。1950 年 4 月，史料編纂所從東京大學文學部獨立，直屬於東京大學。研究人員約有 60 名。

史料編纂所從 1885 年開始蒐集古代至明治期間收藏在國內外之各種日本史史料。從 1901 年出版史料集《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書》以來，迄今已編纂出版了可作爲日本史研究基礎的史料集九百冊以上。初期是用毛筆、日本棉紙模擬抄寫，簡稱之爲摹寫，1950 年代開始使用相機拍攝。在史料編纂所中，摹寫、拍照、修復、修補史料等是重要的工作，爲此特別設置了史料保存技術室，內有 5 名技術人員。史料編纂所的書庫

與閱覽室建於 1973 年，共有 10 層，藏書約有 14 萬冊，原始史料與抄寫資料約有 19 萬件。

1984 年史料編纂所開始使用電腦來調查、編纂史料，將明治以來所蒐集的龐大歷史資料作成資料庫。1993 年 2 月使用 ACOS 3300/150N 和 workstation (EWS 4800) 作業系統，開始建置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歷史情報系統 (SHIPS) 和資料庫。此資料庫包括「古文書目錄及全文」、「大日本史料索引」、「維新史料綱要」、「編年史料綱文」等，至 1995 年度累積約有 50 萬件，200 萬字以上。

1996 年開始進行影像資料庫的建置。首先將史料拍成微捲(35mm film，共 870 捲，約 53 萬 coma)，再轉成數位化影像，作成光碟片，以 EWS 4800 電腦、DBMS 之 Future Happiness 搜尋引擎，配合資料庫檢索，利用 Netscape Navigator 及 View Director PRO2 為瀏覽工具，建構影像顯示系統。1997 年 6 月正式公開「東寺百合文書」等影像資料庫。為了提高影像的畫質，以 A3 格式作微掃描(micro scan)解析度 400 dpi 單色畫值，存成 TIFF 格式。由於早期的瀏覽器(browser)只支援 GIF 或 JPEG 格式，所以須外掛(plug-in)閱圖程式，再作 G4 壓縮，讓每一個畫面大約花一分半鐘即可讀取。此後不斷地改良系統，以增加影像資料庫的速度和穩定性。

1997 年設立畫像史料解析中心，內有 5 名研究人員，負責蒐集、解析、公開各種畫像史料（包括肖像畫、莊園繪圖、繪卷物等繪畫史料；錦繪、瓦版、古寫真等畫像史料）。1999 年 4 月開始公開的「史料編纂所所藏肖像畫模本資料庫」，大致簡介如下：

### 1、史料編纂所所藏肖像畫模本概略

史料編纂所為編纂「大日本史料」，將明治以來的許多繪畫史料以摹寫本形式收藏，至 1999 年 2 月總數有 1,577 件，收集了 900 餘件古代至近世之日本史上著名人物的肖像畫，另外有古地圖或莊園繪圖等多種摹寫的繪畫史料。以上全收錄進「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所藏肖像畫模本目錄」。

### 2、肖像畫資料庫

目前東京大學正與靜岡縣收藏有人物肖像資料的圖書館合作，分工整合人物肖像與文字說明資料。肖像畫的檢索分為詳細檢索及簡易檢索。原則上以一張肖像畫為一筆資料，但一張畫上同時描繪多位人物時，每一位

人物為獨立一筆資料，另給予一個編號。因此肖像畫 900 餘件，卻有 1000 筆資料。每一筆資料都包括四種詮釋資料：

- (1) 管理資訊：以「架藏號碼」、「標題」、「模寫時原本收藏者」三個項目作為檢索項目。
- (2) 像主資訊：像主名（包括幼名、成人後實名或改名、法號、道號等）、略歷（重視家族關係記述）。
- (3) 畫面資訊：詳細描述畫面中出現的事物，如身上的物品、服裝、日用器具等，甚至於面貌表情。
- (4) 相關資訊：與處理肖像畫相關的文獻資料介紹。

以上四個詮釋資料是建構在 Microsoft 「Access 97」上。網路的檢索引擎是利用 Future Happiness Light。每一筆畫像先用相機拍攝，再掃描成數位化影像，作成 prophoto CD。每筆資料都具有兩種影像格式，一是為了能在網路上公開，利用 Paintshop Pro V 3.0 影像處理軟體，將影像轉換成 JPEG 格式，製作成約 6-7KB 的 thumbnail 檔案；二是供保存之用的 100-200KB 的詳細影像檔案。

肖像畫影像資料庫的製作原則是先拍攝文物，再掃描底片，作成數位化資料庫。利用 Kodak 公司所開發的影像管理軟體 PCD File，將底片掃描後燒錄到光碟片。一張光碟片可儲存 100 張畫像。影像採 TIFF 格式，拍攝後的掃描軟體採用富士公司 film MS-1600 等數位化微紀錄 (digital microreader) 軟體，所以必須外包給廠商製作。TIFF 格式的影像檔案記憶體太大，一般 PC 不易處理，為了順利在網路環境傳輸，每張影像必須壓縮到 100KB 左右。

影像資料的壓縮方式有 JPEG 格式和 CCITT Group 4 格式。錦繪的影像製作先將 PCD file 變換成 JPEG file，再用 JPEG 壓縮。畫像越小（畫素數），畫質越高。但是錦繪的影像過小，無法閱讀出影像上的文字，為了確保文字的可讀，就須將尺寸作大，再提高壓縮率，然而高壓縮同時又會讓畫質劣化。另一種是 CCITT Group 4，這是一種不失真而能達到非常高的壓縮率格式，由於不是網路傳輸的標準格式，所以也要外掛(plug-in)瀏覽器才能閱覽。

多國語文轉換是利用 TRON 介面，可與世界 220 種語言的文字相容。包括中國的 GB2312，臺灣等的 Big5，韓國的 Ksx1001，UNICODE 中的世界文字，甚至歷史文字、新創的文字也都可相容。

### 3、資料庫的公開與使用

古文書（包括複本）在作者去世 50 年後，其著作權即消失，作品公開在網路上不會有著作權問題。史料編纂所會對原書的收藏者說明史料數位化的目的只供調查研究之用，所製成的複本（影寫本、謄寫本）相關諸權利屬於國家。在網路上公開國家或公家機關的典藏成果，以推廣利用，已形成一種共同的趨勢。

在網路上公開的畫像，因為受限於傳輸速度，畫質和複製底片實體差別相當大，因此不適合作為商業出版品用途，但使用者若要作為其他用途，譬如製作教材，應予許可。因此有必要對利用者明確規範利用的許可標準、使用範圍，並建立洽詢窗口等機制。

## 四、國立情報學研究所 <http://www.nii.ac.jp>

位於文部省（即教育部）學術綜合中心第十八樓。該所是為支援日本學者的研究活動，目前建有三大資料庫：電子圖書館服務中心(NACSIS-ELS)、全國圖書館線上書目查尋資料庫(NACSIS-CAT)、各大學及學會或協會主動提供的綜合性電子資料庫。

### 1. 電子圖書館服務中心(NACSIS-ELS)

收錄日本各學會提供發行的學術雜誌，予以數位化（影像格式為 PDF,400dpi），並提供目錄檢索及列印論文的服務。目前除了文部省有此服務之外，尚有筑波大學、東京工業大學、京都大學、神戶大學、奈良大學等設有相同的電子圖書館。申請使用須知如下：

1. 資格：以研究學術為目的之國公私立專科學校以上的教職員學生研究員、文部省及文化局職員、國公立實驗研究機關職員等。
2. 費用：免費閱覽使用該系統。若需列印論文，除 50 年以前的雜誌著作權自動失效外，須按各學會之規定交付著作權使用費（可由 <http://www.nii.ac.jp/els/copy-j.html> 查知各學會著作權使用費的最新資料）。著作權使用費由電氣電子情報學術振興財團負責向讀者收款，一年一期，以支付各學會的運作。
3. 時間：24 小時線上服務。
4. 申請：申請書郵寄國立情報學研究所共同利用係（科），約 10 天

後可正式啓用。

5. 配合此資料庫所需外掛的瀏覽器和專用軟體，可由 <http://www.nii.ac.jp/els/equip-j.html> 下載。

## 2. 圖書目錄線上服務

NACSIS-CAT 為線上書目查尋系統資料庫，網羅了全國 800 多個圖書館所收藏的圖書、雜誌。此資料庫的著錄格式是參照 JAPAN/MARC 和 US/MARC，由全國的大學圖書館共同執行線上著錄作業，每日約有 10,000 人輸入 3-4 筆資料。截至目前為止，1980 年以後的資料大致建檔完成，1980 年以前的資料依各圖書館的回溯進度而有所不同。最古老的藏書可回溯到 17 世紀。因為是連線網，所以能直接引用其他圖書館已作成的書目資料，可以避免因重覆輸入而導致人力的浪費。各館的資料可用錄音帶、光碟片等方式保存。

館際之間建立館際互借系統——NACSIS-ILL (Inter-Library Loan)，參考 NACSIS-CAT 中最新的綜合目錄，利用特定索書號的館藏地、地域、館種（國立、私立等）等條件，同時和五個指定館進行館際互借，如果在某一個館被拒絕時，會自動送到下一個館。此一系統是根據 Protocol CATP 製成，在 2005 年將全面轉換成新的 CAT/ILL 系統。Web UIP 是 CAT/ILL 的 gateway，在 Internet Explorer、Netscape Navigator 等即可使用，能接受 CATP 最新版本，支援多國語言，亦可顯示中文資料。

有關館際互借系統(ILL)，國際標準的 Protocol 有兩種規格：ISO10160、ISO10161，只要遵循這個標準，不同的館際互借系統也能相互聯繫，NACSIS-ILL 系統即可與 BL（英國）之 ILL、OCLC、RLG（美國）、KERIS（韓國）、CALIS（大陸）等國際圖書館機構進行館際互借之業務。

1997 年開始發展的多言語對應目錄系統從 2000 年開始使用，最初支援拉丁文字、希臘文字、俄文、日本漢字，以後又增加了中國漢字、韓文等國際符號化文字集合 (Universal Multiple-Octet Coded Character Set)，採用此系統後，可解決中文和韓文資料的文字登錄問題。預計約有 700 萬冊收錄在全國圖書館中的中文資料聯合目錄，將能使用 CHINA-MARC 輸入建檔。

### 3. 綜合性資料庫

由全國的學術單位及研究者主動提供研究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研究計劃內容，或各學術單位所作的資料庫，目前有 58 個資料庫。以上資料視研究者意願主動提供，資料庫的完整性不足，例如東洋文化研究所及其所做的仁井田陞資料庫均不在其中。

## 五、結語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長期蒐集國內外之各種日本史史料的精神，實為臺灣史料典藏單位所應效法，為了克服收藏者未必將資料捐贈出來，該所初期是用毛筆、日本棉紙描摹抄寫，1950 年代開始使用相機拍攝。換言之，編纂所製作複本後，將史料原件歸還給收藏者，如此也解決了版權的問題，此一作法可為我國史料收藏單位參考。另外日本各單位的影像資料庫的建置大都採先將史料拍成微捲 (35mm film)，再轉成數位化，作成光碟片的方式，同時儲存兩種不同的載體，較國內直接製作數位化影像更為保守。史料編纂所所藏肖像畫詮釋資料庫包括管理資訊、像主資訊、畫面資訊、相關資訊，與國內目前數位典藏計劃之 Metadata 意義相近，唯此詮釋資料由日本學者自行設計，尚未建立在標準化的著錄格式上。

文部省國立情報學研究所的線上書目查尋系統資料庫，網羅了日本的圖書目錄，對總督府檔案中相關出版品的搜集有很大的助益，透過此資料庫可將臺灣總督府的各项出版品補齊。

另外，日本多語言對應系統的介面研發，如何解決漢語系國家及非漢語國家語文轉換的問題，也值得我們關注。

日本政府過去對支持綜合型或整合型的資料庫計畫的態度較為消極，近年來在國際資訊傳輸技術日新月異之下，已深切體認整合資訊技術及資料庫的重要性，對國內數位化典藏的建置及技術研發亦多所推動，充分反應在 2001 年度的國家預算之上。如能促進雙方的密切交流，有助於彼此的檔案、資料數位化的發展，尤其是漢字系統的統合，有賴於相關國家的進一步合作。



#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成立一年來的概況

蕭富隆\*

檔案法於民國 88 年 12 月 15 日公布，行政院研考會簽奉行政院核定籌設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乃設置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以下簡稱籌備處)。在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正式成立之前，關於檔案事務，籌備處為行政院指定之主管機關，隸屬於行政院研考會。民國 89 年 3 月 1 日，發布籌備處主任人事命令，正式揭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籌設任務。由於檔案法有所謂兩年落日條款之規定，必須於 90 年 12 月 14 日前成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籌備時間並不充裕，故必須步步為營，爭取時效。

籌備處為全新的機關，約 70 位同仁來自各單位，各擁不同專長背景。除了人事、會計、行政管理及(籌備)處本部人員之外，共分檔案管理、典藏技術、企劃與資訊四個業務組。回顧這一年來，籌備處從無中生有，並與時間競走，是否已有具體成績，應該向關心檔案事業的社會各界做個說明，藉以接受各界的檢視，共同思考全國檔案管理事業的未來。以下就個人參與籌備工作所知，擇要歸納整理近一年來籌備處的重點工作。

籌備處第一個工作任務即是依據檔案法母法之規定及授權，訂定相關子法。過去因無檔案法，故檔案管理工作規範依附於文書處理業務之下。檔案法既已公布，則檔案管理事業有了新的立足點，得以規劃設計全新的檔案管理制度。相關子法的訂定，如同綿密的網絡，將檔案管理有關事項串聯為一個整體，形成一套可運作之制度，其影響是全面性的，更是全國性的。截至目前，籌備處總計草擬二十三項子法草案，包括具備法律位階的組織條例、母法授權訂定的行政命令及職權命令三種類型。其細目如下：國家檔案局組織條例草案、檔案法施行細則草案、國家檔案移轉辦法草案、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草案、機密檔案管理辦法草案、檔案微縮儲存管理實施辦法草案、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法草案、私人或團體捐贈珍貴文書獎勵辦法草案、國家檔案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機關

---

\*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檔案管理組組長

檔案點收作業要點草案、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草案、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草案、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草案、私人或團體所有珍貴文書託管及收購要點草案、總統文物管理要點草案、檔案分類編案規範草案、檔案編目規範草案、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草案、國家檔案館工作規範草案、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草案、機關檔案管理單位及人員配置基準草案、檔案庫房設施基準草案、檔案保存技術規範草案。

各項子法的草擬，除了組織條例因時效上的關係，已送經行政院院會通過，正在立法院待審議之外，基本上都需經過四道手續，從 89 年 5 月起至今，仍在進行。首先是處內討論，彙整為初稿，在 89 年 11 月之前已全部完成。隨後行文各機關表示意見，90 年 2 月回收完成。現階段為彙整各機關意見之階段，後續將分別各項子法性質，逐案召開機關座談會，希望以當面溝通的方式，進行子法條文的修訂，預計 90 年 4 月底完成。最後為彙整機關座談結果，確認各項子法條文，循行政程序報經行政院核定。預計隨同檔案法之實施同步頒行。

子法的擬定，除了廣泛收集各機關現行業務資訊以及國外參考資料之外，委託專家學者從事相關研究，從中獲取有用的材料，亦是籌備處一項重點工作。自 89 年 6 月起陸續委託且已結案者包括：檔案開放應用研究、總統圖書文物管理法制作業之研究、國家檔案分類系統之研究、機關檔案管理單位及人員配置標準之研究、機關檔案管理現況調查分析報告、檔案電子儲存管理辦法之研究、檔案微縮等方法儲存紀錄及其複製品確認作業準則研究、檔案保存技術研究、機關檔案管理系統之研究、全國檔案資訊系統之規劃研究等十種。90 年度進行中的委託研究則有：電子文件檔案管理與應用之研究、國家檔案館典藏環境及設施規範之研究、檔案修護技術及制度之研究為例、電子檔案儲存之安全認證研究、國家檔案館建築及設備設計規範等五種。

委託研究案的推動有助於籌備處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彙整系統性的資料，透過學者專家的參與與協助，共同思考全國檔案管理事業可能面臨的問題。這是籌備處同仁拓展思考領域的途徑，同時亦為將來的問題預為籌謀對策。

規劃設計檔案制度貴在與實務互相結合。籌備處為取得實務運作經驗，乃主動策劃執行「二二八檔案蒐集整理工作計畫」。此一工作計畫的進行無異是籌備處訂定各項子法案的試金石。89 年 8 月正式奉行政院核

定，專案辦理。計畫內容包括：檔案訪查、移轉、整理、分編、展示、數位化以及建置二二八檔案資訊網(<http://www.archives.gov.tw/228>)。此亦為籌備處另一重點工作。

89年9月、10月，籌備處同仁與18位學者專家，分為六個小組，以兩個月時間動員498人次，查訪70餘個機關。11月，協調48個典藏相關檔案之機關移轉檔案，並與國史館簽訂協議，共同保管此批檔案。至90年1月中旬，完成移轉之檔案共計57,134件。立即進行目錄整理、建置資訊網路，並審選其中119件代表性檔案，撰寫解說文案，分為二二八事件背景、事件經過、綏靖與清鄉、事件中的校園、善後措施以及解嚴後的平反等六大主題，於90年二二八紀念日假國家圖書館公開舉辦展示。

此一專案計畫後續仍有五項任務仍待完成：一、繼續訪查其他機關，完整徵集二二八事件檔案，使其成為第一批國家檔案。二、辦理巡迴展覽。三、協調各機關辦理此批檔案解密工作。四、在檔案法雖公布但尚未正式施行之前，訂定二二八事件檔案開放應用暫行辦法，提供閱覽、抄錄、複製申請服務。最後邀請學者專家系統性整理此批檔案，使檔案發揮研究與應用之價值。

檔案法雖明定兩年內成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但因90年度立法院預算審查聯席會議附帶決議，要求行政院於90年6月底前成立國家檔案局，因此各項準備工作必須提前完成。在時間的壓力之下，許多工作幾乎同步交錯進行。以上提綱挈領臚列的重點工作事項都在極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此外還有許多經常性的工作不再贅言。但相信仍有不少是各界所希望了解的，茲條舉四點說明如下：

第一、檔案管理名詞彙編工作，預計90年4月底完成初稿。這是基礎工作，亦是檔案管理實務上有用的工具。過去各機關的內規往往自創語彙，並不通用，反而有礙彼此交流經驗。

第二、彙編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預計90年7月底完成。這是將二十餘種子法案的立法精神，用在實務工作上的指導範例，有更具體而微的作業程序及其參考格式與範例說明。希望基層檔管人員能依據工作手冊的示範快速上手，對檔案做有效管理。各機關檔案管理以手冊為範本照做，則全國檔案管理制度的建立指日可待。

第三、規劃出版檔案季刊預計90年5、6月之間創刊。檔案管理有主管機關以後，建立制度，此一事業將逐漸邁向專業化。關於檔案管理之學

術研究必將隨之展現生機。籌備處提供一個園地，使檔案管理專業人員有吸收新知、交流經驗的機會，是創辦檔案季刊的宗旨。

第四、未來國家檔案局獨立辦公廳舍的設置規劃。經本處查訪臺北鄰近地區五十處場所，經審慎評估後，選定國防部位於伊通街之聯勤新雄營區(聯勤服務大樓)，並已獲國防部原則同意支持。該場所現況為地上三層樓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1,120 坪、土地面積約 620 坪。90 年 2 月已完成相關機關協商，確定有償撥用原則。預計 90 年 6 月完成內部裝修規劃設計。

回顧籌備處近一年來的工作，可謂千頭萬緒，馬不停蹄。各項準備工作只有提前完成者，幾無停頓、延遲之處，匆促之中或許仍有未盡妥善之處，藉此短文簡介就教於各界，尚祈不吝批評指正，以力求改進。(關於各項子法詳細條文可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archives.gov.tw>。)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75)

### 李承基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紀錄：黎志剛 校閱：陳鋒

407 頁 平裝 400 元

李承基，1916 年生，廣東香山縣石岐鎮人。1940 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肄業期間，曾追隨潘序倫學習會計，在永安紗廠實習行政管理。畢業後，在其父親創辦的新新百貨公司接掌要職，建立商品管理制度，創立奇美服裝廠，採多角化經營。抗戰期間，上海新新百貨公司仍有相當發展。大陸易手後，放棄家族企業，轉至香港另謀發展。1957 年，移民澳洲，開創事業的第二春。本書所述不僅是個人生命史，也見證了北伐戰爭、一二八之役、八一三戰爭、八年敵偽統治、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因其家世背景，更提供了四〇年代上海企業史、五〇年代香港商業史，以及澳洲華僑史的珍貴史料。



研究行腳

## 「大陸尋奇」、「中國經驗」

### ：大陸訪查資料經驗座談會紀錄

時間：民國 89 年 11 月 24 日 10:00-13:30

地點：近史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

主持人：呂芳上所長

引言人：侯坤宏、吳淑鳳、胡國台、游鑑明、余敏玲、陳慈玉、羅久蓉、張寧、林美莉、張建侓

紀錄：裘明娟、王佳玉

**呂所長：**歡迎各位同仁參加這次座談會。羅久蓉小姐今天有事不能到，她的書面報告已經在各位手上，所以大家可以閱讀。首先要謝謝所有今天願意作引言的同仁，還有國史館的侯坤宏先生和吳淑鳳小姐前來共襄盛舉。我們絕大部份的同仁都有大陸經驗，我想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跟感想。但是今天來座談的這幾位同仁大部份都是最近去的，因此帶來的都是最新的消息，我們很期望能夠從他們在大陸的經驗，給我們作為借鏡或參考。大家從書面資料可以知道引言人都很下功夫，替我們寫了不少訊息，提供了很多相關資料。這次座談會的內容，希望能夠發表，提供更多同行參考。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先聽他們幾位的引言報告，如有時間，我們再交換意見。

我們現在就請侯坤宏先生。侯先生大家都認識，仙風道骨，一副仙人之相，因為他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他以前是作經濟史的，現在轉向作佛教史，他最近去大陸兩三個月，去的地方很多，我們就先請侯先生作報告，謝謝。

**侯坤宏：**謝謝呂所長，我覺得今天我們有關大陸地區蒐集資料的經驗交換相當有意義，因為在民國史研究資料蒐集上，大陸地區各層級檔案

館、圖書館藏有許多寶藏，值得我們去蒐集。但在另一方面，因彼岸在檔案資料的開放上，偏於「人治」，欠缺「法治」，而衍生許多對於閱覽上頗為不便的規定。

我這次去的地方主要是中國第二檔案館，這對大家並不陌生，像胡國台先生等一下也會報告。在最近一期《近代史學會通訊》（十二期）上刊有吳淑鳳小姐寫的〈滬寧訪查史料經驗談〉一文，其中對南京二檔館的目前最新相關規定，已有明確說明，為節省時間起見，在此不準備多談。有一點提出來向各位報告的是，近來二檔館在利用部主任馬振犢先生的帶領下，閱覽檔案比起四年前我第一次去時改善許多。

呂所長剛剛特別提到我暑假期間到大陸跑了幾個地方，譬如廣州、韶關、衡陽、武漢、九江、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大同、五台山等，除了檔案館以外，我也順便去了一些寺廟，順便採訪一些有關佛教的資料。呂所長也提到，我個人十幾年來是從事經濟史的研究，這幾年來因為心境的轉變，所以轉向佛教史，到南京二檔館之前，我先閱覽了國史館所典藏的《內政部檔案》，也寫過一篇〈國史館典藏內政部檔案有關民國佛教史料的分析〉，這是在東吳大學所辦的「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一篇文章。

在國史館內政部檔案有關民國佛教史料的內容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有關「寺廟經濟」、「廟產興學」這兩部份的資料相當地多。也因為有這方面的資料，引發了我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這一次到南京二檔館所看的有關佛教的檔案，大部份也是這方面的問題，所以在研究時，兩方面的檔案剛好可以配合。

在以前處理一些有關經濟史的問題時，基本上是以檔案資料為主，但過分依賴檔案，而不知檔案史料之特色，可能會影響研究的客觀性。作為一手資料的官方佛教檔案，其史料特色大概有二點：其一是有關政府對佛教之法律規定、佛教組織（中國佛教會及各地分會）史料，屬於正常運作部份。其二是有關佛教問題之呈現，如檔案中所呈現的廟產爭執。由於這方面的檔案特別多，而造就了關於此項主題研究之可行性。就歷史選題言，事件本身若具有較高的衝突性，寫起來較有意義，讀起來也較有趣味。但是在其間，可能隱含某種陷阱，而讓研究者過分強調負面成分，反而扭曲了事件本身正常運作的部份。關於這一點，研究者本身要保持相當的自覺，以免過分膨脹自己的研究主題。當然，這有時並不容易做到。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在南京二檔館所看的有關民國佛教檔案史料，主要有六個全宗，又可細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國民政府時期，有《國民政府檔案》、《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與《國民政府內政部檔案》，其中又以內政部檔案為最多，因為宗教（佛教）是屬於內政部掌管，由這三個檔案就可以瞭解國民政府在 1949 年以前的佛教問題。

第二部份為《汪偽政府內政部檔案》與《偽北京臨時政府內政部檔案》，這兩宗檔案所涵括的時間主要為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檔案中可透露出日本隨著它的軍事擴張到中國所從事的一些佛教活動，對於了解 1949 年以前中日佛教的交流頗具有參考價值。第三部份為《北京民國時期內務部檔案》，這一部份時間就比較早，但在數量上卻較少，可做為研究民國初年到十幾年間佛教問題的參考。

以下謹就閱檔管見，提出幾個可以進行研究的論題，就教於各位。其實由歷史選題來講，應該是要由材料的性質與內涵來選擇。其中可能要先確定，到底要用多長的視角與縱深來研究民國時期的佛教史？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小的角度來探討的話，是可以達到比較精細的地步，但可能會埋沒在資料裡面；如果能夠跳出來用一個比較長遠的角度，反而能有綜觀全局的方便。幾個月前張瑞德兄曾提示我，不妨用百年演進的眼光，來看民國佛教變遷史，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如果這樣的話，著重的角度、解釋的方式，當與短而小的專題有所差異。從清季以來影響佛教變遷的重大事件來看，主要有四個階段：一、清末義和團運動。二、清季以迄民國二、三十年時期的廟產興學。三、抗戰前後日本在中國地區所從事的破壞佛教行動。四、文化大革命。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加以觀察與比較研究的。

以下我要談的是和我這次看檔案比較切題的問題，就是有關於寺廟經濟的問題。我記得 9 月初在北京碰到林滿紅小姐，她說：「你怎麼跳槽了？不再研究經濟史了？」因為她知道我以前是研究經濟史的，其實若從廟產經濟這個角度來研究佛教史，基本上還是不脫離十幾年來所從事的經濟史範圍。因為檔案裡面這方面的材料相當多，其中透露了一些問題，譬如寺院的土地相當多，引起了地方士紳（土豪）、地方官員（保甲長、鄉長、縣長）的覬覦，他們為取得寺院的土地，常利用興學的名義，藉機向寺方謀取寺產；又例如在抗戰時期，為實施新縣制、地方自治的建設費用，因為廟產很多，也成為各方需索的目標。其實這個問題牽涉到寺廟本身，因

爲千百年來的同一個問題已經呈現在那裡，佛寺常因擁有大批廟產，目標特別大，所以會引起當時社會上的注目。在檔案中也常見：某些地方官霸占寺廟、毀佛像、毆僧、驅逐僧人、囚僧等現象。因爲有上述這種現象，當地出家人就把這種情形報到政府機關，由政府機關來處理。

第二個問題就是有關中日佛教關係史的研究，整個中日佛教交流史，在早期都是由中國輸向日本，到了清末出現一種逆流的現象，即由日本反輸入中國。在抗戰前後，隨著軍事的活動，日本佛教界在淪陷區從事所謂「開教活動」，發生了很多問題，對於中國的佛教也有很多不利的影響，直到抗戰結束後才告一段落，在檔案裡面，有很多淪陷區的中日佛教問題，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

另外，我想提幾點有關蒐集檔案的一些感想：我們在研究任何問題時，許多檔案館（各省、市、縣）均藏有相關檔案，可前往參考。有些檔案館可能事先沒有料想到會有資料，結果去了就有收穫。像我在北京期間，請社科院近史所的曾業英先生帶我到北京市檔案館，裡面典藏有關佛教的史料特別多，光是目錄就有三大本，一千多卷，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倒想去看這批檔案，因爲這批檔案超乎想像中的多。另外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裡，也意外地發現了 1949 年以前部份佛教期刊（如《佛教評論》、《威音》、《佛學半月刊》、《佛教公論》），也是此行的意外收穫。

另外像是重慶市檔案館，也有一些相關的資料，值得前往參閱。其實佛教寺廟分佈在中國各地，所以除了掌握中央級的檔案以外，各地的檔案館如果能去深入探究的話可能都有。同樣地，在圖書館方面也一樣會有些資料。但是，問題是有些檔案館、圖書館在開放上有很多限制，如果我們能先知己知彼，再前往閱覽的話，則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檔案館、圖書館外，各地的寺廟也有一些出版品，雖然經過了文革，但是當地所出版的一些寺廟的史志還是可以發現。這些就不是光到檔案館、圖書館就可以找到的資料。譬如我在五台山就買到了很多有關五台山的資料，到武漢歸元寺就買到了一本《歸元寺》，到大同雲岡也看到了幾本書，在鎮江的定慧寺買到了《焦山志》，在粵北乳源雲門寺買到了《雲門山大覺禪寺》。又對於一個研究佛教史的人，掌握了基本的檔案資料以外，實地採訪是很重要的，如有合適的對象，甚至可以進一步作口述訪問。當然這都要有計畫地去做，才會比較有成果。



對於每一個研究領域的人來講，其實只要材料許可的話，研究主題是可以無限的伸延，譬如就近代中國佛教史來講，剛剛所提的是幾個可能延伸的研究題目，如果能再深入的去實地探訪，看多一點的檔案，應該有很多題目都可以進一步的去作。

最後，容我再做一次強調：如果大陸各地的典藏機關多一點「法治」的成分，少一點「人治」，那對於研究資料的蒐集上就會有很大的方便，研究成果也可以早日呈現。以上是我粗淺的心得，請多指教，謝謝大家！

**呂所長：**侯先生實際上已經把他研究佛教史學術的部份提出很多了，我想再給他一個鐘頭也講不完，因為他跑好多地方，到山西大同，五台山的廟就夠他講一個鐘頭了，將來有機會可以再慢慢講。下面我們請吳淑鳳小姐，她現在研究的是戰後 1945 年以後的這一段時期，吳小姐也是去了兩三個月，時間也是蠻長的，今天報告的主要重點是放在廣東。

**吳淑鳳：**廣東省檔案館位於廣州市合群二馬路省委大院內十號樓。要到該館查閱檔案，應事先提出申請，備妥申請書（讀者身分、研究主題、停留時間及查閱的檔案）和大陸學術機構的介紹函，批核後才准予調閱。但廣東省檔案館考慮遠道的讀者可能不諳規定，耽誤時間，遂通融現場辦理申請，資料齊全後，即可查閱目錄、調閱檔案。由於廣東省檔案館位於廣東省委大院內，出入均有武警駐守，管理較為嚴謹。進入該館時得先到省委的傳達室登記，傳達室位於合群一馬路人民醫院合群門診旁，傳達室查驗讀者的介紹函及證件，即另填一紙證明單，門口的武警核對此單與讀者進入時間無誤後，才會放行。所以，該證明單每次進入時均須填寫一次。

廣東省檔案館開放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 8 點至 12 點，下午 2 點 30 分至 5 點 30 分，夏令時間下午上班時間改為 3 點到 6 點，周五下午學習，不對外開放。閱覽室通常在下班前約半個小時即收拾善後，如果讀者停留時間短暫，可向館方說明並要求中午繼續閱覽。目前架上所有檔案目錄均對外開放，亦可複印。據該館館員表示，目前 1949 年以前的檔案除了海關檔外，均已完成電腦建檔，不懂五筆輸入法的讀者可請館員代為鍵入關鍵字查詢。我是以年代斷限自行在電腦上檢索，該系統可以做到檢索檔案涵蓋年代，譬如我要求 1945 年至 1949 年，該系統不僅能找到符合我要求年代的檔案目錄，同時也會列出該資料庫中跨及 1945 年的檔案目錄。讀者可挑選所需的檔案目錄，再一併列印。該系統有一缺點，檢索後的資料，若未能在開放時間完成工作，系統無法記錄已完成的階段，所以下次開機

時，得以相同條件檢索，再自行找到上次查詢的段落。當然也可利用書架上的目錄冊翻閱查詢，再抄下全宗號、目錄號和案卷號交給館員調出。

該館收費情形，每半天使用費 3 元，電腦列印檔案目錄每張 3 元（每張約可列出 20 到 22 則目錄），調卷費每卷 3 元。檔案複印費 B5、A4 所謂小張紙每張 4.8 元，B4、A3 則每張 5.1 元，外地讀者均是大陸讀者付費的 3 倍。另讀者最好在周五上午前歸還調卷，因為周五該館會將調出檔案歸架，周一若再調相同卷宗，還得再收一次調卷費。

該館曾出版《廣東省檔案館指南》(1991 年 9 月)，可惜目前存書不多，無法購得。到該館查閱檔案的讀者，並非全為研究，有的來查自己單位移交的檔案，解決疑義，甚至藉檔案證明資產歸屬，有的則是為了找先人的資料。

孫中山文獻館，位於文德路 81 號，是中山圖書館（即廣東省圖書館，地址是文明路 213 號之 1）的分館。孫中山文獻館典藏有孫中山文獻，廣東地方文獻，民國時期全國圖書、期刊和廣東地區的報紙，還有清代史料、東南亞及華僑史料等。該館原本開放時間是周一至周六上午 8 點至 12 點，下午 2 點 30 分到 5 點 30 分。從 11 月 1 日起，為加強服務，周一到周五中午休息時間雖停止借閱，但可留在館內繼續閱覽，周六開放時間則改為早上 9 點至下午 4 點，中午則不休息。臺灣讀者可憑臺胞證辦理閱覽證，7 天的閱覽證 5 元，半個月 10 元，一個月 20 元，半年 40 元，一年 60 元，該閱覽證可適用於中山圖書館的古籍室和特藏室。交通方面，公車 10、12、24、36、65、66、190、220、222、263、544 等路在文德路下車，或是 215、106 等路在文明路下車，還有周六、日因北京路規劃為步行區，1、7 路也會改道文德路，交通很方便。

孫中山文獻館調卷無需付費，但善本、珍本、1949 年以前出版的單本報紙、期刊和地圖，以及毀損不堪的圖書不提供複印，但可拍照、抄寫。善本類每拍 3 元，報紙、期刊每拍 2 元。複印方面，A3 每張 0.7 元，A4 每張 0.5 元，B4 每張 0.6 元，B5 每張 0.4 元，另須付每張 2 元的資料費。文獻館 1949 年以前的報紙不能複印，可到中山圖書館縮微室詢問所需的報刊是否已完成縮微或電腦掃描。中山圖書館典藏的報紙縮微比文獻館完整，亦可在該室閱覽，每小時使用費 2 元，複印 A4 每張 3 元；若已完成光盤的資料，可在電腦上閱覽，使用費亦是每小時 2 元，複印費每張 3 元。但因縮微機老舊，複印功能時好時壞，而且讀者不能自行複印，還是到文

獻館看原件比較舒服。

縮微室館員原先建議掃描我所需的資料，再由電腦印出，費用每張 6 元，我覺得太貴，與館員磋商，最後館員建議以光盤取代列印，除了付一張光盤費 16 元，另付資料費每版 3 元。

目前孫中山文獻館和中山圖書館的特藏室均提供所謂「一條龍服務」，即是依讀者主題代為查找該館、室所典藏的資料，以及代為處理複印、裝訂和郵寄工作。

住宿方面，距離廣東省委大院最近的招待所，是省委的培訓中心。培訓中心在合群三馬路省委禮堂旁，該培訓中心並不對外營業，外來讀者若要住宿得由省內機構代為介紹，入住時得有一位省方單位工作同仁以工作證為住宿者簽名擔保。該中心是由民家改裝，設備很簡單，櫃檯在三樓，沒有電梯，一般回房時需召喚服務人員打開房門，我以女性安全為由，要求自己持有鑰匙。省委培訓中心單人房不含衛浴 1 天 70 元，空間很小，亦有雙人房不含衛浴，其標準房 1 天 160 元，均提供空調、電視和市內電話。另可考慮稍遠處的合群大酒店（合群一馬路 43 號），據說是省人大辦的招待所，標準房是每天 250 元，由每層樓的服務員查驗房卡後，代為開門。這兩家住宿均須先付押金，結帳時培訓中心另收 5% 的交通建設費。合群大酒店附近生活機能很完備，有百貨公司、市場、小吃店等，搭公車到孫中山文獻館約需 12 分鐘。

廣州一到 10 月，活動頻繁，除了 10 月 15 日至 26 日的廣交會、11 月珠海航空展等大型活動外，另有大小不一的訓練課程，住宿問題得提早預定。聽說廣交會前 2 個月每家賓館幾乎都已預定額滿，即便住房費也會翻漲一倍，另各種交通工具在廣交會期間也是班班客滿。

至於吃的方面，合群三馬路上有省委自己辦的餐廳，如果停留時間長，可向檔案館借飯卡，解決三餐問題。這是一張 IC 卡，當師傅按下餐費，將卡靠近即可扣款，最後再與檔案館結帳。省委餐廳有兩處，較小的餐廳早餐有粥品、麵包、糕點、包子、水餃等，供應時間是 6 點至 8 點，午餐提供麵食，晚餐時外賣包子、饅頭等。大的餐廳午餐提供自助餐，白飯是以兩計，一兩飯至少有一碗飯的量，菜量大概是臺灣自助餐的兩倍，供應時間 11 點 30 分至 12 點 30 分，晚餐 5 點 20 分開始供應，菜色沒有午餐多，且供應時間較短。該區 14、15 號窗口是外賣區，提供沒有飯卡的人點餐，菜色不多，價錢約 5 元。另龜崗三馬路上有許多小吃店，飲食

無虞。至於孫中山文獻館，附近只有一家教工之家，合菜 5 元，菜色普通，可到文明路和北京路的小吃店解決民生問題。

此趟在大陸尋訪資料過程中，有三點感想：第一，廣州的圖書館、檔案館雖然收費較貴，但較有服務讀者的觀念，自動自發改善一些規定，而且服務態度也好。第二，對自己研究主題要向旁人多問多提，有時會有意外收穫。譬如我想寫戰後引渡匿藏澳門漢奸的問題，一直苦於無法閱讀葡文檔案作罷，因提及此事，廣東省檔案館的研究人員即借給我一本華南師範大學的碩士論文〈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可以解決我部份難題。另外，也因此看到廣東地區典藏報刊的調查報告。第三，費用方面一定要事先問清楚收費項目和如何計費，而且要表達自己的意見，適時地討價還價，往往可以奏效。

**呂所長：**謝謝吳小姐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的訊息，這裡面相關的生活資訊在我們看檔案的時候也是相當重要的。客人都已經講過了，接下來是換我們所內同仁來講，因為胡先生好像 12 點要離開，我們也正好排到胡先生，就麻煩胡先生先講。

**胡國台：**所長、各位同仁、各位來賓，今天我被分配報告的是上海檔案館與上海圖書館兩部份。個人的建議是前往大陸之前先做一些確認工作，譬如說上海檔案館，本所館藏有《上海市開放檔案館全宗目錄》，目前已經發行 13 批，本所館藏缺 11 批。今年 7 月份我個人曾經親自到上海市檔案館收集資料，並要求購買 11 批。服務人員說：「我們不賣 11 批。」在我堅持一定要買的情況之下，他拿出來薄薄的一本冊子，花費幾塊錢買來一看，才發現小冊子裡面只有一個檔案目錄。頓時大悟，大概是內容單薄，不好意思賣。

另外，大家也不要對開放檔案太過於樂觀，因為開放檔案中間還隱藏不少不開放檔案。第二個就是我們在行前的時候最好聯絡一下上海市檔案館，上海圖書館則是不需要事先聯絡的，以下我先談上海市檔案館。

上海市檔案館位於仙霞路，吃飯不方便，從檔案館走路能到的範圍大概就只有一個麵館。所以，我第一天實際上就已經有了準備，帶了三明治去。至於查檔案還算方便，有詳細開放檔案卷宗目錄可供查詢，可是其中隱藏了太多不開放的檔案。譬如說查到同濟大學、交通大學，很開心地調出詳細目錄，仔細一看，發現目錄後面至少有一半註明是不開放的。經過請教服務的人員，才發現為什麼不開放的理由，講得都很有現代化的想

法，因為檔案裡面涉及了個人隱私權。只要是名單、會議紀錄，通通不准開放。我進一步企圖說明開放目錄涵蓋太多不開放檔案，對查檔案者很不方便。他說：「你可以試看看，我們領導或許會批。」我就問領導怎麼批啊？他說：「三關」。所以要先過三關、斬六將，才能看到有些檔案。上海之行，時間有限，待查資料多如牛毛，不容荒廢，不開放就算了，不看了。

大約估算了一下，開放檔案目錄中，平均有一半的檔案是不開放的，其中大部份是人名、名單、會議紀錄。還有一個有趣的發現，檔案裡面很多都是有關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資料，他們檔案的目錄全部重新整理過。有關檔案命名更有意思，誠如剛剛吳小姐說過，檔案名稱通常很長。我發現檔案名稱不但長，而且很奇特。譬如有一次看到一個檔案名稱叫做「匪青年團」，本以為是有關共青團的檔案，可能國民黨原檔案內用的是「匪」字，結果打開一看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又誤以為是很早期整理的，好奇之下詢問，答案是最近幾年才完成的成果，墨跡猶新。由此可見兩岸暗地裡互貼「匪」字標籤，反應敵對意識深入人心。

至於複印很方便，只要是開放的檔案，全部都可以調出來複印。印完了以後，館方還會註明案卷號，省了很多抄錄功夫，在別的地方還得賣力地抄案名。但是它也有缺點，就是全部靠傳統的目錄卡片，沒有電子數位化的書目，這是不方便的地方，有待改進。入館可以帶筆記型電腦以免手抄，但是電腦插座少，所以要早一點去佔位置。另外建議，如果在當地有認識研究生的話，可以請當地研究生來幫忙，花些錢但可以省很多時間。

上海檔案館開放的時間，大概到中午 11 點 30 分以後就不調新檔案了，中午休息時間到一點半。這段時間有個好處，雖然不調閱，但是可以在那邊看資料，邊吃三明治。更好的是它有空調，不像南京二檔館，7、8 月份坐在那邊就汗流浹背了。

剛才吳小姐提到 IP 卡跟 IC 卡，IP 卡去年我也遭遇困難，所以今年特別買 IC 卡，又碰到一個特別的經驗，就是上海圖書館裡面，黃色的電話筒才可以用 IC 卡，裡面一層有兩個黃色的電話筒。第一次去打的時候，兩個都通，第二天打的時候，有一個不通。電話內還會傳出：「暫停通話服務，電話忙線中。」實際上是電信局在控制那個線路。有一次插入 IC 卡，LCD 液晶顯示板出現：「你撥出的話筒號碼是不合法的」，其實是這個號碼暫時被切掉。第二天再去試同一隻話筒又通了，換另一個則不通，

彈性很大，全靠運氣。

上海圖書館是我去過這幾個館裡面，印象最好的。很有國際水準，它裡面有兩個部份是我常常去的，一個是近代史資料室，一個是上海地區研究室，這兩個資料室都非常好。

上海圖書館基本上去之前不需要跟他們聯繫，只要到一樓用臺胞證辦個臨時閱覽證，費用 20 元人民幣，有效期一個月。一個月到期之後，再續辦。上海圖書館很大，電子數位目錄尚在建置中，所以去查它的卡片有三種書目卡，即作者、書名、分類三種卡片。特別提醒大家，去的話不要只依靠一種，如果書名卡裡面找不到的話，也可能在作者中找到。如果三個都找不到，還是有可能找得到，可以詢問館員代為查詢，館員服務態度和善。至於影印費用彈性大，由館員彈性決定。也可以帶筆記型電腦，不過插頭很少，可以考慮帶延長線與多向插座，以免有人捷足先登時，仍可以分享電源。

上海圖書館有個好處，吃飯很方便，地下室就有餐廳，但是人太多，點菜、找位置都需要等。而外面有許多伙食，有個體戶快餐店，約 7 至 8 塊，上菜快，又經濟實惠；也有很好的餐廳，質量較佳，一客約 20 至 30 塊人民幣。更好的是館內附設書店，旁邊還有一個賣光碟片與文具的店面。內部可以找到水準很好的 CD 片，可以買到全世界做得很好的光碟片，而且已經中文化，譬如像藝術方面的東西，有法國、義大利藝術家、音樂家的作品，大概只要 20 塊人民幣。而大陸本身出的光碟片，只要 10 塊人民幣，這是個意外的收穫。

順道一提，本所與上海檔案館、圖書館都簽訂有合作計畫，希望下次再續訂合作計畫時，應該有實質的利益。譬如上海圖書館有些書有十幾個複本，我們就可以請求交換。另外，館內所收藏抗戰之前的資料也相當的多，希望本所能交換或互贈。今天我的報告到這裏。

**呂所長：**謝謝胡先生。上檔和上圖和我們的關係很好，他們對推動學術工作不遺餘力，上圖和上檔最近想和我們合開學術會議，海峽兩邊輪流開會，也是一樁好事。接下來就麻煩游鑑明小姐。

**游鑑明：**自 1992 年以來，我到過大陸 4 次，第一次因私費去開會和探親，僅在徐家匯圖書館和復旦大學歷史系圖書館短暫瀏覽；此後三次因獲公費補助，到北京、南京、蘇州、上海和杭州等地的檔案和圖書典藏機構進行研究與資料蒐集，主要是北京圖書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南

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蘇州大學圖書館、蘇州市檔案館、蘇州圖書館古籍部、上海檔案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上海圖書館、上海辭書出版社、浙江圖書館、杭州大學（目前已與浙大合併）體育史資料室、浙江省檔案館和杭州市檔案館。為不與其他引言人介紹的典藏機構重複，我除了補充部份之外，主要介紹同仁尚未前往的機構。

首先，我以上海為軸心，先介紹該地資料的典藏情形。上海圖書館確實是具國際水準的圖書館，週末也全日開放，不僅設備完善，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頗為親切，上圖近代史資料室的最大特色是典藏 1949 年以前的期刊報紙，其中期刊的查閱卡片列有提要，讓讀者能從中得知該期刊的性質與大致內容。據稱上圖仍不斷向各地圖書館徵集舊期刊，因此卡片的提要編寫工作一直在進行中；換句話說，該館有關 1949 年以前的期刊資料是有增不減，隔一段時間去蒐集，必然有新發現。至於住的方面，上圖附設有旅館「圖安大酒店」，計有 25 間客房，環境單純、幽靜，價格也公道，並附贈早餐。訂房以傳真知會即可，本所同仁可享 8 折優惠。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也典藏不少 1949 年前後的期刊書籍，採開架式閱覽方式；惟書刊多半陳舊，易破損的書刊，管理人員僅准手抄或電腦輸入。上海辭書出版社基本上是典藏 1949 年以前的教科書與教育史書刊，這些資料原為商務印書館所有，該出版社對陳舊易損壞的書刊一樣不准複印。

其次，到了上海以後，可將行李寄存旅館，再北上南京或蘇州。南京大學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同樣藏有豐富的舊書刊，南大複印費相當昂貴，多半刊物只准拍照不准複印，拍照是由該館負責；南圖典藏許多 20、30 年代的資料，據該館人員表示，這些資料並未列在《全國總書目》中，因此一般讀者不熟悉南圖藏書狀況。我在該館研究期間，發現該館典藏的書刊確有其特色；遺憾的是，目前該館的複印費比照南京二檔，奇貴無比。

由上海北上蘇州交通相當便捷，可搭乘高速巴士，約計一個半小時即可抵達蘇州；由於夜間的巴士站群集各種野雞車，在人生地不熟之下，最好選擇白天前往。蘇州檔案館以典藏該地檔案為主，設備相當新穎，前去調閱資料務必一個月前聯繫。蘇州大學圖書館共計四層，1949 年以前的書刊典藏於四樓，資料複印則於二樓，每頁複印費為 0.8 元人民幣，除此之外，另有調書費，外國學者調閱的價格較當地人昂貴。至於蘇州圖書館古籍部也典藏 1949 年前後的書刊。古籍部備有期刊目錄，並准許複印資料。但目前古籍部已於 10 月下旬閉館，擬另遷他地，預計於 2001 年 6 月

再開館，日後是否准予複印，無法預知。需要補充的是，據說蘇州博物館藏有不少明清善本書，如何借閱或是否能複印，因我不及前往，無法得知。

再次，從上海南下杭州可搭乘高速巴士或高速火車，杭州大學體育史資料室歸屬該校體育系，是目前中國大陸保存近代中國體育期刊最完備的機構。浙江圖書館位在西湖風景區內，是典藏 1949 年以前書刊的重鎮之一，有不少書刊是其他圖書館所未藏；缺點是該館屬古蹟，設備較陳舊，特別是衛生間設在館外，周圍盡是雜草，而且僅以口型牆阻隔，未裝設廁門，對女性不甚方便。浙江省檔案館和杭州市檔案館分別典藏省和市的檔案，與蘇州檔案館一樣，前去查檔之前宜先行聯絡，以免敗興而歸，至於複印價格則尚公道。

綜括言之，上述圖書館、檔案館或研究機構，除上圖無須介紹函之外，其他各機構均需預先聯絡或請當地學者代為推薦。在資料複印方面，上圖、蘇大圖書館、杭大體育史資料室和浙江檔案館訂有標準價格，其他機構均無明確規定，當地人與外地人的複印費也不一致。此外，這些機構中午多半閉館或不調書；但有時會酌情處理，我因行動欠便，大體上能得到管理人員的通融。由於同仁赴中國大陸蒐集資料的時間相當緊湊，又有資料無法蒐集齊備之憾，臨行前，宜掌握該機構的資訊或自製目錄，俾免重複複印；同時紙、筆、釘書機、立貼等文具儘量備齊，圖書機構是不供應文具，而且不是每個地方都能方便購得文具。總之，有充分的準備，將使蒐集資料的工作更加順暢。

**呂所長：**我最近去上海時，承上海圖書館人員告知，準備在最近二三個月內要出版一本庫藏的期刊題要目錄，即是游小姐提到的卡片提要，他們答應出版以後會立刻送給我們所內一本，這是工具性的一本好書。下面請余敏玲小姐談一下香港中文大學的狀況。

**余敏玲：**我所做的研究是 50 年代到文革前的中蘇文化關係，香港的工作環境要比大陸好很多，吃住方面也不是問題，因為香港中文大學內有賓館，學生食堂也很多，吃住不是麻煩。到香港中文大學去看資料很方便，只要像所內圖書館一樣，簽個名即可，頂多要求妳出示一下工作證，開放時間非常長，從早上 9:00 到下午 5:50，週六也開，從早上 9:00 到 12:15，複印也很便宜，只要港幣 4 毛錢，A4、A3 都是同樣的價錢，而且全部是開架式的，上網可以找得到目錄，但上網的目錄和圖書館內的目錄有點不太一樣，圖書館內的目錄比較詳細。它有些目錄是不公開的，必須要有人



告訴你才可能知道，他們才會拿給你看。

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服務中心原隸屬於美國的 ACLS（美國學者聯合會），它原是為一批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在香港於 1963 年建立的，由美國一些基金會資助，1989 年才由香港中文大學接管。他們所收藏的報紙很多。屬於直轄市綜合報紙種類共有 42 種，從南到北，重要的城市如：南京、北京、廣州不談，連新疆、西藏也有。許多是從創刊或 1950 年開始已有收藏。期刊方面，我需要的 50 年代比較少，一般都是 70、80 年代之後的較齊。

此外，浸會大學從友聯研究所接管的有關中共的期刊書籍和剪報目錄，我帶回來給圖書館印了一份，同仁可自行參閱。浸會把友聯的剪報都製成了微捲，可是有一點很不方便的是，他們把主題依年代分拆下來拍攝，同一個主題因為年份不同得抄好幾個書碼。複印費是港幣一元。

另外值得一提，特別是要研究 50、60 年代，當時的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做了一個很好的收集工作。他們將大陸出版的報紙，按日期做了整理、摘要和主題索引，那個刊物叫做 SCMP（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1950 年開始出版），現在中大計畫將此資料重新掃描。建議所方與其合作這項掃描計畫。這是一份研究 50、60 年代中共非常好的史料。

**呂所長：**謝謝余小姐。中大的大學服務中心我去過，據知他們有些副本書願意送給我們，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再跟他們聯絡。接著我們麻煩陳慈玉小姐。

**陳慈玉：**此次為執行戰時日本對東北亞工礦業的經營之研究計劃，承蒙所方補助，於 10 月 12 日至 25 日到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和北京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蒐集相關資料，茲報告如下：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自成立時就非常重視圖書資料的蒐集，其創始人何廉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中國大學圖書館的藏書中，無一例外，主要是些歐美出版的教科書、普通讀物和通俗雜誌，很少收藏中文原版的貿易報告冊、政府公報、統計資料和專門性刊物，教師無法開展研究工作。因此，該所自始就大量收集供經濟研究工作的各種資料，如《海關貿易報告及統計冊》、《中華民國統計提要》、《中國實業志》、《中國經濟年鑑》、《中國勞動年鑑》等。對於各種地方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調查材料尤其注意收集和保存。該所教師和研究生的論文（手稿）也盡數入藏。這些珍貴的資料都按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分類法編目，分類、書名、作者三套

卡片目錄完備，讀者稱便。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抗日戰爭期間這批資料幾經波折，運往重慶，戰後悉數返津，並陸續向日本索回被拿去的書籍等。

這些資料一直放在大學的總圖書館，去年科技大樓啓用後，即被移至該大樓一樓的一個大房間。由於利用者不多，學校管理人員有限，所以規定僅在每週三上午開放。

我於10月12日（星期四）抵南開大學，翌日是南開校慶，不上班，週六和週日亦然。到星期一，雖然經濟所「老圖書」不開放，但由於經濟所教授請校方「外事辦」寫一公函，說明我的身分，拿到總圖辦公室；該教授並事先向相關人士打電話，所以「老圖書」的管理人就特別讓我閱覽。

此次我想查閱的是開灤煤礦檔案，這些檔案大多是手抄的，經過文革和唐山大地震，已毀滅了不少，現存的只有一些零星片斷，很難在短時間內掌握。所以，只得退而求其次，根據圖書館所編印的《南開經濟研究所中日文圖書資料索引(1927-1952)》，翻閱和抄錄工礦業相關的調查報告。

星期二（10月17日）我從天津到北京，星期三拜訪經濟研究所。該所圖書館藏書豐富，索引卡片亦很完整。我當即借了一些礦業勞工相關的中日文調查資料，到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去閱讀。然後再逐一翻閱民國初年以來中華礦學社所出版的《礦業週報》。

除了蒐集資料外，另一收穫是和此兩經濟研究所的教授們從事學術交流。由於出發前數月我已和他們聯絡過，所以應他們之邀請，各發表一場主題不一樣的學術演講，也認識到他們的研究概況及其方向。

此兩所經濟研究所對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可以說有一類似的特色。大致而言，南開經濟所秉承何廉、方顯廷先生創所以來的學風，倡導將西方經濟理論應用於中國史實，注重調查研究與科際整合的研究方法，例如最近出版的新書（如：劉佛丁主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王玉茹、劉佛丁、張東剛，《制度變遷與中國近代工業化——以政府的行為分析為中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就非常重視新制度經濟史學。同時，他們也發現到承襲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一些相異於西方的因素，因此他們企圖以新的概念和結構模式來說明這個與西方不完全相同的經濟形態，進而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和突破。另一方面，社科院經濟所在吳承明先生的影響之下，嘗試探討經濟發展、制度變遷和社會與文化思想變遷的關係（當然，並非兩所的成員都是這種研究方法）。而從該所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期刊中，也可以看出他們對於

修正西方學者的相關經濟史理論的努力。

**呂所長：**謝謝陳慈玉小姐跟我們講了很多北京、天津的事情。我去過天津的總圖書館，看過他們的珍藏室，但東西不多，可能是因為抗戰時期遭到轟炸的關係。後來有人告訴我，如果是研究經濟史的話，那邊有很多豐富的海關資料和檔案，還沒妥善加以運用，所以那個地方還是值得繼續開發。至於北京的經濟所就有以前的中研院社會所藏書，的確裏面有很多好材料，我手上有一本期刊目錄要送給圖書館。那個地方資料很多，特別是社會科學方面的資料，服務也很不錯，如果同仁有機會到北京的話，值得到經濟所的圖書館去看看。接下來我們請張寧小姐報告。

**張寧：**我於今年 10 月至 11 月前往上海、武漢、天津三地查閱洋行資料，由於這次座談會中已有不少同仁介紹上海市檔案館，我將集中於武漢和天津市檔案館，並附上這兩個機構的基本資料，供大家參考。

洋行資料多半對外不開放，原因有二：第一、大部份洋行資料都是外文，檔案館人員不能完全掌握；第二、他們擔心其中可能涉及當年洋行撤離中國時的產權交割問題，為了安全起見，故不開放。這些擔心其實沒有必要，1950 年代中國政府迫使洋行離開所採取的方法雖厲害，但迂迴、合法，更重要的是，各國商行以英國擁有資產最多，而中、英雙方因九七香港回歸問題，已於 1988 年簽訂了資產清算協定，中國方面提出一筆賠償給英國，所以兩者之間已經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不管如何，因為檔案性質的緣故，我在每一個檔案館都遇到一些困難，可是我還是想辦法看到了一些資料，上海及武漢市檔讓我看，但不讓我複印，所以我只能一路抄，從上海抄到武漢。

武漢市檔案館最好的地方是開放時間長，從早上 8:30 至下午 5:15，中午只要已經調檔出來的話，可以繼續看。去之前要先傳真個人簡況表和查檔清單，要查檔清單的原因是因目錄不開放，必須由接待人員依照查檔清單來調出他們認為讀者需要的東西，但對學術工作者而言，這種方式常有與所需不符的問題。而且調卷費不低，對臺灣人每卷收人民幣 12 元，最麻煩的是它是按天計算，如果同一卷連看三天，費用就要算三次。總結武漢市檔案館目前的情形：第一、收費項目多，包括調卷費、檔案服務費、摘抄費等，而且費用高，港、澳、臺胞的收費為本地人的三倍，外籍人士更可高達六倍；第二、沒有辦法自由查看目錄；第三、查檔方面有很多限制，必須要很有耐心地跟他們慢慢磨，很難速戰速決。不過，未來的展望

不錯，因為新任副館長涂文學先生，原為武漢市社科院的研究員，有可能未來對學術工作者採取較開放的態度。而且涂副館長也已表示，希望在近期邀請華中師範大學的章開沅和馬敏等先生一同對該檔案館的檔案進行鑑定，對於未經鑑定的檔案，在鑑定後予以開放，對已鑑定但意見老舊或過時者，重新界定。

至於天津市檔案館，它比較開放，收費合理，態度也好，但是也不能看目錄，不過閱覽室沿牆有兩排卡片櫃，分為建國前和建國後，可以略補不足。此外，天津人純樸，物價也比上海、武漢要低，我中午和晚上常在市場裡逛來逛去，一方面找地方吃飯，一方面看看天津人如何過日子。在乾冷的北風中，穿著厚重的大外套、圍巾、手套，混在熱鬧的人群裡，觀察各式蔬果、熟食的買賣，是查檔之餘的最大樂趣。

(附表一) 武漢市檔案館與天津市檔案館基本資料

	武漢市檔案館	天津市檔案館
地址	武漢市漢口一元路 5 號	天津市南開區復康路 11 號增 1 號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15pm, 中午可繼續看	週一至週四 8:30am-11:30am, 1:30pm-4:30pm, 中午休息; 週五半天, 週六、週日可預約查閱。
收費方法	調卷費：每卷每天 RMB\$12 查檔服務費：每天 RMB\$30 影印：A4RMB\$1.5、B4 RMB\$2.1 摘抄：每頁 RMB\$9	只收影印費，每張 RMB\$1 上下
住宿	長海大酒店 地址：漢口沿江大道 111 號 Tel: (027) 8281 8980 Fax: (027) 8281 1107 三星級，距檔案館步行 15 分鐘 費用：經講價後，每日 RMB\$280，另加 10%手續費，供早餐	華城賓館 地址：天津市南開區紅旗南路 253 號 Tel:(022)23369219; 2336 8444 Fax:(022) 2336 8395 二星級，距檔案館步行 20 分鐘 費用：每日 RMB\$180，供早餐

**呂所長**：謝謝張寧小姐。張寧小姐的文字報告中有一個比較表，這個基本資料蠻好的，以後同仁若要去武漢或天津的話，這裏都有很詳細的資料可參考。下面麻煩林美莉小姐。

**林美莉**：我在今年 6 月及 8 月間兩次到重慶市檔案館及重慶市圖書館查資料。重慶江北機場有巴士開往市區，約半個小時一班，但由香港飛重慶的飛機每天只有固定的一班，而且飛機到機場已經晚上 7:45 分，若搭巴士到市區，再由市區「打的」到沙坪壩，至少得花一小時，因此最好是事先請人來接機。

重慶市檔案館是以典藏抗戰時期陪都研究史料聞名的機構。與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相較起來，它的收藏極具特色，是研究抗戰史的學者必到的地方。依規定，查檔者須事先把查檔目的及需要看的資料寫一份查檔提要，寄給館方審閱，我先查閱他們出版的《重慶市檔案館簡明指南》，挑出需要看的函目名稱，用 E-mail 和他們聯絡，E-mail 地址是 jguxu@public.cta.cq.cn。來館時須有工作單位開具的介紹信。由於重慶是著名的三大火爐之一，據說如果炎夏氣溫超過 38 度或 40 度以上，下午會休館。

檔案館的接待人員相當親切，除了將開放檔案的所有目錄放置於閱檔室供學者直接查閱之外，也為研究者提供卡片檢索的服務。例如我請他們以「走私」及「物價」來檢索，他們就找了三個抽屜的卡片，讓我在龐雜的檔案中快速找到需要的資料。由於抗戰史料實在極為豐富，讓我常感時間不足之憾。文件複印部份，絕大部份都可複印，但是若文件破損，或是照片，或其認為有特殊考量者除外。查檔者用複寫紙填好一式三份的複印登記表後送印，大約需半日（至少 2 至 3 小時）才可取件，他們會把印好的資料連同一張複印登記表讓你核對，如果有不能複印的部份，接待人員會告訴你那些部份未印，讀者即須自行抄錄。建議大家一定要在回國前至少預留一天的複印與核對資料的時間，否則會很緊張。由於檔案館不允許使用筆記型電腦輸入資料，若須抄錄資料則須使用其館內提供的紙張。我兩次在那兒都用複印的方式找資料，從不抄錄，所以我不知道抄錄要花多少錢。另外，檔案館從 1989 年開始出版《檔案史料與研究》期刊，每年四期刊佈史料，本所圖書館現在已經補齊全部的期刊（從創刊號到 2000 年第一期），而且在我為本所帶回的《重慶市檔案館四十年》這本書的 301 到 310 頁，有這份期刊從 1989 到 1999 年的總目，大家可以查看，若

已刊佈自然就不需要浪費時間去調閱檔案甚至影印了。

重慶市圖書館「保存本圖書查閱室」收集了許多抗戰時期的書籍及期刊，並曾於 1957 年及 1958 年各編輯出版了《抗戰時期出版圖書書目》的第一及第二輯。我事先借到第一輯書目，勾選了部份書籍再前往訪查，第二輯書目則是在當場借閱。除了看這二本編輯出版的書目外，閱覽室外面也有卡片櫃，讀者可以作者、書名或分類來檢索。這裏的收費標準，讀者調借書籍，每天的基本收費額是 5 元，可借 5 本書，每超過一冊加 1 元。當日若未看完，隔日再借同一本書也須再重新繳費。這裏的複印費用不高，但是資料保護費依原稿收每頁 5 元，也就是說每張影印的資料如果是一本書的兩頁，就要收 10 元，而且這還是對國內學者的標準，「涉外讀者」則須依此標準再加 5 至 20 倍不等的費用。由於收費高昂，大陸的研究者幾乎都是採取抄錄的方式，國外學者則多攜帶筆記型電腦輸入資料。

(附表二) 重慶市檔案館與重慶市圖書館基本資料

	重慶市檔案館	重慶市圖書館
地址	重慶市沙坪壩天星橋曬光坪 56 號	重慶市渝中區枇杷山正街 93 號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11:30am, 2:00-5:30pm。	週一至週五 8:30am-5:00pm，中午可繼續閱讀。
收費方法	接待費：每天 RMB\$40 (不另收調卷費) 影印費：A4 RMB\$1、B4 RMB\$2 資料保護費： 1. 檔案：A4RMB\$1.5、B4 RMB\$1.5 2. 資料：A4 RMB\$1、B4 RMB\$1 歐美日等外國學者依此收費標準加倍收費。	調卷費：每卷 RMB\$1 影印費：A4RMB\$0.5、B4 RMB\$1 資料保護費：依原稿收每頁 RMB\$5 「涉外讀者」依此標準加收五至二十倍不等的費用。
住宿	麗苑大酒店 地址：重慶市沙坪壩天陳路 13 號	

<p>Tel: (023)65316666          Fax: (023)65319999          四星級，距檔案館步行 25 分鐘          費用：重新協議價每日          RMB\$310，供早餐（不附早餐          的特價房每日 260 元）</p>	
---	--

位於成都的四川省檔案館（地址在成都市花牌坊街），其館藏特色以巴縣檔案聞名，與我的研究主題相關的民國史料並不多。我在成都透過四川大學歷史系的介紹，住在川大的國際交流中心（應是留學生樓，每日收費 100 元，附早餐）。到四川省檔案館查資料須有國內接待單位的介紹信，我持川大為我開具的證明單去申請，經檔案館接待人員陳報請示，在二個小時的等待批准期間，我先查閱放在閱覽室的開放檔案目錄並先填好借閱單，一獲得批准就送件，不過由於他們中午要休息，我還是得等到下午才能看到資料。該館的開放時間是從早上 9 點到 12 點，下午 2 點到 5 點，和重慶市檔案館差距不大。至於收費狀況，是我在大陸各檔案館查檔經驗中最低廉的一次，由於川大在為我開具的證明單上記載我是其系上的訪問學者，我的收費標準比照其國內學者的標準，即查檔期間收一次接待費 10 元，調卷每卷收費 2 元，複印每頁只收 0.3 元的資料保護費。在我回國之後，據說其收費標準在 7 月份曾經大幅調整，即調卷費每卷 5 元，複印費每頁 2 元資料保護費，「涉外讀者」依此標準加 3 至 5 倍不等的費用。所以，我在成都的待遇可能是空前絕後的優待吧。在四川生活要注意吃飯問題，四川人吃麻辣燙是有名的，我在重慶有次一時不察，點了「紅燒牛肉麵」，上頭浮了一層紅油，原來四川的「紅燒」其實就是加上紅油辣椒的「川辣」，後來我在點餐前一定要問清楚加不加辣椒。

最後是福建省檔案館（在其出版的檔案館指南上的地址是福州市銅盤路泉塘村，但我在「打的」時發現要告訴司機要到「屏西新村」他們才知道），這是我在去年 7 月中旬去的單位。這裏的資料當然是以福建為主，但也有不少有關臺灣史的資料。館方要求須有國內接待單位的介紹信，於是我請南京大學歷史系幫我開一張介紹信，我先到南京二檔館看完資料後再到福州。本館的開放時間從早上 9 點到 12 點，下午 2 點到 5 點。其檔案目錄不公開陳列，讀者須先參閱他們出版的檔案指南，先查明檔案機關及全宗號後向他們要求借閱。同時他們還提供電腦檢索服務，例如我以「走

私」要求檢索，服務人員在半小時後交給我四張列印的報表，包括檔案編號、事由摘要及年份，相當方便。收費部份，他們在結賬時會列印一張明細表，包括手續費（手續費以每一張調卷單 9 元為單位，一張調卷單有十格，同一編號的史料寫在一格內，故有時一格會調出 5、6 卷資料）、調卷每卷收保護費 1 元、複印 A4 每張收保護費 1 元及複印費 0.35 元，另外還有摘抄費和諮詢費等項目。

我在這兩年好幾次到大陸收集資料，因為我相信運用檔案進行詳實研究，會是當代史學持續發展的一條必要途徑。據觀察，會去大量利用大陸檔案機構的通常是來自海外的研究者，一般大陸學者或研究生沒有辦法支付這些開銷，我在南京大學就聽到有的教授感嘆其研究生只用二手或三手史料來作博士論文的情形。看檔案非常辛苦，往往工作一天找不到多少可用的史料，而且如果對自己研究主題的問題意識不夠清楚的話，會讓人有淹沒在檔案中的感覺。我覺得事先的準備很重要，在臺灣先過濾完本地史料，把大陸資料作為補充不足的部份，這樣子就圓滿了。大陸很多檔案館都會編印出版其檔案史料，我每到檔案館時都先要求購買其出版品，在查檔期間不時與調閱的史料對照，這樣子可以避免花了時間與金錢查檔，而在回國後發現辛苦收集的資料居然早已出版的情形。像南京二檔有一些大部頭史料集如《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我就先閱讀與我研究相關的部份，先有個大概的印象，並把目錄影印下來，在查檔時靠過去的記憶和適時地查對，都能找到自己研究所需的史料。

最後，我再補充一下胡先生提到上海市檔案館的吃飯問題，我在今年的 8、9 月間也在上海和南京看資料，所以或許會有一些比較新的資訊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我在上檔查資料時住在古北路 628 號的利嘉賓館，離檔案館只要走路 5 分鐘就到，那也是在今年才開的新旅館，標準間定價 380 元，我和櫃臺討價還價後以 8 折成交，即每天 304 元，並附早餐。至於午餐，上檔對面的麵館的確口碑不佳，我有時就和同在上檔查資料的學妹一起在利嘉賓館裏點菜吃飯，有時候也會從仙霞路前面往虹橋賓館的方向走大約四五百公尺，那裏有一家臺商開的「喜年來」點心店，可以吃擔擔麵、炒麵、炒米粉、蒸餃、小籠包、雲吞湯等，價錢頗公道，而且比較衛生。在我回來後，像張寧、羅久蓉和游鑑明小姐等人都從我這兒得到這些吃住的相關資訊，也藉這機會提供給大家。至於二檔館的情況，今年也有改善，他們在酷暑期間就讓查檔者在一間有空調的房間看檔案，複印的



限制也稍有放鬆。實在很抱歉，佔用這麼多時間。

**呂所長**：謝謝林小姐，最後麻煩張建偉先生，他談的是貴州，我們同仁好像沒有人去過。

**張建偉**：各位好。首先，我先補充各位之前所談到的一些訊息，香港大會堂圖書館（位在港島中環立法會的對面），它等於是香港的公共圖書館，有非常豐富的英文資料，還有很多報紙，保存非常完整，且縮微複印只要投幣就可以了，可說相當方便。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貴州地區的大略情況。在大陸來說貴州是以窮困聞名的地區，所謂地無三里平，直到今天，在省會貴陽街上，仍然可以看到許多少數民族的青年人背著竹簍子撿破爛，許多街道、建築物甚至仍是抗戰時期的產物，和以上各位介紹的大都市相比，貴陽毋寧是最為寒酸的城市了。

貴州地區蒐藏的史料主要仍集中在貴陽市，可以介紹的有貴州省檔案館、貴陽市檔案館以及貴州省圖書館。貴州省檔案館曾出版檔案指南，所裡圖書館也有收藏，他的檔案特色仍以貴州地區的行政、教育、財經等機關團體的檔案為主，唯一的例外是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檔案，因為該總隊的屬下救護隊遍佈抗戰時期全國戰區和大後方，包括解放區。貴州省檔案館正在籌建新館，他過去舊庫房的收藏環境似乎不佳，許多檔案有受潮發霉的情況，檔案本身也沒有經過整理、裝訂，顯得較為雜亂。可能由於地處偏遠的關係，同時看檔的人很少，除我之外只有兩名，所以閱覽室也很小，大致上鼓勵抄錄，雖可複印，但審核很嚴，批准的不多，且複印費 B4 一張 5 元，兩張 A4 算一張 B4 的錢。開放時間從早上 8:30-12:00，下午 2:00-4:30，調卷看目錄很方便，不會刁難。比較麻煩的是附近沒有看來較為衛生安全的飯館，所以每天中午必須來回奔波。

其次介紹貴陽市檔案館，這個檔案館建築較新，管理似乎較上軌道，舉個例子，在該館的一樓櫥窗裡，張貼從館長以下工作人員的照片、姓名，很有負責服務的精神。該館收藏的檔案較省檔案館範圍更窄，主要以貴陽市相關檔案為主，不過也有少量舊圖書、期刊可以借閱，我去那邊也是看救護總隊的檔案。檔案的整理較有系統，讀者還檔時，管理人員也會略做整理、檢查，檔案紙張很乾淨，裝訂得很整齊。可以複印，且工作人員複印的態度很認真，印不好重來，海外讀者複印費一張 3 元。櫃臺人員服務親切，整體說來，貴陽市檔案館的服務品質在大陸各檔案館中，可能是名

列前茅的，也是很少見的。

貴州省圖書館目前在籌建新館，它的特藏部暫時棲身在貴州師範大學的圖書館樓上，借閱的讀者很少，須以卡片櫃查目錄，主要仍以抗戰時期資料居多。貴州省圖書館的資料在數量上可能不如四川或南京，但有時頗能收補闕之效。舉個例子，我曾查閱紅十字會的幾種期刊（會務通訊、救護通訊等），在黨史會可找到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南京可補充二分之一，其餘找不到的在貴州省圖書館全都找到了。複印限制較少，印一張約兩元，不過影印機效果較差。

貴陽生活指數較低，飯店住宿約 200 元左右，如借住在大學招待所，如貴州師大招待所，更便宜，約 100 元左右，冷氣、衛浴都有，只是設備較為陳舊。飲食也很便宜，但未必可口，尤其是衛生問題較令人感到擔心，一般生活用品當地都買得到，但有些電器用品當地未必有貨，例如我曾爲了買一個轉換插頭，跑遍貴州大小商場，遍尋不著。

總結貴州地區史料的情況，大致說來，除了區域研究的資料外，抗戰時期相關研究的素材相當豐富，而這是過去兩岸史學界較為忽略的。其實從地理位置來看，貴州尤其是貴陽地處西南上四川的必經之路，爲大後方交通樞紐所在；而也正是在抗戰期間，貴州當地不論在文教、經濟、交通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值得學者加以重視。特別目前該地區資料使用者不多，更是前往拓荒尋寶的好時機。

**呂所長：**謝謝張建球先生，也非常謝謝大家的參與。今天有十個人談閱檔的經驗，大家就自己的經驗做一些交換，特別是資訊上的交換，這樣的一個場合，對我們常使用檔案的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得到此訊息之後，我們再去時才不會遇到太多的困難，今天這樣談下來，我覺得有兩件事是我們可以共同了解的：

一、我們都會在不同的檔案館遭遇不同的經驗，但是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就是如果去的地方能夠提供更多方便，以利用檔案館是最好的，例如中午能夠開放空間繼續閱讀檔案，便是對讀者的莫大恩惠。

二、我們去查閱檔之前，不能沒有準備工作，一方面在手頭上有相關的資料要先了解，知道他們開放的狀況；另一方面他們已經出版的東西，或國內有的相關資料先閱讀，以免再調閱，徒然浪費寶貴時間。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提出這些訊息，所有的訊息會整理成爲紀錄，相信可以提供同仁將來研究上更多的方便。

## 附：湖北省檔案館查檔情形簡介

羅久蓉\*

### 檔案內容：

抗戰時期，武漢淪陷，湖北省政府遷至恩施，繼續運作，這或許是為什麼省檔案館所藏與淪陷區 相關檔案數量不多的主要原因。在湖北高等法院案卷號下，有為數甚豐的司法審判案件，包括戰後漢奸審判與民事訴訟案件。從所列條目判斷，其中可供研究婦女相關問題者，如婚姻、繼承等，為數甚豐，但目前司法檔案不對外開放。

### 檔案開放：

湖北省檔案館對大陸學者與港澳臺學者的檔案開放似乎有不同的認定標準，當然這其中也必須將個人因素考慮進去；不同的關係與背景會導致不同的待遇。例如，有部份大陸學者可以全部複印的資料，港澳臺學者只能摘抄，不能複印。目前港澳臺學者雖然可以參閱目錄，但所調之卷必須符合事前提出並且經過檔案館高層審批的課題大綱。有的案卷他們也許會允許查閱，但在複印上則把關把得很緊；凡涉及個人資料者，即使可看，一概不准複印。此外，以中共為主體的意識形態，也深深影響到檔案的開放與否，例如國民政府時期反共、剿共等相關文件，即使是印刷品，也不准複印。尤有甚之，汪偽時期帶有親日色彩大東亞共榮圈意識形態的宣傳文字，也在複印管制之列，原因何在，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凡此種種，皆顯示檔案管理人員的保守心態，以及地方檔案館對於檔案敬畏有加的心理；檔案的開放與否，意味者管理人員必須承擔某種責任與風險，港澳臺學者因此較當地學者受到更大的約束。

### 收費標準：

複印費每張人民幣 1 元，檔案保護費每卷人民幣 4 元，調卷費每卷人民幣 4 元，10 元諮詢費則是以人次計算，並非如某些檔案館以天計算。

### 服務態度：

湖北省檔案館接待人員甚為親切，在其權責範圍之內，通常都會盡量給與閱檔的方便，但有關案卷開放與複印，關鍵還是在上級領導。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上海查檔生活二月行

孫慧敏\*

## 一、啓程

西元 2000 年 7 月 14 日，我獨自前往既熟悉又陌生的目的地——上海。之所以選擇上海作為首次單飛的目的地，最主要是因為我準備以上海的律師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而在查訪上海圖書館網站，並查閱郭廷以圖書館裡所收藏的上海檔案館案卷目錄後，我更加確信上海就是我應該去的地方。另一方面，作為一個首次單飛的女性旅行者，又是在炎夏時節出發，上海的生活環境與衛生條件，也讓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親友少了一分掛慮。

雖說上海是個相對安全的地方，我對上海之行卻不無忐忑，因為我一直到離臺之前，都沒有找到一本實用的上海自助旅遊書，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透過請教會到大陸看資料的同學與學長姐，來搜集旅行資訊，而與〈上圖二月記〉的作者許慧琦小姐的一番長談，更讓我產生了一些勇氣以制壓漫溢的恐懼。

在臨上飛機的時刻，我唯一確定的事，就是我在上海的住址：「政通路 280 號復旦大學國際交流學院」，但我根本不知道它究竟在那裡，不過，我的大陸指導教授葛健雄先生在 E-mail 裡說：「從虹橋機場搭計程車到那裡，只要 70 元上下。」就在這樣無知的狀態下，我展開了為期兩個月的上海之行。

## 二、住宿

走出虹橋機場入境大廳後，即是一個全新的挑戰。舉目無親的我，甚至連身邊「同胞」的話語都不能理解。所幸靠著「每事問」的精神，我順利地找到計程車招呼站，並在司機先生專業的引導下，毫無困難地找到了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復旦大學國際交流學院」。

根據前輩們的經驗，以及我後來的觀察，上海涉外旅館標準房的房價大約在 200-250 元左右，學校留學生樓或招待所（需有人介紹）的標準房，則在 130-200 元之間。可是，在葛劍雄教授費心地接洽下，我以每天 87 元人民幣的價格，住進「復旦大學國際交流學院」的五號樓 103 室。這是一個衛浴、空調、電視、電話一應俱全的單人套房，雖然舊了一些，但還算乾淨舒適。不過，我後來才知道，住宿費的優惠其實是有代價的——我必須自己打掃房間，但正因為如此，我的房間成爲一個不會有服務員打擾的「私人空間」。

復旦大學雖然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名校，但它所在的楊浦區，卻是上海發展較爲後進的區域，因此，住在復旦大學，除了費用低廉外，還可以觀察另一種面貌的上海。每天一大早，當我走出學院大門時，學院圍牆邊早已聚集了一大群年輕的男人，他們或蹲或坐，或倚或躺，身前放了個木板牌子：「木工、泥工、油漆工、水電工」，原來他們是一群等待僱主上門的散工。由於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多，在初來乍到的日子裡，我總會在走過他們身邊的時候，感到一絲絲的恐懼。對初來乍到的旅行者而言，漆黑的夜晚，無疑是更加可怕的。但每天晚上，當我走進五角場社區漆黑的弄堂裡時，卻從不覺得畏懼，因爲兩旁乘涼者的笑語，已爲我指出回家的路。

住在復旦大學，唯一的缺點，就是離上海圖書館與上海檔案館太遠，一般來說，我得要花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的時間才能到上海圖書館，如果要到上海檔案館，則得花兩小時到兩個半小時。所幸搭車、轉車的地方都是起站，因此即使路途遙遠，卻並不太辛苦。而觀察沿路的景物，尋找上海的歷史遺跡，更是我每日生活中的一大樂趣。

### 三、飲食

第一次扭開上海的水龍頭時，我終於見識到上海的自來水——黃濁而且帶著泥沙，這水讓我連刷牙都不敢用。我想，也許煮過的開水會好些吧，於是我又打開了桌上那隻很古典的熱水瓶，但幾經嘗試，我始終無法忍受那嗆鼻的味道，最後都只漱口而沒有喝水。

除了水以外，「油」是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我是個胖子，對肥肉、油炸食物從不避忌，自認對油膩食物的接受程度應該很高，但一碰到上海的

「油」，便立刻棄甲投降。在上海，許多食物都是油膩膩的，就連炒青菜所用的油，也是臺灣的兩三倍，因此，我在上海吃了第一餐後，便開始鬧肚子了。

面對棘手的飲食問題，我最初打算改吃水果來代替飲食，但這並不是個長久之計。7月16日，也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三天，我終於發現一個釜底抽薪之道——買電鍋。我花了46元買了一個小電鍋，它除了能煮飯以外，還有個可以蒸東西的架子。在此後的日子裡，這只電鍋除了擔負起煎、炒、煮、炸的任務外，也是我治療筋骨酸痛和養顏美容的利器。9月17日，也就是我回臺灣的日子，我將它送到舊貨舖，賣了5塊錢。

水的問題，則沒有這麼好解決。在買了電鍋以後，我最初是採取將學院供應的開水放涼再煮沸的方式，來製造飲用水，但這並不能消除水裡的味道。後來在朋友的建議下，我開始嘗試瓶裝水，但我發現，市售的瓶裝水其實還是有味道的，只不過在冰涼的狀態下，味道會比較不明顯。在幾經嘗試後，我發現延中牌蒸餾水的確是無色無味，至此我的飲食問題總算得到解決。

#### 四、上海圖書館與上海檔案館

上海圖書館（上圖）無論是在設施或收藏上，的確都稱得上一流，但它的費用也是一流的。普通的參考閱覽證，一年要繳20元的閱覽費，最高級的參考外借閱覽證，則除了閱覽費外，還要再付1000元押金。不過，這些正式閱覽證必須經過大半個月才會核發，因此對短期研究者而言並不合用。像我們這樣需要馬上展開工作的短期研究者，最好是申請那種並沒有公布在看板上的臨時閱覽證。讀者只要持臺胞證，加上10元的閱覽費，便可以向辦證櫃臺申請，不需填表，隨到隨發。持有這種閱覽證的讀者，可以在一個月內，進入各閱覽室查閱資料，但需同時出示身分證件。

在為時三週的上圖之旅中，我主要是在近代文獻資料室閱讀民國時期的出版物。我的策略是先收集所有上海律師公會的出版品，包括報告書、名錄、規章等等，然後廣泛閱覽各種法學書刊、法規文獻、法校資料，最後再從各種上海史資料中，找尋律師的蹤跡。透過這樣的程序，我對1890-1940年代的上海法律界，總算有了粗淺的認識，接著我便移師上海檔案館（上檔）。

上海檔案館位於仙霞路、古北路口，狹小的入口，在隔鄰的上海銀行與證券行相映照下，顯得更加不起眼，但只要注意一下門口的持槍警衛，便可以馬上識別出它的所在。上海檔案館的閱覽手續十分簡便，讀者可以直接憑身分證件或大陸接待學校的介紹信申請查檔，而且不需任何費用。但為求出入方便，準備長期滯留的讀者，最好花兩塊錢向櫃臺申請一張閱覽證，以供門口的衛兵查驗。

上海檔案館的主要收藏，是 20 世紀以降上海各政府、民間機關的檔案，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清末以來所發行的書籍雜誌。讀者必須先在目錄室查出所需案卷的編號，然後填單調閱，在一般的情況下，每次可以調二、三十宗，而且只要一、二十分鐘就可以調出，效率相當高。不過，如果您要調閱的是所謂的「後庫卷」，建議您提早申請。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原來打算用兩三週的時間來閱讀上海地區各級法院的檔案，但因為這批檔案是所謂的「後庫卷」，每週只有一個調閱日，偏偏又碰上庫房管理員發生意外，不良於行，所以我一直到回臺前三天才看到這批檔案。

上海圖書館與上海檔案館的豐富館藏，吸引了許多國內外的閱覽者，但對我而言，上海檔案館的吸引力要大過上海圖書館許多。上海圖書館的閱覽室雖然寬敞舒適，但閱覽者之間的關係相當疏離，彼此即使天天見面，也很少有機會交談。上海檔案館閱覽室的物質條件雖然不如上圖，但它對讀者的尊重（不必寄包）與讀者之間的情誼，則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在上海查資料的生活是很緊張的，特別是對時間極其有限、資料卻堆積如山的現代史研究者而言尤其如此。上海圖書館各閱覽室的開放時間不同，以近代文獻資料室來說，它的開放時間是週一至週六，早上 8 點至下午 5 點，但通常從 4 點 30 分起，就會開始趕人。上海檔案館的開放時間則是週一至週五，早上 9 點至下午 4 點，不過館員們常會視讀者的工作狀況，將下班時間延遲到 4 點以後。在這樣緊迫的時間限制下，準備適當的工具就成為爭取時間的重要課題。

如果您是一個熟練的電腦使用者，手提電腦將會是您在上海工作的利器。雖然上海圖書館和上海檔案館都不像臺灣許多新圖書館，在閱覽桌邊就有電源和網路插頭，但根據我的經驗，上圖的近代文獻資料室，至少有 3 個座位可以接到電源；上海檔案館則可以供應 4 到 5 部電腦的電源，因

為大陸圖書館讀者使用手提電腦的比率仍相當低，所以幾乎都可以順利接上電源，如果不放心，只要在當地買一條延長線就沒問題了。<sup>1</sup>萬一您不熟悉電腦操作，或者沒有手提電腦，您不必擔心，因為天無絕人之路，只要準備好隨身聽、電池、錄音帶、麥克風，您就可以順順利利地將資料「讀」回家。<sup>2</sup>這是許多大陸學生所使用的辦法，有些人甚至還用同樣的方法，到上海書城裡「讀書」。

假設您的預算充足，也可以用影印的方式取得資料。在上海圖書館，影印資料除了要繳影印費外，還要收取「保護費」，二者加起來，B5 大小的資料，每頁要將近 1 元人民幣。相形之下，上海檔案館的影印費就便宜許多，因為這裡不收「保護費」。不過，許多在上海圖書館可以影印的資料，在上海檔案館是不能影印的，於是「抄錄」便成為取得資料的唯一辦法。除了自己手抄以外，也可以請人代抄，據我所知，請研究生抄錄的代價，大約是每天 100 元人民幣。

## 五、上海踏查

在上海的日子裡，我經常走路，一開始是因為實際的需要。上海的公共交通雖然相當普及、方便，但因為公車乘客很多，所以除非在起站搭車，否則一定得擠沙丁魚。為了能有比較舒適的乘車條件，我和其他的上海人一樣，選擇多走一段路，到公車起站上車。不過，由於上海公車的站距，通常是臺灣的 2 至 3 倍，所以這「一段」路，通常是將近「1 公里」。

另一方面，上海的公共交通地圖，雖然清楚標示了各線公車行駛的路線，但卻沒有標示公車站牌的位置，更「可怕」的是，站名相同的站牌之間，距離可能有幾公里遠。以「上海火車站」為例，當我第一次搭 866 路公車到「上海火車站」時，不但沿路沒見到鐵軌，下了車連車站的影子都沒看到。原先我已做了最壞的打算——在原地等下一班車打道回復旦，還好遇見了一位好心的烏魯木齊女孩，帶著我穿街過巷，好不容易才見到了火車站的芳蹤。但接下來我又得開始找地鐵的「上海火車站」入口，東問

<sup>1</sup> 臺灣的電壓是 110 伏特，大陸則是 220 伏特，因此臺灣市售的延長線在大陸不能使用。

<sup>2</sup> 上海的隨身聽價格比臺灣同級產品貴很多，所以最好從臺灣帶去，至於電池則可以在當地購買。在延安東路、西藏中路口，也就是「大世界」的對面，有個賣電池的攤子，特別便宜。



西走，又耗了將近 1 個小時，才終於搭上往上海圖書館的列車。問題是，到上海圖書館應該在那裡下車呢？我以為從位於淮海路上的常熟路站下車，到同樣位於淮海路上的上海圖書館會近一點，那知道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結果，我頂著 7 月的豔陽，在幽雅的淮海西路上，走了幾十分鐘。在回程的時候，我學乖了，沿著上海圖書館旁邊的高安路，走到衡山路後左轉，在新華社上海分社的隔壁，找到了衡山路站的入口，順利地回到上海火車站。但這時的我已經忘記怎樣回到原來下公車的地點了。我開始嘗試在附近找尋往復旦方向的公車。在遍尋不著的情況下，我於是開始往東北方向走，因為這樣才可以越來越接近復旦。我一邊走，一邊注意沿路的公車站牌，經過一個多鐘頭以後，我終於在一個站牌上看到「大柏樹」——我早上所搭的公車曾經經過這個地方，我在地圖上找到大柏樹的位置，它就在復旦大學附近，我於是決定搭這班公車。果不其然，這班公車所停靠的「大柏樹」站，與早上 866 所停的「大柏樹」站，並不相同，因此，我下了車以後，又進入了迷路狀態。所幸我很快地看到醒目的地標——「蘭生大酒店」，找出了正確的行進方向，順利地走回復旦。從這天開始，我的腳底，始終就有一個水泡。

但漸漸地，我便迷上了走路。在從圖書館或檔案館回復旦大學的途中，我必須在外灘附近換車，由於這時正值下班時間，往五角場方向的公車通常都很擠，而且路上塞車也很嚴重，因此我便利用這段時間去領略上海的城市風華。

我最初的探訪景點是外灘。從上海圖書館搭上 126 路或 926 路公車，一路到底。<sup>3</sup>下了車以後，沿著步道往北走，慢慢欣賞沿街的著名建築物，然後對照背包裡的《上海掌故辭典》，找出這些古老建築的歷史樣貌，於是當下所見的海上海逐步與魂夢所見的海上海有所連繫。

如果要欣賞外灘的建築，只沿著中山東一路走是不夠的，因為從中山東一路上看到的，是這些老傢伙被刻意粉飾的一面。只有走進廣東路、九江路、圓明園路或滇池路，才可以從它們的側面和背面，看到它們在百年時光中所經歷的風霜。有一次，我在一棟老洋樓的牆面上，看到「支持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殘跡，歷史突然之間立體了起來。就在這個牆面上，我看到了近百年來的歐風美雨，看到了 60 年代激烈的文化大革命，

<sup>3</sup> 最好搭 126 路，因為 926 路所經路線有許多百貨公司，很容易塞車。

也看到 90 年代對文革的反省。

如果時間尚早，我會走到蘇州河邊，再穿過馬路，到外灘公園；如果時間不夠，我便從南京東路的地下道走到對面的外灘步道。這時天色通常已經有一些暗了，對面的老建築也開始用黃色的燈光，妝點上海的夜晚。雖然在地下道口，就有 55 路的站牌，但因為這裡人多，我通常會沿著步道，走回金陵東路的「新開河」站上車。

每當走在清風拂面的外灘步道上，我常覺得是走在一條分水嶺上。往上看，西邊是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古老建築，東邊則是高聳入雲的現代建築東方明珠與金貿大廈；往下看，西邊是車水馬龍，東邊則是碧波盪漾。在我的身邊雖然多的是遊客的笑語，但老老少少的拾荒人，迫不及待撿去每支寶特瓶的場面，卻又使我懷疑這外灘的繁華歡樂究竟是夢是真。當我在夜幕低垂的時分，走在南京東路步行街上時，這種感覺尤其明顯：在瓷磚步道的領域內，閃亮的霓虹、喧鬧的音樂、熙攘的人群、各式各樣的商品，加上卡通似的觀光列車，置身其中，簡直就像到了迪斯耐樂園裡的世界市集一樣，就連那幾年過半百的老建築，也都展現著青春的活力。但只要一走出瓷磚步道的領域，所有的光彩絢麗，就像過了 12 點的灰姑娘一樣，立刻化為烏有。

遊外灘、逛南京路和豫園，幾乎是每個上海觀光客必有的行程，我自然也不能免俗。這三個地方雖然都有豐富的歷史意義，但我總覺得經過刻意修飾後的它們，活像個穿著旗袍的外國人，而這件旗袍還是豫園商城裡所販售的旗袍。<sup>4</sup>

我開始認真的展開踏查，其實是為了尋找 30 年代上海律師的足跡。在閱讀律師余華龍的日記時，我看到他經常和客戶到東方飯店開房間討論事情，又常到東方書場聽書，到跑馬場看賽馬。這些流水帳似的紀錄，在我按照 1940 年代出版的《上海市路街行名圖錄》，找到東方飯店以後，便立刻鮮活了起來。原來東方飯店與東方書場，就是現在的工人文化宮，這棟白色的建築，到目前為止，看起來仍相當富麗堂皇。在東方飯店的對面，就是跑馬場，也就是現在的人民公園。從這裡往北走大約 10 分鐘的路程，就是繁華的南京路，往南走大約 10 分鐘，則可以看到大世界遊樂

<sup>4</sup> 這種旗袍的特色，在它鮮豔的色彩（多半是大紅色）、誇張的牡丹圖案，以及寬大的剪裁，在我看來，與其說它是旗袍，不如說它是「浴袍」。

場。於是，余華龍這位 30 年代律師的文化取向，已經顯而易見。

## 六、結語

在思鄉的情緒中，隻身在上海的日子是漫長的；但如果要認識上海、搜集史料，兩個月的上海行無疑是短暫而緊湊的。希望我這些親身的經驗和觀察，能夠對其他即將上路的人們有所助益。

###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八期

#### 論 著

265 頁 平裝 300 元

賴惠敏·朱慶薇：婦女、家庭與社會：雍乾時期拐逃案的分析

張壽安：十八、九世紀中國傳統婚姻觀念的現代轉化

胡曉真：秩序追求與末世恐懼——由彈詞小說《四雲亭》看晚清上海婦女的時代意識

Joan Judge: Meng Mu Meets the Modern: Female Exemplar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Textbooks for Girls and Women

#### 演 講

Charlotte Furth: Doi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Representation and Experience

#### 學術討論

劉瑞琪：女性主義藝術史研究方法論

#### 問題與討論

王秀雲：有關西方女傳教士與中國婦女的幾個歷史問題：從文獻談起

#### 書 評

羅久蓉：評介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新書評介

## 容閔以後的故事

——李又寧教授的華族留美史研究叢書評介

從二十一世紀初的視點回顧過去一個半世紀的中國近現代史，眼前呈現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圖景，即中國社會的傳統確乎得以保留和延續，但也在同時逐漸獲得「現代性」，包括時間軸上的「近代化」和空間面上的「開放」、「全球化」。傳統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累積了由量到質的整體性變革，逐步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即由自然經濟下封閉的農業宗法社會逐步演變為商品經濟下開放的現代工商社會。這一演變過程是由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觀念文化的層層深刻變異累加而成的。造就此一轉型的動力，不外來自外部和自身兩個方面。費正清學派的「西潮衝擊——中國回應」典範(paradigm)，將外力當做這一動力的來源，實際上是「西方中心」觀念的產物，在美國已被費氏的弟子或再傳弟子視為過時。近年的新興取向是「在中國發現歷史」，亦即重視中國的內在發展。這固然是美國漢學界的進步，但是當人們將觀照點移到中國時，往往又會將中國自身傳統的延續、演進視為主線，忽視中國力圖使東方與西方接軌，力圖以放大的、包容的新中華文化圈，化解中國文明與異質文明碰觸時的文化衝突，建立更新進化後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互補互存的中國式現代化社會的努力；忽視中國確有走向世界的願望而且確已邁步走向世界所留下的深刻足跡。那麼，推動中國近代社會成功轉型、引領中國和中國人邁向世界的關鍵環節何在？比較當時的時空環境和現今的世界格局，便可以略窺端倪。

環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非西方」世界，尚有奧圖曼土耳其、印度和中國這三個「老大帝國」，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還大體保有中古以來的傳統。但三者皆面臨西潮的衝擊以至侵凌，也分別從各自的傳統出發，同時汲取西方的技術甚至制度，掙扎求存。凱末爾以其「世俗改革型」的

民族主義改革，將奧圖曼伊斯蘭帝國轉型為土耳其民族國家，代價是以伊斯坦堡為中心的泛伊斯蘭和泛突厥政治／宗教／文化圈的崩解。甘地以其「宗教道德型」的民族主義求得了印度的自治以至獨立，但同樣不能維持印度的傳統疆界和政治、文化影響。今天兩國在世界上都不復有恢復昔日榮光的奢望，只能勉強維持二流國家的地位。相形之下，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圈似乎漸漸走出了谷底，看到了希望。事實上，不論名稱為何，這三個國家民族革命的共同之處都在「師夷長技以制夷」，其中重要的步驟即是主動或被動地派遣留學生前往西方「先進」國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行動此後不同的發展和結果。土耳其雖標榜世俗主義，但伊斯蘭宗教傳統和歷史情結依然在社會生活中佔有決定地位，社會拒絕接受留學生攜入的技術以外的西方文化，即便吸收了法制和教育兩大系統，新瓶中的舊酒仍佔大半；印度留學生則幾乎完全無法觸動從根本上限制印度發展的種姓制度和宗教壁壘。從歷史角度來看，兩國原本即具有以宗教代替教育的傳統；從現狀來看，兩國留學生離鄉之後即與本土社會處於疏離的狀態。反觀中國，在漫長的歷史傳統中不僅始終重視教育，甚至以科學制度確保了教育與社會的聯繫。因此，有識之士在面臨「外患」時，很快就意識到必須效法趙武靈王，師夷之長技，就此推動建立了近代的留學制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以之代替了科學制度的部份功能。相較於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這一設想一開始便是相對主動的，有一定組織、計畫和系統，其結果也比較廣泛、深入、有成效，而其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正常的」社會轉型是由經濟轉型開始，繼之以政治轉型，最後才是思想文化的轉型。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背離了這一「常軌」，它是經由思想、文化的轉變推動了政治變革，再及經濟變化。箇中原因正是一群以留學生為主的社會菁英變通了西方的近代化模式，從主觀角度，以觀念變革帶動了制度層面和物質層面的變革。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實際上迅速轉變為「中西兼採」，「道器互用」。

基於這樣的觀察、思考，在國際漢學界有重要影響力的美國華裔歷史學家李又寧教授站在新的高度，以廣闊的視野重新發掘、檢視了中國近現代史的關鍵問題，找到了開啓這扇歷史之門的鑰匙。李又寧教授認為，留學生是世界與中國之間的橋樑。中國透過留學生，從各個層面各個角度接觸了世界，世界也透過留學生比較深入地了解了中國。這兩個因素的交匯使得中國在相對成功地在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同時，亦得以保持傳統的國

際地位，並且更進一步使中國人走出地理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國界，成為華族的世界公民。基於這一新的重要觀點，李又寧教授發起成立了「華族留美史研究會」，旨在發掘對中國近代史有重大影響，卻相對遭到忽視的歷史，多角度、多層面地推動留學史的研究。1997年10月，在李教授倡議、徵集下，在紐約主辦了「華族留美史：150年的學習與成就」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將其中重要論文編輯成書。以此為起點，迄今為止，經過李教授孜孜不倦的努力，「華族留美史研究叢書」（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年）已有三個重要系列的五種書籍相繼問世。2000年10月又舉辦了「華族對美國的貢獻」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填補了中國史和美國史的空白。正在編印之中的研討會論文集將作為該叢書的第四個重要系列於近期推出。

系列之一，《華族留美史：150年的學習與成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彙輯了張玉法、高宗魯、江勇振、孫震、林耕華、于宗先、邱坤玄、謝復生等十餘位重要學者的專題論文，涵蓋了自1840年代至1990年代留美學生卓絕的奮鬥史，分別考察了自晚清、北洋時期、南京和重慶國民政府時期，最後到臺灣，留美學生從政治、經濟、科技、農業、教育和社會發展等不同層面對母國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其中大部份是首開風氣的研究。由這一組覆蓋面寬廣，研究力道深入的論文中，我們瞭解到留學菁英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心態、角色、作用及其所造就的中國近代化運動的特色。中國的近代化開始於軍事工業，表面上這只是在物質技術層面的「師夷長技」，但對翻譯人才的需求造就了近代中國學校教育和留學制度；譯介西學又導致文體變化，使白話逐漸成為文化載體的主流，直接動搖了傳統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洋務派的「變器不變道」的技術主導論迅即遭到冷落。但在同時，留學生群和中國近代化進程一樣，也具有複合性的特徵：即現代觀念與傳統道德並存、激進思想與保守行為並存、現代工業與傳統農業家庭手工業並存、工商社會經營管理與傳統社會官僚衙門作風並存、新式利益集團和舊式宗派組織並存。這部論文集的涵蓋面和縱深度為「華族留美史研究」奠定了鞏固的基石。

系列之二，《留美八十年》（一）、（二）卷彙整了從1920年代到1990年代共二十幾位留學生的留美經驗回憶錄。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自海峽兩岸中國各地，橫跨幾個世代，多數是在李又寧教授建立當代「活的歷史」（“living history”）構想下，第一次以留美為主線索，將個人的地緣、

家世背景、生活、教育過程和奮鬥、成就形諸文字。每一篇回憶的主人在經歷、思想、感情上各有千秋，但在他們筆下所記錄的都是富有感性、生動翔實的第一手史料。早期、中期的留學生如羅家倫、魯滄平、王念祖、唐德剛等人的文章格局開闊，文筆優美而幽默；晚近留學生的回憶則更細緻、更多元，反映了中國人留學美國的發展、擴大、深化。透過這些作者以動人的文字所編織的畫面，讀者更可以直接感受到中國人勇敢游向世界文化海洋的大時代氣氛。其中每個人的經驗皆有相似的異質文化接觸——衝突——交流——融合的過程，具體而微地呈現了中國近代走向世界的整體歷程；同時每個人的特殊經驗又都具有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歷史紀錄價值。以此看來，《留美八十年》第二集並不是這一主題的完結篇，從它所開啓的方向走下去，歷史的全景必將一步一步地完整呈現在我們面前。

與留美史的線索並進的，是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後者一直歸屬於「華僑史」範疇。但兩者的發展事實上是密切正向相關的。李又寧教授為此提出了「華族」的概念，將有關中國之命運的研究擴大為華人在全球範圍內的生存、發展問題的研究，將「華僑史」這個本身即暗含以中國為中心取向的概念擴大為身處全世界和全人類中，消彌了狹隘國界意識的「華族歷史」這一新觀念。這樣的新思維正是華族留美史研究叢書第三和第四個系列的出發點。觀察華人在美國處境的變化，可以看到華人不斷提升素質，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其地位的改善，而在提升華人教育程度、職業結構、所得水準、經濟實力以至於政治參與程度等方面，留學生扮演了關鍵角色。當然，其他客觀和主觀、外部和內部的因素也導致了「華族」在美國地位的變化。其一，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韓戰和越戰的過程中，改變了百年來弱勢的國際地位，華人參與美國對德、日的戰時工作中的傑出表現也使美國主流社會逐步減少了對華人舊有的刻板印象，這兩方面皆與留學生有一定關聯；其二，華人由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主觀轉變，與留美學生及第二、三代在美國受教育的移民子弟新世界觀的形成密切相關；其三，留美學生及第一代華人移民自強奮鬥的精神，直接促進了華人個人、家庭和整個族裔生存條件的改善。

「華族留美史研究會叢書」的第三個系列《當代留美中學生——喜樂與心酸》（一）、（二）集，就是合留學史與華僑史為華族歷史的開端。兩冊的內容是六十餘位當代華族留美中學生——臺灣習稱的「小留學生」

——以中文所撰寫的親身經驗。這些文字與傳統留學史和華僑史研究中留美「高級知識分子」的回憶錄相比，具有更為獨特的視野和價值。事實上，這些資料與華僑史料、傳統留美史料分層配合，構築了美國華族遷移／涵化／共生的生存發展模式。其中「遷移」是「華僑史」的研究重點，時間上又集中於 19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初；「涵化」集中研究土生華人——臺灣習稱為 ABC——的文化意識行為模式，時間從 20 世紀初迄今；「共生」則是 1943 年以後的新移民模式，它是以粵籍勞工為主的「華僑」成長為「華族」的關鍵，其所注入的新血液，使華人社群的結構和功能更新、轉換並得以永續。因此《當代留美中學生》的意義就絕不僅限於「年齡層次降低」這一表面差異上了。

到目前為止，「華族留美史研究叢書」不僅有了好的開端，而且建立了比較全面的架構，但是也留下了某些尚待擴展的空間。例如我們注意到，儘管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和華人打破國界走向世界這兩項成就以最終結果論是成功的，但其過程仍是曲折多舛的。其中之一，回國留學生在傳統勢力強大的中國社會中難以深刻介入固有的權力結構，報國苦心無法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時而面臨「邊緣人」的角色尷尬；留在美國的留學生和華人移民也還不是生活在沒有種族文化偏見和隔膜的國度，同樣時而浮現「鄉關何處」的邊緣感。其中之二，中國各階層、各地區以及每一留學生個人在中國近代化的問題上，並不具有相同程度的認知和準備。尤其是近代化的地域差異問題，不僅表現為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由東南沿海、沿江啓動，逐漸向內陸推進的空間過程，而且也表現在人的因素上，內陸以至邊疆背景的留學生在心態、經歷、角色與東南地區背景的留學生有相當差異，期盼未來的華族留美史研究可以進一步擴及這些複雜的方面。對文化接觸過程中矛盾、衝突現象的探討，應當會更有助於全面充實這一有意義的大題目，也正切合李又寧教授打破國界，合國別史為世界史的大構想。但話說回來，李又寧教授最重要的貢獻正是在於讓我們確信由容閱所開創的事業所預示的近代中國和近代華族的方向，在這個大的方向上以「華族留美史研究叢書」紀念他和其餘的仁人志士，必然是一件不朽之盛事。由此我們就更熱切地期待編輯中的「華族留美史研究叢書」下一個系列——「華族對美國的貢獻」儘快問世。



《中華民國海軍史事日志》。蘇小東著。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9年10月，807頁。

蘇小東的《中華民國海軍史事日志》（1912年1月—1949年9月）是繼姜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1860-1911》之後，在大陸所出版的一部姊妹篇。不僅風格相類，時間銜接，而且內容翔實。

該書計有807頁，60餘萬言，堪稱皇皇巨著。披覽之餘，非但可以使人對於民國以來五十年的海軍動態瞭若指掌，且可為有志於民國海軍史研究者提供一條清晰的線索，殊有參考價值。

比較該書與前之相關各作不同之處有以下幾點：其一、時間較為完整：池仲祐的《海軍大事記》（1917），僅記至民國六年，固毋庸論。即抗戰時期，海軍總司令部所刊的《海軍大事記》（1943，重慶），及中共建政後楊志本等輯《中華民國海軍史料，1912-1941》（1987，北京）所附之〈海軍大事記〉，亦僅記到民國三十年（1941）為止。而實際上後者又不啻為前者之改訂版，內容並無太大的改變（見該書頁1,012，編者按語）。至於本書則將史事記至國府自大陸退守臺灣為止，即民國三十八年（1949），在民國史上恰可告一個段落。其二、史料較為豐富：以往之作所參用者僅限於海軍部及其所屬各部門之公文檔案，而該書則大為擴充。由於編者長期執教於海軍學校，具有此一方面豐厚的學養，並曾與吳杰章、程志發等主編《中國近代海軍史》（1989，北京），熟悉海軍史事，故於該書內能充分地參考利用海軍公文檔案、政府公報、報章雜誌、海陸戰史，以及私人書札、日記、回憶錄，乃至近人所作論著等，其中尤以三十餘種「未刊稿」最為珍貴。於此可見其搜集之廣，用力之勤。不過由於兩岸阻隔，時空所限，仍有若干資料為編者遺漏疏忽。(1)陳策：〈考察歐美海軍報告〉（1934）。(2)陳存恭：〈從「貝咸里合同」到「禁助中國海軍協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期5，1976，臺北）。(3)馬幼垣：〈抗戰期間未能來華的外購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6，1996，臺北）。(4)張力：〈蔣公與海軍之建立及發展〉（《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國防部史政局編印，1986，臺北）；〈中國海軍的整合與外援，1928-1939〉（《國父建黨革命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5，臺北）；〈從「四海」到「一家」：國民政府統一海軍的再嘗試，

1937-194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期 26, 1996, 臺北)。  
(5)老冠祥:〈楊樹莊在北伐期間率海軍易幟〉(《紀念北伐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6, 臺北)。

再者, 該書所涉及的層面也相當廣泛, 舉凡民國年間海軍所發生的重大事件, 本書均有清晰而詳細的記載。諸如海軍與革命、討袁、護法、北伐、抗戰及剿共戰爭等, 無不涵蓋於其內。此外, 尚有幾件海軍史事為他人所忽略而少見於史冊者, 此書亦透露不少消息。一是二次革命時中山先生對海軍之重視, 認為「海軍助我則我勝; 海軍助袁則袁勝。」(頁 43) 因而特派陳其美在上海對海軍秘密策動。並另派王統至日本海軍基地橫須賀運動中國海軍留學生參加中華革命黨, 計有十八人參加(頁 85)。此外, 他還命王統招募一部份日本備役海軍人員, 以為臂助。王統旋即與日海軍退役大尉富永龍太郎協議秘密進行。民國五年五月, 中山先生由日返回上海, 親自指揮反袁革命, 並命王統為海軍司令, 率領部份在日招募的海軍人員至上海與陳其美配合, 計劃奪取「策電號」軍艦, 砲轟製造局, 而一舉攻佔上海。惟以聯絡有誤而失敗, 王統亦以受孫責備而他去, 結束了二次革命與海軍之一段插曲(頁 65, 87-88, 100-103)。

二是程璧光與孫中山之分合: 民國六年, 北洋海軍總司令程璧光以反對段祺瑞破壞約法, 而率領部下加入廣州軍政府, 號稱為「護法艦隊」。因而造成閩系海軍裡的閩粵二派之分裂, 北洋海軍實力大減。程璧光為廣東人, 早年曾留英, 並參加甲午一役, 可謂是粵籍海軍中的耆宿。本可使南方海軍自成一軍(計有 10 艦), 而與北洋海軍對抗, 借以程、孫二人對於桂系態度的不同而失和。次年二月, 程氏遇刺身亡, 過去多以為桂系陰謀, 後始知為孫氏親信朱執信所主使(頁 134, 引自 1964 年 6 月刊《廣東文史資料》, 輯 25, 羅翼群:〈有關中華革命黨活動之回憶〉一文。羅氏自言, 據其親身經歷, 知程案乃朱執信策劃, 蕭覺民、李漢斌執行)。程死而粵系海軍亦不振, 殊為可惜。

三是「一二八事變」時期, 駐滬海軍的不助戰爭議。民國廿一年一月廿八日, 日軍繼「九一八事變」之後, 復於上海發動「閩北事變」。是時我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及軍長蔡廷鍇率領下, 與日軍作殊死之戰, 而我駐滬海軍非但袖手旁觀不為助戰, 甚至傳出海軍部次長李世甲還私與日駐滬海軍司令塩澤幸一達成「互不攻擊協議」。更有甚者, 當十九路軍向之借用高射砲時, 亦遭拒絕(頁 488)。以上諸事為四月二十三日上海《生

活周刊》首先揭露，並對海軍的腐敗加以指責（卷 7，期 16，頁 488）。五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高友唐、邵鴻基、周利生、王平政等亦聯合提出「彈劾海軍案」，請將海軍部長陳紹寬、次長李世甲交付懲戒（頁 493）。而海軍方面亦不願示弱，李世甲首於五月七日對於《生活周刊》7:18 中之〈國難期中的海軍當局〉一文，提出反駁，斥為「無根之談，純屬誣蔑」（頁 491）。陳紹寬亦於六月十八日在上海答記者問時有所解釋，謂海軍之未能助戰「實因未奉命令，不能妄動，而經費困難亦為最大難關」（頁 495，又見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1994 年 7 月，北京，頁 94）。不過，海軍部係奉何人之命令？陳在當時並未言明。直至二十七年之後，他才公開宣稱，蔣氏當時尚為在野之身，而下達「海軍保持鎮靜，聽候命令」者乃是當時主持軍事大計的何應欽。只是蔣氏返回南京後，「亦無變更」而已（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頁 404，1959 年 8 月〈給海軍司令部的回信及答覆的幾個問題〉）。按據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蔣氏於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辭國府主席暨行政院長職（冊 3，頁 119），但於「一二八事變」前之一月廿一日即返南京，並於次日與汪兆銘及孫科討論時局（冊 3，頁 128-130），故陳氏之說並不正確，不知是其記憶有誤，抑或是故意模糊其詞。是以何應欽下達海軍「保持鎮靜」之命令，究係出自其個人決定，還是受到高層的指示，恐尚有待查考。

尤有進者，「一二八事變」時期海軍之未能助戰，頗與上年「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之奉命「不抵抗」，同出一轍。在當時蔣氏「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決策之下，亦不無可能為中樞所指示。然而何以「閩北事變」時，中央僅命陸軍作戰（先是蔡廷鍇的十九路軍，後又增加張治中的第五軍），卻反令駐滬海軍袖手旁觀，置身事外，殊為令人費解。再由陳紹寬六月十八日（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對記者的談話，除了「未奉命令，不許妄動」外，同時又強調「經費困難亦為最大難關」。衡以北伐之後，中央依然奉行「重陸輕海」之策，海軍經費每月不過五十萬元，而實收卻僅有四成五，至滬變當月僅領十餘萬元，以致各艦之燃料及伙食等費用亦均告罄（頁 483）。因此，海軍對中央不滿，藉口未奉命令而按兵不動，以便保存其實力，亦有可能。觀於其後陳紹寬曾經二次提出辭呈，而均未為中央接受，對於李世甲是否曾與日軍簽訂互不攻擊協議，亦未加深究。其中的曖昧亦頗令人尋味。

最後，透過本書，吾人尚可瞭解民國海軍派系勢力的消長。民國海軍

雖有福建（北洋）、廣東、東北之分，但由於歷史的傳承，海軍的軍政大權均為閩系所操控。如日人園田一龜在其《新中華人物誌》一書裡，即將閩系比作為日本的薩摩，並謂：「中國之海軍謂為福建人之海軍，非過言也。」（民國 16 年奉天（瀋陽）刊，1978 年 8 月，黃惠全、刁英華據 1931 年版，譯印於香港，頁 288，「福建省」）。這一支海軍與東西列強的海軍相較起來，其武力實微不足道。然而這一支海軍始終為閩系的海軍將領所掌握，舉凡民國以來所發生的大事，不論革命、護法、北伐、抗戰、剿共等，幾乎無役不與。而且對於政局發生相當的影響，發揮其關鍵性的作用。由於閩系海軍的傳統政策一向是「接受能統治國家勢力的命令」（陳紹寬語，見文集頁 402），故亦常為北洋軍閥之袁世凱、段祺瑞等所利用，而充當鎮壓革命的工具。北伐時期陳紹寬雖然投身革命，對於統一作出不少貢獻，然以閩系海軍具有強烈的派系色彩和觀念，亦漸為國民黨軍事強人蔣介石所忌。自「一二八事變」後，蔣氏即以準備抗日為由，決定培養一支自己的「嫡系海軍」，以取代閩系海軍（頁 511）。因之乃引起蔣氏與閩系海軍將領薩鎮冰與陳紹寬等的不斷地矛盾與衝突。抗戰結束後，終於導致閩系海軍勢力的式微。同時，也結束了福建人長期主導海軍之局。

綜觀以上所述，可見本書內容豐富，包羅萬象。所記大事皆有史料可據，遇有重大事件，且附註出處，以便查考。大體已具工具性、參考性及指引性之價值，故特為之推介。至於史料浩繁，原為史家所難，自亦無法對之責備求全。如何再作擴充，補苴罅漏，尚待作者異日更上一層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王家儉□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期刊第十期

#### 蘇東啓政治案件專輯

訪問：陳儀深 紀錄：王景玲等 4 人

412 頁 平裝 450 元

蘇東啓政治案件發生於一九六一年即戒嚴時期的雲林縣，軍事檢察官起訴四十七人，覆判的判決書則有五十人涉案，為首的蘇東啓、張茂鐘、陳庚辛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罪名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本案是白色恐怖時期少數牽涉臺灣獨的大案，只因年代距今較久，涉案人出獄後極少成為政治明星，以致迄今仍不甚受到世人注意。本案受刑人雖有若干人死亡，或無法聯絡，或有要角（陳庚辛）因故拒絕受訪，但透過十九位相關人士的現身說法，已可呈現相當程度的蘇案真相。



大事紀要

##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2000.9-2001.3)

張珍琳\*輯

2000.09.15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研究計畫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辦「中越關係國際研討會」，假近史所檔案館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外學者共發表論文十二篇。

09.18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第十一次聚會，邀請司徒琳博士(Dr. Lynn A. Struve, Prof. of History & East Asian Languages & Cultures, Indiana University) 主講：〈明清時期的「回憶錄」：一個比較性的揣摩〉(Ming-Ch'ing 'Memoirs': A Comparative View)。

09.18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陳瑋芬女士主講：〈自我的客體化與普遍化——近代日本的「東洋」論及隱匿其中的「西洋」與「支那」〉。

09.1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由副研究員陳玉美女士主講：〈臺灣考古學的兩個傳統——一個提案〉。

09.19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由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陳培豐先生主講：〈重新解析殖民地臺灣的(同化)教育政策——以日本的近代政治思想史為座標〉。

09.2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胡國台先生主講：〈抗日戰爭對高等教育的衝擊，1937-1945〉。

09.21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座談會，邀請阮斐娜女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文學部副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外國人研究員)主講：〈西川滿和《文藝臺灣》〉。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09.2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臺東師範學院社教系教授夏黎明先生主講：〈臺灣多樣性：試論臺灣的島內區域研究〉。

09.26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第十二次聚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郭松義先生主講：〈清代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文獻和田野調查的結合〉。

09.29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邀請黃淑玲女士（國防醫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科副教授）主講：〈變調的“ngsal”：婚姻、家庭、性行業與四個泰雅聚落婦女 1960-1998〉。

09.29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行為組舉辦「情感、情緒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假該所舉行兩天，主要係從人類學與心理學的角度探討臺灣社會不同族群與社群的情感、情緒特性及其與文化的關係，共發表論文十二篇。

09.29 中華經濟研究院與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共同舉辦「全球華人經濟力現況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期兩天，針對全球華人的經濟力、投資、活動、企業經營、組織結構與發展趨勢等議題進行研討，由國內外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十二篇。

10.0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專題座談會，邀請日本姬路獨協大學教授楊啓樵先生主講：〈中國大陸文史界的一些特殊現象〉。

10.0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與中國近代史學會共同舉辦「清代的檔案與研究」學術座談會，主講人與講題如下：莊吉發，〈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檔案——社會史檔案〉；郭松義，〈我所熟知的大陸檔案館典藏——曲阜孔府文物館、遼寧檔案館、北京檔案館、北京首都博物館〉；徐泓，〈清代鹽務史料〉；劉錚雲，〈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刑案部份〉；熊秉真，〈作為偵探的學者與作為偵探的歷史學者〉；馮明珠，〈「軍機處檔——月摺包的數位化典藏」與「清代臺灣史料彙編」——國立故宮博物院目前進行兩項檔案整理與出版工作〉；許雪姬，〈清代的臺灣檔案〉；賴惠敏，〈《紅樓夢》的虛與實——從歷史檔案來探索〉。

10.0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翟志成先生主講：〈馮友蘭的抉擇及其轉變〉。

10.0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學術演講，邀請日本姬路獨協大學教授楊啓樵先生主講：〈衙門小職權大——論雍正朝的內務

府造辦處)。

10.0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群與中華科際整合研究會合辦「越南僑教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邀請許振榮先生(僑務委員會主任秘書)、梅培德先生(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周功逢先生(越南代表處處長)、何福田先生(玄奘大學校長)與會討論。

10.10 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語言文化學系主辦之「重繪臺灣：全球化觀點下的歷史與文化」研討會(Remapping Taiwan: Histories and Cultur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假該校舉行六天(至十五日)。

10.11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第十三次聚會，邀請沙培德教授(Professor Peter Zarrow, Senior Lecturer, Univ.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主講：〈清末維新運動與近代中國保守主義之緣起〉。

10.13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邀請臺大社會系副教授林端先生主講：〈國府統治(1945-2000)下的臺灣「祭祀公業」：法律社會學的考察〉。

10.14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政治大學歷史系承辦之「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為期兩天，主題分為環境變遷史、族群與社會、歷史知識的實踐與應用、地方性與國際化，邀請國內學者計發表論文十五篇。

10.15 宜蘭縣史館舉辦「宜蘭研究」第四屆學術研討會，為期兩天，邀請專家計發表論文九篇。

10.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呂芳上先生主講：〈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以蔣介石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例的探討(1929-1936)〉。

10.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學術討論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郭松義先生主講：〈從清人婚姻行為看「法」與「情」的矛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壽安女士主講：〈由成「婦」到成「妻」：清儒對婚姻成立原則的討論〉。

10.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午餐會，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主講：〈作為東亞城市化的標誌——村上春樹與臺灣、香港、中國的當代文學〉。

10.2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情慾與死亡」小型專題研討會，為期兩天，其中有關明清方面的論文如下：黃克武，〈明清笑話中的

身體與情慾》；高桂惠，〈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紅樓夢》續書中的仙境、地獄與人間〉；楊芳燕，〈明清思想轉向中的公、私、情、慾——研究現況及意涵〉。

10.20 由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主辦之「跨越一九四九年：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延續」研討會(Bridging 1949: Historical Continuity in 20<sup>th</sup> Century China)，於加拿大 Fredericton 之 New Brunswick 大學舉行兩天。

10.2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民族學研究所舉辦「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假中研院活動中心舉行三天，邀請國內外學者共發表論文二十篇。

10.25 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玉山社出版公司主辦之「霧社事件的歷史省思」座談會，邀請多位臺灣與日本學者以及霧社事件遺族共同參與討論。

10.26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共同主辦之「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與臺灣島史—慶祝曹永和院士八十大壽」國際學術研討會，假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外學者計發表論文十六篇。

10.27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研究員張茂桂先生主講：〈告別「妒恨」與「危機感」：關於當代臺灣認同政治的反思〉。

10.28 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臺南市政府、財團法人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主辦之「荷蘭時期臺灣史座談會」，假臺南市立藝術中心舉行一天。

11.0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文化研究群」學術座談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金觀濤先生主講：〈「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國文化「正當性」論證的思想史研究〉。

11.09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金觀濤先生主講：〈經濟決定論的興起——社會組織原則變遷的思想史研究〉。

11.0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學術演講，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研究科博士生陳姪媛女士主講：〈近代中國的「賢妻良母」〉。

11.13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彭小妍女士主講：〈朱天心的臺北：地理空間與歷史意識〉。



11.1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座談會，邀請日本九州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所教授柴田篤先生主講：〈宋明思想研究心得略談〉。

11.15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組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蔡吉源先生主講：〈臺灣土地課稅制度：問題、影響與改革〉。

11.16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邀請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莊國土先生主講：〈閩南人在海外華商網絡中的地位〉、〈介紹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的海洋史研究〉。

11.17 由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協辦之「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假南港中研院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十六篇。

11.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文化研究群」學術討論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郭松義先生主講：〈社會經濟演變和婚姻——16世紀以來傳統婚嫁行為中新因素的萌動〉。

11.20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專題演講，邀請福建社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楊彥杰教授主講：〈閩粵贛地區客家文化的田野研究〉。

11.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主講：〈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反思〉。

11.24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午餐研討會，邀請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莊國土先生及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古鴻廷先生主講：〈今日海峽兩岸對東南亞研究評述〉。

11.27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專題演講，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主講：〈關於我所編輯的《魯迅事典》〉。

11.29 東吳大學建校百年，文學院舉辦「二十世紀前半葉人文社會學術研討會」兩天，以我國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諸領域發展具關鍵性影響之民國時期重要人物為對象，研討其學術地位及影響。邀請學者共發表論文二十篇。

11.30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梁其姿女士主講：“Medical Instru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Ming-Qing China”。

12.0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1600 迄今」系列演講，邀請古地圖收藏家魏德文先生主

講：〈從蒐集古地圖看臺灣〉。

12.08 由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李約瑟研究所主辦之「紀念李約瑟博士百年誕辰——科技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外科技史專家發表論文共十一篇。

12.09 由高雄市政府、高雄縣政府主辦之「2000年高雄研究學術研討會」，假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發表論文共十九篇。

12.09 由蒙藏委員會、中國邊政協會主辦之「公元2000年兩岸藏學會議：西藏的傳統與現代化」，共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發表論文計二十四篇。

12.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汪朝光先生主講：〈民國電影檢查制度之濫觴〉。

12.1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由研究員劉錚雲先生主講：〈乾隆朝的雇傭勞工：工資及其生活水準初探〉。

12.11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由該處博士後研究人員黎漢基先生主講：〈論金岳霖在一九四九年後的思想轉變〉。

12.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般近代史組「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海峽兩岸」系列演講，邀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汪朝光先生主講：〈國民黨在內戰中失利原因的軍事解析〉。

12.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熊秉真女士主講：〈案據確鑿？近世幼科醫案的傳承與傳奇〉。

12.1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傅斯年講座」，邀請中研院人文組院士何炳棣先生主講：〈明清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2.15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日記史料與臺灣史研究——以田健治郎日記為中心」研討會，邀請學者發表論文六篇。

12.15 由中華軍史學會主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美國企業研究所協辦之「二十世紀中國戰爭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假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二十三篇。

12.1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傅斯年講座」，邀請中研院人文組院士何炳棣先生主講：〈明清社會及其相關問題〉。

12.2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舉辦學術討論會，由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張哲嘉先生主講：〈中國星命學中案例的運用——以《古今圖書集成》所收書為中心〉。

12.22 由臺灣文學協會、輔大外語學院、日文系主辦之「近代日本與臺灣」研討會，假國家圖書館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發表論文共七篇。

2001.01.0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美國康乃爾大學歷史系教授 Prof. Sherman Cochran 主講：“Homogenizing the World’s Cultures? Global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01.09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澳洲墨爾本大學管理學系教授(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Dr. Stephen L. Morgan 主講：“Health and Economic Well-Being in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Research Questions and Data Issues”。

01.09 國父紀念館舉辦「第四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發表論文共三十一篇。

01.11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張彬村先生主講：〈陪門財〉。

01.15 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分支計畫研究成果報告討論會，邀請學者共發表論文八篇。

01.1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江燦騰先生主講：〈臺灣的宗教研究：一個歷史學者的觀點〉。

01.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張淑雅女士主講：〈1950年代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改變〉。

01.19 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學術演講，邀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宋有成教授主講：〈東北亞傳統國際體系的變遷——中國與周邊的互動關係〉。

02.0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賴惠敏女士主講：〈從高樸案看乾隆朝的商人與內務府〉。

02.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與女學會合辦學術演講，邀請東華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曾珍珍女士主講：〈女性情慾與女權之辯證關係〉。

02.1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社教系助理教授何義麟先生主講：〈日本殖民地研究與「自由主

義史觀」論爭)。

02.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與東北亞區域研究合辦學術演講，邀請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李曉東先生主講：〈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與國會觀〉。

02.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研究群九十年第一次討論會，邀請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胡衍南先生主講：〈《金瓶梅》：食、色交歡的文本〉。

02.19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專題演講，邀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張錫鎮先生及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逸舟先生分別主講：〈中國大陸的東南亞研究〉、〈新世紀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

02.20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100 Years Onward: Lectures on George Leslie Mackay in the Context of Canada/Taiwan History」，邀請 Michael Stainton (Research Associate,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York University)主講：“Mackay and Bethune as ‘Hero’: Symbols in the State Historical Narrative”；Alvyn Austin (Researcher,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York University)主講：“Our Wild Colonial Boy: Mackay as a Canadian Missionary in Taiwan”；A. Hamish Ion (Professor of History, Royal Military College of Canada) 主講：“Other than St. George: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and Taiwan, 1872-1941”。

02.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李達嘉先生主講：〈公共衛生與城市變革——清末上海人生活文化的一個觀察〉。

02.27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研究員張茂桂先生主講：〈我看晚近臺灣族群研究的發展〉。

02.27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古慧雯女士主講：“Sorting: The Function of Tea Middlemen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03.0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鍾彩鈞先生主講：〈湛甘泉哲學思想研究〉。

03.0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理員藍旭男先生主講：〈上海證券交易所(1946)初探〉。

03.10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學術演講對談會，邀請

魏京生先生主講：〈從牢獄經驗看中共政權的性質與民主展望〉。

03.1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葉春榮先生主講：〈親屬與「宗教」：一個臺灣南部村落的例子〉。

03.1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由副研究員李孝悌先生主講：〈天道與治道——明朝統治意理中的神怪色彩〉。

03.1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第三期第二次小型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發表論文共六篇。

03.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萬麗鵠女士主講：〈1950年代中國第三勢力的組織活動〉。

03.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般近代史組「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海峽兩岸」系列演講，邀請京都大學大學院經濟研究科教授堀和生先生主講：〈1945年以後之臺灣工業化——以近代東亞國際關係為背景〉。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4)

### 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

蘇雲峰著

326頁 精裝300元 平裝250元

本書為《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的續篇，介紹抗戰前的九年間，清華大學快速發展成為國內一流大學的情形。其發展特點為：一、有良好的學校領導人和獨特的領導風格；二、有比其他國立大學充沛穩定的經費；三、有第一流的教學和研究環境，尤其是圖書館和理工學院的儀器設備；四、有堅強的師資陣容；五、有自由主義傳統和教授治校制度；六、實施嚴格的通才教育，並採精英政策，文法理工四學院學生最多時不過千餘；七、政治干預學術，乃時代通病，清華的學術自由傳統雖抗拒了公開的政治干預，卻寬容地下的政黨活動，以致有學生越軌舉動，所幸梅校長領導有方，校園得免淪為政治鬥爭場所；八、畢業生人數不多，但於兩岸三地和美國等處的學術、教育文化、科學研究和工業建設等領域上，均有卓越表現和重大貢獻。總之，清華大學在近代中國動盪不安，欲振無力的高等教育困境中，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樣板。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史料叢刊 40、43、44 三種

## 40 居正先生全集(下)

合編：陳三井·居蜜 精裝 800 元 平裝 700 元 876 頁

居正(1876-1951)，字覺生，別號梅川居士，生於湖北省廣濟縣。早年參與革命，民國以來，歷任黨政要職。編者蒐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現在大陸之報刊雜誌、日本外務省和萱野長知家藏、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淡江大學所藏有關資料，輯為本書，為研究民國史之重要史料。(上)、(中)兩冊已分別於1998、1999年出版。

## 43 水竹居主人日記(一)(二)

作者：張麗俊 (一)精裝 450 元 平裝 400 元 404 頁

解讀：許雪姬·洪秋芬 (二)精裝 500 元 平裝 450 元 460 頁

《水竹居主人日記》是豐原下南坑人張麗俊所寫的日記，日記以工整楷書，詳載日本時期豐原的民生、社會種種，時間長達二十八年。藉由本書可閱讀到當時商社經營、人際悲歡、臺灣禮俗及張家的家族史等第一手資料，是研究二十世紀前半臺灣社會變遷重要的史料。

## 44 孫立人言論選集

主編：朱浚源 平裝 500 元 438 頁

本書將孫立人將軍在民國三十三年到四十三年十年間與帶兵、練兵有關的講演、訓詞、計劃、書序等文章集為一冊，是以一個以將軍為中心所公佈的寶貴的臺灣建軍史料。本書較有系統的是第三部民國三十九年(二)的相關文件，顯現了孫將軍的建軍理想、鳳山練兵的精神與內涵，以及當時臺灣的防衛措施。這部言論集可以幫助讀者了解孫將軍的軍事思想、在軍中的事業、以及他在軍中的人脈。值得讀者細讀。



口述歷史的開拓者與民國軍事史、山西區域史研究的尖兵  
——陳存恭先生



李又寧教授為中國婦女史、現代化史、留學史和華僑史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 本期要目

從北京到南京——參加兩次近代史盛會紀略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讓證據說話：案類在中國」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二十世紀中國戰爭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China Will Complete Its Transformation in Forty Years

Homogenizing the World's Cultures? Global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學人簡介——陳存恭、李又寧

近四十年來香港醫學發展史的研究概況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友聯資料介紹

清代小商販稀珍資料五種

英國檔案所見蘇俄與孫中山及國民黨的聯繫

日本檔案數位化概況介紹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成立一年來的概況

「大陸尋奇」、「中國經驗」：大陸訪查資料經驗座談會紀錄

上海查檔生活二月行

新書評介二本